目 录

论 谈 话

“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和他的朋友谈话之后所说的话。这确是一句真话。“一夕谈”现已成为流行的词语，表示一个人曾经和朋友畅谈一晚，或将来要和朋友畅谈一晚。中国有两三本叫做《一夕谈》或《山中一夕谈》，和英国的《周末杂文集》(Weekend omnibus）相同。这种和朋友夜谈的无上快乐自然是很难得的。因为李笠翁曾经说过，智者多数不知如何说话，说话者多数不是智者。因此，在山上的庙宇里发现一个真正了解人生，同时懂得谈话的艺术的人，一定是人生一种最大的快乐，像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行星，或植物学家发现一种新植物一样。

人们今日在叹惜炉边或木桶上的谈话艺术已经失掉了，因为目前商业生活的速度太高了。我相信这种速度颇有关系，可是我同时也相信把家庭变成一个没有壁炉的公寓，便无异在开始破坏谈话的艺术，此外，汽车的影响更把这种艺术破坏无遗。那种速度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谈话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种悠闲的精神是包含着安逸，幽默和语气深浅程度的体味的。因为说话和谈话之间确有差异之处。在中国语言中，说话和谈话是不同的，谈话指一种较多言、较闲

逸的会谈，同时所说的题目也比较琐碎，比较和生意无关。商人函件和名士尺牍之间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差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谈论生意经，可是真正可以和我们作一夕谈的人却非常之少。因此，当我们找到一个真正可谈话的人，其快乐是和阅读一个有风趣的作家的著作相同（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而且此外还有听见对方的声音，看见对方的姿态的快感。当我们和老友欣然重聚的时候，或和同伴在夜车的吸烟室或异地的客栈里畅叙往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可以找到这种快乐。大家谈到鬼怪和狐精，杂着一些关于独裁者和卖国贼的有趣的轶事和激昂的评论，有时在不知不觉之中，一个有智慧的观察者和健谈者提起了某国所发生的事情，预言一个政权的倾覆或改变。这种谈话使我们一生念念不忘。

谈话当然以夜间为最好，白天总觉得乏味。说话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毫不重要的。我们无论是在一间十八世纪法国女士的沙龙中，或于午后坐在田园中的木桶上，都可以畅谈文学和哲学。或是在风雨之夕，我们在江舟上旅行，对岸船上的灯光反射于水上，舟子有益我们叙述慈禧幼时的轶事。老实说，谈话的妙处乃是在环境次次不同，时地人物次次不同。关于这种谈话，我们有时记得是在月明风清、庭桂芬馥的夜间，有时记得在风雨晦冥、炉火融融的时候，有时记得是坐在亭上，眺望江舟顺流下驶，也许看见一舟在急流之中倾覆了，有时又记得是午夜以后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这些景象和那几次的谈话联系起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永不磨灭。房中也许有二三人，或五六人；或那夜老陈有点醉意，或那次老金有点伤风，鼻音特重，这使那晚的谈话更有风趣。人生“月不常圆，花不常好，好友不

常逢”，我们享享这种清福，我想必非神明所忌。

大概谈话佳者都和美妙的小品文一样；无论在格调方面或内容方面，谈话都和小品文一样。狐精、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东西文化之不同、塞因河畔的书摊、风流的小裁缝、我们的统治者、政治家和将军的轶事、佛手的保藏法——这些都是谈话的适当题目。谈话和小品文最雷同之点是在其格调之闲适。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多么重要，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示出来。因为在文化中，我们无论多么愤慨，对于剥夺我们自由的强盗无论多么恨恶，我们也只能以唇边的微笑来表示我们的情感，或由笔端来传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真有慷慨激昂、情感洋溢的议论，也只让几个好友听见而已。因此，真正谈话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房间里悠闲而亲切的空气中表示我们的意见，身边只有几个好友，没有碍目之人。

我们拿一篇美妙的小品文和政治家的言论来对比，便可以看出这种真正的谈话和其他交换意见的客套商议之差别。政治家在言论里虽则表现了许多更崇高的情感，民主主义的情感，服务的欲望，对于穷者福利的关系，对国家的忠诚，崇高的理想，和平的爱好，及国际永久友谊的保证，同时又完全没有提到贪求名利权势的事情；那种言论有一种气息，使人敬而远之，像一个衣服穿得过多或脂粉涂得过厚的女人。在另一方面，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头发微乱，一钮

不扣，但反觉得可亲可爱。这就是西洋女子亵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和“讲究的随便”（studied 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须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

所以，谈话的适当格调就是亲切和漫不经心的格调。在这种谈话中，参加者已经失掉他们的自觉，完全忘掉他们穿什么衣服，怎样说话，怎样打喷嚏，把双手放在什么地方，同时也不注意谈话的趋向如何。谈话应是遇见知己，开畅胸怀，有一人两脚高置桌上，一人坐在窗栏上，又一人则坐在地板上，由沙发上拿去一个垫子做坐垫，使三分之一的沙发空着。因为只有当你的手足松弛着，身体的位置很舒服的时候，你的心灵才能够轻松闲适。到这个时候：

对面只有知心友
两旁俱无碍目人

这是谈话的绝对必要条件。话既无所不说，结果愈谈愈远，毫无次序，毫无收束，尽欢而散。悠闲与谈话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一国最精炼的散文是在谈话成为高尚艺术的时候才生出来的。在中国和希腊的散文的发展上，这一点最为明显。在孔子以后的年代里，中国人的思想很有活力，结果产生了所谓“九流”，这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一种文化背景，在社会上有一派以谈话为业务的学者。为证明我的理论起见，我们可举出五个富有的贵族，他们均以慷慨、侠义、好客著称。他们都有几千的食客，例如齐国之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人，穿着

“珠履”，住在他的家里吃饭。在这些家里，我们可以料想得到谈话是多么嘈杂热闹的。我们由《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览》这些书里，可以晓得当时学者的谈话内容。后者一书据说是吕不韦的宾客所写，而以吕氏的名字出版的（和十六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的《保护者（Patrons)》一样），这部书里已经有着一些关于丰富的生活的观念，认为一个人最好可以过丰富的生活，否则还不如不生活之为愈。除此之外，社会上产生了一派聪明的巧辩家和专门的说客，他们受着各交战国的聘请，做外交官到外国去游说，使危机不至发生，劝敌军撤退，使危城得以解围，或缔结同盟条约。这些职业的巧辩家往往以他们的机智，聪明的譬喻和劝说的能力著称。这些巧辩家的谈话或聪明的辩论都记载在《战国策》一书里。这种自由而诙谐的谈话的空气产生了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杨朱，以其玩世主义著称；韩非子，以其现实主义（和意大利十五世纪的大政论家马基雅弗利 Machiaevelli 的理论颇为相同，不过比较温和）著称；大外交家晏子，以其机智著称。

纪元前三世纪末叶的文化社会情形，大概由“李园纳环”一段，稍稍可以看出。李园将其女弟介绍给楚相春申君，又由春申君介绍于楚王，大得楚王的爱宠，后来楚国之被秦始皇所灭亡，与此事颇有关系。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女环谓园曰：“我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春申君，径得见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托言？”女环曰：“即不见我，

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有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等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问汝，'女弟何能？'对曰：'鼓琴读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

园曰："诺。"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何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园驰人呼女环，女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这种有教养的女子和有闲的学者的社会背景，结果造成了中国散文第一次的重要发展。有女子能谈话，能鼓琴，能读书，的确是男女交际谈话的风度。这无疑地有点贵族气，因为楚相春申君是不易见到的，然而有女子能鼓琴读书通一经，却非见不可，这便是中国古代巧辩家和哲学家所过着的有闲生活。这些古代中国哲学家的书籍不外是这些哲学家闲谈的结果。

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这是很明显的；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这也是一样明显的。大概谈话的艺术与小品文，在人类历史上都比较晚出，这是因为人类之心灵必须有相当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只有在有闲的生活里才能够产生。我知道今日享受有闲的生活或属于可恶的有闲阶级，可

是我相信真正的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闲，或有闲能够普通。所以有闲并不是罪恶，善用其闲，人类文化可发达，谈话乃其一端。商人终日孳孳为利，晚膳之后，熟睡如牛，是不会有益文化的。

“闲”有时是迫出来，而不是自己去求的；有许多文学佳作是在监牢中产生出来的。当我们看见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耗费精力于无益的社会集会或当前政治论文的撰作时，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关在监牢里。须知文王的《周易》和司马迁的杰作《史记》，都是在监牢里写出来的。有时文人落第不得志，乃寄幽愤于文章间，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或艺术品。元代有那么伟大的画家和戏曲家，清初有石涛和八大山人那么伟大的画家，原因便在这里。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下感到无上的耻辱，这种感觉鼓起了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专心致志于艺术和学问。石涛无疑地是中国过去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画家，他在西洋之所以不大著名，乃是因为满清的皇帝不愿使这些不同情清朝政府的艺术家得到的应得的功名。其他落第的伟大作家开始把他们的精力升华起来，朝着创作之路走去，因此施耐庵和蒲留仙能够写出《水浒》和《聊斋》来。

《水浒传序》虽未必出自施手，然其言朋友过谈之乐，实在太好了。其文曰：

>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

> 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颓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施耐庵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这种格调和情感之下产生出来的，而这种格调和情感乃是有闲的生活所造成的。

希腊散文也是在这种有闲的社会背景下勃兴的。希腊人思想那样细腻，文章那样明畅，都是得力于有闲的谈话。柏拉图之书名《对话录》(Dialogue) 可为明证。《宴席》(Banquet) 一篇所写的全是谈话，全篇充满了席上文士、歌姬、舞女和酒菜的味道。这种人因为善谈，所以文章非常的可爱，思想非常的清顺，绝无现代廊庙文学的华丽萎靡之弊。这些希腊人显然知道怎样运用哲学的题目，比如“Phaedrus”一开题便描写希腊哲学家的可爱的谈话环境。他们的好谈，及他们对畅谈和选择谈话环境的重视，这使我们明白希腊散文勃兴的情形。

柏拉图的《共和国》也不像一些现代作家那样，一开头便用“人类文化之发展过程，乃是一种由庞杂而至纯一的动力运动”一类的迂阔之辞。它所用的乃是这么闲适的一句话“我昨天同格老根 (Glauco) 亚里斯多 (Aristo) 的儿子，到比雷斯 (Piraeus) 去向女神祈祷；同时顺便去看看第一次举行的庙会的光景。”中国古代哲学家那种非常活跃而有力的思想，我们也可在希腊的社会中找到；比方在《宴席》中，他们所谈的是：“写悲剧的伟大作家应不应该也成为写喜剧的伟大作家”等问题，但

是席上是庄谐杂陈，名士时或笑谑苏格拉底的饮量，苏格拉底可以饮，可以不饮，兴则自斟，也不管他人饮否。这样一讲讲到天亮，苏格拉底还是健谈如故，但人人睡去了，只剩三两人，可是不久喜剧家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s）也打盹，跟着亚迦通（Agathon）也入睡乡。苏格拉底没法，只好独自出来，到兰心花园（Lyceum）洗个澡，那天照样精神不倦过去。希腊哲学就是在这种畅谈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在风雅的谈话中，我们需要女人供给一些必要的琐碎材料，因为琐碎的材料是谈话的灵魂。如果没有琐碎的轻快成分，谈话一定立刻变得滞重乏味，而哲学也变成脱离人生的愚蠢学问。无论在那个国家时代里，当社会有一种认识生活艺术的文化时，社会集会中往往产生一种欢迎女子的风气。伯利克利斯（Pericles）时代的雅典是这样的，十八世纪法国沙龙的情形也是这样的。甚至在中国男女社交不公开的环境中，中国的男学者也在要求女人参加他们的谈话。在晋宋明三朝中，谈话的艺术很发达，谈话成为一种风气，于是也就有了才女，如谢道韫、朝云、柳如是诸人。中国人与妻尽管举案齐眉，以礼相守，但是要求才女的心，终未消灭。中国文学史和歌女的生活关系颇深，人们要求风雅的女子参加谈话，乃是一种普遍的要求。我曾碰到一些健谈的德国女子，可以同你由下午五点钟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钟；我也曾碰到一些英国和美国的女子，对经济学共为熟识，使我惊奇不已，因为我对这个科目永无研究的勇气。可是据我看来，纵使周遭没有女子可以和我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

(Engels)，只要有几个女子露着沉思的可爱态度在倾耳静听，谈话也可以风趣盎然。我往往觉得这是比和呆头呆脑的男人谈话更有乐趣的。

（《人间世》第2期，1934年4月20日）

母猪渡河

相传有母猪，带九只猪子外行。将渡河，点一遍，连自己共为十只。乃渡再点，只有九只，环观小猪，固未有失者，然再三点数，仍只得九只，恚甚急甚。哭而死。盖未将自己算进去也。是之谓母猪之智慧。

人类似比母猪聪明许多，然亦常有因恚甚急甚，而忘记将自己算进去者也。如穿西装革履赴国货大会演讲反对洋货者，坐汽车赴运动会作主席自许为鼓励赛跑者，即屡见不鲜。是亦与母猪之智慧相去无几。似乎是亚里斯多德说过，人类者能理论而行为未必合理之动物也（Man is a reasoning, but not a reasonable being)，此语得之。

譬如有人于此：所编为小品副刊，所发表为随感、游记、读书随笔，而偏好攻击他人所编登随感、游记、读书随笔之小品文刊物。甚至随笔所谈亦同为明人书。然攻击之势甚急。是亦忘记将自己算进去耳。“公无渡河，公既渡河，可将奈何。”

又有人焉：义形于色责人春游，以为是“亡国”之兆。而在同期一刊物上登启事曰：“前订本期出版《作家生活专号》，因春假关系，执笔诸先生多乘时出游，致承撰稿件未能如期完成……”其智慧亦与驱车赴运动会而自许为鼓励赛跑者相等。

世上若无此等事，呵呵大笑机会，岂易得哉？

古则有法国文人著书立说，刺刺不休，阐发沉默之重要，卒成书三十卷，今则常见有破口大骂幽默之刊物，在投稿简章中欢迎幽默小品；夜夜在回力球场努力工作者，四处投稿骂人颓废。信哉亚里斯多德之言，人类非合理动物也。然则母猪之智慧，并不希奇。此孟子所以常有“相去几希”之叹。

母猪之智慧既极常见，如之何而后可？中国有名言曰：“眼不见为净。”夫“眼不见为净者”者，孟子齐人一妻一妾章之注脚也。夫良人者，所仰望于终身也，故宜“餍酒肉而后返”，“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亦理之宜。齐人之妻若肯不见，岂不净乎？然彼妇偏欲“瞯良人之所之”，于是发现东郭墦祭乞馀事实，卒至“相泣中庭”，家庭破裂，皆一“瞯”之罪也。吾人读人文章，不应查问人之行径。此为上策。其次，为齐人妻者，既发现东郭乞祭事实，当良人“施施从外来”时，不必“讪”，亦不必“泣”，只须迎笑上前摸其大腹曰：“今日又是那里吃得贵人一腹酒肉？”良人必喜甚。如此家庭亦可不致破裂。

西人有言曰：All fools are not dead yet。吾欲糊糊涂涂以终身，不见不瞯，则满眼皆载道之漂亮文章也。

陈继儒有言曰：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故自有致。然则在鸦片炕上大谈严肃生活，亦有致之一。近水楼台，何时不有妙致，要在慧心人随处享乐耳。

（《人间世》第5期，1934年6月5日）

纪春园琐事*

我未到浙西以前，尚是乍寒乍暖时候，及天目回来，已是满园春色了。篱间阶上，有春的踪影，窗前檐下，有春的淑气，“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树上枝头红苞绿叶，恍惚受过春的抚摩温存，都在由凉冬惊醒起来，教人几乎认不得。所以我虽未见春之来临，我已知春到园中了。几颗玫瑰花上，有一种蚜虫，像嫩叶一样青葱，都占满了枝头，时时跳动。地下的蚯蚓，也在翻攒园土，滚出一堆一堆的小泥丘。连一些已经砍落，截成一二尺长小段，堆在墙角的杨树枝，也于雨后平空添出绿叶来，教人诧异。现在恍惚又过数星期，晴日时候，已可看见地上的叶影在阳光中波动。这是久久不曾入目的奇景，也正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时节。

但是园中人物，却又是另一般光景。人与动物，都感觉春色恼人意味，而不自在起来。不知这是否所谓伤春的愁绪，但是又想不到别种名词。春色确是恼人的。我知这有些不合理。但假定我是乡间牧童，那必不会纳闷，或者全家上下主仆，都可

* 本文经改写以《家园之春》为题发表在英文报纸《中国评论周报》，内容有较大变动，故此处重录。

骑在牛背放牛，也不必至于烦躁。但是我们是居在城中，城市总是令人愁。我想“愁”字总是不大好，或者西人所谓“春痉”，表示人心之烦恼不安，较近似之。这种的不安，上自人类，下至动物，都是一样的，连我的狗阿杂也在内。我自己倒不怎样，因为我刚自徽州医好了“春痉”回来。但我曾在厨夫面前，夸赞屯溪风景，厨夫偏是徽州人，春来触动故乡情，又听我指天画地的赞叹。而事实上他须天天在提菜篮，切萝卜，洗碗碟，怎禁得他不有几分伤春意味？我的佣人阿经，是一位壮大的江北乡人，他天天在擦地板，揩椅桌，寄邮信，倒茶水，所以他也甚不自在。此外有厨夫的妻周妈——周妈是一位极规矩极勤劳的妇人，一天在洗衣烫衣，靠她两只放过的小脚不停的走动，却不多言语，说话声音是低微的，有笑时，也是乡女天真的笑，毫无城市妇女妖媚态——凡中国传统中妇人的美德，她都有了。只有她不纳闷，不烦躁，因为她有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心地，既然置身于小园宅，叶儿是那样青，树儿是那样密，风儿是那样凉，她已经很知足了。但是我总有点不平。她男人以前常拿她的工钱去赌，并且曾把她打得一脸紫黑，后来大家劝他，我立了一条“家法”，才不敢再这样蛮横。他老是不肯带她外出，所以周妈一年到头总居在家中。

但是我是在讲“春痉”。年轻的厨夫，近来有点不耐烦，小菜越来越坏了，吃过饭，杯盘都交给周妈去洗，他便可早早悄悄的外出了。更奇的是，有一天，阿经忽然也来告半天假。这倒出我意外，阿经向来不告假的。我曾许他，每月告假一天，但是他未告过假。但是这一天，他说“乡下有人来，须去商量要事”。我知道他也染上“春痉”了。我说：“你去吧！但不要去

和同乡商量什么要事。还是到大世界或新世界去走一遭，或立在黄浦滩上看看河水吧。”我露齿而笑，阿经心里也许明白我明白他的意思。

阿经正在告假外游时，却另有人在告假常来我家中走动。这是某书局送信的小孩。这小孩久已不来了，因为天天送稿送信，已换了一位大人。现在却似乎非由小孩来不可，就是没有稿件，清样，他也必来走一遭，或者来传一句话，或者来送一本杂志。我明白，他是住在杨树浦街上，所看见的只是人家屋瓦，墙壁，灰泥，垃圾桶，水门汀，周围左右一点也没有绿叶。是的，绿叶有时会由石缝长出，却永不会由水门汀裂缝出来的。现在世界，又没有放小店员去进香或上坟的通例。所以他非来我这边不可，一来又是徘徊不去，因为春已在我的园中，虽然是小小的园中。自然他不是来行春，他不过是来“送信”而已。

人以外，动物也正在发“春疟”，我的家狗阿杂向来是独身主义者。若在平日，住在家中，它倒也甚觉安闲自在。我永不放它出去，因为它没有挂工部局的狗领，我又不善学西人拉着它兜风去，觉得有碍观瞻。但是现在不行，我的园地太小了，委实太小了；骨头怎样多，它还是不满意。我明白：它要一个她，不管环肥燕瘦，只要有个她便好了。但是这倒把我难住了。所以它也在发愁。

不但此也，小屋上的鸽子也演出一幕的悲剧。本来我们租来这所房子时，宅中有七八只鸽子，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现只剩了一对小夫妇，在小屋上建设他们快乐的小家庭。他们原打算要生男育女，养一小家儿女起来，但是总不成功。因为小鸽出世经旬，未学走先学飞，因而每每跌死。那对少年夫妇歇在对过檐上，眨眼儿悲悼的神情，才叫人难受。这回却似乎不

同，聊有成功之希望了。因为小鸽已经长得有半斤重，又会跑到窗外，环视这偌大世界，并且已会扇几下翅膀儿。但是有一天阿经忽然喊着说“小鸽死了！”轰动了全家人等出来围问。这小鸽怎样死的呢？阿经亲眼看见它滚在地上而死。这条命案非我运用点福尔摩斯的本领查不出来。

我走上摸这死鸽项下的食囊，以前他的食囊总是非常饱满的，此刻却是空无一物。巢上尚有两枚鸽蛋。那只母鸽坐在巢中又在孵卵。

“你近来看见那只公的没有？”我盘问起来。

“有好几天不见了。”阿经说。

“最后一次看见是在何时？”

“是上礼拜三看见的。”

“唔！”我点首。

“你看见母鸽出来觅食没有？”

“母鸽不大出来。”

“唔！”我说。

我断定这是一桩遗弃妻子的案件。就是“春疟”作祟。小鸽确系饿死无疑。母鸽既然在孵卵，自然不能离巢觅食。

“薄幸郎！”我慨叹的说。

现在丈夫外逃，小儿又死，母鸽也没心情孵卵了。这小家庭是已经破裂了。母鸽零丁孤独的歇在对过檐上片刻，顾盼她以前快乐的小家庭一回，便不顾那巢中的蛋，腾翼一飞，不知去向了。我想她以后再也不敢相信公鸽子的话了。

（《人间世》第5期，1934年6月5日）

中国人之聪明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而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可算得是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奸巨猾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奸巨猾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

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入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吾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

> 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以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奸巨猾，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一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暗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晚，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人间世》第6期，1934年6月20日）

论小品文笔调

文本无一定体裁，与书法同。或称人曰，某书法学赵学苏，皆是骂人的话。所谓书法之体者，皆个人之体而已，盖不熔炼前人，自成一 家，即不成书法。若与前人悉同，曰摹曰拟可耳。为文亦然，惟自客观立场研究文学，互比参较，乃可辨出异同，而与异同之间，分出门类。文选所分，如赋、论、表、檄等，系就其内容言之，非赋论表檄各有不同笔法也。西洋分文为叙事、描景、说理、辩论四种，亦系以内容而言，亦非叙事与描景各有不同笔法。惟另有一分法，即以笔调为主，如西人在散文中所分小品文（familiar essay）与学理文（treatisc）是也。古人亦有“文”“笔”之分，然实与此不同。大体上，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起伏分明，小品文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学理文则为体裁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此中分别，在中文可谓之“言志派”与“载道派”，亦可谓之“赤也派”与“点也派””。言志文系主观的，个人的，所言系个人思感；载道文系客观的，非个人的，所述系“天经地义”。故西人称小品笔调为“个人笔调”(personal style)，又称之为 familiar style。后者颇不易译，余前译为“闲适笔调”，约略得之，亦可译为“闲谈体”、“娓语体”。盖此种文字，认读者为“亲热

的”(familiar)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钮扣之心境” (unbuttoned moods)，略乖新生活条件，然瑕疵俱存，好恶皆见，而作者与读者之间，却易融洽，冷冷清清，宽适许多，不似太守冠帽膜拜恭读上论一般样式。且无形中，文之重心由内容而移到格调，此种文之佳者，不论所谈何物，皆自有其吸人之媚态。今日西洋论文，此种个人笔调已侵入社会及通常时论范围，尺牍，演讲，日记，更无论矣。除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学考据论文之外，几无不夹入个人笔调。而凡足称为“文学”之作品，亦大都用个人娓语笔调。故可谓个人笔调，即系西洋现代文学之散文笔调。若Lytton Strachey以此笔调，起传记文学之革命，称为现代传记宗师，亦仅如此关系而已。若美国Time周刊，以小品笔调记时事，亲切而有意味，博得社会欢迎，亦仅此关系而已。盖现代人心思灵巧，不以此种笔调不能充量表其思感，亦不能将传记中之人物个性，充量描写出来。此理甚易见得。试将袁子才之《祭妹文》与归有光之《先妣事略》文相比，便可看出两种文体传情达意之力量相去有如霄壤之别，归所叙为其先妣事略，为他人之先妣事略亦未尝不可，惟袁子才之祭妹则断断非袁妹不可。归有光那样矜持，无论文胜于情，即使情胜于文，亦客观之情而已，何能如子才放声大哭，一字一泪乎？所以说来，亦只是古典派与浪漫派之不同而已。若侯朝宗与李香君一段哀艳之情，写来只有四百八十五字之《李姬传》，全将个人伤感隐伏起来，矜持至此，真气煞人也。惟在古典派批评家看来，此正侯公子之文学工夫，可见古今观点实在不同。——

在白话刊物中举例，则《现代评论》与《语丝》文体之别，亦甚显然易辨。虽然现代派看来比语丝派多正人君子，关心世道，而语丝派多说苍蝇，然能“不说别人的话”已经难得，而其陶炼性情处反深。两派文不同，故行亦不同，明眼人自会辨别也。语丝之文，人多以小品文称之，实系现代小品文，与古人小摆设式之茶经、酒谱之所谓“小品”，自复不同。余所谓小品文，即系指此。且现代小品文亦与古时笔记小说不同。古人 或有嫉廊庙文学而退以“小”自居者，所记类皆笔谈漫录野老谈天之属，避经世文章而言也。乃因经济文章，禁忌甚多，蹈常袭故，谈不出什么大道理来，笔记文学反成为中国文学著作上之一大潮流。今之所谓小品文者，恶朝贵气与古人笔记相同，而小品文之范围，却已放大许多，用途体裁，亦已随之而变非复拾前人笔记形式，便可自足。盖诚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此种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是之谓现代散文之技巧。故余意在现代文中发扬此种文体，使其侵入通常议论文及报端社论之类，乃笔调上之一种解放，与白话文言之争为文字上之一种解放，同有意义也。余意若郑元勋《文娱》，刘士璘《古文今致》，陈继儒《古文品外录》(注)，这些明人所选“外道”文章，内中亦大有佳品，差足见出“小品文”之用途及范围非可以笔记偶谈漫钞丛录等尽之也。

《人间世》以专登小品为宗旨，所以关于小品之解释，必影响于来稿之性质，而来稿之性质，又必限制本刊之个性。在此本刊个性尚在形成期间，似应把小品范围认清。余意此地所谓

小品，仅系一种笔调而已。理想中之《人间世》，似乎是一种刊物，专提倡此种娓语式笔调，听人使用此种笔调，去论谈人间世之一切，或抒发见解，切磋学问，或记述思感，描绘人情，无所不可，且必能解放小品笔调之范围，使谈情说理，皆足以当之，方有意义。本刊之意义只此而已，即同于《论语》中所云，“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至谈话内容与题材只看各位旨趣之高下耳。宇宙之大，万象之繁，岂乏谈话材料。或谈古书，相与勖励，而合于“相与观所尚，时还读我书”之意。或谈现代人生，在东西文化接触，中国思想剧变之时，对于种种人生心灵上问题，加以研究，即是牛毛细一样题目，亦必穷其究竟，不使放过。非小品文刊物所弃而不谈者，我必谈之，或正经文章而廓大虚空题目，我反不谈。场面似不如大品文章好看，而其入人处反深。须知牛毛细问题辨得清，则方寸灵明未乱，国家大事亦容易辨得是非来。读书养性，正在此等工夫，世人不察也。其与非小品文刊物，所不同者，在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无拘无碍而已。若非有感而作，陈言烂调，概弃不录。至于笔调，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惟看各篇能谈出味道来，便是佳作。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贵。但倘有酸辣辣如里老骂座者，亦在不弃之列。因论小品文笔调，想及本刊，附书数语于此。

作者注：按《媚幽阁文娱》，崇祯刻本，较不易得，余所得仅初集（参阅本刊第二期沈启无《闲步庵随笔》）。《古今文致》余所见有崇祯刻兰雪斋《增订文致》本，及天启刻王永启《评选新隽》本，系刘士璘原选，王永启增删，计刘增订本与王本

比较，删王本一〇二篇，增五十七篇。王本有光绪间文玉山房翻刻，颇易得。《古文品外录》陈继儒选评，董其昌、蔡祖芬同校，共二十四卷，皆古人所不理之“外道”文章也。

（《人间世》第6期，1934年6月20日）

论玩物不能丧志

余尝谓玩物丧志，系今世伪道学袭古昔真道学语。今人谓游名山，读古书，写小品，便是玩物丧志。然德人善登名山，法人好读古书，英人亦长小品，而三国人之志并未丧，并不勇于私斗，怯于公愤，如吾同胞。然则国人之志本薄弱可知，丧之不足惜，不丧亦不能为也。

孔子好歌好和，好鼓瑟，好射，好乐，不删“郑风”、“陈风”，不删“关雎”、“桑中”诸章，“学而”第一章，即以读书为乐事，《论语》到处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盖孔子洞澈人情，只求中和，不以玩为非，尚不失为健全的人生观。汉儒曲解毛诗，宋儒则变本加厉，以玩为非，陷入道学。今儒又比宋儒进一步，并游山，读书，小品，亦欲禁止。大约行愈卑者言愈伪，此心理分析所谓“求平”作用（compensation）与麻子特才钻同一道理，不然则不足保持其心理上之均衡。

“玩”在西洋社会已取得相当地位。西洋男女喜作乐，甚至夫妇携手同行，毫不为耻，只是表示一种自然的人生观。今我国人效之，似亦不觉得怎样。倘无西人榜样，真不知当如何斥为伤碍风化的事。西人踢球，吾人仿效之，倘无西人榜样为踢球者之护符，不知又当如何遭人反对。

中国人独好山水花鸟。山水花鸟，即中国之所谓玩。中国人看见成人在球场上抢一只球，总以为可笑，踢球之姿势，七颠八倒，亦有伤大雅，君子所不为。惟在初夏晴日，趁夕阳西下，沿堤散步，看柳浪，赏荷花，观池鱼，……乃为成年人之玩赏乐趣。其散步，亦主安闲自在，不似英人所谓country walk在大日中急步数里，回来罩上羊毛衫出汗，始谓之exercise。

中国人生活苦闷，得以不至神经变态，全靠此一点游乐雅趣。西人之评中国文化，最称赞奇异者，即在不堪其忧之中，穷人仍然识得安乐，小市民在傍晚持鸟笼在街上谈天，江北车夫在茅屋之外，种些金花草。盖中国人无宗教，其所以得性灵之慰安者，专在自然之欣赏。此一半系中国诗文的遗赐，使常人亦识得鸟语花香之趣。今之复兴民族者，只许人踢足球，不许人看花赏鸟，真不知如何说法。工农阶级倘不得踢球，又不许看花赏鸟，失了东方人欣赏自然之精神，真不知将何过日子也。

然古人以玩为非，尚有系统的哲学在焉。理学家以为凡玩足使心性浮动，故女子必以礼教防范之。盖以为小姐游花园，情根一动，即为祸苗，禁之不使游花园，亦不失为防微杜渐之计。今日中国风俗已受西方影响而浪漫化，女子可游公园，青年可踢足球，要人可看电影，画家可画裸体，凡有西洋祖宗为护符者，皆不敢讹议。独东方式之游玩，必认为玩物丧志，此而言复兴民族，民族岂不殆哉！

在此东西文明接触之时，最用得着健全的批评眼光。小品文只是一种笔调，等于西洋之familiar essay。如何能令人丧志，

百思不得其解。吾恐国人詈陈眉公、冒辟疆之小品，余勇可贾，而詈蒙旦、哈兹烈脱之小品，真无此勇气。吾其急急抬出蒙旦、哈兹烈脱以为护符乎？

（《人间世》第7期，1934年7月5日）

时代与人

据说这个时代是伟大的，但是时代伟大与否须看这时代的人是否伟大。时代错误，误把二十世纪当做十六世纪，固然老朽，然而根本失了人格，喘着气急急忙忙趋新骛奇的投机主义者，也不足为伟大的时代增光。所以这个时代是否伟大，也是看有无伟大的人。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不是盛世之点缀。

现代中国人脾气，近于美国，不近于英国。美国是未成年的儿童国，忽而麻雀，忽而哥而夫，忽而 Crossword pule，哄，哄，哄一年半载便都忘却，又去赶最新的热闹。麻雀、哥而夫、Crossword pule 就是玩具，而儿童非有玩具不可，而且玩具非迎新弃旧不可，在哥而夫时行之际打麻雀即名之为落伍。全国就是这样哄哄哄度岁月。然而这并不是美国国民之伟大处。

英国人便稍许不同，高洋楼不大肯造，旧名词不大肯改，剃头机关椅不大肯坐。美国人跑到伦敦 King's a way 理发室看见只有平平正正的坚厚的木椅，暗笑英国人落伍。然而英国人以为坐在木椅理发仍然就可以过活，而且暗中窃笑全美国人民就是被广告术哄骗的儿童。英国人是不大会受广告欺弄的。这也许就是英国国民之伟大。

美国报纸论调是降低以就市井无赖的，编排要叫街人注目，

杀人放火新闻必列第一版。英国报纸是比较镇静的，循规蹈矩而来，论调太肤浅下流，就要遭人鄙薄。两国报纸各有高下二种，但是大体上有这个分别。

美国人因电气风行，戏台演剧全然没落，如 Schubert Theatres 也要倒闭。伦敦的演剧却仍然与电影并行。我私衷是佩服英国人，而不佩服美国人的。

牛津、剑桥大学许多图书馆没有卡片索引，许多寄宿没有凉热水管。然而剑桥学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间惟我独尊，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谁为独尊皆不在乎。此数大学皆能保存其个性，虽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时似乎落伍，然而一九三〇年时代自身消灭之后，牛津、剑桥仍岿然独存，并不会随一九三〇之风尚以消灭。

是的，人须有相当的傲慢。辜鸿铭、康有为是傲慢的，不是投机的。辜、康虽然落伍，仍然保持一个自己。与时俱进加入国民党之军阀虽然博得革命，却未必是“迈进”的时代的光荣。罗文干的外交政策已经落伍，然而罗是傲慢的，不是投机的，一时代多傲慢的人，时代就会伟大。

也许资本主义诸国都要消灭，但是英国消灭必最后，此可断言。我不大相信英国会落伍。英国所落伍的，只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

然而中国又与美国不同。美国投机而同时有容忍批评的文化。中国人却是投机而加以笼统。

凡是舶来货都是好的。凡是古老的都是不好。这是中国人的笼统。富家不肖子弟不能开发先人遗业，只数家珍以示人，固不足取。然富家子弟卖祖上园宅去买汽车、造洋房，未必是兴

家之象。

凡是文言都是坏的，而不能评鉴文言文学中之真伪货色，便是笼统。甚至认语录为文言，因不看而加以定罪，也是笼统。凡是白话都是好的，而对于食洋不化的白话四六，不能加以纠正，也是笼统。

把文学根源所在之“性灵”糊里糊涂认为白话、文言文学上的问题，也是笼统。西洋文学中之 individuality，personatily 便是好，中国文学里之“性灵”便是不好，也叫做笼统思想。

这样下去，中国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因为不会有真正批评的文化，所以这个时代（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的时代）也不会为后人称为伟大。

因周作人不投机，所以周作人“落伍”了。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自身没落以后，周作人文章不会跟着消灭。一九三〇年间哄哄者恐要消灭。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怕为时代遗弃而落伍者，先已失去自己，终必随那短短的时代而落伍。

在这熙熙攘攘、世事纠纷的世界，只有一字可做标准，就是“真”。一人宁可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不可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说襟腑独见的落伍话，至少良心无愧，落伍得痛快，落伍得傲慢。而且即使一时见解错误，尚有生机。说虚伪投机的合时话者，方寸灵明已乱，不可救药。

（《人间世》第 8 期，1934 年 7 月 20 日）

说 浪 漫

晨起雨霁，作云中闪数日，见此心地亦随之而放。窗光照纸上，如蓝天海月，照人颜色，更喜，乃执笔记叙此心境，不负此晨光。因思日来濛雾蔽山，不能出门寸步，颇似名教及文学上之古典主义。处其间者，亦终日守身如玉，存履霜临冰之念，兢兢以终世至入棺木，是岂得人情之正者？孔子闻人歌而乐则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于未时申时举行也，今世儒者即定时亦不敢歌。哭而恸，酒无量，与点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于情感之证。至若见一不相知者之丧，泪珠无故滴下（恶其泪之无从），直是浪漫派若卢骚者之行径。盖儒家本色亦求中和皆中节而已，第因“中和”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误解“中和”，乃专在“节”字“防”字用工，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观，一变为阴森迫人之礼制，再变而为矫情虚伪之道学，而人生乐趣全失矣。汉之儒学趋入陈腐，专习章句，已无有生气。既无有生气，于是有第一次浪漫运动之魏晋思想出现，比儒士之守绳墨如虱行裤中缝线。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乃人性之正反两面，为自然现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独霸天下之中国亦不能免。儒者不自知其过，而直詈清谈，岂知此乃自身俗论引起之反动。时势所成，积重难返，儒家反抗，亦无奈何。自

是道家思想遂成为中国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遁世、若欣赏自然，皆浪漫主义之特色，入自然者愈深，则其恶礼制愈甚。阮籍等之倡狂放任，唾弃名教，即浪漫派深恶古典派之本色。或者不是深恶，只是若庄生之呵呵大笑的轻鄙而已。唐之道风不绝，至宋而有理学出现，苏黄之诋谑理学，亦即浪漫思想。明末后有浪漫思想出现，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至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挚，反抗矫揉伪饰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尚有一些文章可读者，亦系借此一点生气。此些人尚可自称为儒，并肯自称为儒，实系孔子人本主义基础打得宽的缘故，故在其"近情"范围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许人归返自然也。此时若屠龙之浪漫思想最明。此人尚放任，尚伟大，尚高傲，若鸿苞书《中庸奇论》说得最清楚：

> 俗人局井蛙夏虫之见，乏见大寥廓之观，惟知世间之啖饭遗矢以为中庸。稍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为奇，而惊骇疑畏之，此庸众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贤智坐困。苟非挺金铁百炼之性，负凤凰千仞之气者，鲜不俯而就俗尚，趋常局，以免于世之疑骇，世道又何赖乎？此其关系夫岂浅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个关键，眼光实超人一等。我以为中国伟大人格，正在贤智坐困而俯就俗尚，趋常局耳。在看得起人类者，都不会赞成此种陷贤智于常局之圈套。试思中国四万万同胞，何以出不了一位甘地，并出不了英国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关系，岂非如赤水所云？否则天生四万万同胞，皆庸才无

疑，而非礼教俗尚之罪也。赤水又曰：

> 古豪杰遇今之时，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而居显要享富贵者，必啖饭遗矢之辈。啖饭遗矢而外，稍有所举动，悉奇也。此岂国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当不是天不生豪杰，当是天生了豪杰，而豪杰为世所困耳。世人既鄙奇崇庸，黠者乃饰其奇而隐于庸，以与世浮沉。讨王公大人喜欢，求得一官半职，从庸众啖饭遗矢，又从庸众生子生孙，而国事乃无人过问。夫岂真儿女情长，英雄肝胆自生得不结实耳。及至庸胜奇之势成，半个甘地乃不可得，半个路易乔治亦不可得。从此可知中国之病已入膏肓。赤水黄泉有知，亦当三叹。

吾故曰，中国可产龟，但断产不出长颈鹿。因在中国，颈太长是一桩罪过，人人执一斧待而砍之。惟有龟，善缩颈，乃得人人喜欢，而龟龄鹤寿，亦果然可以办到。是之谓中国式之养生。

（《人间世》第 10 期，1934 年 8 月 20 日）

无字的批评

Mendelsohn 有"无辞之歌"，安徒生的"无画绘帖"，还有好些题目，如"没有听众的演讲"，"没有收信人之函牍"，都可做得十分出色，可惜没人做过。这还不在话下，只说庄子也有所谓"不言之辩"句，含有大道理在焉。这"不言之辩"，也就近乎"无字的批评"意思。

庄子的意思是说，世上道理讲不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越讲越支离破碎，于是报屁股上吵闹愈凶，双方投稿愈起劲，则问题愈不明白。所以说道可道，非道也。故有所谓不言之辩，让人去自家体会。所谓"体会"，也不过说平常读者胸中自有一点是非，也有见道之本领，常人虽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逻辑之训练，青红皂白却是懂得。所以这个体会两字，也不必说得像佛家"悟禅"，或如陆九渊"悟道"那样神秘。

在逻辑上之意义，所谓道可道非道也，也有很深的学理。因为道是浑浑噩噩的一片，经学者一分析，遂变成甲乙丙丁之各片面，而失其整个性，甲乙之下又各有一二三，道由是更加割裂破碎而失了本来面目。因为这一离开，狡者遂便于掩饰而成所谓饰词强辩，由是道越辩越吃亏。譬如日本侵东三省，欲为之强辩，也可以做成一篇很好的辩论文，由历史上、经济上、现

实上，说明日本不得不占据沈阳、锦州之理由。纽约有著名的“外交研究会”，曾为此问题开会，会中就有某国际法律专家引经据典发挥一场，结论为“日本之占据沈阳并不违背国际公法”。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悟辩之无益及分析的理论之靠不住了。那时我碰巧在座，所以在发言时，也不与辩，只说两句话：“依国际公法，日本占据沈阳是合法的，这已业经专家证明，料想不会错了。不过我向来很不敢相信律师。”意思是，若我们不用学者分析的理论。只用常人茶楼上评时事的说法，就用不着理论。日本占据沈阳是欺负人家，是想霸占人家，很清楚了，所以说道是浑浑噩噩的一片，而分析的理论常靠不住。这是庄子“不言之辩”的深义。

中国人向来不重逻辑，也就是这个缘故，凡事只凭直观。因为直观是整个的、非分析的，所以反而容易见出事理之是非，及道本来的面目。女人是没有理论而只有直观的，然而临了事急，我还是相信女人当机立断的主张，不相信男人。因为直观不离现实，整个局势全在把握。男人的主张虽有甲乙丙丁的理由，然而说甲时已忘了乙，说乙时又忘了丙，甲乙丙都可互相矛盾，而且心中已有主见，要列出甲乙丙以自慰并不难。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个缘故。历朝建朝帝王，如朱元璋，如刘邦，都是市井无赖，因为无赖未读过书，只有直觉，而对付现实之本能反强于书生。只顾不管三七二十一，无赖干去，遂干出一帝王万世事业来。中国人知道理论靠不住，所以用“情”字来调和，不但言理，且兼言情。入情入理，则凡事不错。这是中国人思想原则之特征。

这且不在话下。庄子说“不言之辩”，现代人偏偏好辩。杂

志及报屁股，专以骂人逢迎读者。据说批评很难，西方学者都这样说，然而今人都以为批评很容易。其所以难，就因为同是一个人，评人之短，未必即露出自己之长。而且批评者，既同是一个人，读者自要批评他一下，而自身就成了被批评之对象，不过对方未必答辩。多半读者，亦不为文辩之，只对某批评家得了一种印象，静默。这静默就叫做“无字的批评”。譬如有人在街上愤愤的说：“他妈的！放他的小驴大臭屁！他为什么骂人？”旁人就对他用了“无字的批评”。

又如有人站在台上说现今教员这国语甚坏。倘自己用的是教员的国语，大家惟有静默，这种静默中也就含有“无字的批评”。可惜不曾有人发现以非国语批评他人国语之妙法。否则倒是十分安稳。故以声辩声，不如以无声辩声。以言辩言，不如以无言辩言。

又有骂人不革命、消沉、住租界。读者心中总以为你自己为何不在江西打仗？这也是无声无臭无字的批评。

凡批评的文章，自身都脱不出文章的范围。那篇文章仍然免不了有眼光、见解、理论、气量、格调、动机等等。眼光有高低，见解有深浅，理论有疏密，气量有宽狭，格调有雅俗，动机有诚伪。倘若那篇的眼光是卑下，见解是浅薄，理论是空泛，气量是偏狭，格调是浮躁，动机是鄙恶，就给人家一种印象，而受无字的批评。

可惜世人智慧去母猪不远，每不将自己算进去。以小品文表示“我憎小品文”，就屡见不鲜。然而诚如庄子所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自身既落了一个是非，又同是一个人，越揪打，本性越见，偏狭、浮躁、卑下、浅薄、鄙恶、滑头越暴

露。即使满纸之乎也者，仁义廉耻，主义立场，世道士风，皆无用也。因为这些文章已受读者无字的批评。

尤有可惧者：倘若批评一错，认璞作石，指鹿为马，虽然无人与之辩，总留下一个痕迹。后人只消说某人认璞作石，某人认鱼目为珠，两三句话就可下定某人之批评。比如以近人为例，吴雨僧在民国廿二年反对白话，戴传贤在民国廿三年信佛。这无言之辩已是可怕。

（《人间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

大学与小品文笔调

近日闻大学毕业生亦闹失业问题，甚喜。喜纸老虎揭穿也，喜一张大学文凭亦不甚灵也。夫吾岂全无心肝幸灾乐祸之徒，然吾恶社会及学府之骗局，故亦喜骗局之揭穿。惟其恶之深，故亦喜之甚。大学青年沉迷于骗局之中四年，今一旦醒悟，如之何使我不喜？夫谁不知入大学，非所以求学问，乃所以骗文凭，求文凭乃所以骗饭碗，今执一张文凭以入世应世，饭碗仍骗不着，毕业即失业，于是始而疑，继而恶，终而得。且大声疾呼联盟结社以互相救济，而引起未毕业青年之警惕危惧，岂非佳事哉？

社会有罪，诚然。今日四十岁大人有才无用武之地，投资家有资无投出之法，在此全国买空卖空以度日的世界，何暇来顾初出茅庐之青年？经济愈恐慌，竞争愈酷烈，青年中良者坐对四壁长叹家中，狡者狐群狗党，投降势力，相倾相轧，使尽气力，以谋得一差半缺，皆社会经济压迫使然，亦不必深罪。然此一哄，使大家觉悟不是靠一张文凭便有饭碗到手，已是好教训。

今日青年闹失业，与今日女子闹失恋求婚同。此中苦疼惟子女之父母知之，然无论何种状态，女子仍有嫁得出者及嫁不

出者，青年仍有谋得业者及谋不得业者之别。竞争愈酷，则各人谋所以树立之心愈切，女子搽粉涂脂愈用工夫，而青年研摩实学亦愈用心，是诚一大好事。须知人寻机会，机会亦寻人。所苦者空空洞洞，一知半晓，无一专才实学足以问世而已。汝读英文，有报馆请英文翻译，汝吃得消乎？汝专中文，有学校聘中文教员，汝能无负此职乎？各人只要有一样确确实实特出专才，出以问世，或者一时经过磨折，终有汝出头日子也。

然大学教育亦太不为青年着想矣。今日大学生无个人笔调。教学子如养群鸭，复不知甲有何长才，乙有何优点，得暇而栽培之滋养之，使之成器。一旦上课，皆以最低能者为准，知其最低率，不知其最高率。拙者每课三页，能者每课三十页，则以三页为限。某生已览何书，未览何书，应览何书，皆不知也。大学既无个人笔调，教出青年亦无个人笔调，无性灵，无特才，无实学，只要他单位八十，分数六十，即赐以文凭，赠以学位，驱而送之大门之外，如此而欲其不失业，其可得乎？

须知大学所以如此，因其好大故也。教三十人易，教一千人难。人既有一千之谱，亦只好用蒸馒头法子，一笼蒸来二百只。想大学若能弃其好大之心，改称书院，收生欲少，教学欲专，作小品文，不作大品文，不要文理法商样样齐全，却单办一个绝好不过之文学书院，或办一绝好不过之植物学书院，如此则人尽专才，即使竞争如何剧烈，求学当较不生问题。今有一大学使人称曰："凡此大学毕业生，中文必优，必可用。"不谋实德，单骛虚名，办大学者，与有罪焉。今之人但知大学之

道，学院以多为贵，学生以众为荣，全无小品文味道，全无个人笔调，宜乎大学个个平庸如一班和尚头分不出高下也。

（《人间世》第11期，1934年9月5日）

罗素离婚

来沪以前，看见外报罗素第二次离婚的新闻。只短短的十几行，使我发生无限感想。初想这位现代圣人，倒也有切身的苦痛。前听志摩讲，住在他家里时，看见他也曾发怒打小孩屁股。这在《教育与好生活》之作者及具有新教育理想倾家办私塾之伟人，倒很耐人寻味。罗素第二夫人，来北京时，尚是勃烈克女士，时为罗素书记。时我在国外求学，未曾见面，北平学界中人曾见过者当不少。后来她（!）们回英。罗素就离婚而娶勃女士了。我只知道她也是一位有新理想的女子，著有《快乐之权利》一书，并曾经译过她著的一小册《女子与知识》（北新出版。此书无人顾问，谅久已绝版）。所以他们夫妇俩对于婚姻的理想及态度，我是很熟识的。最可惊异的，是他们主张夫妇一时有外遇，或是暑假期间有一段艳史，都属无妨，且言痛斥者是妒忌之非。前几年美国发生林赛所提倡之伴侣结婚问题，罗素也曾在 Forum 同 Mr Dougall 笔战过，极力拥护这新办法。然而他们竟然离婚了。不知是那一方逃不出妒忌，或有他种原因，我们无从推敲了。因而想到不知此时，勃女士乐不乐，罗素乐不乐，而已离异孤居之第一夫人此时又有何感想？再想婚姻是这样复杂的问题，古今圣人都不能免。在中国孔孟都出妻，

在西方耶稣则不娶，释迦亦忍心从他爱妻的睡着的身子跨过出了家。只有穆罕默德不出家，不离婚，却用讨姨太太方法来救济苦闷。倒是苏格拉底欣然处于悍妇淫威之下，逆来顺受，深得幽默之道。他曾遭老婆的恶声痛骂，痛骂之后，正要出门，复被老婆泼一桶冷水，浇满身上。苏却处之泰然，只说“雷霆之后，必有淫雨”，就此出门了。他说婚姻如学骑，马性愈悍愈可习练德性。想孔子何不用此工夫。然而孔子之妻是离呢？是逃呢？史无明文，在我推想后者较有可能。食不语，寝不言，这已够难受了。何况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配色那样艺术，衣服那样讲究，使孟光伺候亦当觉麻烦。又何况，事事善于发明，与人不同，亵裘长，短右袂，非换寝衣不可，寝衣又须长一身有半。虽然这些都是孔子深有所见，独出心裁之处(短右袂，便工作；长寝衣，防伤风)，但是在不学无术之孔子夫人，却不能不叱为咄咄怪事了。何况，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厨下备饭之人，切肉就要多一倍工夫。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尚有则可，若失饪不食，就得忙得慌，不然当家的人，又得看老爷饿半天了。不时不食，早上买菜就不容易了。至于割不正也不食，不得其酱也不食，孔子之妻当已萌离家之念矣。若一时赶不出来，做妻子的人心慌，怕他过饥，叫阿鲤到街上买点肉松，添点酒敷衍得过去，一顿饭可以平安无事，倒也罢了，偏偏沽酒市脯又不食，于是孔子之妻行矣。

婚姻是这样的烦难，所以今日婚姻问题，算是社会问题中之最复杂问题。离婚，娶妾，都有流弊，谁也知道是不妥善的办法。原因是婚姻强叫生理上情绪上必然不同，实际上过两种生活的两个人，去共过一种生活。这两人对于文艺思想人情事

物，必有不同之反应，兴会好恶，必然不能一律。叫这些时浮时幻之兴会感好，息息相应，脉脉相关，若合符节，真非易事。万一两方情意好合，相适相就，互相体贴了解，经过十年八年的操练，也就像一双旧鞋，适足无比，这就是所谓美满姻缘了。然而现代教育，又不教人这些常识，这些常识也不是课堂上讲得来学得来的。况且性情啬衲，总是难免，胶漆好合，十无一二，所以婚姻成了问题了。现在圣人也逃不出常例，也没人能想出完满的办法，除非是天主教严禁离婚及中国人白头偕老这种抹杀问题之存在，以无办法为办法之办法了。我所知者，婚姻是女人最大最稳的保障。无论何时，男子变坏而夫妇之道灭，恩爱之心轻，总是女人吃苦的。离婚也好，娶妾也好，伴侣结婚也好，自由恋爱也好，都是穷极无聊的办法。即使女子经济独立，女子也不能占便宜。天地间男女有自然的不平等，是否天地以女人为刍狗，无从得知；造物只知道传种二字，无所谓仁与不仁。外国自由恋爱的夫妇，大家誓以恩爱为始终，经济负担平分，然而所谓负担平分，儿子出来，每每变成什七与什三之分，谋生之外，家总是女子管的，孩儿的奶总是找女人吃的。一旦恩绝义尽，近代女子慷慨履行前约，让夫自由。这时四十岁的男子所享的再恋的机会，与一个生过三个小孩之色衰的四十岁妇人，乃俨然不同。这叫做什么自由平等？所以任何办法，都是无办法中之办法。

无办法，然而娶妾离婚，亦是无办法中之办法。中国人是家庭主义，所以主张娶妾，保持妻在家庭之地位，及保存家庭之整个性。西人以婚姻为个人恩爱之事，故恩绝爱尽则离婚，而使家庭破裂，妻子离散。在中国，男子有钱，或是发泄性欲，或

是忽然感到爱的冲动（这爱的冲动，在生理上，并非限于青春时期，由二十岁到七十岁，男女都可有，婚姻只许冲动一次，毛病就在这里），于是有外遇，由外遇而娶妾回家。妻固然心中不乐，但是她妻的地位是保存的，仍享母道之权利，仍得子女团圆之乐，只听老爷去胡闹罢了。在西方，女人去诉求离婚，拿了赡养费出来独居，或是再嫁或是在社交上出风头。谁得意呢？我不敢下断语。有时我想弃妇的零丁孤苦，较有妾之妻为难受。即使经济独立，室家已失，名位已败，妾心藕如丝，虽断犹牵连，十年恩爱，一旦泡影，顾怀往事，能无慨然？这个是非，何从去讲，横竖得意的也是一个女人，失意的也是一个女人。离婚之可恶，在有一新欢，必有一弃妇。这时自有一位得意之佳人，亦必有一位无论如何不能得意之匹妇。这其中，我想很不公道，但是以婚姻为单纯基于个人一时情意之人，是无法避免的。中国人于爱字之外，加一恩字，再加情分二字，还有点道理。恩虽似乎不平等，但不必如此解，只说大家顾念一点旧情分罢了。况且还有义字，十年劬育之劳，亦未便一旦丢之脑后。况且待母即所以教子，这些关键，专门治教育学之人现在已有点模糊了。一个得意佳人，排在眼前同居共室，自然也碍目，也何尝什么平等？但是有时我想现在女子得了平等观念，再不能与另一妇人共享一夫，却把老的同性赶走，倒有点近乎野蛮人之战争相似，近于物竞天择了。物竞天择，于是美者胜，丑者败，少者生存，老者淘汰，倒是归返自然了。所以同性之相欺，还厉害于异性。以前女子为事势所迫，偶然钟意于有妇之夫，真的爱他，也愿屈身为妾，以礼事妻。现在据一夫一妇之义，少女性逐出老女性，才叫做文明解放。但是女人既然喜欢这样，以

为这办法较好，也就听之罢了。问题是这样的新又是那样的旧。人性未改造以前，婚姻也必无完满办法。我非观世音菩萨，不能为女子消灾解厄。发泄性欲之多妾老爷，也不必读此文章而自鸣得意，婚至不可不离之男子，也不便一概责备。我亦非包龙图，不能识破人家闺阃衽席之是非冤枉。世事是这样纠纷的。婚姻之事更无可治人异症的万应灵方。最好是不要有非离不可之情境。也许只有男子多公道存心，多念旧情，及增加一点父母的责任心，才能够少许减少这情境之发生吧。至于此种情境已发生，女子又不赞成纳妾，主张离婚，以为老者退位，少者补充为较完善办法，则应同时主张提高弃妇之地位身分，使在社交上可大出风头，或可多得再嫁的机会，不使有“下坂车辚辚，畏逢乡里亲”之感，而减少社会的残酷与弃妇之羞辱，略如西洋一样。至于要女子对情敌之同性保存良心，我是不做这种梦的。

（《人间世》第 11 期，1934 年 9 月 5 日）

辜鸿铭论

George Brandes 著　林语堂 译

是篇为一九一七年丹麦文评大家勃兰得斯所作，收入他所著之 Miniaturen 书中 (Erich Reiss Verlag, Berlin)。辜鸿铭于欧战未终时，曾著长文，题曰 Verteidigung Clinas gegen Europa《为中国辩护反对欧罗巴》，其他论文，亦有译为德文者。时欧洲大乱，人心对西方文明之信仰基本动摇，故辜氏之论调，甚足炫惑人心。本文第一段叙述该篇大意，第二段叙述"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ce People) 要旨。读勃兰得斯此文，可知辜氏论调之要点，及其在西洋思想界之影响。勃兰得斯学极淹博，于近代欧洲文学思想，无不融会贯通，故此文中参入批评，亦能抉核见微，与寻常评论，又自不同。——译者。

(一)

瑞典学者斯万伯 Harald Svanberg 译述辜鸿铭著作，由是使我们得窥到此位卓著的中国学者对于欧战及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思想。比之通常欧洲人士所仅识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语了。

辜鸿铭氏生于一国，其国中既无欧洲的世传贵族，又无美国之金钱贵族，凡常人只须能科举中试，皆可升为绅士，并且凡绅士除依其中试之鼎甲外，不得升迁。同时我们可以说辜鸿铭的家世门第，比我们的伯爵男爵还高贵久远。他的家族出于西历纪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统治中国之王室。(按元和姓纂云泉州晋江有此姓，相传辜为厦门同安人，其望出晋江。一云，其先因被辜自悔，以辜为氏，如敕氏，赦氏，谴氏之类。然则勒氏所云或者是据瑞典译者解'汤生'二字之误吧?) 在精神上，他也是真正的中国人，是一位儒者，热烈崇拜二千五百年来支配中国人思想之孔夫子。

孔夫子的道理，前曾为 Voltaire 与 Leibniz 所钦服，现在也得辜鸿铭不倦的向欧人宣扬。此公向为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直至民国建立以前曾享文誉，不但精通东方学术，且于东方文学之外，熟谙我们的文字，写的是英文，引据的是法德作家，而最好讲的是腊丁文。他生于槟榔岛，早年被他的父亲送到欧洲，留学十二年。他在苏格兰得了博士学位，而渐成苏格兰学者卡莱尔 Carlyle 之热烈崇拜者。卡氏生时，他还有时会到，他与卡莱尔一样崇拜歌德为欧洲的最高人物。他看见孔子的精神学问经过几千年后重复见于歌德身上。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卡莱尔于辜鸿铭的影响。

可以确知的是：歌德是德国唯一的作家给过辜鸿铭深刻的印象，余则用法文写作的德人 Leibniz，由于他极口称扬中国文化之伟大精微而引起辜氏之同情。还是英美作家较常给他影响——尤其是 Matthew Arn old，Tennysn，Emerson。在法国文学中有时他也亲炙那些不大知名的作家如 Joubert 及那些不为

人所爱及若有若无的诗人如 Beranger。

他讲到欧洲时，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他新颖讨人喜欢的观点。有时偶然也可见到我们已经弃而不用的学说的痕迹，如在学堂课本也可见到。比如：他相信犹太国族之亡是因为与耶稣的关系；罗马民族之亡是因为不听耶稣的话："谁拔剑者，须亡于剑。"（按勃兰得斯系犹太人，故对此尤觉不满。）

但是这些辞句，只是他在欧洲大学听讲时所留下偶然的踪影。在这样一位自立脚跟，坚确求道，及文字极有清新力量的人是不足介意的。

先讲他关于大战起源之说法。据辜氏，说也奇怪，大战是起源于英人流氓崇拜及德人之武力崇拜。英人之流氓崇拜（Poebelkultus，尝见英文作 mob-worship）可由大英帝国，听市侩实业家之戏弄，向南非洲两个蒲尔民主国宣战这事实看出来。依这位华人的意见，英人对流氓这样恭顺，引起德人极深痛的不平，而激起德人之武力崇拜。这武力崇拜不久就变成武器崇拜。

辜氏虽然普通极佩服德人之优点，但是据他意思早晚德国民族必亡于这武力主义。这种主义发生一种罪恶，在中国人眼光比任何罪恶还坏，就是蛮横，不识轻重（Taktlosigkeit），一味恃强，有伤恕道。我们很有趣的看他在最近中国事件举出什么例子，代表他这样憎恶的缺德。他举的是在中国京城的大街上迫中国人所造的克持拉碑（按即哈德门街上的克林柏牌坊）

在由欧人侵略激起的拳民之变乱中，北京有一位疯人误杀德国大使。明知使四万万人为一疯人闹出的案负责，是极不合情理，但是德国政府还是逼迫造此碑坊，留为中国之耻辱。这正像奥国逼迫意大利在罗马 Korso 中造一纪念以利沙伯皇后

的碑，因为一位发疯的意大利人拿一皮匠的扁钻刺杀那位可敬的无辜的皇后。中国人最重礼仪，所以在外交上受人无礼侮辱更比他国民族深为愤慨。依辜鸿铭意见，中国民族有三大特征，就是，沉潜、远见与淳朴。

所以他觉得欧美民族不易了解。美国人大凡有远见淳朴而乏沉潜；英国人大凡沉潜淳朴，而乏远见；德国人远见而沉潜，而乏淳朴。依辜鸿铭，好像只有法国人最能了解中国人。固然，法人没有德人的沉潜，也没有美国人之远大眼光，也没有英人之单纯思想法，但是他们有的是 情感，细腻，而中国古老的文化非细腻聪明者不能了解，因为自希腊亡后，中国人比任何民族细腻聪明。

二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文明，是一种没有祭司阶级及没有兵士的文化。

在辜鸿铭所最痛恨的革命以前，中国比任何国度较有自由：没有教士，没有巡警，没有公安局捐所得税等——总之，凡使欧洲人民苦不欲生的文物，一切都没有。

中国有句格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谁只要与中国士人稍有接触，就会惊异感觉中国人之痛恶战乱及轻鄙军士。

斯万伯氏说得好，Thomas More 于亨利第八年间在他的《乌托邦》书中所梦想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只是欧人不知：一种没有贵族，没有祭司，而只有士人贵族为最高贵阶级的社会。

辜鸿铭最喜引用歌德一句话，表示中国的精神："世上有两种势力：公道与礼义 (Recht und Schickliohkeit。)"

"义"是孔教基础之一。其他一基础中国人名之曰"礼"。这

是一种极难译的字，辜氏译为Takt（英文tact），但却与原意不尽符，因礼字指一种繁文缛节之礼仪。斯宾塞在他极好的书《礼仪的政制》(Ceremonial Goverment)中，推究礼之普遍原义，这意义常是仅指一种上古时代的拘束罢了。但在孔子看来，如在一切道德家看来，各种的礼节都含有伦理的深义，而依这位晚近儒者辜鸿铭的意见，这“礼”（即待人接物的礼貌）的价值重要并不在“义”字之下。所以他虽然极口赞扬德人的公道观念，却把这次战祸归罪于德人礼貌观念的缺乏。（按辜鸿铭译礼为Takt甚妙，系指待人接物体会人情，而“无礼”译为Takt loalckoll，特指为人粗率傲慢无端伤人。）

同时这战祸，无论在德人，或在其敌国，却有更深的理由。（并非如辜氏说那样简单。）

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不得不鄙视欧人。

由中国人看来，欧人或是美人是一种非靠教士及军人不能自治的人类。中国人自治也不用教士，也不用军人。孔教，教人做好百姓的教，已经证明，在二千五百年中，能不靠教士军警，统驭一个比欧洲更大的民族，使就轨道。

据这位中国批评家的意见，欧洲所恃以维持社会国家秩序者有两样：就是敬神与畏法。所谓敬畏，必先假定一种权力。

为要保持敬神观念，欧洲须得养活一大班游手好闲的人，名为“教士”。这些人不但极靠不住，并且也要浪费巨资，所以成为欧洲人民极大的负担。辜鸿铭认为宗教改革（路得马丁）及宗教改革之战（即“三十年战”）只是欧洲人民要排去教士阶级的企图。

天主教禁止人民的（思想）自由，使得贯入敬神观念，然

而因为天主教势力已经溃灭，所以又有一种方法，想用法律的制裁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为要使人有畏法观念，又须养成一班更浪费金钱更游手好闲之徒，名为巡警及军士。那末，依辜氏意见，在大战期间，欧洲人民渐觉养这一班士兵，比养教士还要浪费，简直可以破产。正如在宗教改革时代，欧人有意排斥教士，现在大战期间，也想起一种念头，要由军士之下自求解放。所以要维持社会秩序，我们须如辜氏有点天真的说法，归返于教士统治之下，不然，军队既然变成无用，我们就得另求新路，觅一新教，以代替那旧的，依他意见一堕不可复振的畏神观念。所以结果，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中国的古道，教人做好百姓的教——一种人文主义，以义为本，以英人所谓 gentleness 为欧人的基本道德，以君子为人的理想，如东方民族几千年来所奉为理想之君子一样。

（二）

由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人的说法，据辜看来，中国的民族是主情的民族。据他说，德人之武力阶级比欧洲同阶级的人少粗暴性；而中国人的武力示忠厚和让，正与欧人之野兽抢掠本性相反。

据他说，中国人没有兽性。倘使在他身上找点与兽相近之处，也不是狐狸一派的理性，能偷到小鸡就偷，而是近乎亚剌伯骏马一种的聪明，虽然不懂英文文法，却能领会它英国主人的意思。

中国的精神生活，据辜氏意见是心肠的情感的生活。因此中国人对于环境外观（洁净?）极不注意。中国的语言是心肠的

语言(这名词有点欠明了),所以小孩及未受教育的人最易学会。这班人学语言最易，在各国都是一样。中国人长记忆力，也是主情的记忆。中国人的礼貌，也是由衷肠流露出来，非如日本人硬学来的。

辜氏以此说解说外人所一致指出的中国人不精确的习惯。情感是一种极微妙的天秤(觉力),但是我们用心肠想事总不如用头脑想事之精确。

辜氏说中国人之用毛笔，可以象征中国人之理智。毛笔画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运用也较难。但是学会了之后，倒反轻重如意，浓淡得中，写来比钢笔美观动人。

欧人说中国文化发育一半即不长进，说中国人对于抽象科学缺乏能力。辜说中国人并不是发展一半的民族，乃永不衰老的民族。中国人兼有赤子之心及成年人之智慧。他极力阐扬,欧人情感理智之冲突，心肠与头脑之冲突，不见于中国。关于中国人缺乏进取精神，他未曾说到。

欧人有一种宗教,安慰他们的心灵,但与他们的理智冲突。

中国人没有欧人所谓宗教，因为中国人，就是群众也不真正重视宗教。道观佛庙礼式仪节之用,是作生活之点缀小玩,并非性灵的启迪。

中国人不感觉宗教之迫切需要，因为中国人思想向来不去推敲来世，亦不去打破宇宙来源之谜。但是他们虽不需要欧人狭义的所谓宗教，却于孔教中已有了一种广义的宗教，就是歌德在以下几句所指的意义——

谁有科学与艺术，就也有了宗教；谁两样都没有，就须有宗教。

由中国人看来，欧人将宗教与人类社会国家隔开，非常奇异。宗教教欧人做好人，孔教却教人做好百姓。欧洲所谓宗教，教人成圣，变成天使；中国人之所谓教教人做孝子顺民。辜氏作一妙语说“政治在欧洲是一种科学，在中国是一种宗教。”（按此指“政教”观念。）

孔子生前，中国人也有情感理智的冲突，与今日欧洲一样。孔子生而此冲突遂化归乌有。他不像老子，卢骚，托尔斯泰，专门攻击鄙弃文明。他教人，由于教化，人才可以立身行世。

人类受宇宙之谜的压迫，所以需要科学，艺术，宗教。这些减轻他心上的压迫。艺术与诗词叫士人处处见出美；哲学与科学教他处处见到秩序规律。天灾人祸，世事变迁迫着大多数的人求一种安全的躲避；生老病死迫着人类求一种永久。

欧洲在宗教中追求这安全与永久，中国人在代替宗教之孔教中也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及斯宾塞的哲学都不能在欧洲得到同样的成绩。多半的人不能明了他们的理想，也没有那种德性来服从他们的法律。宗教之价值在于教人能听良心的吩咐。

辜鸿铭说：人以为由于教人敬畏上帝，才能达到这结果。但是孔教却不用宗教，也收到同样的成效。他只教人义的观念。辜氏知道，一切立教的教主，都是极富感情而慈悲为怀的人，都归结以公道与慈爱为最高观念，而名之为上帝，但他虽觉得这甚自然而且有意义，却认为不关重要。

依他意见，欧人认为宗教之现形（所谓教会）的宗旨，在于教人民信上帝，这是一种错误；这层错误在最近时代叫许多正直的人讨厌教会。辜氏引英国史家 Froude 的话说：“我在英国听过几百篇讲道，讲宗教之神秘，讲教士奉行上帝的意旨，讲

使徒师承的传统等等，但不曾听见过一篇讲通常的廉耻，讲这简单的训命：不可说诳，不可偷窃。”对此一点，辜鸿铭只指出，教会的义务并不在于叫人注意这些单纯的道理，而是做一种神感，引起人一种活泼泼的热诚。

欧洲耶教，及回教怎样激起这神感，引起这活泼泼的热诚呢？他们的方法是引起对教主的爱，激起对教主有无限的爱慕崇拜。这里可见孔教与耶回两教的区别。回教教人迷信穆罕默德，耶教教人信奉耶稣，孔教却不教人崇奉爱慕孔子。（按指不奉孔子为神明。）孔子生时，他的门人是爱慕他的。他死了，他个人地位就不立于孔教之前。

欧洲有教堂，中国则有学校以代之。学校的地位与西方之教堂正相同，因为中国指宗教之字，正是“教”字。同时学校不尽与教会之范围相同。学堂之外，还有家庭。各家有神主，各城有祖庙。家庭与学校在中国合成外国之所谓教会。

辜氏对于他的议论有这样的简单的结语：孔教力量之源在于敬爱父母，犹如各教力量之源在于敬爱教主。耶稣教会说：爱耶稣！回教教会教人：爱先知！中国的教会教人：爱你的父母！——一位欧洲人附上说：这样却使批评祖宗成为完全不可能，但是这批评却常是进步的来源。

（《人间世》第12期，1934年9月20日）

关于《人间世·辜鸿铭特辑》的弁言*

辜鸿铭特辑之出，并未提倡什么宗旨，只是一天晚上，肚里盘算，关于辜鸿铭材料有七八篇之多，觉得此人值得研究认识。你说，阿猫阿狗也值得研究么？我说，辜鸿铭并不是阿猫阿狗，而且如果阿猫阿狗肯用头脑，有独特的见解主张，亦是值得认识研究。你又说，他妈的反动尊君尊孔，也值得研究吗？我说，反动也值得研究，而且依本年行价，尊君是反动，尊孔却非反动，老辜也不过反动一半而已。你又说，他的思想有毒。我说，有毒也得研究。今日随波逐流之人太多，这班人才不值得研究。倒是难得一闻彻头彻底开倒车的人的见解，来让我们分析体会，到底有毒无毒，毒在那里，并且看看其思想系统是否一贯。譬如尊孔是无毒，尊君是有毒，这有毒与无毒之两方面是否有必要的关连，如非有这样坦白无伪的思想家给我们分剖，就不易明白。况且一绝顶聪明人，用了终身思维工夫，评判东西文化，著成《春秋大义》（原文为《中国民族之精神》），替我们揭要发凡，点出要着，我个人是想看看他如何说法的。你又说，如果有毒如何？我说，不同你讲了！你这人大概很容易

* 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毒。你也很容易丧志，蚊子一叮，便会发循还疟，秋风一吹，便会患肺膜炎。你是卫生家，我不同你讲了。

老实说，《人间世》并非为此等读者办的。

本期因加此特辑，原有读者随笔，杂俎，诗，译丛，书评等为篇幅所限，只得从略，读者谅之。

（《人间世》第 12 期，1934 年 9 月 20 日）

怎样洗炼白话入文

（一）

吾于《论语》廿六期（《语录体之用》及《可憎的白话四六》）表示深恶白话之文，而好文言之白，时余不知今年白话倒霉年也，又不知吾所欲纠正者，竟有人欲打倒。于是十分抱歉，想拥护白话之文又非做不可了。在第一篇已言“白话作文是天经地义，今人做得不好耳”。今日仍是这个想头，并无变卦。夫文人恶习，好填塞，为文曰“一颗受了重创而残破的心灵是永久的蕴藏在他的怀抱”，曰“女人最可畏的物质贪欲和虚荣心她渐渐的都被培植养成”，既不明又不白，罗里罗嗦，则非纠正之不可，但又有人欲一古脑儿推翻白话，或复兴旧式文言，或另树旗帜与之对抗，则又非急急起而拥戴之不可。须知吾之拥戴语录，亦即所以爱护白话，使一洗繁芜绮靡之弊，而复归灵健本色之美，岂得谓吾之赞叹金圣叹“大君不要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之句耳。然则吾之爱白话诚甚，且更甚于欲脱离白话另起炉灶之大众语文人也。

大众语问题发生时，吾未敢遽发议论，而数月来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自由谈》此类文章无一篇不读，无一意见不领教，真是辗转反侧。反侧结果，但见一篇说高尔基教人洗炼白话及黎锦熙一文正中下怀。黎锦熙之言曰“那我终于不知道他（大众语）和国语或白话有甚么异同了！”我亦始终不知道其与白话文有何分别也。白话范围宽大，有何不容？有何不好，须来打倒？有何不治之症，在大众语便可得治？胡适之下白话之定义曰“明白之白”，二十年来结果文人作白话仍是不明不白，然则今日倡提大众语，二十年后文人所作仍不大众可必也。文人有什么捞什子可容于大众语而不容于白话乎？大众语并非方言，便是普通话，普通话非白话乎？大众语文人明知大众辞汇缺乏，须提高程度，由大众提高之白话，非白话乎？大众语主张掺入欧化新名词，掺入欧化新名词之白话，非白话乎？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给我们见识见识，只管在云端呐喊，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

故欲纠正今日文字之失，仍是大家先学做好白话文。须知今日白话之病，不在白话自身，而在文人之白话不白而已。此症不除，换一名目，亦不能除。文人之病在好填塞，用烂调。好填塞之由，竺翁说得十分清楚：“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叠用人名，直书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取现成以免思索”，即矫，空，懒三病也。此三病不除，只管换任何新招牌，仍会一溜烟陷入填塞烂调之弊。乃因白话浅显，加以作家意见浮泛，索然无味，读者生厌，作者亦虑人生厌，故天然必走上粉饰之途，以文其陋。“你的老婆，我的老婆”写厌时候，又必回到“夫人”、“妻”、“内子”、“拙荆”。此有意建造大众文学之人所必留意而早为之者也。

凡一国之文字必有其传统性，欲入大众口中之文字尤必保存其传统性。必欲排除外国名词，若十七世纪之英人，及近代德人之所谓国粹家（purist）者，固然见地太狭，不足为法，而醉心欧化认为国语有毒者，欲排斥文言，行其保姆政策，一手建造“新大众语”，亦未免痴人作梦。国语中多文言遗产，为何不可享受？一时矫揉，必难持久。写厌了“欢喜得了不得”时，自然而然会写“欣喜雀跃”，写厌了“比不过他”时，自然而然会写“相形见绌”，写厌了“话说的投机，大家心中理会”，自然而然会写“相视莫逆”、“心照不宣”等文言句，乃中国文字传统中锻炼出来之成语，亦即吾国文学之遗产。用乎？不用乎？若以为太不大众而摒弃之，恐不仅文不洁净，恐并“辞达”二字亦办不到，其结果是否梦想中之“大众”所欢迎，亦成疑问；若其用之，则又与今日白话有何分别？此又努力大众文学之人所应从长计议者也。

若曰，文字欲其美，欲其洁净，是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大众所要，此语虽甚时行，实则表示摩登文人之浅薄功利主义而已。洁净与达意排不开。谓“大家心中理会”不如“心照不宣”洁净可，谓其不甚达“心照不宣”之意亦可。至于文字只许达意，不许其美，骂为布尔乔亚，亦不过如云吃菜只须补养，不必美味，此非近代卫生饮食论也。盖菜色不美，或菜味不甘，则胃汁不大出来，有碍消化。苏俄新成立时，以为妇女皆应不搽粉，打倒其所谓小资产阶级“可憎的迷恋时装之心理变态”(The wretched psychosis of fashion)。今年年初乃有苏俄政府颁给国立脂粉馆女主席“列宁勋章”之事。苏俄妇女初亦认脂粉为性的奴隶之表记，毅然将镜子一齐都打碎，一如鼻头不油

光便是反革命。孰意不数年间，一车蛇皮新鞋运到苏都时，苏俄妇女成群结队争先恐后包围，至须红军出队镇住，蛇皮鞋子始得安全无恙。今则并由苏俄政府分送胭脂与女工矣，盖认为如此，人才活得下去，而工作亦易得良好成绩也。（见 Vogue，本年四月一号）然则文字欲其美，似非反革命矣。此又提倡大众语者所应及早见到者也。

况今日提倡大众语者，非仅欲求文人幻想中所臆测之大众之"意识形态"而迎合之迁就之，并欲改造吾国平民之"意识形态"，以符吾主义。此即所谓国语有毒说也。且无论长衫阶级配不配能不能了解工人之意识，即此保姆政策，欲将工人原有意识加以淘汰，为之抉择，自身又不读平民所好读之《七侠五义》，只读卢那查斯基，大众果然肯不肯读汝的货色，则尚有疑问。所谓国语有毒，纯系肤浅之见，即使有毒，亦非三数文人至三数十文人所能改造，而置语言之历史性于不顾也。夫所谓有毒者何？迷信之语也。现代英人不信乔治大仙，而赌咒仍言 By George，不信"人身四液说"，而言人沉默寡言者仍称之为"痰气" phlegmatic，而英人并未因此中毒。然则国语中之"肝火""脾气""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吓得"魂不附体"，气得"七窍生烟"。用乎？不用乎？以科学言之，四月八日比佛祖生日好也，夏季比三伏高明也，阳历九月比廿四秋老虎科学也。用乎？不用乎？佛祖生日，秋老虎，三伏用之则深得大众语意味，皆大众所欢迎，弃之则惟有意识形态物质环境一套西洋把戏，能深入大众之心乎？大众固有大众之读物矣，其对大众有极大之魔力。谈大众语者非努力看大众所看之章回小说不可。今且有人主张"改造"《水浒》、《红楼》而去其毒，吾以为狗尾续貂的

勾当仍是不做好。能改《水浒》者惟有啃窝头之山东第一流才子，非吃洋点心之青年。今既无此啃窝头之才子，并无啃窝头之念头，乃欲迫之而就我，究竟一国文字可否容许你如此抉择处置，而能保留其生命，实可怀疑。现此已有人言，“拿货色来”，大众语拥护者曰，且勿心急。实则并非人家心急。连你所讲亦非国语，亦非白话，亦非文言，亦非欧化语之所谓大众语，人家亦不懂，有无三头六臂，汝亦说不清楚也。吾以为并非拿出货色来要紧，是货色拿出来时大众要不要睬汝，乃是要着。若大众要睬不睬，则汝僵矣。此时所谓大众意识如何，全是文人梦想，及真要迎合大众心理，使大众读你文章，尔时必不是你的文章能磨炼大众意识，而反是大众意识能磨炼你的文章，否则死亡。然则大众语弟兄非但《水浒》、《红楼》要看，乃并张恨水之《啼笑姻缘》亦不可不看矣。此又提倡大众语者所应思量一下者也。

创作自是好事，但亦应善引前车为鉴。西洋文学，据我所知，并无所谓大众语独别于白话者。英文中描写“一只飞机在空中像一只蜻蜓飞来飞去”句子，读来甚好，在中文便有人恶其不文。然以如此健全标准之文学仍不见有人提倡以大众之语为文而别于白话。或有一二作家，如 Will Rogers 以俚语批评时事，一针见血，极有力量，如 Ernst Hemingway 以美国口语写作小说，亦维妙维肖，实亦不异《水浒》、《红楼》描写口吻之绝技。英文普通文字，惟有行文或深或浅之别，文白之间未尝有何一定界限，亦非有文章全然一致一回事。盖据一说，英国矿工常用辞语不过七百字，英人固未尝梦想以七百字行文也。至于苏俄是否有大众语其物，则吾不知。倘使有之，是如何样子，

颇想一看。此又提倡大众语者所应详加考较者也。

吾意大众语必无声无臭的归还白话，真正大伙儿的话，文人必学不来，但能从此学会写明白的白话，而矫正今日白话洋八股之弊，是亦一大佳事。倘能实地工作，依实录方法编一部精确的《京都字典》，则吾更将焚香顶礼而膜拜之，因吾欲查京话，尚须检 Hillier 氏之《英汉北京土话字典》也。

（二）

须知流行白话之可憎，乃白话作家之罪，尤其是“海派”作家之罪，非白话之罪。白话作家能写成老舍老向何容白话，已了不得。吾尝谓（《论语》四十期《语录体举例》）“白话提倡至今十余载，而白话语法之妙，文人尚未尽量移入文中。若胡适之所引‘你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白话达意传情句子，在今人作品中极少见之”。又曰：“大凡《野叟》《红楼》白话之佳，乃因确能传出俗话口吻，而新文人白话之劣，正在不敢传入俗话口吻……夫白话提倡时，林琴南斥为引车卖浆之流之语，文学革命家大斥其谬，而作出文来，却仍是满纸头巾气，学究气，不敢将引车卖浆之口吻语法放进去。”此中弊源，乃在文人“文”的观念之误。文人所谓文者，乃文彩之文，非文理之文，乃粉饰之文，非本色之文。石有纹，云有章，此文章之本义。善行文者，议论风生，层层滚出，此本色之文也。八股文之佳者，亦在其起承转合段段逼出之奇，非关文字辞藻也。故所谓文者，即思想议论之纹路，若《红楼》凤姐的话，篇篇好文章也。识得凤姐话里文章之美，始可与言文。随举一例（三十回）：

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向宝玉黛玉）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也没见你们两个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

此尚不是凤姐最好文章，最好文章一时也检不出。然此种话里文章乃文之本义。行文者能学凤姐说话，即是文学大家，若只是在修辞改句掉文弄墨，皆真所谓雕虫小技，不足以言文，亦不足以言锻炼白话入文也。白话不敢用引车卖浆者流之语，好用烂调，即正在此雕虫小技上用工夫所致。吾常见友人谈话，风采焕发，层层滚出，津津有味，以为此人若肯就此作题材，就此写下去，便是绝好文章，有机趣，有譬喻，有妙语，有见解，有风调。吴稚晖之文，即近此派，毫不造作，而不容你不读下去。

吾理想之文字乃英国之文字。英国文字，所谓最正派者（in the best tradition），乃极多土语成语之文，非书本气味之文。英国散文大家，绥夫脱也（《小人国》作者），第否也（《鲁滨逊》作者），莱姆也。试读诸子之作，何尝有丝毫书本气？若Macaulay，Arnold之文，只好算第二流，因腊丁名词过多，书本气过重也。英人得此种正确传统，乃有极灵健之文字，而有极好之白话。谓"检讨经济最穷之方面"乃书本英文，曰"看

看鞋子那一方窄痛”(find out where the shoe pinches)乃上流文字。谓“劳意乔治与守旧党妥协”乃下流文字，曰“劳意乔治吊守旧党之膀子”(Loyd George's flirtations with the conservatives)乃真正上流正统英文。英文在各国文字中首屈一指，乃一方由其辞汇之丰富，一方由其文字之灵健 virility。其所以灵健，乃因其尊土话成语 racy，idiomatic English 为正统也。犹如中国人人能尊曹雪芹为文学正统，取之以为标准白话文，将来亦可有好白话文章，中国文字亦必灵健无疑。实则英文文字固有二宗源统，一为法语腊丁语，一为盎格罗撒逊语，故今日英文辞字中每每有二名词同表一义，欲其典雅，则用法语腊丁语，欲其矫健，则用盎格罗撒逊语。如“得”字有 obtain，get，“爱”字有 affection，love，“家宅”有 residence，home，“掘”有 unearth，dig 等等。第一字用于典雅处，第二字用于灵健处。其中关系，适与中国之有古文白话相同。“惆怅”比“恼”高雅，而“恼”却比“惆怅”有力；“废然而返”比“搭讪回来”古朴，而“搭讪回来”却比“废然而返”雄劲。今人但悉得“废然而返”之美，而不知“搭讪回来”之妙，殊不足以论文。盖物有新旧之分，语有古今之别，古者则得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与英国文字相同。但采用白话尤为重要，因人忽略故也。且白话多反映现实语。凡文字必不可无反映现实之辞字，文字多抽象名词则流为萎弱。中文固最好具体名词而最缺抽象观念，然能善用之，正可产生好散文。若“大小”观念只以具体之“大”与“小”合成，“长短”观念只以具体之“长”与“短”字撮合，无所谓 Size，length 也。“是非曲直”已具体矣，而又不如“青红皂白”之具

体。不能知人之心则曰“我岂汝肚里之应声虫?”此是如何活泼一种说法!若今日文人必曰:“我何以能够了解你的意志呢?”再进一步必又曰:“我何以能推知你思维之程序呢?”今日最佳之现代英文,乃能将二种字面,抽象的及具体的,连贯起来。如言 A “nose” for news, the “cobwebs” of knowledge, the “drift” of language riding on the “tide” of success,若将 nose, cobwebs, drift, tide 等具体字面改为 appreciation, accumulations, tendency, forward movement,则全失文字精彩而文字自身流为靡弱。白话本性既极具体,再加入文言之淡远字面,运用适中,锻炼起来,必有极灵健之散文出现,与任何国文学媲美也。吾理想中之白话文,乃是多加入最好京语的色彩之普通话也。

试以此一观点读《红楼》,便可知白话之字亟应收入文中者甚多。“待放下又放不下”待字甚好。“你可仔细”可字甚佳。白话中“可”字最能传神,“可不要把身子弄糟了”,“可不是吗?”今文中少见。“只管出神”,只管亦好,出神亦好。“叫人心酸”心酸亦好,“总不理会”总不亦好,理会亦好。今人“可”字不能用,“只管”亦不能用,“心酸”则易以“悲哀”,“理会”则易以“注意”,却不知“理会”,“计较”,“睬”皆极好字面。“睬他一眼”,“觑他一眼”亦皆灵妙。“不许恼了”,恼字比发怒动怒好。“你又在跟前弄鬼”,又字亦系传神字。吾前作《论语》小评,有一题曰《又来宪法》亦系借用此法。“别提那个了”,今人作“提起”,全失白话精彩。“派他一个不是”、“落个不是”,“派”、“落”字亦是真正口语,须多用。“打抱不平”今人言“路见不平”,亦不及原语声势。“选”《红楼》曰“拣”曰

"挑"("拣了几种进去")。动词《红楼》用得极其灵活，若"向宝玉怀里一摔"、"黛玉戳他一下"、"递了过去"皆是。余如"合眼"、"记挂"、"害臊"、"受气"、"受用"亦用得维妙维肖。今人不言"合眼"，只说"闭着眼睛"，亦是白话写得不好之证。

其实白话中尽有许多传情达意之字皆比文言具体。"害臊"今人作"惭愧"，"记挂"今人作"记忆"，"念头"今人作"思想"，"思量"今人作"思索"，"受用"今人作"享受"，"受气"今人作"怨愤"，"赏乐"今人作"欣赏"，"日子"今人作"时间"，"快活"今人作"愉快"。实则论其传情，后者皆不如前者。公安诸子尺牍中"思量""受用""快活""日子"等字面皆尽量用过，惜今人不能用耳。实则不但明尺牍语录如此，古文诗词佳句亦每每含有此种味道，能运用平常字句，画出一副光景。若"月挂树梢"，挂字便是寻常字，"载月归来"，载字亦是寻常字，余如"踏雪"，"枕流"胜于"横流"。至如"爬梳"史实，"收拾"闲情，"撩乱"胸矜，"洗涤"尘想，"芟锄"坏种，打破"藩篱"，尽释"芥蒂"，斩除"葛藤"等皆是最健人脾胃字句。此种字面，万古常新，因其能近取譬，生飕飕，活泼泼，灵动矫键，毫无板滞枯萎气味也。白话文中此种句子，尽管放进去无妨。盖《红楼》、《野叟》等行之在先，已能将白话文言调和尽当也。

吾尝谓今日之乎与了吗之争，皆甚无谓。人言吾写的是语录，是文言，吾亦不计较；或言吾兹所写的系白话，吾亦不计较。文白之争，要点不在之乎与了吗，而在文中是今语抑是陈言。文中是今语，借之乎也者以穿插之，亦不碍事。文中是陈言，虽借了吗呢吧以穿插之，亦是鬼语。此其中所不同者，一

真切，一浮泛耳。故吾宁可写白话的文言，不可写文言的白话。文言烂调诚多：读来字字熟炼，而字字霉腐，必然不得新生命。九月十日《上海报》有吴稚晖先生传略，文字便属此种。

> 先生矢志不作官，故至今未膺重寄。为人强毅果敢，见义勇为。演说一气数十句，诙谐动听，精力兼人。晨起庭见宾客数十人。会议每穷日夜。归阅函简盈尺，要者答覆，不假人手。作文章，则坐以待旦，习以为常。与人言议论风生，辩才无碍，所操皆锡音也。少孤寒，以孑身走中外，恃文章投稿自给。今名满天下，仍贫屡，而每有金，为友人贷尽不吝。生平刻苦卓绝，健步行，不须车马。尝上泰山，观日出，升降如飞，不少委顿，盖异禀也……

此种字面，板板六十四，句句已见过知百遍于前人传记中，故句句陈腐（若“少孤寒”、“盖异禀也”等等），盖作者笔调专学古人，尺落窠臼，一步不得自由，故其表现能力极薄弱，极有限，而毫无尖新之趣。其中吾人可得一点真意义者二句而已，即“演说一气数十句”，及“无须车马”，须知此二句所以使吾人得点确切印象者，正因其非古人做过之句耳。今取文言而洗尽一切俗态，打破藩篱，放入土话，接近今语，此乃真正的解放，名之为白话亦可，名之为文言亦可，名之为语录亦可，甚至连之乎亦换为了吗亦可，或者既用了吗，再放一二矣焉进去亦可，皆不要紧也。所便宜者，用语录比用白话省写几个字，亦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所谓“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用意

云尔。如此则文白之藩篱尽破，借此可直捣文言巢穴。

（三）

今人白话，不但不如清人之小说，明人之尺牍，且并不如元人之戏曲，戏曲“也么哥”人人知之，这是如何勇气。彼不但能用此等字面，且并能运用洗炼之，使与文言调和，发生无穷滋味。且举元曲数例，以见元人之勇及今人之懦：

> 旧酒没，新醅发，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
>
> 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关汉卿《闲适二首》）
>
> 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那不怕？（马致远《落梅风》）
>
> 一个空皮囊包裹著千重气，一个干骷髅顶戴著十分罪，为儿女使尽了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了担山刀。你省的也么哥！你省的也么哥！这一个长生道理何人会？（邓玉宝《叨叨令道情》）
>
> 百年三万六千场，风雨忧愁一半妨，眼儿里觑心儿上想，教我鬓边丝怎地当？把流年仔细推详，一日一个浅斟低唱，一夜一个花烛洞房，能有得多少时光？（无名氏《水仙子遣怀》）

元曲白话之成功，已甚显然，而在浅显之间，仍然不俗，且亦

甚得文言白话之调和。试看《西厢》闹会曲中，有文言，有白话，而却能调和不露痕迹。

二月春雷响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约。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

其实若《一半儿》、《山坡羊》诸令皆是前半多文言，末二句全用白话。

戏曲，传奇，小说皆中国之平民文学，虽或有专供文人案头阅读者，而多系要在台上演唱与平民理会。是戏曲小说文学，乃真正大伙儿的话，今人所谓"大众语"也。在案头写作尽管作大 众语，而台上扮演，却非用大伙儿的话不可，若新式"大众语"三字，大伙儿便不懂。所以注意白话文学者，正可在旧戏曲小说中研究其用字取材。余谓李笠翁曲话乃是一本绝好不过之文章作法指导，不限于戏曲也，而对于此种使平民了解文字之工夫，尤系李氏所自称为"所谓三折肱为良医，此折肱语也"。字字得自经验，出自襟腑，毫无一句假话，且能运用个人笔调，到处诉其个人感兴，或叹其穷苦，使你不忍释卷也。(此书在《笠翁一家言》、《闲情偶记》部中，普益书局有石印本，现启智书局有单行标点本，摊上二十个子可买得来也。)余意凡白话文人，非人人将此书读透不可。就中"第一结构"立主脑，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第二词采"，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第三宾白"，语求肖似，词别繁减，字分南北，文贵精洁，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等等，皆与本题有关。此书读好，用心磨炼，不但可作听得懂说得响的白话，并可得

幽默文小品文之三昧。兹就一二要点录下。其教人脱书本气曰：

(贵显浅)若论填词家宜用之书，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书，下至孩童所习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之中。至于形之笔端，落于纸上，则宜洗濯殆尽，亦偶有用着成语之处，点出旧事之时，妙在信手拈来，无心巧合，竟似古人寻我，并非我寻古人。

其论造句用成语须能顺口曰：

(拗句难好)变难成易，其意何居？有一方便法门，词人或有行之者，未必尽知之者……凡作偪僵聱牙之句，不合自造新言，只当引用成语。成语在人口头，即稍变更数字，略变声音，念来亦觉顺口。新造之句，一字聱牙。

非止念不顺口，且令人不解其意……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字句，则几与海外方言无别，必经重译而后知之矣。海内译家，可理会斯言。其论作宾白以顺口耳为标准，亦正与行白话文无别。其言：

(词别繁减)从来宾白作说话观，随口出之即是。笠翁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愿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澈，奏之

场上便觉糊涂，岂一人之耳目，有聪明聋聩之分乎？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

老舍行文，必使其妻念得顺口，便是此种道理。实则世界好文学皆须朗诵，至顺口始其得佳处。Henty James 文极难懂，惟念出始得真味道，Phelis 尝以此叩之，James 首肯而请其代守秘密。其论作文与妇人小子看曰：

（忌填塞）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隐辟，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使文章之设亦为与读书人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则古来圣贤所传之经传，亦只浅而不深，如今世之小说矣。人曰，文士之作传奇，与著书无别，假此以见其才也，浅则才于何见？予曰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故笠翁推《水浒》文字第一。“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长最大而寻不出丝毫渗漏者，惟《水浒》一书。”（少用方言）。其论洗炼成语入文曰：

(戒浮泛)然一味显浅而不知分别，则将日流粗俗，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可得矣。……又有极粗俗之语，止更一二字或增减一二字，便成绝新绝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当存其说，以俟后人。

"熟"乃文章斫轮老手之谓，此中关系，惟赖天才。有天才出，自能运用自如也。曹雪芹，施耐庵，王实甫，汤若士皆是前例。

此外论作文须自己删稿（见"文贵洁净"），论"少用方言"，论即景生情之描写法（"琵琶赏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见"戒浮泛"），论描写须从"有待说之情"说起"同段"，论冷热并用（"剂冷热"）皆作文要着。其论"字分南北"、"声音恶习"、"少用方言"，作大伙儿的话者亦可参考。其论"科诨"、"戒淫亵"、"重关系"、"贵自然"数段，竟可作幽默文章之指南。如曰："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此等虽难，犹是词客优为之事；所难者，要有关系，关系维何？曰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重关系"）。又曰"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贵自然"）。又曰"人间戏语尽多，何必专谈欲事，即谈欲事，亦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法"（"戒淫亵"）。即其论作文不可有道学气（"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如王阳明之讲道学"（见"重机趣"）。论文字须依"笔性"（见"词别繁简"），论贵性灵（"填词种子，要在性中带来"见"意取尖新"）等段，直是小品文作法门径。

吾意，白话成语用之于小说戏曲固然，而人或以为在论说

总有不便。过渡之法云何？曰，以小品文出之是也。故今日文字问题有二要点。一，洗炼白话使之入文；二，利用小品文使此种成语同时侵入论说境界。如此中国文字便可活将起来。

（《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谈天足

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倘若放开眼睛观看，旧人物中亦可看出极新的态度。若袁中郎之反对复古，主张个人说今话，其历史观点并不亚于胡适之。若俞正燮之反对缠足，赞成寡妇再嫁，其女性观念亦不亚于陈独秀。新中有旧，若戴传贤一派根本不必谈，然骂戴传贤者，固新中之新者矣，而崭然新中之新，仍含有我国文化遗产之极旧成分在焉。若单轨思想，若一道同风，若门户之见，若文人相轻等。我读此辈文章，若见江北老妈拉洋狗，扬州老妈穿高跟，若见人在新瓦片上烤西药，在电炉上煎人参。是诚吴稚晖所谓"咬牢了鸡巴，鸡腿都挽不动"者也。

吴稚晖之言曰："一道同风，就是钦定的反面。我国一道同风的观念，不但入了政界，咬牢了鸡巴，鸡腿挽不动。就在文学界，也是移动一毫，就要若丧考妣的伤感的。破坏统一之罪，在政界是顶大的罪名，在学界何尝不是呢？"

德谟克拉西倒霉，中国人之思想，缠了二千年的小脚，际此西洋思想输入之时刚似放了足，该是恢复一点先秦思想自由景象，朝着自由解放路开展下去。无奈二千年缠惯了脚，无形中还有道统二字留在脑后，排也排不动，割也割不清。由是皇

室虽已灭亡，道统虽已失势，而钦定观念仍然在脑中作祟。打倒旧道统，又扶新道统出来，今日左右派思想，都有朕即国家之意，非把你的脚再缠上不可，于是所谓一道同风，也不过一道同脚臭气味而已。谁脚不同臭，便是乱臣贼子，秉笔直书，隐名刊出，而钦定了小阿斗之天下。

这也是时势使然，中国人相信德谟克拉西不深，敬道心不笃，深恶思想自由之老脾气不改。民国成立二十年，偏偏又狄克推多盛行欧西之时，这是如何合于中国人的老口味啊！于是政治上狄克推多，文学上、思想上亦欲来一狄克推多，一若曰不狄克推多便不摩登。西家倡文化统制，东家怒目视之，东家所作文章，字里行间，又何尝非欲狄其克而推其多？（语从俞正燮之“经了筵”，及蔡元培之“袈了裟”。）狄克推多固摩登矣，无奈其差儒家之立道统定一尊亦无几。此所谓新中有旧也。

夫所谓一道同风者何？乃必纳天下人之意见于自己的意见，纳天下人之议论于自己的法轨。有不就范者，则深恶之痛詈之，得意则叱咤风云腰斩之，不得意亦埋伏道路而暗射之。其名词则崭新娇新欲滴，曰曰曰云云云。夫曰曰曰云云云者，亦何异古人之最顽腐不堪陷思想生活于停滞圆寂之罢黜百家独专孔孟政策，亦何异西洋中世纪之狱囚天文学家？必欲天下人之耳目同一副面孔，天下人之思想同一副模样，而后称快。稍有说两三句心头话者，则名之为“吊诡谲奇”；稍稍放开两步闲游者，则名之曰“佻达不雅”；稍稍发两三行心中独见议论，则曰“离经叛道”。夫吊诡谲奇，佻达不雅，离经叛道，新思想乎？旧思想乎？

吾尝窃笑中国女子缠足，袁子才攻之不倒，李汝珍攻之不

倒，俞正燮攻之又不倒，独高跟鞋攻之始倒，于是中国女子舍弓鞋而就高跟。论其作用，使女子臀部突出，步伐娉婷，使足大若小，身矮若长，弓鞋高跟，有以异乎？无以异也。此笠翁所谓"有底（高跟）则指尖向下而秃疑尖，无底由玉笋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同是欲纤欲尖，而以高跟女子笑小足村妇，为理固未甚平。至西子、王嫱大足之美，则无人主张。惟其不能大足，故无"蹇裳涉洧"、"蹇裳涉溱"之脚力，亦无"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之勇气，惟坐在闺中，剔寒灯，滴泪水，眠冷衾，吟闺怨，骂薄幸郎而已。

然则男子似可笑高跟女子矣？却又未必。思想上缠足运动正在开展下去，甚为得势。弓鞋思想，虽已打倒，而高跟思想相继之而起。高跟思想，虽属舶来革履，以之笑弓鞋思想之国货，为理亦未甚平。

人有性灵，一道同风，谈何容易？一道同风，非桎梏性灵，使之就范不可，故此辈人必深恶性灵亦即深恶个人主义。其意似曰，脚非再缠起来不可，否则亡国灭种之祸立至。呜呼，其不信人类至此！其恶大足若此！

是故一道同风局面之促成，必端赖于单轨思想。单轨思想发生于单轨头脑，其直如矢，其世界极简单，其思想极固定。一有问题，用三两时行名词上去，果然天下太平，无复问题矣。社会中多此单轨头脑，则此种烂调易行，而一道同风亦易办到，行将见文学界又如白茅千里，不复有溪涧潭壑之胜矣。夫用夷变夏，吾亦不反对，惟衣夷之衣，言夷之言，而根性不改，以向之事夏者以事夷，则亦有何所取于解放？名为个个阿斗，实则个个顺民。

由单轨思想之集合而达到一道同风之局面，固然亦可称霸天下。无奈既然成了白茅千里世界，有时亦会对之生厌，而道风亦随之而变。思想分子既然简单，毫无弹性，于是从云从风，都无一定，去年鸡年，今年却是狗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为人亦苦矣。虽然一呼百啸，院落似甚热闹，然略具弹性之思想，深思好学，肯竖起脊梁、立定脚跟之人，却寥寥无几。故热闹之后，归于寂寞，亦甚容易。

凑热闹，唱烂调，相呼应，立门户，鄙夷苍蝇，好谈宇宙，都是单轨思想之徽记。门户一立，惟知有彼此，不复知有是非，党其所同，而伐其所异，一有丝毫不同意见，就"若丧考妣的伤感"，加以"破坏统一"的"顶大罪名"，与前之崇孔卫道有以异乎？

江山可改，人性难移。吾不大相信人类进步，尤不相信数年之间，国民性便会改变。所以从前服从是美德，今日仍然服从是美德。幸今人不必太轻看古人，而古人泉下有知，看今日文坛似亦不至于如何自惭。

吾欲得苏州大姐七寸平底长鞋一双置之案头而玩赏之，抚摩之，供奉之。若有西子、王嫱倩影入梦，则取此鞋而试之，合则奉为文字之神。

（《人间世》第 13 期，1934 年 10 月 5 日）

笑

古之君子，未尝不笑，而于文中自述其笑，则甚难得。仲尼莞尔，是他人写的，非自己述的。能自述其顽皮谑浪之笑，更是翻破万卷书亦不易得也。若苏子瞻之记喜雨，赋赤壁，尚有多少清高文士气味，不然便是世道人心之笑，实不希罕。至于笑天下笑世人之笑，皆带些酸味，此非吾所欲见陶情谐谑之笑也。因此亦甚难于文中见得文人笑时之真实影子。杜牧之“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插得满头归”乃是吾所欲看得。夫菊花插得满头，是如何“不雅”样子，而杜牧之竟敢叙之，是诚难得。总是儒者之伪，在文中摆臭架子，欲于一笑一颦之中尽合圣道耳。

欲觅笑的真实影子，明末文集中可看到几篇。即如张岱《陶庵梦忆》中《金山夜戏》：

> 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皆漆静。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瞖，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

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此篇不言其笑态，而我已闻见其肚里笑声矣。半夜在佛殿唱剧，惊吵人家，吓杀寺僧，是如何不雅，不雅之笑，无关世道人心之笑，而竟敢为文述之，是如何老实！

《袁中郎文集》中，此种顽皮的笑的影子，却甚容易找到。此所以三百年后中郎文犹能活跃纸上，使我如见其人也。《山居斗鸡记》篇末曰：

余久病未尝出里许。世间锄强扶弱，豪行快举，了不得见。见此以为奇，逢人便说。说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而说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

夫笑已不雅，而况跳乎？而况竟以此终日告人乎？宜乎道学方巾之鄙夷中郎、厌恶中郎，道学方巾跬步要排大人先生样子，做文亦要排大人先生样子，宜乎其敢卖友事仇，而不敢佻达不雅也。中郎若向此辈说斗鸡故事，此辈不但不笑不跳，且必踧踖不安，以为在骂己也。

中郎游盘山，“与导僧约，遇绝险，当大笑，每闻笑声，皆胆落。”夫遇绝险，何以当大笑？笑又何必相约？又何必笑得人胆落？凡何道理？此皆不可为道学方巾道也。道之而三掴其额，彼辈亦不能解。然则中郎因此反可为吾辈所独有。犹如名山奇谷，道上少俗僧，少游客，使我辈独得而据为己有，岂非快事？中郎游天目，临行诸僧进曰：“荒山僻小，不足当巨目，奈何？”

中郎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劳过谦，某亦不敢面誉。"因大笑而别，颇些这种意思，心里颇想警告世人。中郎全书多此种佻达不雅之调，无关世道之笑，实在无什么价值，可以不买，以免买了生气。有些须喜欢真情真话者始可买此书。十月十九日读中郎游记后有所感书此。

（《人间世》第16期，1934年11月20日）

谈劳伦斯

朱柳两位老人正在黯淡的灯下闲谈，因为此时虽是民国卅五年，苏州城外居户大半还未有电灯。在廿八年曾经因为沪宁公路通行，苏州的马路上屡次发现汽车的踪迹，后经吴门人士一体反对，报上也曾有过一次剧烈的辩论，才把汽车禁绝了。柳先生饭后无事，过来找朱先生攀谈，在这黯淡的灯光之下，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朱先生一枝旱烟，下垂着一个烟袋，一卷烟云缭绕而上。

“早晨在我的箱箧里翻出一部旧稿，”朱先生指红木桌上一部黄纸的书稿说，“看来倒还有趣。但这是不预备发表的。”

“怎么不发表？”

“一则还有末段两章未译，一段译得不甚满意。起初我也想发表，拿给一家书局看，书局不要。过了半年，书局忽然来信要了，我迟疑莫决起来，主张不发表。我想一本书如同和人说话一样，也得可与言而与之言，才不致于失言。劳伦斯的话是对成年人讲的，不大容易懂，给未成熟的社会读了，反而不得其旨……

“报上也常听见劳伦斯的名字，大概是说他诲淫罢了。”

“自然，日报上那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谈，就是谈，人家也

不懂。现代孤芳自赏的作者，除非不做书，或做趋时的书，就得被人拖到十字街头示众，顶好还是可以利用做香水肥皂的广告。这是德谟克拉西的恩赐。大家都识字了，日报就是大众唯一的读物，日报逢迎读者，读者管住日报，除了奸淫杀掠以外还有什么可谈呢？只有卖便药式的文章及广告才能把得住读者。你告诉读者科学的理论，他们要听吗？现在的作社论，传宗教，讲文学，都是取法于卖便药的广告；文人，教士，政治都跟江湖卖膏药的庸医差不多。文字以耸人观听为主，你说这便药是椰粉加香料做的，吃了病也好，不吃病也好，还有人肯买你的药吗？我颇不愿使劳伦斯沦为走江湖卖膏药的文学，所以也不愿发表了。"

"那末，劳伦斯与中国的《金瓶梅》何别呢？"

"其间只有毫发之差罢了。庸医，良医不是都带眼镜，都会按脉，都会打针吗？我不是要贬抑《金瓶梅》。《金瓶梅》有大胆，有技巧，但与劳伦斯不同——我自然是在讲他的《却泰来夫人的爱人》。劳伦斯也有大胆，也有技巧，但是不同的技巧。《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劳伦斯是主观的写法。《金瓶梅》以淫为淫，劳伦斯不以淫为淫。这淫字别有所解，用来总不大合式。老柳，你也许不相信，劳伦斯是提倡肾囊的健康，但是结果肾囊二字，在他用来不觉为耻，不觉为耻，故亦无耻可言。你也许不相信，《金瓶梅》描写性交只当性交，劳伦斯描写性交却是另一回事，把人的心灵全解剖了。这在于他灵与肉复合为一。劳伦斯可说是一返俗高僧吃鸡和尚吧。因有此不同，故他全书的结构就以这一点意义为主，而性交之描写遂成为全书艺术之中点，虽然没有像《金瓶梅》之普遍，只有五六处，但是前后

脉胳都贯串包括其中，因此而饱含意义，而且写来比《金瓶梅》细腻透彻。《金瓶梅》所体会不到的，他都体会到了。在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这是劳伦斯与《金瓶梅》之不同。”

“这怎么讲法？”

“你不看见，当却泰来夫人裸体给麦洛斯簪花于下身之时，他们正在谈人生骂英人吗？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以后人类颓唐失了生气，所以发愤而作的。”

“现代英国人也失了生气吗？”

“在我看来倒不，但在劳伦斯看来如此。若使我们奄奄待毙的中国人给劳伦斯看来，那简直无话可以形容了。我想他非用北京最下流的恶骂来骂不够出气。你要明白他的全书旨意，须看准他所深恶痛绝的对象。他骂英国人没情感，男人无睾丸，女人无臀部，就是这个意思。麦洛斯表示轻鄙却泰来爵士一辈人时，却泰来夫人问：

> 他一辈人怎样？
>
> 你比我知道的清楚。那种女子式小白脸的青年，没有蛋。
>
> 什么蛋？
>
> 蛋！男人的蛋！
>
> 她沉思这句话的意义。
>
> 但是问题是不是在这点？

一个人呆笨，你说他没有头脑；一个人促狭，你说他没心肠；一个人懦怯，你说他没有肝胆，一个人若没有一点大丈夫气，你说他没有睾丸。这人就是靡靡不振了。

朱先生翻起他的旧书稿说，“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工业制度社会规矩，小白脸的无人气，都骂在里头。你明白他对战后英人的愤慨，你就难怪他所以不惜用极粗鄙淫猥的话骂他们的理由。这是一种的反抗，不这样，骂不出气的。麦洛斯说：

“他们一辈子是最卑鄙的贱流。上校常对我说：‘老麦，英国的中等阶级一口饭就得嚼三十次，因为他们的肚肠太窄了，一粒小豆般的东西就可以塞得肠胃不通。天地间就没有看过这样小姐式的鸟，又自豪，又胆小，连鞋带结得不合式都怕人家见笑，又像陈老的野味一般霉腐，而又自以为尽合圣道。所以我吃不消，再不振作了。叩头，叩头，舔屁股舔到舌头也厚起来了，然而他们还是自以为尽合圣道。而且都是一班乡愿小人。就是乡愿的小人！一代小姐式的乡愿小人，一人只有半只睾丸。’”

康妮（却泰来夫人）笑了。雨还淋淋不住。

“他一定痛恨他们。”

“不。”他说，“他不管了。只是讨厌他们。这有不同。因为，他说，连丘八近来也跟他们一样拘泥小气，睾丸一样不全，肚肠一样窄小。这是人类注定了应走

的命运。”

“连平民，连工人，也这样吗?”

“全伙都这样。他们的人气都完了。汽车、电影，飞机把他们还遗留的一点人气都吸完了。你听我说，一代不如一代了，越来越像兔子，橡皮管做的肝肠，马口铁的脚跟，马口铁的面孔。马口铁的人！这是一种鲍罗希微主义慢慢的把人味儿杀贼了，代以崇拜机器味儿。金钱，金钱，金钱！一切现代人只把人情人道贼害创伤当作玩乐，把老亚当、老夏娃剁成肉脍。大家都一样的。世界都一样的：把活活的一个人闷死了，割掉一张茎皮一金镑，割掉两只睾丸两金镑。阴户还不是机器的窝吗！——大家都一样的。我们出钱，叫他们替我们割掉阳物。给他们钱，钱，钱，叫他们把人类的阳气都消灭了，而只留下一些孤弱无能的机器。”

这书前后就是这样一个脉络贯穿着，时时爆发出来为谩骂淫鄙，而同时优美的文字。劳氏的文字之美是不必说的。所以他全书结构，写一战后阳萎而断了两腿的公爵，要一健全的中等阶级女子做夫人，及夫人求健全性爱于代表作者主义的园丁麦洛斯。所以他引 Henry James 的话，处处骂他们的金钱，崇拜，为崇拜狗母（Bitch-goddess）——狗母就是金钱的富有及商业的成功。却泰来夫人康妮看见她的丈夫管工厂，着发财迷，就恐慌起来。所以她想到将来的英国，想到她自己为这样的人类怀孕传种，就不敢想下去了。所以麦洛斯说：

‘我要把机器全部消灭，不使存在于世上，而把这工业时代收拾的干干净净，像一场恶梦。但是我既然没有这本事，所以只好沉默下去，自顾自的生活。’劳伦斯意思是要归真返朴，回到健全的，本能的，感情的生活。”

“我明白了。”柳先生说，“那末，他描写性交，也就是带这种玄学的意义？”

“是的，性交就是健全本能的动作之一。他最痛恨就是理智，心灵，而没有肉体。在这点，他和赫胥黎 Aldous Huxley 诸人一样，讥笑不近人情的机器文明，也和孔孟一样，主张‘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劳伦斯有多少东方思想的色彩。在书的前部，有一段记述几人的闲谈，说未来世界，女人生产也不要了，恋爱也不要了。但是扁纳雷夫人说：

‘我想，如果恋爱也没有了，总有别的东西来代替。或者用吗啡。空气中都散布一点吗啡。……’

‘政府每星期六散布一点吗啡于空中。’捷克说。……

‘我们身体都可不要了，’又一人说。

‘你想我们大家都化成烟，岂不好吗？’康妮（讥笑的）说。所以康妮在以下一段就心里想着说：

‘给我肉感的德模克拉西，给我肉身的复活。’因此你也可以明白他描写性交的意义了。”

柳先生说：“但是你所谓他全书的命脉，文字最具特色的性交描写与《金瓶梅》是怎样的不同？”

“是的，我们是不健全的，像一人冬天在游泳池旁边逡巡不敢下水，只佩服劳伦斯下水的勇气而已。这样一逡巡，已经不大心地光明。裸体是不淫的，但是待要脱衣又不脱衣的姿态是

淫的。我们可借助劳伦斯的勇气，一跃下水。”

“劳伦斯有此玄学的意味,写来自然不同。他描写妇人怀孕，描写性交的感觉，是同一样带玄学色彩。是同大地回春，阴阳交泰，花放蕊，兽交尾一样的。而且同西人小说在别方面的描写一样，是主观，用心灵解剖的方法。我的译稿是不好的，不及他文字之万一，姑就一段念给你听吧。

> 他也已露了他身体的前部，而当他凑上时，她觉得他赤身的肉。有一时，他在她身中不动，坚硬而微颤。到了他在无可如何之发作中开始振动时，她的身中发觉一种异味的快感在摇摇曳曳的波动。
>
> 曳曳摇摇的，如鸿毛一般的温柔，像温柔的火焰腾跃，翻播，时而射出明焰，美妙，美妙溶化了她全已溶化的内部。像钟声的摇播浮动，愈增宏亮。她躺着，不觉她最后叫出细小的浪声……她的子宫的全部温润开放，像潮水中的海葵，温柔的祈求着他再进来，为她完结。她热烈的保住他，而他不全然脱出，而她觉得他的细蕊在她的身中活动起来，而神异的节奏在神异的波浪中浮动充溢她的体内，起伏膨胀直到充满她缠绵的感觉，然而开始那不可形容的动作，其实不是真正的动作，只是一种感觉的清澈无底的漩涡，旋转直下，深入她一切的肉质及感觉，直到她变成一团旋流不断的热情，而她躺着发出不觉的鸣咽不明的呼声……

这种文字，可谓淫辞了。但是我已说过淫字别有意义，用在劳伦斯总觉不大相宜。这其间的不同，只在毫发之差。性交在于劳伦斯是健康的，美妙的，不是罪恶，无或羞惭，是成年人人人所常举行的。羞耻才是罪恶。所以他在书后有一段说：

> 诗人及一切的人都在说谎！他们叫我们相信我们所要的是情感。我们需要的是这锐敏的，溶化的，相当可怕的肉欲。只要有一人敢这样做，不要羞耻，不要忏悪，不要后悔！假如他过后羞惭，而叫我们也羞惭，那岂不淫秽！”

……朱先生放弃他的译稿，看见柳先生的脸上又回到清净的神态，露出妙悟的笑容。柳先生此时似乎明白了，也觉得可以听下去，而不觉羞惭，而反以霎时前羞惭之心为淫邪。

“劳伦斯真难读啊！”柳先生吸一口烟慨叹的说。

朱先生起立，推开窗户，放入一庭的月光与疏影。墙外闻见卖夜食者的叫卖声。

（《人间世》第19期，1935年1月5日）

清算月亮

左派文人反对风月的文章，竟“把月亮一笔勾销”。因此我必须为月亮辩护。我生怕的是，如果中国人全部失去了欣赏月亮与夏日清风的能力，那么中国之为国也必将变得更为狭小、粗劣与物质主义了。现在竟有人把看中秋月与吃月饼，认为是“封建的”与“反革命的”，由于月饼是中国的，所以也便是旧式的，而与一个女学生去吃瑞士的巧克力牛奶糖，却是“进步的”与“革命的”，因巧克力糖来自西方。让他们去吃巧克力糖吧，这些聪明的青年人。他们可以不去理，但是月光却要照在他们身上，并且继续不断的照着他们，静寂无声，不图自卫，终有一天她会得他们的心。除非他们确是迷失了灵魂！

因此想把月亮清算，不能像那些青年作家想得那样容易。陶渊明、苏东坡、李白、杜甫虽为左倾分子所不容，也不能就把他们一笔勾销。左倾分子称之曰“毒”，但是只要中国一日忠于自己，忠于她自己的天赋才智，那么陶渊明与苏东坡就一日不会被人勾销。据我所知道的，那些左倾分子，就连陶渊明或苏东坡的诗也没有读过。他们说这些作家是“封建的”，“有闲阶级”、“不面对现实的”士大夫。陶渊明歌曰：“采菊东篱下”，“鸡鸣桑树巅”；苏东坡歌曰：“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

果也封建之极矣！江上清风与山头明月只属资本家有闲阶级所有乎？惟有资本家之鸡方立于桑巅上乎？雄鸡桑树果不属于“现实”之世界乎？事实是如此的，陶渊明与苏东坡已经进一步，不再去谈大众平民——他们自己已经变成平民，思想行动与农夫同感。

因此，不能把月亮一笔勾销。还是让我们把月亮这问题，去一劳永逸的勾销了吧。中国的诗文与浪漫人物，和月亮全有连带关系。这派浪漫人物，西方尚未之闻。

中国的浪漫人物与西方的浪漫人物同。西方的浪漫人物表示一种强烈冲动的情感，中国的浪漫人物则表示一种恬淡幽静的状态，不过他们是把内在的热烈情绪隐藏起来。中文名之为风雅，意思含有艺术化的培养，对诗歌的喜好，畅达无忧的人品，不贪钱财的心理，喜爱交游朋友，憎厌官场。《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与他的朋友，在萧爽楼中就是最合风雅的人。沈复描写他的朋友如下：

“萧爽楼友朋之间，有禁止四事：第一，谈论他人之升官晋爵；第二，闲谈诉讼与时事；第三，讨论科举之八股文章；第四，赌博。凡有犯此一条者，得罚酒五斤。但尚有四事不禁止：宽宏、浪漫、自由不拘和安静。”

这些朋友们都耽于诗赋、绘画、饮酒，但不行之过度，并且喜欢交游谈话。他们最喜欢在月下小酌晚餐。他们虽然贫穷，不以错过为怀，但都是快乐的，并没有去作资本家的走狗。中国的浪漫人物对于财势，向来都感到强烈的厌恶，他们饱经世态炎凉，就连一个势利的和尚也不齿的。

“城里的情形怎样？督办还到衙门吗？”沈复与他的朋友偶

然走进一个庙中，有一个和尚这样的问。

“这秃头的势利小子!”沈复的一个朋友骂着说，长袖一拂，夺门而出。

但是在这种旷达的浪漫主义之下，中国历史中的浪漫人物在国家危急之时，都是勇敢不屈出名的好汉。苏东坡、白居易、袁枚、郑板桥（那个怪才子），还有袁中郎——不一而同的，他们遗留下来史迹，比较满口仁义的孔教徒要清白得多。他们执政为县吏之时，乃是人民的真正“父母”，离任之时，农民夹道跪，感激涕零。“嘿，你写的歌女诗赋如此之多，而人民诗赋则如此之少!”一个标榜孔教的人嘲笑着白居易这样说。在表面上看来，孔教徒关心于人民的福利，但是白居易为官清廉，孔教之徒则并不如此。十七世纪著名的批评家金圣叹、袁枚、郑板桥，犯有渎君之罪名。但是不能忍受贫民之被压迫者乃为金氏，当朝廷征收苛捐之时，鼓动农民造反与他的朋友在孔庙相对而哭者亦为金氏，是以终于就义就死。协助贫民反抗朝廷者为金氏，而非之“侮君之罪”制他于死地为高官。那个高官的灵魂征收苛捐，得以安然，皇帝死后之灵魂，亦得安然。不论在什么时候，我喜爱月亮而憎恶这种伪装忧国的孔教徒。

（出处暂付阙如）

小品文之遗绪

从前西滢说过，现代白话文体分二大派：一以胡适之为代表，一以周作人为代表。西滢此话曾在那里发表过，但我只是由他口头听来，现在也记不清他是如何说法了。姑就我的见解说说。一人有一人之笔调，本难于分类，所谓二大派，亦只是就大体上分出而已。二者之中，也没有什么鸿沟。但此二大派之分法，却甚有意义，推之于古今中外之论文，皆可依此略分其派别出来。周作人不知在那里说过，适之似公安，平伯废名似竟陵，实在周作人才是公安。竟陵无异辞，公安竟陵皆须隶于一大派。而适之又应归入别一系统中。愚见如此。

二大派之区别，依我们的见解，在于说理与言情。此二辞皆就广义讲。“言情”系包括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非言爱情而已。无论何名辞，总容易被人曲解附会。周作人用“载道”与“言志”，实同此意，但已经有人曲解附会，说“言志派”所言仍就是“道”，而不知此中关键，全在笔调，并非言内容，在表现的方法，并非在表现之对象。现代人总喜欢在名词上推敲，而不知所言为何物，甚不足取。比如你说“个人笔调”，便有人说个人是与社会相反；你说“性灵”，也便有不懂文学的人说这是与物质环境背道而驰。中国人向来总是这样不求甚解糊里糊涂

了事。以上所分“说理”与“言情”，也只是在文章的笔调上说法，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也。故吾尝曰，《人间世》提倡小品，不能兴国，亦不能亡国，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最多亦只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

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但确有此种笔调，正实明畅为主，首尾相顾，脉络分明，即有个人论断，亦多以客观事实为主。言情者以抒怀为主，意思常缠绵，笔锋带情感，亦无所谓起合排比，只循思想自然之序，曲折回环，自成佳境而已。换句话说，说理文如奉旨出巡，声势煊赫，言情文如野老散游，即景行乐，时或不免惹了野草闲花，逢场作戏。说理文是教授在讲台上演讲的体裁，言情文是良朋在密室中闲谈的体裁（“闲适”笔调便是此义，与“有闲阶级”无干，不得引《马氏文通》之例，数其罪而诛之，因写闲适笔调并不比写载道文多费工夫，或者反是忙人的文章也）。适之文似大学教授演讲格调，他本攻哲学，回国后又多作小说考证，因此不觉中自然形成说理笔调。想当时若少作考证，多写随笔，亦未必如此。但此亦自成一体。在此体中又可依各人议论风采之不同，或沉着厚重，或爽利透辟，或魄力雄浑，只要文字优美，皆可成为艺术。不过此类文章大体上不免带忠厚老实气味耳。

小品文笔调与此派不同。吾最喜此种笔调，因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入意之作。或剖析至理，参透妙谛，或评论人世，谈言微中，三句半话，把一人个性形容得维妙维肖，或把一时政局形容得恰到好处，大家相视莫逆，意

会神游，此种境界，又非说理文所能达到。谈话中当常有此种境地，不然古人何以有“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一句话呢？晋人清谈，宋人语录，常有此番光景，启人智慧，发人深思，一句道破，登时妙悟，以此行文，何文不妙，以此攻道，何道不通？且其来得轻松自然，发自天籁，宛如天地间本有此一句话，只是被你说出而已。此法行文，较之濡墨摘翰，苦索枯肠，刻意求工，翻《佩文韵府》作赋者，其相去何只千里？曾闻蔡孑民夫人言，蔡先生“饭硬他亦吃，饭烂他亦吃，饭焦他亦吃”，此是何等妙，语隽逸轻松，甚得机趣，但出之偶然，得来全不费工夫。好的小品文，亦是如此。正是王充、章学诚所谓论人适如其人，论事适如其事之境地。不过达到如此境地，亦不容易耳。

小品文之写法，容专篇叙述，此地仅讲此派笔调在汉文之遗绪。英文散文也分这个派别，我们可以借来说明这个意思。尝在那里看见一本英国文学史，就是把英文散文笔调分为二派，立为图表，各自相承为一统系，一以乔索为祖，一以贝根为祖。贝根整洁细密，即系代表说理一派；乔索散逸自然，即系代表闲谈一派；贝根凝重，乔索轻柔；贝根下笔如举千钧，踌躇再四，乔索下笔如行云流水，无拘无碍。如何精细划分是不可能的，但大体上，贝根派若骈四俪六之 Lyly，若幽深古雅之 Milton，若辩才无碍之 Burke，若典雅都丽之 Gibbon，若温文持重之 Macaulay 便是。此派文章，都颇费经营，修辞造句，颇费苦心。又一派则浑浑噩噩，不知写作润饰为何物，只如春水奔江，滔滔而下，如老吏断狱，出口成章，如盲女唱曲，字字如珠。若无中生有之 Defoe，若绘影绘声之 Fielding，若想入非非之 Sterne，若入木三分之 Swift，若细腻温柔之 Lamb，若滑稽突梯

之 Bernard Shaw 便是。近人中若 Beerbohm，Lucas，皆承此派之遗绪，至如当代 Bloomsbury 派之 Virginia Woolf，E. M. Forster，Lytton Strachey 更显然恢复十八世纪风味，追继 Sterne 之宗祧，行文皆翩翩翔翔，左之右之，乍真乍假，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嬉谑，或寄孤愤于幽闲，一捧其书，不容你不读下去。此即吾所谓现代散文大家，余吾不欲观也。

在中文，向来闲谈文体不发达，一则因为死文言不便闲谈，二则因为深受假文学观念之遗毒，做文章的人全在遣词用字堆砌辞藻上下工夫，不然便是讲什么章法格套，说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语果确，《论语》作者未尝高吟低唱，只是子路出，子贡入一句一句写下来，既无句法，又无章法，有何文可言，而何以行得如此之远？因有此错误的作文观念，故古文中极少好散文，类皆似三寸金莲，一步一摇，未得天足女子步伐自然之美，古人或者因其工而以为美，今人看来只有因其拘而叹其苦而已。若言本色之美，《左传》尚有叙事写景魄力，太史公犹能下笔淋漓生动，如鸿门之会等，太史公以下便不堪过问，文字无复灵健可言。其步伐极束缚，其题材极限制，其气力极薄弱，气力既薄弱，由是以工代逸，舍本色之美，求雕斵之美，写起一人传记，总是寥寥三百字，多便写不下去。若大家称赞之《五柳先生传》，通共一百二十五字，事实极薄弱，描写极模糊，虽然清淡，决不是所谓好散文。

故中国好的散文，大部全在白话小说，但此种散文，多半叙事，而非议论。议论之佳者如风姐之评人论事，玙姑之谈道，逸云（《老残续集》）之谈爱，聊有西洋小品闲谈风味。文学革命以后，既以说话行文，自然要演出以闲谈说理笔调一派，在

谈话之中夹入闲情及个人思感，此即吾所谓个人笔调。但吾不大与时人同意，惟有西洋祖宗才算祖宗，惟有哈尔滨小品才算小品。于是此小品文遗绪之问题便发生了。中国古文中虽少好散文，却也有不少个人笔调之著作。若用另眼搜集，倒也有趣。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虽然挨骂，亦不足介意。其搜集标准，亦不尽以古时所谓小品为标准（如柳宗元之讽谕小品《三戒》等），而当纯以文笔之闲散自在，有闲谈意味为准。最好如屠隆《冥寥子游》一类，与十八世纪之 Sterne 相同，叙事夹入闲情，说理不妨抒怀，使悲涕与笑声齐作，忧愤与幽逸和鸣。总之，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

周作人谈《中国文学的源流》一书推崇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直继公安之遗绪。此是个中人语，不容不知此中关系者瞎辩。试读《白苏斋集》伯修《北游稿小序》末段，而细味其笔调：

> 今日晨起栉罢，长孺北游稿寄至。余读一过，为写此数行，砚冻人懒，不知便可称《北游稿序》否，又不知便可当复丘长孺否？纵欲作书，亦不过“何时更北游”五字而已。万历丙甲冬日。

此书原系信意信手写出，极欠齐整，而淑正（新

安詹濂字）却胜得如此齐齐整整，遂不成模样矣。

家三弟在家读书作文，学作忠厚人，亦快事也。浼不作书，又作此数行，可笑，可笑。宗道顿首。

此文声调，非周作人行文声调而何？有耳者当能闻见，无耳者强辩，亦如井蛙语海夏虫语冰耳。周作人得力于明文，肚里有数码也。

公安之外，实有不少此类文章。Virginia Woolf 在《自己的房间》一书开头用一个“但是，你说”，极得闲谈自然笔调（《有不为斋丛书序》曾偷来用），但是黄道周之《文心外符》起句亦是“若其贫富贵贱，隆污迟速，可眠而言也”，其斗然而来的起句法，亦无甚异。舒白香《游出日记》，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曹亮采《绣虎轩尺牍》，皆有此自然不羁的笔调。贯华堂《水浒传序》是一篇绝好的个人笔调文章。在此短文中，我只能特举笠翁说说。此种笔调，到李笠翁已是洋洋洒洒的大文，去现代散文已不远，只有文言白话不同而已。其理由甚简单，笠翁才思超逸，事事自发机杼，《一家言》无一句抄袭人家，故写出必是个人笔调，而因此笠翁之文，至今无一篇不读得。又因其作文如说话，纯然以语言自然之节奏为节奏，遂洋洋洒洒而来，去五柳先生文字甚远，而变为繁长，正如今日白话散文比文言繁长一样。尤其在其所作曲中之宾白别开生面，竟然是现代白话文。笠翁尝见到此层而为其最自负之宾白文字繁长作辩曰：

总之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遒劲者，不

能强之使长。笔性纵肆者，不能缩之使短。文患不能长，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使之长。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则虽为宾白中之古风史汉，又何患焉。予则乌能当此，但为糠粃之导，以俟后来居上之人。

白话散文此种趋势，笠翁早已见到。所谓宾白中之古风史汉，笠翁亦应坐一把交椅。

（《人间世》第22期，1935年2月20日）

哀莫大于心死

天下大聪明与大糊涂，相去只有毫发之差。女子一念之差，可误终身名节；士人一念之微，可误国家大事。国事如此纠纷，是非如此混淆，可与不可之间，糊涂者不能辨，聪明者亦常不能辨。如果身处利害中，更必不能辨。以不可为可者，未尝无可之理由，以可为不可者，亦未尝无不可之理由。因此聪明人失之，糊涂人反得之，不然历史上聪明人何以常干出极糊涂之事，留下极糊涂之名！处此是非混淆之势，聪明不足凭，惟视一点孤贞气义足为我们表率而已。中国儒家，因儒而儒，向来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事业，也是因为这一点缘故。若文天祥、史可法、王阳明、曾国藩、林则徐，以儒家出身作出大事业，皆禀一点孤贞节烈之气而已。此数君子皆一片天地正义在心头，其学问皆从正心、修身做起，王阳明讲良知，曾国藩事事留心，皆是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之成功者。聪明以为可，良知以为不可，则不可之；聪明以为不可，良知以为可，则可之。良知为主，聪明为奴，其人必忠；良知为奴，聪明为主，其人必奸。

孙中山为中国近代伟人，无疑矣。其所以成为伟人，非其聪明过于袁世凯，亦只是一点忠贞为国凛烈秉耀气贯日月之光

明心地而已。苟无此一点心地光明，则其聪明学问皆不值半文钱。民国以前，其所知者惟不愿中国为满奴而已；民国以后，其所知者惟不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而已。此所谓知者，良知之知，非聪明之知。中国何以断断不可沦为半殖民地，惟良知知之，聪明不知也。中山先生既有此知，乃不顾困难，不辞艰瘁，奋勇而行，然后以聪明为奴，解决一切，如众星之有北辰，是非易于分辨，去从易于抉择，然后行易，此吾解知难行易之说；若心中本无确定之目标，本无主裁，见事而疑，知难而退，于是生出糊涂了事、敷衍委蛇之局面。今日事发，只图今日对付，明日事发，再图明日对付，此时并行亦不易矣。王阳明良知之说如此，《大学》在明明德之说亦如此。先明德然后致知，德不明，知亦无用，知既无用，行必缺少勇气。

孟子曰，哀莫大于心死，亦只是如此说法。心为主裁，心死则万事不足为。孙中山本良知之知，中国断断不可沦为半殖民地；又本良知，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民众于是心亦不死，全国从而有一番新毅力新目标，共谋北伐成功。此十六年民心未死之证，亦人心未死，事且可为之证。是民国以来，中国人之政治努力，皆凭孙中山此一点良知唤起所使然，其理甚明。吾愿谒中山陵者，皆想此“天地正气”四字道理。

于此又可知先知觉后知之理。先知欲国民之心死则死，欲国民之心不死则不死。今日国难方殷，满目疮痍，人心已经奄奄将死。倘使如越王勾践，使人心不死，生聚教训，养精蓄锐以待时，则人心亦可不死。倘使并此心亦不可有，欲其死，则死亦甚易。只看有何由良知指示之目标，决不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并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坚其意志，以为一剂

补血针，则中国人心尚可救药，行亦不难。处于今日地位，虽曰万分困难，只要当事者以孙中山先生之心为心，是非立明，去从立决，而办法自来。不然恐烦难之问题，且将层至叠来，任尔如何聪明，皆对付不来也。

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读报有感而作

（《人间世》第 23 期，1935 年 3 月 5 日）

再谈小品文之遗绪

Jung 治心理，以言人个性之派别为主，Sainte-Beuve 治文评，也好言“性灵之家系”（Nature family of minds），以为文人个性，各有派系，派系同者，虽然或者时代先后不同，而上下千古，自能心心相印，其文章学问气质品类如出一轨，如同系子孙，面貌声音同出一脉者。倘使生在当时，自然声气相求，如苏子瞻与黄山谷，结为莫逆之交，即使生于异世，后人读前人之书，亦必如语从己出，道破自己胸怀郁抑，或者他人所不可解，反能体会入微，于是咿唔终日，爱不忍释，思之不已，梦寐随之，此袁子才、袁中郎所以皆有苏东坡“后身”之说也。吾在心理学，厌 Freud 而好 Jung。而在文评，尤主 Sainte-Beuve 性灵同脉之说。在小品文遗绪中，也可将此说略略印证出来。倘如吾将苏东坡、袁中郎、徐文长、李笠翁、袁子才、金圣叹诸文中怪杰合观起来，则诸人文章气质之如出一脉，也自不待言了。

大概诸人皆赋性颖悟，见解超人，胸中有万丈光芒，自然不易以心为形役，免就世俗格套，因此其文章也独往独来，有一片凌云驾雾天马行空之气。现在只就小品文笔调一端，也可看出诸位共同之点。苏东坡文从胸间流露出来，固不待言，若

其《陶然亭》、《赤壁赋》、《喜雨亭》诸篇，亦皆妙在画出胸中一点心境。文主心境，正是小品之本来面目。袁中郎之旷达自喜，萧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公安派举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贵见真”、“文贵已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此派行文，全如黄庭坚所谓“如虫蛀木，偶尔成文”。自此以后，李笠翁有“文贵机趣”之说，袁子才有“文章无法”之论。金圣叹在讲笔法上似迂腐，而其文学眼光，又能打破一般俗儒鄙视稗官小说之论，远继中郎重视民歌、文长批评西厢之遗绪。这些各种倾向，对于古文迂腐见解，都含有解放的作用，打破桎梏，排斥格套，善出机杼，不守成法，虽然被“以时文论古文”之辈所深恶痛绝，也是极自然之事。然而自我们现代眼光看来，无论作品，或是文学见解，都还是这几位可以说有点价值，与现代人性灵有点接触。

文学见解且不讲，且讲诸位行文之笔调，及其思想之内容。除子才时亦好弄玄虚排比典故外，诸位之文都近于平易浅淡。笠翁文体甚得语言自然之势，前已说到。若金圣叹那种行文，更是与说话一般无二。笠翁善用个人笔调，叙述日常琐碎，寄发感慨，尤长于体会人情，观察毫细，正是现代散文之特征。如果文言散文有所谓现代的，笠翁定可当之无愧了。其所著《觉世十二楼》，在中国短篇小说之演化上，尤不应轻轻看过，恐古来中国人所写短篇小说，对人物之描写，事理之推敲，尚无如此发挥方法。笠翁、子才二人之人生观，又可以说是现代的人生观，是观察的、体会的、怀疑的、同情的，很少冷猪肉气味，去“载道派”甚远。这种怀疑的、观察的、体会的、同情的人

生观，最是现代思想之特征，甚足动播人心，推翻圣道。子才、笠翁虽然表面上站在儒家方面，持此态度以往，实足动摇儒教的基础。到于金圣叹，此公评人文章，句句叫好叫绝，代人算一伏二伏，一折二折，实则自己行文，全无举业时文味道，尽是意到笔随，萧散自在，断断不是拘泥章法之辈所做的文章。

吾尝称赞其伪托贯华堂古本《水浒传序》为一篇绝好模范小品，现在在此再来说说。此篇好在何处？全在“闲散自在”四字，即所谓小品文之闲适笔调。且以此为《水浒传序》亦奇矣。作序本有二法，一是学者做法，历叙与该书同类的古人书中之系统，借此炫示一点学问，道来却无半句心头的话，或者平铺直叙作书之原委，参校之用心，搜罗之不易，编纂之疑难，再来两句“鲁鱼亥豕，在所不免，海内大雅，赐以匡正”的老话。此全非小品文之做序法，乃上言说理派，学教授之忠厚老实做序法。小品文作序法，仍然来得闲散，自天边海角讲起，或就茅庐草屋讲起，只诉述一点作书之衷情，余者尽置之度外，或有牵涉本书，也是轻描淡抹而过。然表面虽未尝说到本题，却一字不离本题，未尝用意专为此书作序，却是本书一篇绝好的序。倘使载道派为《水浒》作序，亦不过在天下治乱兴亡方面发挥高论，再来以几句警世劝善的门面话自为掩饰而已，其结果非如佛头着粪不可。圣叹作此序，乃专在描写作书者之心境，以心境为主，乃纯然小品文作法，而此篇遂成一才子奇书上之绝妙才子序文。

吾想一人将此序精读，小品文作法已思过半矣。圣叹批评文章，专在点出人家字法，句法。吾批圣叹文章，乃全在点出其逆字法句法大放自然之处。起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

……”夫三十娶妻也未与著书何干，又与《水浒传》何干，经他此一点，已离题千里矣。此语似故出惊人，然实由胸肠透露出来，如闲谈中应有闲散态度而已。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餐，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如此一放，已谈入日常琐事，又离“载道派”之天下国家甚远矣。然读者已得如闻至友闲谈之乐，“起问可中，中已久矣”，即所谓得语言自然之势。“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于今若干岁”虽文言，实语言格调。“夫若干岁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语言格调），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此处已是纯然所谓个人笔调，盖全出己见，不曾摭拾前人，而体会微细之情，正是小品文本色。下句“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又转入一段，与起句一样唐突，而实与起句一样闲散，盖纯本思想自然之序下去，此所谓：“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然亦何曾多得？”又是如闲谈，借一句问话转下去。“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不值，如是等时，真住牢狱矣。”此处真情真景，逼现目前，而因个人笔调，笔锋又带情感矣。若以下“舍下薄田不多……舍下门临大河……舍下……仅老婢四人”，此皆非序《水浒》而叙作者个人生活，无关《水浒》一百〇八人的事。实则全篇笔调如此，不必一一举例，作无谓之推敲。此篇之所以动人，全在其说浅近实情的话，就眼前叙述，不贪高鹜远，架空而言。因此写来，字字逼真，最好是以下几句：“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为常矣。吾友

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大概此文写来如说话，虽用文言，却是全然闲谈的语调。最怪今日之人行文，何以不学如此写法，因而怪行文之难，自己胸中无一句实话，只能雕章琢句，拾人矢橛，奉为珠宝耳。有些塾师改文，不得此旨，遇有一二真诚可喜之句，反叱为悖谬不雅，全然改削，所留下惟与人雷同全失个性之得体文章而已。行文欲其难，则甚难。欲其易，则亦甚易。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苟能人人各抒性灵，复出以闲散自在之笔，则行文甚易，而文章之奇变正无穷，何至如今日之沉寂空泛。至若等吃冷猪肉之辈，必欲吮毫濡墨，寻章摘句，"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以自文其陋者，此又是载道派勾当，与吾辈无涉。到底应当如何摹仿前人，如何抑制自己，说也说不来。自有彼辈中人能道其奥妙，吾辈不便干涉也。

（《人间世》）第24期，1935年3月20日）

谈中西文化

自从朱柳二先生那夜谈劳伦斯以后，数日不曾会面。这夜，朱先生饭后无事，踏月向沧浪亭走来，有意无意的走到柳先生家门，顺便进去，也不管柳先生正在吃饭，一直走到上房。柳夫人与柳先生正在月下对饮，自然也不回避。朱先生自己拿条板凳凑上，一屁股坐下。不一会撤席，老王排上水果，大家且嚼且谈，甚是自在。起初大家乱扯乱谈，后来谈到英国新出一部轰动欧洲的讲中国文化之书。

柳：文化这个东西，谈何容易。东西文化之不同，其实都是基于生理上的。你想日耳曼族信奉耶教一千余年，这耶教是由小亚细亚传过去的，所以也有和平、谦虚、恶魔、罪孽等等观念，日耳曼族名为信奉，骨子里何曾变了丝毫，还是进取冒险，探北极，制大炮，互相火并，就是因为西人身体气质不同。你看他们鼻子那么高，眼孔那么深，下巴那么挺，就晓得了。十年前也有西欧和尚来到中国，佛号叫做“照空”，我也跟他谈过话，那里有一点出家人相貌，谈起话来，就象一颗炸弹，时有爆发之势，恨不得欧人天诛地灭，当时我称他为火药菩萨。老实说，清净无为还是我们东方的玩意儿。你想一个天天探北极，赛摩托车，打破飞机纪录的民族还能做真正佛门弟子吗？西洋

人要扮出清净无为的相貌，只觉得滑稽好笑罢了。

朱：想起来也好笑。西洋人到我们中国来传教，叫我们和平、忍耐、谦虚、无抵抗，这真太岂有此理了。难道世上还有比我们中国更和平忍耐的老百姓吗？

柳：我就是这么说。中国文化就是有什么好处，西洋人也是学不来的。西洋的个人主义，不在于他们的书上，而在于他们的骨子里头。你看看西洋女子之刚强独立跟中国女子之小鸟依人一比就明白了。你再看中装与西装之别：舒服温暖，西装不如我；而间架整齐，中装不如西装。其实西方也何尝无舒服温暖的衣服，你看他们在家穿的 dressing gown 及 slippers（便服软鞋）何尝不跟中装一样，只是我们中国同胞经过几千年的叩头请安，骨子都软了，所以在家在外都穿他们的“便服”及“拖鞋”罢了。他们祖宗在我们明代还在出入绿林骑马试剑，到现在胸部臂上还有茸茸的红毛，让他们再文明了二千年，你且看看他们要不要在家在外都穿起长袍软鞋。西妇嘴上常有一撮胡须，中国女子就少有。中国女子有“白板”，西洋就没见过这名词。中国女子皮肤比西洋女子嫩，就是因为二千年的深守闺中，难得出汗，所以毛孔也细起来了。凡此种种都足见中西体格气质上之不同。再加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容人多管闲事，中国社会制度，不容人太出风头，即使生下来有一点英灵之气，都被这种社会压完了，大家俯就常局，八面玲珑，混过一生，了此公案，怎么不叫聪明的人都明哲保身，假装糊涂呢？如果有什么真正英雄豪杰，必不容于家庭，不容于社会，一驱之于市井，再驱之于绿林，剩下一些孝子顺民大家争看武侠小说过瘾罢了。再加上家庭制度把你的个性先消灭，而美其名曰“百

忍"，于是子忍其父，媳忍其姑，姐忍其弟，弟忍其兄，妯娌忍其妯娌，成一个五代同堂的团圆局面，你说怎么不叫中国人的脸庞也都圆了起来？你想社会制度如此不同，他们来讲我们的文化有什么用处？

朱：吾兄所言诚是。我想处世哲学社会制度终归东西不同。但是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主取，东方主守；西方主格物致知之理，东方主安心立身之道；互相调和，未尝无用。世事如此纠纷，西人一天打，打，打。照道理，学所以为人，并非人所以为学，以人为一切学问的中心，这是中国文明之特征，人生在世不满百，到头来盘算一下，真正叫我们受用的，还不是饮食男女，家庭之乐，朋友之快，心地清净，不欠债，及冬天早晨得一碗热粥一碟萝卜干求一温饱吗？常人谈文化总是贪高骛远，搬弄名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这样一来就有点象盲人骑瞎马了。我最佩服一句孔夫子的话，叫做"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是真正东方思想的本色。这样一讲，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秤上一称，才稍有凭准。

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半谈东西文化的人，都不得要领，打不出这个圈套。其实这也不限于做文章的人。处在今日世界，无论男女老幼贤不肖，那一个不在天天作中西文物的比较。比方你穿的是卫生衣，还是中国短衫，造的是洋楼，还是中国园宅，此中已含有中西文物的比较了。文化范围太大，此刻也不讲中外处世哲学文学美术之不同，只讲常人对此种问题的态度。常人是不肯看到底的，不肯渗透道理的，总是趋新骛奇，赶时髦，赶热闹。讲到我国的文物，不外"虚张声势"与

"舍己耘人"两路，这两条路正是外强中干的正反两面。忽然耻中衣，耻中食，说必洋话，住必洋楼，穿必洋服，行必洋路，过一会儿又是什么孔孟尧舜、仁义礼智，连不知有无之大禹也要搬出来崇奉。这是近来国弱，国人神经失了常态，故郁成这"忧郁狂"及"夸大狂"出来。你想单讲礼貌一端，还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中国社会是世界最无礼的社会。你只消一坐电车，一买戏票，一走弄堂，便心下明白，在中国人之心理中，路人皆仇敌，还配跟人家比什么礼貌吗？要复什么礼？你坐电车，看是洋人司车有礼，还是中国司车有礼？你到公司买物，看是外国伙计有礼，还是中国伙计有礼？然而大家都在糊涂复古。不具批评眼光，所以吹也是乱吹，骂也是乱骂。

柳夫人：可不是吗？中国人口里尽管复古，心里头恨不得制一条陀罗尼经被，把中国这个古棺一齐掩盖起来，别让洋人看见我们的老百姓，只剩下几个留学生带狗领说洋话同外人拉手，才叫做爱国呢！

朱：你也未免忒刻薄了。不过事实确是如此。十几年前，为丹麦皇太子要来游京，因为中山路两旁有穷人茅屋，还发生星夜拆民房的事呢！

柳夫人：这种事情还多着。那时代的人也太笑话了。记得有一要人也曾提议，以京沪一带为洋人常游之地，应将沪宁铁路两旁的茅屋用篱笆遮围起来，才不碍观瞻。他们总是怕中国老百姓替他们出丑，必要叫穷民人人拿一条白手绢，穿皮靴象他们同洋人跳舞，才叫做替中国争脸。其实他们一辈人也不曾替中国争到什么脸，我们老百姓也不曾给中国出过什么丑。

柳：这就是我刚才所说，东西文化之批评不限于文章而见

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这班带狗领的外交跳舞家心目中也自有其所谓“文明”，此“文明”二字含义实与“抽水马桶”相近，甚至无别，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他们的抽水马桶，所以中国老百姓是“野蛮”。至于老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披星戴月，晨露沾衣的种田，不能叫做“文明”。我刚才讲中国人不是中了“忧郁狂”，便是犯“夸大狂”，这都是因为国弱，失了自信心所致。这种专学洋人皮毛的态度，那里配讲中西文化？说也好笑，中国腐儒的古玩，常被此辈人抬出来当宝贝，而中国文化足与西洋媲美的文物，如书画建筑诗文等，反自暴自弃。他们开口尧舜，闭口孔孟，不必说孔子为何如人，彼辈且不认识，就说认识，也何足代表中国文物之精华。你想想，假如中国文明也如希腊文化一般的昙花一现到周末灭亡，除了几本处世格言及几首国风民歌以外，有什么可以贡献于世界？孔孟时人大半还是土房土屋席地而坐，中国如果到周末灭亡，那里有魏晋的书法，唐人之诗，宋人之词，元人之曲，明清之小说？那里有羲之之帖，李杜之诗，易安之词，东坡之文，襄阳之画？那里有《拜月亭》、《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红楼梦》？又那里有云冈石刻、活字版、瓷器、漆器、宫殿园林？现代中国人尊其所不当尊，弃其所不当弃，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不教中国画，建筑工程师不会造中国宅，文人把李白、杜甫看得不值半文钱，难道这还算中西文化的批评么？其实国人心理都已成变态。先自心里不快，眼见社会政治不如人，生了 inferiority complex，真正迂腐之处，无勇气改革，文化为何物，又不知所谓，于是一面虚张声势，自号精神文明，一面称颂西方物质文明。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这且不去管

他，我告诉你个笑话：民国二十二年有法国作家，记不清什么名字，游历来华，偶然称颂东方女子身材之袅娜，态度之安详，说是在西方女子之上。这话是诚意的，我也不知听过外人说多少次，殊不知中国女子那敢自信，自然把那位法国作家的话当做讽刺，大兴问罪之师，还闹得不亦乐乎。

柳夫人：他们正在恨不能投胎白种父母，生来红毛碧眼，一对大奶头大屁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哭笑起来，胸部起伏膨胀，像Mae West一样呢。总而言之，今日中国碰着倒霉时候，说来说去是海军的不是。什么时候中国造得几座无畏舰，去轰击伦敦、大阪，中国女子也就美起来，中国点心也就好吃了。

柳：我所要指明的就是这一点。世上道理原来差不多，只怕常人不肯看到底，看到底处，中外都是一样的。中外女装都是打扮给男人看的，等于雄鸡、雄孔雀的羽毛是打扮给母鸡、母孔雀看的。这样一来，不又是天地生育的一桩寻常道理，那里有什么高下？西洋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中国夫妇吵架，西洋夫妇也吵架，中国女人好谈闲话，西洋女人也一样好说闲话，中国女人管饭菜，西洋女人也把烹饪术叫做the way to reach a man's heart. 你常看电影就明白了。烹饪如此，诗文也何尝不如此？记得民国二十四年，中国戏剧诗文在外国大出风头。梅兰芳受聘游俄演艺，刘海粟在欧洲开现代中国艺展，熊式一把《红鬃烈马》译成英文，在伦敦演了三个多月，博得一般人士之称赏。在上海又有德人以德文唱演《牡丹亭》，白克夫人又把《水浒传》译成英文，牛津某批评家竟称施耐庵与荷马同一流品。德人也译《金瓶梅》，称为杰作。我读了英人《红鬃烈马》的序文，说他读到“赏雪”(enjoy the snow) 二字就恍惚着了迷，说

雪可以赏，又可开宴来赏，这真是中国人的特色了。然而中国人却莫名其妙。若说是假捧场的，那末戏一演三个多月，又非作假得来，若说是真的，到底中国戏、中国画好在那里，又说不出，总觉得杯弓蛇影，希奇古怪，狐疑起来。

柳夫人：你也别多怪，现代左派青年是不看《西厢记》、《牡丹亭》的，你怪他作甚？到于杜甫、李白，他们真看不在眼内。他们只认为宣传是文学，文学是宣传，顶好是专做白话长短句，里头多来喊几声"高尔基万岁"才叫做好诗呢！

柳：据我看来，还是书没有读通所致。西洋文学固然也有胜过中文之处，但是西洋文学一读死了，中国文学也就懵懂起来。他们读过几本西洋戏剧，便斤斤以为西洋戏剧就是天经地义，凡与不同者，都不能算为戏剧。譬如讲戏剧结构之谨严，剧情之紧凑，自然《牡丹亭》不及《少奶奶的扇子》，或《傀儡家庭》。但是必执此以例彼，便是执一不通。《牡丹亭》本来不是一夜演完的。西洋戏剧以剧情转折及会话为主，中国戏剧以诗及音乐为主，中国戏剧只可说是 opera（歌剧），不是 drama. 以戏剧论歌剧自然牛头不对马嘴。你看中国人演剧常演几出，就跟西洋音乐会唱 operatic selections 相同。戏剧多少是感人理智的，歌剧却是以声色乐舞合奏动人官感的。如把这一层看清，也就不至于徒自菲薄。要在中国发展新文学新戏剧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旧体裁也得认清才行。又如小说，那里有什么一定标准，凡是人物描写得生动，故事讲得好听，便是好小说。我曾听中国思想大家说《红楼梦》不及道斯托伊斯基，心里真不服，恐怕还是这一派食洋不化执一拘泥的见解吧。其实我们读西洋文学，喘着气赶学他们的皮毛，西洋人却没有这样拘泥执一，时

时发展，无论传记，长短篇小说，都是这样变动，试验。因这一点自由批评的精神，所以他们看得出中国诗文的好处，而我们反自己看不见弃如敝屣了。

柳夫人：你发了这一套牢骚，喉咙怕干了吧？

柳夫人立起，倒一碗茶给柳先生喝。又要倒一碗给朱先生，却见朱先生已经鼾鼾入梦了。他们举头一看，明月刚又步出云头。柳夫人轻轻的拿一条洋毡把朱先生露在椅上的脚腿盖上。

（《人间世》第26期，1935年4月20日）

今文八弊

（上）

济颠诗："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虽是济公晚年自道圆寂胜景，却也未尝不可拿来做现代中国影子。上二句是应现在六十年来狼藉之势，下二句能否应了将来，却要看中国人灵魂收拾得来与否，收拾不来，恐是长此狼藉下去，不必说西天乐土无份，就是眼前水连天碧也没福消受了。我想文化之极峰没有什么，就是使人生达到水连天碧一切调和境地而已。我生不逢辰，处此扰攘之秋，目所睹是狼藉之象，耳所闻是噪嚣之音，想国事至于此极，我同胞的心灵已经混乱了，柔肠已经粉碎了，神志已失其平衡，遂时时有颠倒梦呓之言，躁暴狂悖之行了。所以"东壁打到西壁"可以形容政治，也可以形容文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何一非混揪混打尔诈我虞之举动。好像一人走了魔一样，魂灵已离躯壳，躯壳只做些无谓的抽抖而已。指天画地，忽哭忽笑，喜怒反常，好恶无定。忽而装腔作势，自欺欺人，忽而悒悒终日，垂头丧志。因此国中的思想忽而复古，忽而维新，所复的是最迂腐的古，所维的是最皮毛的新。好比一人发寒瘟，冷一阵，热

一阵，冷得像入冰山，热得像上油锅。这样子元气怎能不消耗，身子怎能不虚弱下去呢？我国人的神志既然这样纷乱，自然早已失了中国文化所重“事理通达心地和平”的精神，及希腊文化所重的 sweet reasonableness. 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不能有伟大的创作。一人的神灵四分五裂，只有冲突，没有调和，怎能有伟大的创作出现？我看这个时期应当是批评的时期，做些斩芟芜秽推陈出新工作，最为重要。然仅此批评的工作，亦非恢复“事理通达心地和平”的境地不可。到于今人心理，所以这样不宁，本也难怪。一则，受政治的影响，国强则礼盛，国弱则礼衰。今日不论政治、社会、文学，舆论，那里有一种是非公理。是非既泯，公理既灭，于是人心也乱了。人心既乱，于是失了大国风度，自暴自弃，相轻相蔑，容易迁怒于人，而发生东壁打到西壁，乱嚷乱滚不得安静情状。二则，潮流太复杂，处此东西交汇青黄不接之时，融会古今，贯通中外，谈何容易？此种批评，岂是人人做得来？做不来又偏偏不能不做。譬如女子烫发与梳髻孰美，男人卫生衣与短衫孰便，一举一动之微，都无意中含了中外的比较。据此种日常琐碎一言一行之微，概括起来，于是不是复古，便是维新，不是国粹，便是新学，各有成见派别了，对此东西文化问题也就交代过去了。殊不知文化批评，那里如此简单。表扬文化，岂在梳髻改服？风筝岂能救国，打拳何关国防？只因服之短长，髻之形样，武人尚看得到，信手拈来，禁止提倡，博个关心风化的美名罢了。如此批评文化，更难搔着痒处。三则感情过于冲动，主见难于捐除。大家都是黄帝子孙，谁无种族观念？眼见国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斗。一面想见贤思齐，力图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

物，又求保守。此种保守心理，出于至情，一半为国，一半为己，争点体面。保守自信与见贤思齐两种心理，都未可厚非。不过保守自信易流于抱残守缺，顽固迂腐，两者相去，间不容发，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见贤思齐又易流于盲目崇拜，趋新骛奇，彼此之间，岂易鉴别？难矣哉，批评乎！中智以上的人既然失了主裁，心志未定青年，遂亦歧途观望。再加以上所谓国乱心危，人人着急，遂发生此两相成之普遍的“自大狂”与“忧郁狂”。是非颠倒，好恶反常，蝉翼为重，千钧为轻，其情急以哀，其辞激以怨。所见于文，方巾作祟，猪肉薰人，或为西崽口吻，或为袍笏文章，既非真正现代批评，又全非古来明理达情面目了。收拾归来，谈何容易？剪纸招魂，良非得已。林子有鉴于是，欲抒愚见，以箴其失，作今文八弊：（一）方巾作祟，猪肉薰人。（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四）文化膏药，袍笏文章。（五）宽己责人，言过其行。（六）烂调连篇，辞浮于理。（七）桃李门墙，丫头醋劲。（八）破落富户，数伪家珍。

（《人间世》第 27 期，1935 年 5 月 5 日）

（中）

（一）方巾作祟，猪肉薰人——有虚伪的社会，必有虚伪的文学；有虚伪的文学，也必有虚伪的社会。中国文章最常见“救国”字样，而中国国事比任何国糊涂；中国政客最关心民瘼，而中国国民创伤比任何国剧痛。

因而发生尔诈我虞上下欺罔之通电式文章，其势力所及足以影响于普通论文。实则中国政治之腐败，一半是文学标准之错误。大家养成一种说老实话的习惯，行为也可诚实一点。大概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文章也愈矫，所以道学假面具不拆下，魑魅魍魉必横行于世。譬如要人辞职，或因主张不行，或因意见相左，在头脑简单的洋人老实说出，也可过去，但在中国要人，必托以病。夫托以病，便有不可告人之隐，邪正得以混淆而是非莫辨矣。贪官污吏固然可以藏垢纳污，避免举发，而忠直者也隐其苦衷，不得大白于世。在面子至上主义的中国人，当然以为宣布隐衷，必伤人情面，然在健全诚实的社会，意见相左，有何不可说得？其病还在中国社会不容人说老实话罢了。即此一端，已可概见中国社会之尚虚伪了。这不过是文字应有之一端而已。我想此种虚伪的文风不改变，人人可以开口仁义，闭口尧舜，政治的混乱黑暗，也无法澄清。所以文学革命之目标，也不仅在文字词章，是要使人的思想与人生较接近，而达到诚实较近情的现代人生观而已。政治之虚伪，实发源于文学之虚伪，这就是所谓“载道派”之遗赐。原来文学之使命无他，只叫人真切的认识人生而已，你说这“人生”就是“道”也无不可，但持此“载道”招牌，必至连文学也懵懂起来。汉儒解三百篇是最好的例。三百篇大好情歌，经过腐儒一解，“关关雎鸠”，也变成美后妃之德周南之化了。袁子才问得好，文王何以不思太王而思后妃？孔子何以不思鲁君而思狂简小子？识得此理，便知子才文学观念比现代革命文人近情多了。此种载道观念，在往时足使文人抹杀小说之文学价值，视为稗官小道，难登大雅之堂。其在现代，足使人抹杀幽默小品

之价值，或贬幽默在讽刺之下。幽默而强其讽刺，必流于寒酸，而失温柔敦厚之旨，这也是幽默文学在中国发展之一种障碍。必有人敢挨骂，做些幽深淡远无所谓的幽默文品，替幽默争个独立地位，然后可稍减道学派之声势。今人言宣传即文学，文学即宣传，名为摩登，实亦等吃冷猪肉者之变相而已。载道文人，必欲一颦一笑，尽合圣道，吃牛肌而思耒耜，闻蛙声而思插秧，世间岂有是理？揣其为人，必终日正襟危坐，一闻花香，便惧丧志，一听鸟语，便打寒噤，偶谈两句笑话，则虑其亡国，一读抒怀小品，便痛其消闲。舒梦兰写清朝俗儒形相，正是今日文人的影子。他们讥濂溪之爱莲为“留心小草”，鄙渊明之游山为“不孝不慈”，怪李白之纵酒赋诗为“昧于明哲”，詈香山之挟伎侑酒为“伤教败俗”，必欲毁《琵琶记》之书版，拆庐山草堂之遗址，才可以正人心而息邪说。“彼其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虽孔子割鸡之戏言，孟子齐人之讽谕，皆犹似有伤盛德，不形诸口。若第以粗迹观之，即古圣先贤，犹恐不逮，我何人而敢不敬，敢不畏，敢不色沮气丧，言动皆失其常度乎？”此种流风，其弊在矫，救之之道，在于近情。

（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文人最要在通情达理，竖起脊梁，立定脚跟，又须稍顾廉耻，勿专投机。凡事只论是非，勿论时宜。若是心头不定，东张西望，今年鸡年，明年狗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忙够不了，过后自思，当亦哑然其笑。美国国民浮薄，英国国民稳重，就在这一点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还是近于美国派吧。我想文人肯好学深思，多用头脑，凡事求个彻底，看得真透，也可以稍稍纠正此种毛病。以前大众语之争，“海派”文人喊得震天响，北平文人早已看穿葫芦中是

卖何药，置若罔闻。所以沈从文批评一句话，叫做：大抵北平作者“年纪大一点，书读多一点”所致，可谓切中要害。大抵人书读得多，便不易为新说所摇动。古来文学潮流递变，道理却是一样。即如文学是宣传，宣传是文学一说，虽然是崭新苏俄的革命理论，其文学立场却和十九世纪中叶之法国文学一般无二，知彼知此，较量一下，也就不易为危言所耸动了。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时代前锋，而所谓站在时代前锋之解释，就是赶时行热闹，一九三四年以一九三三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为落伍，而欧洲思想之潮流荡漾波澜回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已卷入漩涡，便自号为前进。其在政治，如法西斯蒂在欧洲文明进化史上为前进为退后，都未加以思考。其在文学，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介绍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

（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幽默译西洋本音则争相仿效，小品文忘记译为“凡米利亚爱赛”则起而诋毁。小品文以闲适笔调抒情说理，中外何别，乃翻译西洋小品则曰介绍西洋文化，勾稽中国小品，则曰搬卖臭铜烂铁。推其心理又系耻为华人，此种态度，何足言批评中西文化，又何足建树现代人生观？如此服侍洋大人，必恭必敬，只取洋大人之厌鄙，终身为西崽可耳，岂能一日自作主人翁？吾国文化，自应改良，然一言故旧，则詈为封建，一谈古书，则耻为消闲，只好来生投胎白种父母耳。谈古书固然消闲，然在中国读西班牙诗歌及巴尔干小说，岂便

忙人所应为？又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自然西医归入科学，中医归入迷信，与“卜星相”合为一门，理甚相宜。然一味不察，只詈其迷信，亦非所宜。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若水火相克之说，肝火上生则压以水，胃土积滞则疏其气，说法虽乖，功效实同。又如金鸡纳霜是树皮，高丽人参也是树根，不得因其物有中外而分其新旧，如此将来中外医理才有打通互相发明之希望。故无论何门，读书必通，通则化。读书何为，所以供我驱使，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 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的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四）文化膏药，袍笏文章——所谓西洋文化，有一端吾人颇可仿效，就是：制牙膏说牙膏话，做皮匠说皮匠话。吾人制牙膏必曰“提倡国货”，炼牛皮必曰“实业救国”。于是放风筝亦救国，挥老拳亦救国，穿草鞋亦救国，读经书亦救国，庸医自荐，各药乱投，如此救国，其国必亡，不亡于病，而亡于药。吾国如要得救，各人将手头小事办好，便可救得。今舍小就大，贪高骛远，动辄以救国责人。比方《论语》提倡幽默，也不过提倡幽默而已，于众文学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谣，不脱期，为愿已足，最多希望于一大国中各种说官话之报之外有一说实话之报而已，与救国何关？《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

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何关救国？吾甚愿人人将手头小事办好，少喊救国，学江湖郎中卖文化膏药，国始有救。此种流风，其弊在空，救之之道，在于行。

（《人间世》第28期，1935年5月20日）

（下）

（五）宽己责人，言过其行——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上边已经说到。在比较通情达理的古代社会，儒家也是以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为君子之德。故君子不责人以死，因为知恶死为人之常情，设身处地，也未敢自信必能慨然就义。"我亦人也，彼亦人也，我何胜于彼哉？"这样一想，心地就谦和一点，"何难以一死了之"的话头，也就不容易见于笔端了。其实将来大义所在真能以死了之的，还是这些不愿责人以死的人。世上有这样的奇事：言论愈狂放者，其持躬愈谨，治身愈严，而言论迂阔，好以小过责人，必欲人人如夷齐孔孟者，反是一般夸躁的轻狂子弟。遂其愿，不惜谀死佞生，不遂其愿，不惜丑辞诋毁者，也是这班道学小人。在文学史上，我们看见最放诞不羁的莫如金圣叹，名为圣叹，固圣人之所当叹矣。然能反对苛捐杂税，为民请命、到因哭庙就义大快而死的，还是金圣叹，并不是以"震惊先帝在天之灵"，陷金于死的卫道忠臣朱抚院。故世人或言过其行，或行过其言。若郑板桥欲为厉鬼击人之脑，此则一般吏宦所不敢出诸口见诸文者，但若谓一般吏宦之高风亮节在板桥之上，则吾决不敢信。余如眉公之焚儒冠儒服，子才

之收女弟子，中郎之想要短命妾，东坡之以诗得谤，居易之挟妓饮酒，类皆有伤风败俗之行，放诞不经之谈，正士切齿，仁人寒心。其为文"言有觞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因此或放逐岭外（东坡），或割喉狱中（卓吾），或逍遥山林（眉公），或致仕而卒（居易）。然察其大节细行，都不是常人所能及。一旦任政临民，都能为民父母，临去攀舆载道（中郎、子才），又绝非咿唔孔孟翼道先生所易得到的政声。所以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于风骨，不可求之于言辞，可求之于细行，不可求之于诗文。今日文人求一不关心民瘼者几不可得，求一不愿救国者亦不可得，然纸上谈兵，关心愈切而疮痍愈深，文调愈高而国愈不可救，总因文人言过其行，视文章如画符而已。且宽己责人，以谩骂为革命，以丑诋为豪杰，以成一种叫嚣之风，还都是欠反求诸己的一点修养工夫罢了。难道你骂我，我骂你，中国就真会兴起来么？下焉者，且不惜化名投稿，散布谣言，一以扬己，一以攻人。我真不相信此风一成，中国文学遂会变成"革命的"、"革命底"以至"革命地的"了。故骂人也有君子小人之道。本来卓吾也骂人，轻狂子弟亦骂人，或者欲学卓吾，而实为轻狂。卓吾讥先哲，轻狂子弟亦讥先哲，然卓吾《藏书》攻君子之短，而不没小人之长。攻君子之短，轻狂子弟学得来，不没小人之长，轻狂子弟却万万学不来也。骂之道精微矣！徐芳《悬榻编》记"李卓吾让骂者"一节说："或曰：'卓老生平骂人，乃不许人骂，可谓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眼者，骂卓老可也，世人之骂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谓予何人斯者也。'"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轻薄，救之之道，在恕。

（六）烂调连篇，辞浮于理——文人通病，在于空，在于懒，

空懒而又不肯舍笔从商，遂不能不摭拾陈言，完成篇章。且文章如时装，文人求入时。文之不能不变，犹时装之不能不改。“五四”时代有“五四”时代之文，普罗时代有普罗时代之文，美丑虽不同，风行却是一样的。新潮之文勇往迈进，创造之文激越感伤，语丝之文清新委婉，普罗之文诘屈欧化。青年在中学时期读其刊物，而文笔不期然而然受其同化，按响传声，观场逐队，所不能免。然各种体调，虽有本源，一旦风行，遂成滥调。今日文坛正承普罗文学绝盛时代之余波末流。今日写作之人，许多五六年前在中学念书时代，故此种烂调，一时不易洗尽。通篇文句，仿效西洋，无一句像中国话，名为前进摩登，实则食洋不化。如“玻璃打破”曰“玻璃被打破”，仿英文之受动语气；“竞争市场”曰“竞争着市场”，仿英文之分词体例；“革命的”曰“革命底的”，仿英文之状词语尾；“人”曰“人们”，仿英文之单复分别。甚而狗屁不通，“听爸爸的话”曰“接收父亲的意见”，“作者书商”曰“从事书工作的人”。呜呼，其可以已矣乎？至于行文，同为记游，叙事写景之余，加两句“时代不景气的轮齿已经迈进到农村了”即为前进意识。同为谈古书，鉴别版本之余，加两句“他们的思想为他们的生活的所决定，这种士大夫阶级的艺术必然无疑底的要没落而不能保全它的存在了”，便是革命情调。想文学革命，本为推翻陈言，陈言烂调，新旧无别。陈言不去，何能见清新平淡的白话文？故必如小修所云“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然后文字可以复归于雅驯。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滥，救之之道，在清新。

（七）桃李门墙，丫头醋劲——文人之分门别户与政客之植

党营私相同。惟党派在政治为必然之组织，门户之见，在文学必昧一时之是非。门户一成，惟有汝我，没有是非，党同伐异，互相攻讦，揪作一团，打给武人看开心。甚至为私人豢养，拿枝笔杆，换碗米汤，虽然笔下仪态万千，中夜问心，能无自愧？即使非为拿津贴，亦常走入利害之见。利害之心重，则是非之心昧。求其刚正不阿，狷介自持，就事论事，见理明心者，就真不容易了。我们何贵乎文学，也不过借文字之发表，可以斩除枝蔓的思想，使理日益明而见日益真罢了。一开门户之见，公论遂成为私人之武器，批评成为意气之发泄。理论愈高阔，是非愈混淆，真是无补于事，仅可以“覆瓿”而已。人生本多孽障，文人何苦多增一层烦网，多添一重公案？况且门户必有领袖，领袖必有幕僚，幕僚必有喽罗，喽罗又必有小喽罗，沦至于此，真不若不识之无为干净了。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婢，救之之道，在自我。

（八）破落富户，数伪家珍——不肖子弟，内不能兴旧业，外不能振家声，日数伪家珍以炫人，为识者所笑。世事物极必反，有食洋不化之洋场孽少，也必有自欺欺人之迂腐故老，以变法为亡国，以改进为灭种。对近代既无认识，对古代尤无真知，只要以复古尊孔博关心风化维持道德之美名。其实彼辈所关心的都是他人的风化，所维持的也是他人的道德。别墅十万元，而大夸中国民族俭仆之风；娇妾三十余，而独悲摩登女子荡检之行；洋装少年以硝镪水射女子华服，自认为提倡孔教；国家大吏逐再嫁寡妇出境，自认为纠正末俗。甚而不分青红皂白，禁止男女同座，提倡小学读经，推类至尽，非把女子重复裹足不可。礼教果必如此始得维持，则礼教之灭亡可必。如此尊孔

复古，则古愈复愈不得青年信仰。也不想想，中国人因孔教而知礼义忠信，而西人本无礼教，何以也知礼义忠信，且其礼义忠信，常远在华人之上？也不问问，何以礼义之邦贪官污吏多于夷狄之国？又何以二千年谈礼谈义谈忠谈信之结果，人命犹如草芥，百姓犹在水深火热之中，有明以至现在贪官污吏，擢发难数，到今各地司法保安行政，犹有万万不可令外人知道之野蛮状态？若曰欧风东渐人心大变，岂是工部局西人传染与我市政府此贪污之恶习？还是邮局海关西洋职员秘传贿赂之新方？还是故宫宝物的大员，习了西洋博物院学，始得盗宝的秘诀？岂非原因在吾国向无法治，能知礼义忠信之廉吏，固然知道歌颂，而不礼不义不忠不信之官僚，则无法枪毙，犹得逍遥法外，事成可以扶摇直上，事败可以退居华屋，翻印佛经，或周游列国，考察教育？故舍法治而言礼义忠信，冀以激贪官之道义，而发盗宝者之天良，而谓从此政府可以廉洁，国家可以富强，我真不信。言论人权不与保障，则人各自危，明哲保身，积此明哲保身人自为战的国民为一国，则暮气沉沉如一盘散沙，而谓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两句老话，便能叫人化消极为积极，变中国人民如一盘散沙之现象，吾尤不信。一种社会，能斩决反对私刑反对苛捐之金圣叹而籍没其妻子，则此种社会断不能多产金圣叹，而其分子必皆韬晦自适莫谈国事，此理何待细辩？然则不谈法治，只谈仁义礼智，谓足使中国人民由散漫变为团结足以兴国，岂非如痴人说梦？实则取此态度者，都是自欺欺人，讳疾忌医而已。此种狂论，其弊在愚，救之之道，在多识。

（《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

《大义觉迷录》

雍正此人太奇怪了，火气又大。他不像适之，人家骂他，他必哓哓置辩。《大义觉迷录》便是这样四卷，六、七万字为清室及为自己辟谣的一部书。因为有湖南儒生曾静呈“逆书”给四川总督岳钟琪，怂恿种族革命而骂雍正皇帝害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所以做出来希望“大白于天下”的。原来把曾静拿来杀头，或凌迟处死，夷家灭族便可完事。雍正不出此，反故作宽容——此或是政治手腕，假仁假义，也不一定——只把曾静放逐，反把曾静十三条供语及雍正的十三条问讯刊出。问辞自然长于答辞，都是自辩文字，不但对害父、逼母、杀兄、屠弟加以辩正，并人家说他喝酒，他也要辩两句并不怎样喝酒，这样看来，以一天下之主与一弥天重犯之乡僻寒儒、落第书生对簿于民众读者的公庭上，未免有点所谓“失皇帝的身分”了。据他卷首的上论：“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胸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论，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大白于天下后世，亦不幸中之大幸事也。”因此在卷首另一上谕，他说“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合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

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这就奇了，经此一谕，不令人读此书便变成一种刑法上的罪案。这使我想到：(一)“天下是非公论”做皇帝的也是要顾到的；(二)当时谣谤实在满布西南、西北省分，雍正实在心虚，故必出此；(三)由雍正之自辩，反而透露许多今日不易得到的消息，连吕晚村、曾静之种族革命思想，也在此书保存了。乾隆皇帝大概早已见到此“欲盖弥彰”一层，所以把这雍正论旨颁布并定“不读为有罪”的书列为全毁禁书。是乾隆聪明呢，还是雍正聪明呢？我想雍正当局者迷，还是乾隆旁观者清。

此书实在有许多宝贵史料，尤其是关于雍正嗣位的一段疑案，当日种种不可外扬的家丑，都被他宣扬颁布出来了。卷一有两篇通共万余字的上论，是力辟华夷种族之见，写得实在不错。卷一之末至卷三是书之主要部分，“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也是最有趣的部分。卷四前一上谕力辟吕留良的革命学说，引了许多现在无从看到的吕氏文集及日记的话；又一上谕是驳诘严鸿逵的谤语，也引了许多严鸿逵日记的话。最后附以曾静长一万余字的悔罪书《归仁说》，文笔论调自然与雍正同一鼻孔出气。全书精彩实不在曾静的口供，而在那些似辩似议的鞫语。名为皇帝审重犯，实在是皇帝同重犯剧辩于“天下后世是非公论”之前。

雍正为人奸险猜忌是大家知道的。他曾锢杀阿舅隆科多，贬放功臣年羹尧——两位同他阴谋继位的人。其先康熙因为诸王骄纵，皇储屡定屡废，弟兄起了火并，致康熙痛哭仆地。雍正

得计登极之后，诸弟兄自然各怀异志，散布谣言，时有不隐之势。后来阿哥允礽也被锢禁。允禩允禟，除了摒出宗籍之外，并勒令改名为猪狗（满语“阿其那”、“塞思黑”），而终于被杀狱中，这也是骨肉人伦之大变了。其对曾静虽然异想天开，借犯人之反正自省以为自己作宣传，而宽其性命，然而对于早已死去之吕留良并不宽容，将其裔孙学生一齐捕拿。其先后做作，都可称为奸雄之主了。

《大义觉迷录》卷一辩华夷观念之名论，日人稻叶君山在所著的《清朝全史》（中华书局有译本）已经抄录一大部分，不再引录于此。内有精警语曰“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以后是讲“气数”及君德，即今之所谓“王道”也。若论事实，当时李自成实在也可怕。雍正辩明末失政的文中有这么一段的消息：“不法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以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无孑遗，其偶有生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也。康熙四五十年间，尤其目睹当时之情形，父老涕泣道之者。”中国礼义之邦，道德仁义谈了两千年，还脱离不了此种野蛮状态！然而四川人民虽然“竟无孑遗”，今日还是户口繁殖，有几千万的人肉巍然独存乎天地之间待人屠杀。中国民种强于蚊子苍蝇，真神圣不可思议矣。你说中国的“种”真会“火”吗？

在未抄录关于杀兄杀弟一段，我先抄一条有趣文字，可见曾静之前后思想，亦可见当时之内地情形。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土田尽为富户所收，

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等语。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你以为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俱归咎于君上有何理据呢？

曾静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间辗转，积而成弊，固自然之势，不关君上。……岂知贫以游惰，而致富因勤俭而得。此等不齐，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所能挽。盖天之生物不齐，因五气杂糅，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质不同，乃造化之自然，虽天亦无可如何……况天道福善祸淫，更幽远莫测。其穷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乎？其丰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

把贫富不齐由皇上肩上推到“天”，于是皇上曾静皆无罪。（其实曾静口供，谁保不是朝臣代拟？即使确出于曾口，反省文字本来如此，不足重视。还是应看问鞫语中所引曾著“逆书”文字，方是真正的曾静。）

关于害父、逼母、杀兄、屠弟之辩，及当日谣言四布之情形一段，见于卷三，页三三至页四四。兹抄录该段上谕原文于左：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按即皇后父佟国维之子，雍正称之为舅舅，曾阴助雍正登极，后杀之）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诽谤之语，得之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

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三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谤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从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京遣发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按即允禩）、塞思黑（按即允禟）、允禵、允䄉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现据广西巡抚金鉷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往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按允禵为十四哥，雍正为四哥）'。"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塞思黑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等语。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乃允䄉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因抄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䄉之亲信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其他如允

禵之太监马守柱，允禩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马守柱达色霍成等经过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意设谋，惟以布散谣言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夫允禵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禵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乃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禵，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禵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朕即位之初，召允禵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

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禵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在京，以尽子臣之心。"（语堂案：不知他人以为如何，余意能作此类文章之人最不敢信此一类话。）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禵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洲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禵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雍正此处文笔略乱，愈讲愈不可解。焉知康熙非重用允禵以监察年羹尧？读之愈滋疑窦。况年羹尧之不稳，正是事实。）其以朕为防范允禵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禵声价之论也。及允禵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此等处正是雍正要人读处），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禵，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禵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禵进见，时太后并未向允禵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者。后允禵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禵，严加训诲。此亦宫中人所共知者。允禵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禵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云："太后因闻囚禁允禵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

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之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禵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禵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迹，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禵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禵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禵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禵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乱错至此极耶？……

以下是辩塞思黑母亲自缢而亡，及历数阿其那塞思黑之罪。计此上谕，原为宽宥曾静不准群臣所请正法而作，竟成洋洋八千余字长文，雍正亦好辩而其苦衷亦可见矣。

此种文字颇似两方互诬驳诘的《申报》广告，使当时有《申报》，雍正必不惜几百元登一全页广告可知。然此类广告上之驳诘文字，每使人愈读愈糊涂。此文给人印象，亦复如是。乾隆全毁之，确有卓识。所可知者，诸王兄弟相继禁锢而死，确是事实。骨肉相残，亦云惨矣。

（《人间世》第 30 期，1935 年 6 月 20 日）

中国的国民性

一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义存焉，就是既老且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与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的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水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

的旱灾水患，外寇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遗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然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这种奇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纪比人家大，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诸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的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说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态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其及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不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一黑人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句话也听不懂”。不懂就是伟大，而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你试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独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艺术、乐舞、建筑足与西洋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

竟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收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其他各国有更悠久的不断的经历，中国文化也比其他各国能传布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竟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安、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是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如此颓唐萎靡之势。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的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是等于“神话”，今日中国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的中国人”。）中国历史，约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兴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兵匪内乱，由兵匪起

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寝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和，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之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吃米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

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民族之由来，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经济环境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若安分，这都是好的；若善生儿女，若守旧，和平，这也有好也有坏；若含忍，若分散不能团结，若老猾，这都是坏的。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姑先就这三个弱点来说：忍耐性、散漫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且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由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常理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首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在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摆出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漫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的清楚方便，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流别。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中国民族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

效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那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赋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愈“安排吃苦”愈有苦可吃。假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的安排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及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练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天给我们习练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姐，侄忍其叔，媳忍其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炼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他何诀。张公艺只请纸笔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处，若不容忍，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

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是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了。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的明鉴。东汉之末，士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土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漫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以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予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吾人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夏大学演讲稿）

（《人间世》第 32 期，1935 年 7 月 20 日）

《浮生六记》译者序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她只是我们有时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愿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中饭，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滷瓜）之时，你们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毡把你的脚腿盖上。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因此，我说她是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过甚其辞。

她的一生，正可引用苏东坡的诗句，说它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

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福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这悲剧之发生，不过由于芸知书识字，由于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要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簉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夜，化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看出。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如果是，她全不晓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法的衷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青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法，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痴情少妇，把她逐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沛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了。

这是否她的丈夫，沈复，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他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它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我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 Maurice Ravel 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长啸 Massenet 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之时，每每不期然而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痛苦——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复活》里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其中只有四记（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

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存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一八七七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作者生于一七六三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一八〇八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弢园），颇负文名，曾于幼时看见这书，所以这书在一八一〇到一八三〇年间当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萼之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台湾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廿四年五月廿四日龙溪林语堂序于上海

注：本序英文原登《天下月刊》创刊号，译文登《人间世》，原非汉英对照之用，故译稿有一二语句为原文所无，兹以（　　）别之。

（《人间世》第40期，1935年11月20日）

且说本刊

"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此一代名臣曾国藩家书语也。夫以掌天下之权衡之中兴名将，不谈国事，不讲仁义，乃拳拳不忘于诸女做鞋，弟辈养猪种竹，腐儒必讥其迂，今人必斥其不革命。但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人情事理，何止一端？孔子见朝燕居，本来不是一副面孔。忠臣思君固可，慈父教女做鞋亦无不可。今人抒论立言文章报国者滔滔皆是，独于眼前人生做鞋养猪诸事皆不敢谈，或不屑谈，或有谈之者，必詈之为不革命，为避开现实，结果文调愈高，而文学离人生愈远，理论愈阔，眼前做人道理愈不懂。这是今日不新不旧不东不西不近人情的虚伪社会所发生的虚伪文学现象，而《宇宙风》之所以刊行于世。

文学不必革命，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孔子亵裘长，短右袂，与仁无与；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与义无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与礼无与；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与智无与。四者无与，而仍不失为孔子。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

措皆非，右袂不敢谈，寝衣亦不敢谈，姜酱更不敢谈，若有谈食精脍细者，必指为小市民意里奥罗基(bourgeois idcology)而怒骂之。做人如此，只好退入蜗牛壳。这只是思想成熟青年一斑之见，欲意一主义独霸天下，以一名词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殊不知人生不如此简单，可尽落侪名词壳中，文学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故此文学观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不近人情的文学观”。其文不近情，其人亦不近情。人已不近人情，何以救国？

实则古人何尝如此，西洋人亦何尝如此？古人要人人安居乐业，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而后天下太平。西洋人要人人尽情工作，尽情作乐，皆所以得人情之正。现代人生观是诚实的，怀疑的，自由的，宽容的，自然主义的。现代中国人的人生观，承理学之遗毒，仍是虚伪的，武断的，残酷的，道学的，坐禅式的，真有朱子“一闻钟声便觉此心把握不住”之慨。然没有现代人生观，何以为现代人？况且宋朝理学将心把握得住之时，遂发现有缠足之风大盛及提倡贞女烈妇，禁止寡妇再嫁等不近人情的人生观。愈道学，去孔子之近情哲学愈远。

即以通行文体而论，也是不近人情，故也是非现代的。时行白话做势装腔甚于文言。“他是触到了难比的深度同宽度”是何鬼话?“而今日却被他们利用来掩盖同粉饰活生生的现实的雄姿的工具了”是何屁话？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词藻为能事，以炫其空，与做艰深古文者何别？故今日杂志虽多，而近情可读之文章极少。所谈既皆乏味，文体尤为艰涩。西洋杂志文已演出畅谈人生之通俗文体，中国若要知识普及，也非走此条路不可。杂志之意义，在能使专门知识用通

俗体裁贯入普通读者，使专门知识与人生相衔接，而后人生愈丰富。

《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议论则主通俗清新，记述则取夹叙夹议，希望办成一念于现代文化贴近人生的刊物。所以不专谈幽默，正是以庆幽默之成功，无论何种作品，皆可有幽默成分夹入其中，如此使幽默更普遍化。所以不专谈救国，也不是我们不愿救国，只是不愿纸上谈兵。若有人相信此时之国尚系纸上空谈之所能救，不妨投稿他处谈谈，我们也很愿意看。此外也别无成见，惟有矫情君子理学余孽，必诛无赦。我们誓以此刊与新旧道学作战。若有新旧八股先生戴方巾阔步高谈而来，必先以冷猪肉招而诱之，而后痛打之。

（《宇宙风》第 1 期，1935 年 9 月 16 日）

无花蔷薇

世上有有刺有花的蔷薇，也有无花有刺的蔷薇。但是有花有刺的蔷薇，人皆乐为种植，偶然被刺，皮破血流，总因爱其花之美丽而怜惜之。惟有无花的蔷薇，满枝是刺，虽然也有雄赳赳革命之势，且刺伤人时旁人可以顾而乐之，但因终究不见开花，看刺到底不能过瘾，结果必连根带干拔而除之。因为无花有刺之花，在生物学上实属谬种，且必元气不足也。在一人作品，如鲁迅先生讽刺的好的文章，虽然“无花”也很可看。但办杂志不同。杂志，也可有花，也可有刺，但单叫人看刺是不行的。虽然肆口谩骂，也可助其一时销路，而且人类何以有此坏根性，喜欢看旁人刺伤，使我不可解，但是普通人刺看完之后，也要看看所开之花怎样？到底世上看花人多，看刺人少，所以有刺无花之刊物终必灭亡。我这样讲，虽然我不是赞成有花无刺之蔷薇。

（《宇宙风》第1期，1935年9月16日）

孤崖一枝花

行山道上，看见崖上一枝红花，艳丽夺目，向路人迎笑。详细一看，原来根生于石罅中，不禁叹异。想宇宙万类，应时生灭，然必尽其性。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故置花热闹场中花亦开，使生万山丛里花亦开，甚至使生于孤崖顶上，无人过问花亦开。香为兰之性，有蝴蝶过香亦传，无蝴蝶过香亦传，皆率其本性，有欲罢不能之势。拂其性禁之开花，则花死。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即使王庭庙庑，类已免开尊口，无话可说，仍会有人跑到山野去向天高啸一声。屈原明明要投汨罗，仍然要哀号太息。老子骑青牛上明明要过函谷关，避绝尘世，却仍要留下五千字孽障，岂真关尹子所能相强哉？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之作。经济文章，无补于世，也会不甘寂寞，去著小说。虽然古时著成小说，一则无名，二则无利，甚至有杀身之祸可以临头，然自有不说不快之势。中国文学可传者类皆此种隐名小说作品，并非一篇千金的墓志铭。这也是属于孤崖一枝花之类。故说话为文美术图画及一切表现亦人之本性。“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实际上

老僧虽不叫春，仍会偷女人也。知此而后知要人不说话，不完全可能。花只有一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

（《宇宙风》第1期，1935年9月16日）

烟 屑（一）

吾不读书时即读书时，读书时即不读书时。着笔时即不着笔时，不着笔时即着笔时。不读书时读书，其书活；不着笔时着笔，其文化。

凡人练习文字，必先求得一本心所好读之书。心好其言，则并其文亦无意中得之。苟所言无味，硬着头皮去读，怒目相向而谓能习得其文采，必无是理。

何者为心所好读之书？书中句句的话打上心头，如有你胸中意见被作书人先说出，便是。此亦是缘分，拾句老话，先天注定也。

意思是主体，文采是面目。吾好某人敬某人，则声音笑貌无意中与之相似。今有心恶其人言谈之无味，而专学其声音笑貌之美者，结果必学不像，并俳优亦做不成。此时下教作文学作文之方法也。傻极，亦无谓极。

明末文学观念大解放，趋于趣味，趋于尖新，甚至趋于通俗俚浅，收民歌，评戏曲，传奇小说大昌，浩浩荡荡而来，此中国文学一大关头也。故十七世纪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放光明。而世人不察，明末清初文学史当从头做起也。

即并文学书画而合观之，十七世纪亦当列之第八世纪之后。

王维生于六九九，吴道子七〇〇，李白七〇一，颜真卿七〇八，杜甫七一二；又韩愈生于七六八，白居易七七二，柳宗元七七三。创作精神，勃然齐放。何以如此，我不说出来，说出来人家骂死我也。

袁子才七十九岁时作书与洪稚存云："枚带眼镜已二十多年，须臾不离。今春在西湖桃庄，偶然去之，大觉清爽，因而试之灯下，亦颇了然。故特写蝇头，上污英盼。似此老童，倘到黔中应童子试，学台大人其肯赏一枝芹菜否？"（《小仓山房尺牍》卷六）此老天赋独厚，从此细处可看得出。盖子才少与胡稚威同荐博学鸿词，稚威初见即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胡稚威哀词》，《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四）想此老定有一番英灵气象驰骋于眉头眼梢间也。

耕读同一原理。文人作文，如农夫耘田，有一草便随手拔除，不待吉日；有一句话，一点真意思，便执笔书下。若摄影家然，看见好景便摄，防其相镜排好，天公不做好，不让你摄时也，尤防所摄人物挂朝珠穿朝服排八字脚时也。

不作文的人，不知读书趣味。时时写作，读书方得到好处。愈常写作，读书益愈大。

看书须先看反面的书。吾向不看理学的书。近来将《小仓山房文集尺牍》一气读完，看他口诛指戟，笑詈理学之娇，痛快万分，而无意中却懂得理学立场。喜理学既不可能，惟有恨理学去读他。若不喜亦不恨，永远读不进去也。故恶意读书，亦读书之一法也。

吾前谓翻印袁中郎，"偷他版税，养我妻孥"，戏言之也。大杰标点《中郎全集》，我亦加入，书畅销。由是有人替大杰管帐，

算他版税可得千余元，实则到此半年我未拿到分文，大杰仅拿到百余元。然《中郎全集》已有五种翻印版本，总数在五万以上。中郎中郎，即使我偷得你版税，亦可谅我矣！

其实我看袁中郎，原是一部四元买来的不全本。一夜床上看尺牍，惊喜欲狂，逢人便说，不但对妻要说，凡房中人甚至佣人，亦几乎有不得不向之说说之势。时未读文集也。然此中有个道理，能说尺牍中语者，其人之英灵气魄已全毕现，其文中亦必无迂腐气门面语，此可断言也。故曰文章观气魄，妙语主空灵。气魄足，必有佳品。屠赤水亦是此中一个。

吾喜袁中郎，左派不许我喜袁中郎，虽然未读袁中郎。因此下誓，左派好卢拿卡斯基，吾亦不许左派喜卢拿卡斯基，虽然吾亦未读卢拿卡斯基。

晨起，盥罢，执笔记一点意思，无意为文，而偶然写成一文，此文必佳。或浴罢看书，迫得起来执笔，或灯下独坐，文思涌上心头来，一开头欲罢不能，此文亦必佳。

作文有五忌。前夜睡不酣，不可为文。上句写完，下句未来，或写一段，气已尽，不可为文。文句不出我意料之外，不可为文。精神不足，吸烟提神而仍不来，不可为文。心急，量窄，意酸，亦不可为文。

为文有五宜。心有所喜悦，执笔直书其意，宜。有一意思，积久欲说而未说，今日看一段新闻，听一句话，添上新意，与前意吻合，宜。偶然得开头一二句话，夺口而出，觉得甚佳，虽未有题目，宜。同一事物，得一新法表之，意虽人人所知，而体格特别便于发挥，宜。（如余前作《怎样写再启》，不过以此新法写人之心理前后矛盾，此体格之新也。内容安插甚容易。

《文心》一书亦不过以新体格说旧话而已，而能看之不厌。）读书时确能发前人所未发，宜。五者有其一，尽管下笔，必无迂腐雷同之弊，而得尖新之趣。

（《宇宙风》第1期，1935年9月16日）

评袁枚《答杨笠湖》

（袁文略）

语堂案：理学腐儒，惺惺作态，非子才适情哲学不足以正之，非子才嘻笑怒骂之刀笔不足以诛之。评子才者，须先识得其所痛恨反对之当时理学。

（《宇宙风》第2期，1935年10月1日）

烟　屑（二）

日记所以可贵，因其夹叙夹议也。就记日记，可以练习记事，亦可练习发议论。然日记须嘻笑怒骂皆来，否则又犯伪字。

人不可无好恶，好恶得其正，斯可矣。文不可无是非，是非得其平，斯可矣。是故八面玲珑，无好恶是非者，鲜不为奸。

小学作文教学谬误甚多，而出题为文列第一。我早晚不离笔墨，行文亦不觉难，然有人出题命我为文，必做不出来。故学为文者，须使题生于文，不可使文生于题。见了题目，再想如何下笔者，谓之文生于题，万世不通。有佳意要说，顺其自然如落花流水写去，再加题目，谓之题生于文。

小学生见题目，问先生"要说什么话"时，先生须猛醒，得一当头棒喝。

虽然，行文时心中自然须有题旨，此题旨并不一定为本文最后决用之题目，乃根本要说之几句话。但话在心头，文在笔端，题旨得之意象思考之内，韵致得之有意无意之间。文之佳者，一篇文中，立意要说语居其二，行文后不说自来者居其八。此所谓行文韵致也。一篇文中尽是立意要说的话，其文必牵强；反之，有意无意间得之之语多，其文必清逸。能文与不能文之区别全在此。若银行报告，商人尺牍，必全篇立意要说语。无

一句闲情逸致语，故不能称之为文。尺牍之妙者，皆全篇不要紧话，无事而写尺牍，方得尺牍妙旨。尺牍之可爱者，莫若瞎扯瞎谈。

限题为文如古人限韵做诗，无谓之极，无味之极。袁子才早已反对。

痛恶一人，欲为文骂之而未见到其人好处时，万勿动笔——因尚不够骂其人之资格也。

今日教育目标与成绩适相反。可见方法错误。

今日真教育不在学校，而在电影院。何以故？因实在深入人心，薰陶青年之德性而影响其言行者，乃银幕人物，而非学堂教师。

今日真正大学，不在各校院，而在各书店所出之丛书。卡莱尔曾说，今日之大学在于丛书。（此语卡莱尔所说，《世界文库》发刊词引为爱默生所说，误。）何以故？因现代能读书之青年所得知识，皆由阅览杂书而来，非由听教师讲义而来。

有人问我，现代文言白话交杂，欲求文字精进，应看什么书？我说文字首在实用，使他能够表情达意。写一字条亦是写作。写一寻人启事，亦是写作。写作不可看得太死。故欲求文字上进，只须报纸新闻，广告，启事，讣闻，辩驳，副刊小品，杂志创作，乱看。只要心细脑灵，能够吸收，包管你进步。只学现代文便是，不管什么文言与白话。

（《宇宙风》第2期，1935年10月1日）

谈螺丝钉

柳夫人：那新装的水龙头还在滴水呢！

柳：你不会把它拧紧。

柳夫人：何尝不曾用死劲拧过，可是无用。起初水是从龙头口出来，等到你拧紧了，它便由你手按着的螺丝杆上头周围这样一古脑儿溜涌出来。等你又拧松一点，上头不流了，却又由水管口一直流出。就从昨晚到今天早晨一直这样的的达达的滴的满地板……

朱：我晓得了，你必定是用的国货。

柳夫人：就是因为爱国，不然还上不了这个当，当时又贪它便宜，想省几个钱，现在我想还是叫水匠换个来路货，不但不省钱，还要多赔几个钱。我想国虽要爱，也要叫人爱国莫当阿木林才是。那些洋鬼子，东西怎么造的这样好，叫我有时佩服他们，有时又恨他们。

柳：恨的好。为什么咱们螺丝钉造不好，他们偏偏造的好。真真岂有此理。辜鸿铭先生早就先尔而言之矣。真真岂有此理。为什么西洋人不讲精神文明，专讲物质文明，工业文明，螺丝钉文明。该恨，该恨！（柳先生笑了。）

朱：且慢，老柳。辜先生坐的是苏扬马桶呢，还是抽水马

桶呢？老辜也未免不思之甚矣。难道满身是虱，坐苏扬马桶，精神便文明起来吗？什么叫做精神，什么叫做物质？莎士比亚说的好，脑袋，脑袋，没有袋那里去脑——他并没有这样说，不过我揣他的意思，想当然耳。《亨利第五》那剧中是有过这种意思的。东方才子莫如庄生，西方才子莫如尼采，二位脑袋未尝不好。然庄生死后，脑浆一硬，还会做《齐物论》吗？还真会跳出棺吗？尼采那种头脑，那种天资，小小的花柳病菌一入，也发疯了。西方物质文明实由西方精神而来，而这精神原来就是跟你席上吃的"鸭腰"一样软细的白质做的。

柳夫人：什么叫"鸭腰"？

柳：你别问了。总而言之，鸭之腰也。

柳夫人（呆了一会）：好！鸭腰者，鸭之腰也。你们咬文嚼字先生，总是不得其死然。……你们不告诉，我也不问了。——老朱的意思我是赞同的。什么英雄才子，谁不是娘胎生下来，一层皮包一层肉做的，三天不吃饭，就要精神不振，七天不吃饭，便要上西天。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得他的诗原来是酒精做的。苏东坡醉笔，还不是酒精在脑里作怪？你看他，他不吸烟文章便做不出来，他的文章都是肚里烟灰做成的。

柳：亏你知己。我文章不是烟灰做来，也是烟魂做来的。莎士比亚说过，烟者，烟是波立敦也。

朱：真会挖苦人。你也来"想当然耳"了。

柳：充其量，也不过如你胡闹而已。

柳夫人：别闹，我来做个和事佬吧。我们还是谈谈螺丝钉，好不好？

朱：谈吧。

柳夫人：我想不爱国了。我真要换个舶来水龙头。为什么中国人一个螺丝钉就做不好？请大家研究一下。到底是精神不好呢，是物质不好呢？

柳：两者都有。螺丝钉物质不好，就是一则原料不好，二则马马虎虎，分寸大小，不精不准。西洋人一毫一厘之差，都要寻根究底，中国人一毫与一厘无别，一分也与一厘无别。这就是精神不好。你那天那件二十块钱衣服，还不是给裁缝马马虎虎做坏了吗？我早就叫你先试样，像做西装一样，试好了样，再比比看看宽窄长短领口大小，肩腋宽紧，铺的平平直直，然后去裁去缝，万无一误。可是中国裁缝，万古相传，就是不肯改良，有时二三十元一件衣服，给那裁缝裁坏了，悔之已晚，和他生气也无用。他肯试样，我肯多花四毛工钱，但是他嫌麻烦，——简直就不理我。原因呢？他三代祖宗做裁缝就没听见过试样两字，那里敢违背家传祖训呢？

柳夫人：这话固然是，也有不尽然。我想是时代不同而已。你意思说西人精益求精，我们向来没有自来水，所以水龙头做不好。若中国印泥，何尝不精益求精？但是有一件。我们生在现代，见古人所未见，闻古人所未闻，若肯平心静气算算西人的好处，倒可以得了不少学问。若单谈什么国粹，趾高气扬，欺人自欺，终必灭亡。我们比西洋人长处固然多，西洋人比我们强处，也真不少。我不是讲什么社会经济哲学那一套，是讲眼前人生，第一样西洋人就是放屁放的好。

柳、朱：……？

柳夫人：放屁就是礼貌，礼貌就是放屁。放屁无声叫做好，有声叫做不好，声愈小愈好，愈大愈不好。外国屁的声小，所

以比我们好。外国人屁不乱放，中国人屁乱放。这是他们“礼”字比我们强。不但“礼”字强，“义”、“廉”、“耻”都强。说起来，他们的儒学，比我们精。据我看来，老子思想，才是东方特色，“知足常乐”也委实不错，若儒家道理，他们讲的比我们实在。

柳：别的不晓得，礼字我承认。

柳夫人：礼义之邦！我们什么礼义？我问你，你到公司买物，是西洋伙计有礼呢？是中国伙计有礼呢？是外国司车有礼呢？是中国司车有礼呢？是外国司阍，外国巡警有礼呢？是中国司阍，中国巡警有礼呢？戏台买票，是中国人乱挤乱撞有礼呢？是西洋人排队顺序而来有礼呢？我们自称知礼，骂人夷狄，真不害臊。中国人所讲的礼，都是对上司磕头，对祖宗跪拜，对亲友联欢之礼。若是一则非上司，二则非亲非戚，据我看来，路人皆当仇敌，同车即是冤家。

朱：你也言过其实了。外国人到处亲吻，路上也吻，车上也吻，月台上也吻，戏台上也吻，夫与妻吻，父与女吻，母与子吻，这成什么礼？

柳：你也未免太酸了。

柳夫人：这正是中国所言之礼，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古来就是这一套。其实就我看来，礼之精义，广而大之，就是讲整个社会的秩序，而社会秩序，由邻屋住家，到公共场所，医院戏台，博物院，图书馆，甚到毛厕便所，都是西洋比我国好。怎么水到现在还没开？（柳夫人跑去看，原来他们只顾谈，烘炉上的火已快灭了。柳夫人用铁箸夹两块炭加上，一面用芭蕉扇扇炉，一面谈下去。）马上就开了。

朱：还是我来吧。今天我要行外国礼了。中国男子实在太舒服了。……你去吧。叫说书先生扇炉子是不大好意思。你讲下去。

柳夫人（跑回原座）：我说的就是一句话，大家凭良心讲。若是说我们文明，应该我们要人跑到国外，可以教教洋鬼子知礼，由我们学点礼貌，怎么反常自己闹出笑话呢？

朱（也就座）：那么还有三件呢？

柳夫人：其次是义。义者宜也。样样事物上轨道，人人得尽其才以应世，尽其才后，人人可得合理的酬报，不必使什么鬼蜮伎俩，这叫做有义的社会。你说是中国人人得尽其才呢，还是西洋呢？是中国国家以才用人呢，是外国国家以才用人呢？工程师当县长，牙科医生主教育，宜在哪里，义在哪里？这倒也罢了，工程师若真有才治事，当当县长，办办教育，原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可过于拘牵，世人真才未必在其专长所学，只怕是当县长并不是治事真才，而是由狗洞钻营出来的。不然中国何以这么一团糟？……“廉”字更不必说了。水开了，我来！（她一面冲茶，一面讲下去。）你要到外国去找一部《官场现形记》材料，虽然也有，恐怕没有中国出色，叫你随拾即是吧？其实也不是外国清官特别多，只是人家有王法，咱们无王法，外国贪官尽管营私舞弊，不过一旦找出来，是要受法律制裁，受社会制裁的。咱们老大中华的百姓看见一个贪官，还要给他磕头，说声“老爷，我给你做门房马弁吧！”若有贪官受弹劾，其中总有蹊跷，不是油水不匀，便是藉端报怨，谁是为公来？《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中之苟才你是认得的。外国贪官腰包虽然装，都替国家做点事，咱们的狗官不要说腰包装满了，临走

时，衙门前的石狮子不给你搬回家去点缀他的别墅，你就侥幸！我不敢望中国的官不贪，所求于中国官吏者，私也营，弊也舞，只要国家事也做出来，如此已不可多得。中国只要多出几个贪污而也替国家做事的老爷，老百姓就要感恩戴德。“耻”字原来比“廉”字要紧，有耻便有廉，不过字义广一点。你想中国人脸皮厚呢？外国人脸皮厚呢？今天世界的国家，那一个不争气？日本五十年前就争气，苏俄二十年前就争气，土耳其也争气，意大利也争气，就是亚比新尼亚也争气。偏偏只有一国不争气，不要脸，不但彼虎我羊，抑且羊皆附虎，而且要假虎威耀武一下……喝杯茶吧。

（《宇宙风》第 2 期，1935 年 10 月 1 日）

不怕笔记

岂明文谈及明末之兵虏，引时人记载谓胡虏原不敢梦想坐镇关中，而北京人民“女愿为妾，子愿称臣，不放胡虏北去”。说者或谓求一时之利禄，留千古之臭名，可不戒哉！实则对于秘史，轶闻，笔记一类文字，本有两种看法。一为怕笔记派，一为不怕笔记派。怕笔记派曰，报上新闻，阅之即弃，不如笔记留传远久。且新闻可以有法对付，笔记出世常在局中人已成一抔黄土之后，死人不能由棺中伸只手来把他涂灭。生前以政治压力防民之口者，死后自有无暇防口，而民口终无法堵防之时。可不惧哉！不怕笔记派曰：我妾亦做过矣，臣亦称过矣，天之于我独厚，享受一世富贵矣。千古为何物，留名之香臭，我在地下棺中能闻之否？不能闻之与我何与？余曰：两说各有是非。新闻可不闻，是非自在人心。凡国家兴亡大事，自有耳熟能详者把他偷偷记录，藏之秘阁。看来似不妨事，然譬如种子埋入土中，将来实在可怕，非重见天日不可。且藏之愈密，见之愈珍，后世自有好事人给他刊行，称为“抄本”、“孤本”，而名贵一时。于是重与世人相见，前人秽史鄙行，彰闻于世，作者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莫之奈何。所以可怕也算可怕。但是也不必十分怕。国家兴亡之会，是非乱淆，评史不易。或谓忠直者必愤世，

奸佞者有苦衷，此不必怕者一。且国亡之时，无耻之事，偏国皆是，笔记者见闻有限，何暇尽录之？即记其人所作之亏心事一端，遗漏未载者必十倍于此。我实不相信奸臣苦衷，而相信历代奸臣行为所传于世者不过十分之一。所以到底还是便宜。此不足怕者二。即以明末而论，吾今日知有愿为虏妾之女，愿称虏臣之男，然而到底吾不知此男此女名姓，三百年前享卧福睨福是他，三百年后坐此思量是我。悠悠者宇，茫茫者宙，此笔记不足怕者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孟子随口说说的。战国愈闹愈不成话，惧在那里？

（《宇宙风》第 2 期 1935 年 10 月 1 日）

不知所云

八月廿一日《自由谈》有署名“梅雨”者所撰《现代文学中之颓废性》一文，字句枝节，可以拗断你的廿八根牙齿，而吃不到一口东西。有句曰：

> 同样在法国小说家普劳斯特也有同样的倾向，他小心地描写一些最无关重要的动作，并且用他特殊的——法国市民与贵族中的最特殊部分的眼光，给与最特殊部分的——站在支配地位上的最最少数的人物以极精细的描写，不过在这一方面，他是触到了难比的深度同阔度的。

又有名句曰：

> 可是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这方法，在十九世纪初年度发现的时候，原有作为一种极巧妙的剖解人生，理解人生的工具，而今日却被他们利用来掩盖同粉饰活生生的、现实的雄姿的工具了。

又曰：

当市民由进步退为保守，而逐渐没落时，当艺术的自由，创作思想的执拗，超然的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同离开社会与政治的文学的独立性等等被热烈地主张着与拥护着时，就有许多作家，在不知不觉之间，缩小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观察的范围，放弃了它的广泛的同全面的研究，而停顿于“自己灵魂的孤独”，再由于欠缺现实生活的认识，自我思想的深化同固执等而隐身于“认识自我”的无结果的企图之中。

此文如是翻译，不声明为翻译便是不诚实，且译笔也太那个。如果不是译的，那末中国人请讲中国话。

（《宇宙风》第3期，1935年10月16日）

烟 屑（三）

中国文学一部分遗产应收入现代文者，已有好的作家将他收入不少，大概常看现代文者，便可看到此部遗产。

此就普通青年言之也。若就有文学天才者言之，必须自已到旧矿中去发掘来给与别人。古书便是旧矿，通行俗话便是新矿。真正文学天才应两矿兼采，加以熔炼，使之入文。

徐志摩之散文得力于白话俗语，尤得力于传奇戏曲。徐一天才也。今日此种文字已不多见了。

民国十二年，吾新回国，住北京青年会。一日下午在阅报室看报，看得一篇（大约是《晨报副刊》）写逃雨的文字，惊叹起来，以为不料中国白话已有此流利成熟洽雅俗中外于一炉之散文。细看该篇署名为“徐志摩”，时犹不知徐志摩何人也。

徐志摩承硖石山川之气而生，一身只是“真”字。喜则跳，惊则叫，一片孩子气。因此常做出不知忌讳之事来。如追随泰戈尔演讲开会便是，因此常叫不知志摩者疑其附庸诗哲，引人自重。实则此种念头，志摩想也不曾想到也。徐只是心好泰戈尔而已。

大学刚毕业生，出口便是谠言高论，要如何澄清吏治，救国救民，此谓之乳臭。青年人板道学脸孔，禁止前辈说两句笑

话，亦是乳臭之一。

青年人毛病在趾高气扬，老年人毛病在圆滑奸诈。青年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老年人把自己看得太不值钱。青年人把国事看得太容易，老年人把国事看得太儿戏。此中国之一大悲剧，亦世界之一大悲剧。

青年永远是理想主义者，老人永远是现实主义者。若中国忠荩之臣，外国名流作者，老而愈辣者，殊不可多觏。

与其不朽，不如不老。既老矣，则朽亦何妨？

孔子好青年英灵之气，恶老人衰颓之象。思其故乡“狂简小子”而恶“乡愿德贼”，是最明显的例。“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是骂老人贪财。

依我观察，今日青年贪财见利忘义者，亦颇不少。

今日青年问题是如何忘其所学。

孔子骂人骂得凶，骂老而不死是为贼，又骂今之从政者斗筲之器何足道也。斗筲是饭桶。

耶稣骂人也骂得凶。耶稣一身专与犹太国道学先生作战。使耶稣生于今日，一般主教牧师被他骂得体无完肤矣。

“左派”令人怕。若单看文章，倒没什么可怕；一与其人接触，便叫你提心吊胆，防你吃亏。

“左派”最好的宣传，不应在文字，而在个人处身立行之小节，叫人与你接触，信你在朋辈是道义之交，在国家是耿介之民，比人不爱钱，比人不欺诈，使人望见你而欣喜，说中国将来有望。尤要叫人相信中国交给你去救，你救得来。

（《宇宙风》第3期，1935年10月16日）

再谈螺丝钉

那晚朱先生在柳家谈后，步月归来，满腔悲愤。第三日晚饭后，又到沧浪亭来了。

朱：水龙头换好了没有？

柳夫人：你又来水龙头了！

朱：我不是又来水龙头，我是又来亲聆你的螺丝钉高论。

柳夫人：螺丝钉还有什么可谈？我不过瞎扯瞎拉罢了。我只会歪缠而已。你还不记得前晚我们谈得大家无趣，不欢而散？也许今晚又要歪缠得你哭出来！

朱：我不怕。你尽管歪缠下去吧！我决不哭！

柳（梦中惊醒）：哭什么？

朱：哭中国礼义廉耻不如人。

柳：老朱也未免太多情了。

柳夫人：我只哄他玩。他叫我再谈螺丝钉。我看他上回谈到一半眼眶儿就红了，今天还要来，害臊不害臊？其实我们乡居夕话，不像人家做八股，本无起承转伏，连我也不知要谈向那里去。谁保得住？我要说到那里就算那里。我想谈得叫人哭也不好，叫人笑也不好。最好是谈得人家心头痒痒难过，哭不得，笑不得，才算上乘。

柳（点头称善）："痒。字用得好。原来世上最快乐之事莫过于搔痒。此道理唯圣人能知之。以前我有过"香港脚"（Hong kong foot），足趾痒得难过，晚上倒一盆热水烫脚丫，此中乐境不足为外人道也。那个适意真可以叫你销魂，叫爹叫娘起来。可惜现在脚病也好了，有时想再享这种艳福而不可得之矣！夫痒之妙，在于搔，愈搔愈痒，留个味儿，叫你又难过，又好受……

柳夫人：老实说，古昔先贤立言，得传于世，皆因搔着痒处而已。圣人者，先得我心之所同痒者也。比如我喜庄生某句，便是庄生替我搔痒，我喜杜诗某首，亦仅是杜甫替我搔痒。至于抄袭章句之辈，未能搔着痒处，只算"隔靴"。

朱：那末请尊夫人给我搔搔痒好不好？

柳夫人：可以是可以，只不要搔着痒处喊出来，才是君子。

朱：你搔吧！我有勇气！

柳：夫人，你也给我搔搔痒吧！

柳夫人：我给老朱搔，不给你搔。你还是瞌睡吧！

柳：我睡偏不瞌！此刻也不困了。你讲吧。

柳夫人：那里讲起？当真还讲螺丝钉吗？

柳：为什么不？

柳夫人：好，就讲螺丝钉与法律。原来这螺丝钉之发明，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们总怪西人工业何以如此之精，而不知西人所以如此者，有利可图也。国家有发明法专利法的保护，器精而发财，不精则不发财，试问精乎，不精乎？当然要精。螺丝钉是英国一家人家发明的，因这个发明，那家平地发了几百万，到现在那家子孙还坐享余荫。中国人发明一个螺丝钉，马上就有人仿冒；你除了骂仿冒的人为"男盗女娼，乌龟

王八蛋”外，还有什么法子？这骂人“男盗女娼”，也不过骂个高兴出气而已，难道人家就不仿冒，犹上海女人骂人“杀千刀”，那被骂的就真正死于千刀之下吗？我们是没有法治之国，只有人治；也可说是“君子国”，可是有君子，必有盗娼，也必有乌龟王八蛋。君子愈多，男盗女娼也愈盛。结果吃亏的是君子，发财的是盗娼。

朱：螺丝钉现在谁也可制造，还是那家把持的吗？

柳：是这样的。现在那发明权已过期而属于公有了，可是他家财也发够了。

柳夫人：可不是吗？我听说美国有人发明妇女所用的曲线压发针(hairpin)，也成了巨富。原来妇女用的压发针都是直的，那位发明家一天看见他太太把针先折弯了，再插头上，他问他太太“何以如此？”他太太说，“这样一弯，就不容易落下来。”“好了，”他说：“我财神到了！”他马上去注册专利，而财也只好让他发。你想国家法律这样保护工业的发明，怎样不蒸蒸日上呢？

朱：你所说的固然是。外国工业发达由于法律的保护，及在法律保护之下，大家竞争谋利。不过有时也竞争的好笑。你看汽车一年出一新式，你也发明，我也发明，大家角逐，只因不如此不足以号召。大家用老牌，谁肯买新车？其实家家都造得好，这里加一个螺丝钉，那里加一个点烟具，都是行所无事。不但汽车如此，抽水马桶，牙膏，牙刷都是如此。难道造牙膏也要什么大发明吗？抽水马桶，你也一式，我也一式，还不是大同小异吗？

柳夫人：这个自然。人家过，而我不及。人家行所无事的

发明，而我们只抱残守缺。原因呢，就是没有法律。中国人没有法治，只请出一个乌龟来，你想乌龟果然有灵吗？中国人太好讲仁义道德，天理良心，连这种法律上的事，也以“天理良心”“我是正人”“你是乌龟”了之。

朱：听说现在上海三马路还有一家店铺，外悬着一块大乌龟招牌。

柳夫人：这实在太可怜了。你可骂人家乌龟，人家就不会骂你乌龟蛋？大家争吵起来，你骂我“男盗”，我骂你“女娼”，这是东方君子国之文明。其实这只是法治与人治之不同。

朱：上回你讲礼义廉耻，似是新式儒家，今天又像法家了。

柳夫人：儒也好，法也好，我只知道，欲行儒道，必先行法。欲国家有礼义廉耻，必将不礼不义不廉不耻者下狱枪毙。单谈仁义道德是无用的。人家不肯廉，无羞耻，你能奈他何？你说我是法家，我也承认，我恨儒家道德仁义之谈。咱们中国人开口“良心”，闭口“廉耻”，而丧廉寡耻之事比外国多。拿毛厕来讲，咱们中国毛厕总是写个“君子自重”四字，然而你相信这四个字便叫人真能自重吗？还不如“如违送捕”四字来的有力。“君子自重”的毛厕便是儒家的毛厕，“如违送捕”的毛厕便是法家的毛厕。你想是法家毛厕整洁呢，是儒家毛厕整洁呢？我想中国这个国家就像儒家毛厕，到处墙壁上看见贴两字“君子”，而一个君子影儿也不见，只有满坑的秽气触鼻。西洋国家就像法家毛厕。你说君子自重，大家不自重，你能奈之何？

朱：原来你是个毛厕法家。

柳夫人：是的，庄子说的好，“道在矢溺，矢溺不能见道，其道非道。”讲到“良心”，更笑话极了。雍正皇帝批上谕，不

说“你违某条法律”，却说“你没良心，该斩!”而结果雍正杀人最多。因为良心这个东西，本来无从捉摸。法有明文，而良心可任意解释。秦桧说他凭“良心”卖国事虏，你哪里去同他争是非？你想大马路汽车行走，是凭红绿灯的“法”好呢，是凭各车夫之“良心”为凭好呢？西洋人汽车出事，开口骂来是："你这个傻瓜，你没看见红灯在前吗?”或是“你怎么在右边走？你违法，叫你赔损失!”中国人开口骂来是：“猪猡！你良心到哪里去了!”你想，没有红绿灯，听两个车夫在大马路抛球场评论彼此的良心，危险不危险？等他们俩把各个的“良心”研究出来，自从日升楼到外滩就要挤的水泄不通了。原来世间道理，各有其时，韩非说的好，不可以缓世之政治急世之民。以前两个小车夫在田陌间相遇，大家问问早安，互相礼让，或左或右，各凭良心，都无不可，若在大马路汽车行走凭这个老法，结果必一团糟。以此治市则市乱，以此治国则国乱。以孔孟之道行于尧舜之世击壤而歌之民，是可以的；在现在汽车飞机盛行的“急世”而不助之以法，是要失败的。

朱：你说中国丧廉寡耻之事比外国多，是不是中国人道德比外国人坏呢？礼义廉耻就可以不讲吗？

柳夫人：正正不是。世人生来本无两样。中国官僚爱钱，难道外国官僚就不爱钱吗？礼义廉耻，不是不可以讲，但是单讲是没用的。纽约市政府的黑幕才叫你触目惊心。哈丁总统任下的政府，丑史秽闻，罄竹难书。然而此中有个分别：咱们是君子国，专讲礼义廉耻，人家是小人国，不讲礼义廉耻，单讲法律。人家是有王法的。哈丁任内贿赂横行，然而美国人民并不向华盛顿衮衮诸公说仁说义，只用法律裁判。结果把一个七十

老翁的部长审出罪状下狱。此位老翁不幸，你说；但是这至少证明美国国家还有个王法。中国的部长，你试捕一个下狱给我看看。就是人家不讲廉耻，所以还有廉耻，我们专讲廉耻，所以廉耻扫地。

柳：你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专讲礼义廉耻呢？

朱：因为儒教？

柳：并不是。因为礼义廉耻谈来很便宜。比方说，有官僚对你讲“礼义廉耻很好”，老百姓自然也说：“礼义廉耻很好。”谈起来与人无损，于己有益，又可博关心风化之美名，又不伤人感情，又不费钱。但是比方那官僚不讲廉耻而讲法治，老百姓说：“好！我们就依法起诉，在法庭上与你算算帐，请你坐狱。”那还了得！此礼义廉耻之谈之所以风行一时也。所以道德仁义之谈不止，民之蠡贼不死。

柳夫人：我也是这样想。孔夫子叫君子治国，所以我们也把官僚真正当君子看待，绝不加以法律的制裁。西人不讲君子治国，所以把官僚当凶犯看待，时时绳之以法律，惆之以监狱，防之以舆论，动不动就要弹劾，把他送入牢狱去。西人是相信韩非的话，不期使人为善，只期使人不敢为恶。我想这就够了。我们遇了清官廉吏，给他竖立牌坊，表扬德政；遇了贪官污吏，却不把他送入监牢。西人遇了贪官污吏，给他送入监牢，而遇了清官廉吏，却不给他竖立牌坊。这是法家与儒家之不同，也是人治与法治之不同。西洋天下就是法家的天下。其实世上善人少，恶人多，东西原无二理。我们把官僚当君子看待，一概听其“良心”，爱民也“良心”，征税也“良心”，占你的田奸你的姊也“良心”，结果只有一成廉洁自守，却有九成的民贼；西

方把官僚当民贼看待，不讲“良心”，只讲法律，结果有一成是民贼，却有九成像煞君子。这是东方西方政治之不同。你说“像煞”不够，我说“像煞”就够了。中国政府能办到像外国“像煞”廉洁一样，已经是太平之世了。日本政府何尝没出过贿赂大案，但是中国政府能办到如日本“像煞”廉洁地步，也就委实不错了。

柳：你也路跑得太远了。大家叫你谈螺丝钉你说什么东西政治。你到底搔着痒处没有？难过是有的，好受则未也。

柳夫人：别忙。我来搔。老朱不是笑我为毛厕法家吗？其实吾道一以贯之。无论是螺丝钉，是毛厕，是政府，是人民，都是一样。有法治便好，无法治便坏。我们也不必太过悲愤，妄自菲薄，陷于绝望。我是这样梦想一个太平的中国的。在这样的法治的国家，螺丝钉也好了，毛厕也好了，人也容易做了。人家说我们中国人道德不好，我却说我们中国法律不好；法律好了，道德也就好。人家说我们苟且偷安，消沉畏葸，我说这都不是我们生成这样个坏根性，是因为没有法律保护，不得不苟且偷安消沉畏葸。我们此刻做人太难了。人命本来就如狗命。在中国社会做事，不久就学出卑污苟贱，才能生存，若有英雄侠骨，必被社会磨折而死。剩下来只有给人舔屁股的顺民。就是想，在有法治的国家，做人也可以容易一点，品格可以高贵一点。我是梦想这样一个新国家的自由国民，大家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大开其口，大挥其笔，大展其才，大做其事，只要不犯法，谁也不能动我一根头发。那一个狗官干我自由，侵我的田，奸我的妹，我马上可告他，不必托人讲面求情，而有胜诉之希望。这样一来，民气自然由消沉而积极，由懦弱而倔强，由

畏葸而勇毅，由散漫而团结，由苟贱而高贵，由衰老而少年。那里像此刻这样求生不得，求死未能，专舔人家的屁股呢？你要不要这样一个新国家的积极的，倔强的，勇毅的，团结的，高贵的少年民族？

朱：我有点难过，也有点好受了。柳夫人，我痒搔着了。

（《宇宙风》第4期，1935年11月1日）

提倡方言文学

为啥要提倡方言文学，开头就得讲明白。为只方言自身本来与啥个国语口既不分别，像煞楚霸王同汉高祖，成则为帝，败则为贼。但是因为汉高祖一旦为帝便要尊孔，不敢勒浪儒家帽子头上撤泡尿，失脱不少沛郡无赖本色，实在可惜。

文言文总是越弄越斯文，越空洞，还是方言俗语来得灵活。所以有时上海本地人写一篇上海土语短篇小说把我侬读读倒满有意思。所谓方言文学并弗是想取国语而代之，也弗是叫大家勿要写国语，不过，上海土语，或是别种方言，完全既没人用来写作，也是不应该，写得好个人写写也既没关系。好像有人提倡诗，并弗是叫人家勿要写散文，请弗必误会。还有一样，外邦人学上海话总是学不好，也是因为既没方言读物。苏州闲话写妓女口语（《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固然出色，难道弗是妓女便弗好讲苏州话，苏州人勿要讲道德文章吗？这个真真弗必。我个人就是勒里寻上海土语的著作，学学真正上海话，弗像这篇假货色，恐怕这篇一句真真上海口语也既没。所以更加要请教请教上海作家。

（《宇宙风》第4期，1935年11月1日）

读书与看书

曾国藩说，读书看书不同，"看者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读书道理，本来如此。曾国藩又说：读书强记无益，一时记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读，自然易记。此是经验之谈。今日中小学教育全然违背此读书心理学原理，一不分读书、看书，二叫人强记。故弄得学生手忙脚乱，浪费精神。小学国语固然应该读，文字读音意义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至于地理常识等等，常令人记所不当记，记所不必记，真真罪恶。譬如说，镇江名胜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识。应该说说，记得固好，不记得亦无妨，以后听人家谈起，或亲游其地，自然也记得。试问今日多少学界中人，不知镇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为受教育者，何苦独苛求于三尺童子。学生既未见到金山、北固山，勉强硬记，亦不知所言为何物，只知念三个名词而已。扬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东有万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桥、小金山、二十四桥旧址，此又是常识，也应该说说，却不必强记。实则学生不知五亭桥、万松林为何物，连教员之中十九亦不知所言为何物。今考常识，学生曰，万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则得零分，在平山堂之东，则得一百分，岂不笑话？卫生一科，知道人身有

小肠大肠固然甚好，然大肠明明是一条，又必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又是无端添了令人强记名词，笑话不笑话？弊源有二：一，教科书编者，专门抄书，表示专家架子。二，教员不知分出重轻，全课名词，必要学生硬记。学生吓于分数之威严，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的硬记，由是有趣的常识，变为无味的苦记。殊不知过些时候，到底记得多少，请教员摸摸良心自问可也，何故作践青年精神光阴？

（《宇宙风》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三谈螺丝钉

朱：水龙头换好了没有？

柳夫人：你到底是来喝茶，还是来问候水龙头？你不会自己去瞧？

朱：我看你那样得意，不瞧也罢，水龙头定占勿药了。

柳夫人：可不是呢，水龙头无恙了！

朱：那你必定又在恨洋鬼子了。

柳夫人：说着玩吧。若当真要恨，那还恨得完吗？

朱：我记得：你说他们螺丝钉也比我们好，一恨也；礼貌规矩也比我们好，二恨也；守义也比我们好……

柳（在梦中喃喃）：三恨也。君子有三恨，也就够了。

柳夫人：那不行，底下还有廉、耻、合螺丝钉、礼、义，不是有五恨了吗？

柳：你自己忘记，还有洋鬼子法律比我们好，不是六恨吗？

柳夫人：六恨就由他六恨。什么君子有三乐，君子有三畏，这都是随口说说。袁子才看见"下论"专做这种八股，什么三乐，三畏，三戒，三愆，三友，三变，所以疑心下论不甚靠得住，他说上论是好的，脱口而出，语得天然。上论是小品文，下

论是八股文，先算好一，二，三，再下笔的。其实三乐三畏，都是文人腔调。难道君子真正只有三乐三畏吗？孟子所谓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固然可乐，浴乎沂，风乎舞雩，岂不就是四乐？闻人歌，使人和之，岂不是五乐？有过人必告之，岂不是六乐？吃栗子，啖花生，岂不是七乐……

柳：珠娘，你发痴了……

柳夫人：有过，被丈夫骂，岂不是八乐？同老朱谈螺丝钉，岂不是九乐？

朱：君子也有九畏吗？

柳夫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老婆，畏普罗，畏庸医，畏穷酸秀才，畏衙门司阍，畏武人爱国通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畏全有了。

朱：那末。你也有九恨了？

柳夫人：九九八十一都可以。原来君子有九思，就是三三如九，再求平方，就是九九八十一。你要做下论八股文章，说三恨，九恨，八十一恨都可以。真正要算西洋人可恨而又可佩服之处，恐怕不止百恨，就可以做一篇百恨歌。

柳：像你那样说法，西洋人放屁也比我们强，毛厕也比我们强，恐怕千恨歌也不难做。

柳夫人：圣人教人见微知著，就是叫人不要心好大，由小及大，由迩及远。大家开口仁义，闭口礼智，你说中国强，也一说，他说外国强，也一说。若教取眼前，抓住毛厕一端，则其优劣立见，不容你强辩了。文明两字那种题目，范围广大，捉摸不定，还是脚踏实地，一样一样算去，高下就立见了。

柳：不过不要失之于繁琐就是了。

柳夫人：百恨是什么，让我随口道来……

柳：你一张利口真可覆邦家。我读了五十年书，今日才明白，妇人四德，只要三德便够——“妇言”实在不必教，自己就会的。

柳夫人：夫子错矣！四德所谓“妇言”，是教妇人不说话，不是教妇人说话。所以妇德妇容妇工我都学得来，就是妇言我万世学不来。

柳：你看见过古今中外有一个妇人不说话的吗？

柳夫人：真真岂有此理。为什么没有“夫言”，只有“妇言”？“百恨”你不让我算，我便不算，让你们天下男子去算。

柳：不是不教你算，是教你不要重复琐碎。我说一个笑话给你听。有一个美国人到英国赴茶会，女仆上来问他：“茶呢？咖啡呢？芝哥力呢？”他答：“茶。”女仆又问：“锡仑（茶）呢？詹美克（茶）呢？中国（茶）呢？”他答：“锡仑。”女仆又问：“柠檬呢？牛奶呢？奶浆呢？”他答：“柠檬。”女仆又问：“热呢？凉呢？冰呢？”美国人闻言登时晕过去。这样你算算，吃杯茶也有九九八十一花样。

柳夫人：这有何难？人家说扬州茶馆有廿四种点心。让我开一茶馆，我就有七十二种春卷。

一、鸡肉，香菰笋。

二、鸡肉，虾仁，笋。

三、鸡肉，虾仁，香菰。

四、蟹肉，虾仁，香菰……

柳：五、蟹肉，鸡肉，虾仁。

六、蟹肉，鸡肉，笋。

七、蟹肉，鸡肉，笋，香蕉。

朱：嚼舌头，鸡肉，笋。

柳夫人：猪肉，猪蹄，朱鼻，笋。

朱：牛母肉，牛母舌头，笋。

柳夫人：牛肉不比猪肉好吃。

朱：不见得，柳舌头很有名的。西洋大餐有柳舌汤。

柳夫人：不来了。

朱：牛舌其味甚甘。请你讲下去吧。

柳夫人：他叫我不重复，也可以。广而大之，百根千根都算得出来，约而言之，也很容易。五十年前中国人就知道西洋战舰枪炮比中国好，三十年前我们才知道西洋政制比中国好，二十年前才知道西洋文学哲学学术比中国好，现在大家才慢慢承认西洋人礼义廉耻社会秩序也比中国好。这里头拆开来讲，百根千根就都有了。大家说中国伟大，中国民族如果真正伟大，就不要讳疾忌医，真心诚意，见贤思齐，不耻下问，有容人之雅量，学学西洋人的好处。随便谈谈一二样。譬如中国音乐有乐调（melody）而无音和（harmony），这谁也不能否认。你说是株守成法好呢？是借他山之石，自己发展，创造出来中国音乐的音和，配旧有之乐调，又利用西洋的乐器，如大弦琴 Cello 之类，增加其音阶范围好呢？只要有创造的精神，何事不可辟出蹊径，发扬光大固有之文明？兹再举几个例：

（2）西洋校勘学比中国校勘学精。

（3）外国书校对比中国精。

（4）外国报纸以新闻为本位，以广告为附庸，中国报纸以

广告为本位，以新闻为附庸。

(5) 西洋传记学，比中国传记好。单举三派：Boswell，Morley，Strachey，都是中国所无的。

(6) 外国百科全书体例，中国尚未梦想到。

(7) 外国母鸡有一年生三百粒蛋的鸡种。

(8) 外国人有容人之雅量，见贤思齐，中国人刻薄，见贤思妒（与工业文明无与）。

(9) 外国文化比较懂得小孩心理。

(10) 外国人守时间。

(11) 外国人比中国人清洁（手艺文明人也未尝不可重清洁）。

(12) 外国贪官替社会做事，中国贪官不。

(13) 外国人能解放黑奴，中国人有买卖仆婢制度。

(14) 外国第五流政客才干学问精力抵得过中国第一流政客。

(15) 外国人爽直，中国人重虚套。因此——

(16) 外国办事快，中国办事慢。

(17) 外国现代文明近人情，中国文明虚娇道学。

(18) 外国老人有英迈之气，中国少年有衰老之相。

(19) 外国医院管理比中国好。

(20) 外国有博物院，中国向来无之。

(21) 外国有公共图书馆，中国向来无之。

(22) 外国书出得比中国多，范围广，内容富。

(23) 外国舟车上秩序比中国好。

(24) 外国丧礼简朴严肃，中国丧礼繁杂滑稽。

(25) 外国兵拿得到薪水，中国兵拿不到。

(26) 中国人当巡捕，被外国人训练出来便神气。

(27) 外国人打仗比中国人勇敢。

(28) 几十个外国人在殖民地，就能成立一个工部局，几十个中国学生或华侨同在一城，未有不分为两个对立的"学生会"等。

(29) 中国刊物流行匿名骂人，外国编辑不登此种稿件。

(30) 外国乞丐告地状，所写的是格言，劝人上进，乐观，有供有取；中国乞丐以烂疮触人目。

(31) 上海改良洋车夫生活，外人最热心，讨论最活泼，中国人组织团体，阻挠此事，社会漠视之。

(32) 外国人办赈灾有良心，中国灾官视为发财捷径。

(33) 日本轮船驶往伦敦亨堡等埠，中国出一个招商局。

(34) 太古轮船起货卸货比中国轮船快，船期比中国准。(此系精神上问题，又与机器无与。)

(35) 外国领事保护外侨利益，中国华侨少受领事帮忙。

(36) 轮船失事，戏院失火，外国比中国秩序好。

(37) 外国救火队管理比中国救火队行。

(38) 外国店伙计比中国伙计有礼。

(39) 外国电报比中国电报快。

(40) 外国学堂不欠薪，中国学堂欠薪；外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尊师敬长；外国教授比中国教授用功；外国学堂不发现手枪；外国校长普通是个德学兼优的长者。

(41) 外国司阍没有中国司阍势利。

(42) 外国电灯，自来水，汽车好。

（43）洋人监督之海关盐务解与中国政府税入多。

（44）洋人管理的海关邮政对职员待遇好，比较讲成绩，比较不讲私情，办事人较安心。

（45）中国皮匠皮鞋做不过外国人。

（46）外国胭脂比中国胭脂好。

（47）外国学术界多创作精神，家法之谨严，思想之丰富，皆远超过中国。

（48）外国武人只是军官，中国武人是山皇帝。

（49）外国治安比中国好。

（50）外国司法比中国好。

这已有半百了。那里讲得完呢？总而言之，外国强，中国弱，你能说只是器械之精，螺丝钉之巧，你能说只是物质文明工业文明吗？居今之世，闻古人所未闻，见古人所未见，好学者，自然深思，不好学者，也不免深思以求其故。若还以为中国道德文明胜于西洋，不闭门思过，发愤图强，那末，中国真真不可救药了。

（《宇宙风》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救救孩子

陈衡哲在《大公报》及《独立评论》作《救救孩子》一文，历述今日中学课程之严，影响学生身体，至有想方设法保命者，读之令人发指。陈衡哲的结论是“我们自命为教育界的人，看了现行教育制度与课程对于青年们的摧残到了这样程度，还能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吗？……所以我说，无论为民族的将来，为人道的慈悲……我们自命为教育界的人，尤其是握有实权的教育当局，都不容躲避这目前一个迫急的责任；救救中学生，救救这一大群将要成为残疾，变为废物的中学生！”此种现状不改良，中学青年自好者必皆变成书呆，只留下不怕留级的学生遗传种子。教育界如此大家相压迫，我想真可不必了。校长受会考压迫，怕学生多数不及格学堂出丑，乃压迫教员，教员受校长压迫而压迫学生。学生是最容易欺负的，文凭与分数就是两条鞭，那有不屈服之理？在这层层压迫之中，你向谁去理论？会考官，校长，教员，各人须自卫，各人一个饭碗须保，谁管得到小孩子？若果然绞小孩子之脑汁可以维持各位的饭碗，而无关民族国家，倒也让他绞绞无妨。大半的孩子吃得消的，有的本来聪明，再加一倍功课也念得来；有的先天很好，糟塌五六

年身体仍旧无妨；有的入学精神稍为衰弱，面色稍为瘦黄，但亦未必即犯神经症；自杀者也不过千人中有其一，打针者也不过千人中有其二。然而为整个民族着想，这是危险的，中国读书人向来多愁善病，今日仍旧要制造出来多愁善病的读书人。原因呢？一课程标准是专家学究订的，数学专家说数学重要，要抢几个钟点，地理专家说地理很重要，要夺几个钟点……争辩之后，大家也就相安无事，而案定。至于学生本身是没人想到的。二，教科书是学究编的。非搬弄其专门名词不足以炫其学。三，教员一半也是不知学问为何物之书呆，以为加历史，心理，几何，三角的单位于某生，便可造出一个读书明理的人来。学生的身体呢？自然吃得消。工厂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厂主总认为“懒惰”，十小时也吃得消。我也认为十小时工人也未必个个肺结核，“业精于勤”啊！“苦学啊！”“刺股啊”！“囊萤”啊！至于囊萤追月读书成名之人书中之乐，谁人理会？西洋学校十岁以下儿童，放学就让他玩，无自修功课。现在上海小学学生，自晨起来关在课室静坐，四时回来，玩一小时，还得读书读到点灯时候，晚饭时未必读完。愈重分数的好学生，愈吃亏。我想儿童最要之国民天职在于长大而已。不知天下究有何许学问非十岁以下念来不可？请小学教师有以语我来。除了加减乘除以外，天下究有何许数学不可在三年中学会？请数学教员有以语我来。天下究有几种文法名词，几条文法规则，学者不可不知？请英文教师有以语我来。今日学堂有几间提倡自由看书，请教育名流有以语我来。有相当学力而无中学文凭者，何以不许投考大学？请教育当局有以语我来。做成圈套，维持饭碗，而

戕贼青年者，其无后乎？

我提议教部应当委派一个学生体格调查委员会，巡视各校，作一报告，以为改良课程之参考。

（《宇宙风》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四谈螺丝钉

朱先生刚跨入柳家，就听见他们夫妇俩争辩之声，以为出了什么事了，连忙拔起脚往里跑，要做个和事老。

“你别哄我。专门说这种欺人的话！”他听见柳夫人气愤愤的说。

“谁来哄你？你自己听错了……”柳先生答道。

“罢了，罢了，什么事啦？也可以好好的讲。”朱先生走上来向他们两人讲。

柳夫人：喏，他说杏仁之仁字，作心字解，典出《金楼子》，《金楼子》我是没看过的。这不是明白怄人吗？后来我跟他辩，他才说，他刚才说的，不是“天下杏仁”，是说“天下兴仁”。

柳：老朱，请你公平一下。我的话对不对？你想杏仁何以叫做仁呢？我说仁字有“心”义，并引“仁，人心也”为证。她说也不见得，“虾仁”不见得是虾心。我说虾仁是去虾之外壳，明指与虾之外表相对。她说：“那末，‘井有仁焉’也必定是说井里有虾仁了。”请你评评，是她怄我呢？是我怄她呢？

朱：我以为什么事。这种小事，也值得吵，邻家都听得见。

柳：原来我批评她的人治法治论，她就有点不服。我说人

治法治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她说有。我说她是法家，她也一口咬定她是法家，我便拿出道家的话来压她。

柳夫人：他在做爱国者呢，看见我把中国礼义廉耻批评得不值一文，遂托出一个“仁”字来强辩。你听他讲，听他替东方文明作辩士。我早就说东方思想之特征不在儒，而在道，所以他要和我辩，就不得不讲“仁”了。

朱：怎么一回事？连我都听糊涂了。老子说“绝仁弃义”，“大道废，有仁义”，是很看不起仁。“仁”字是儒家的拿手好戏，怎么变成道家的遗产了？

柳夫人：是这样的。孔二先生老是说仁，但总说不出一个仁的影儿来，让人捉摸不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颜渊问仁，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到颜渊请问其目，孔子答的却不是仁之本身，而是礼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叫人怎么办呢？仲弓问仁，孔子说的又是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推敲其用“仁”字，是与知相反，是主静的，主安的，故有“仁者静”，“仁者安仁”，“天下归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仁可以归，可以违，可以安，是静不是动，而这静不就是道家本色吗？

柳：珠娘这些话说的不错。请夫人不必生气，我们好好的讲。原来孔子就是道家。

朱：什么？

柳：我说孔子就是道家，至少得了道家一脉。不是道家，他就不讲人治了。所以我要替人治辩一下，不得不托出一个仁字来。我老实不是替东方文化辩，想做一爱国者。要真正批评东

西文化，非先看准仁字一字不可。仁者何？叫人做人而已，那一个文化叫人做人，做得像样，做得安乐，便是好的文化。什么科学、哲学、宗教、发明、改良、进步，都是余事。人生之目的是快活，不是进化。你要批评东西文化，就得先把这个标准拿定。老老实实我们礼义廉耻都不如外国人，只有在叫人做人道理，有点意思。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懂得做人道理，中国人礼义廉耻输与人，根本就做人做不大像样。但是此有所短，彼有所长，儒有所短，道有所长。儒家专谈的是居丧年月，棺椁尺寸，早已笑痛墨翟和庄周的肚皮。若说这是儒家的精义呢，那么儒家该死。但是幸而儒家尚有个仁字，不过讲得含糊罢了。可是这仁字终究成为儒家最高的理想，犹如《礼运·大同》终究成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不过仁也说了，大同也说了，但总是悬空的，实际上儒家所行的是小康，不是大同，是礼不是仁。所以我于儒家之儒，认为小人儒，于儒家之道，才认为君子儒。实际上讲礼的多，讲仁的少，所以我也看不大起儒家了。儒家之唯一好处，就是儒教中之一脉道教思想。孔子之伟大就是因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

朱：你刚才说孔子是道家，这怎么说法？

柳：孔子一个人跟我们一样，有时想入世，有时想出世，有时想干一下，有时想乘槎浮于海。你想孔老先生坐一张木筏在东海飘流，乘风破浪，随其所之，不是彻底一个道家吗？孔子乘槎过大海，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其中有什么分别？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不是道家吗？六十而耳顺，这不是养生要诀吗？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不是可做天台山道士骑鹤羽化而登仙吗？假使孔子生于今日，目观这个乱世，丧土辱

国，假使他不是个修养十足炉火纯青的道士请问他的耳朵顺不顺，能一点不生气吗？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率性”两字怎解？不是道家思想是什么？这“命”字怎解，“性”字怎解，“道”字怎解？

朱：依你这样讲，孔子曾子子思都是儒家兼道家之流了，诸葛孔明也是道家兼儒家了。

柳：正是。我想中国人生下来就是一个道家。有时候展出治国经纶，暂做儒家，可是骨子里还是道家，一旦无法对应，屎就甜了，下野归田，优游林下。所以中国人在朝时都是儒家，在野时都是道家；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都是道家；幸福人都是儒家，穷苦人都是道家。道家再进一步，病入膏肓，就变成佛家，穷苦而至于无告，忍无可忍，不是投河，就是出家。所以富者为儒，穷者为道，穷得不得了者为释。管事时为儒，不管事时为道，事真管不了就去做和尚。中国人之神经专靠这道家道理节制调摄，揖让之余，也得来一下优游林下，不然一天揖让到晚，一定发狂。所以中国好的诗文，都是道家思想，都是叙田园林泉之乐，假如一天到晚念那些狗屁不通的经济文章，歌功颂德，中国整个民族要进疯人院了。这是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之遗赐。

柳夫人：但这与中西文化何关？我还是说中国人命如狗命，人还是在西洋国度做得像样，做得高贵。

柳：我刚才是跟你怄气。你说西洋国度，人做得像样，我也承认；人家一脚把西人踏在地上，西人不滚在地上叫敌人爸爸，我也承认。

柳夫人：那不是明明因为人权有法律的保护吗？

柳：这话我也承认。不过有利便有弊。外人刚强，华人柔弱；外人进取，华人安分；外人动，华人静；外人阳，华人阴；外人是火做的，华人是水做的。我问你一句话：假定你未出阁，你要嫁给洋人呢？要嫁给华人呢？

柳夫人：当然嫁给华人。

柳：这就是我的意思。有东方丈夫，有西方丈夫，这东方丈夫就是东方文明之结晶，西方丈夫就是西方文明之结晶。假定我未婚，也是想娶中国女子，不娶西洋女子。这为什么呢？也不尽在于饮食居室之不同。抽象言之，中国丈夫属于西洋丈夫吗？中国太太属于外国太太吗？这是中西文化最后的标准，看他教出的人是怎样。我总觉得中国人温柔忠厚明理一点。中国国势弱于日本，也是事实，但是个人并不坏于日本人。这个个人就是文化最后的目的。

柳夫人：我想文化最后的标准，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的痛快不痛快。活的痛快便是文化好，活的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

柳：像中国的陶渊明那样恬淡自甘的生活，中国文化能养出一个陶渊明，你能说中国文化不好吗？能养出一个夜游赤壁的苏东坡，你能说中国文化不好吗？

朱：你可别让普罗听见，要说你落伍了。

柳夫人：那些拾人牙慧未学做人的人你别管他了。他们会的是挂狗领，打领结，唱哈尔滨时调，做欧化散文。陶渊明“鸡鸣桑树巅”、“采菊东篱下”的生活，据说并非大众的农民的生活，而《赤壁赋》“江上之清风与山中之明月”是资本阶级才有的。普罗不要人家赏菊，只要人家吃芝古力糖。菊花中国所有，所以一赏就是落伍，芝古力糖出自西洋，共女学生食之就

是革命。我看他们的灵魂不是臭铜坯做的就是芝古力糖做的。黄金黄金，一切是黄金。不是黄金就不值钱。

柳：普罗作家是什么，就是穷酸秀才之变相。听他罢了。现代中国人，酸的厉害，本来就是神经变态。听见两句笑话，就想亡国。真是劳伦斯所谓"半卵"之流亚，自到于沟渎，可也。所以我要讲仁。意思是讲讲做人的道理，希望做人也要健全一点。

朱：仁字怎么讲？

柳：仁字向来最难解，也最浅显。据我看来，仁就是做人而已，所以浅显；可是"人"是什么东西，没人知道，所以不能解。你看孔子说"天下归仁"、"三月不违仁"，孟子说"居仁由义"，这讲得何等玄妙？怎么叫做"居"？怎么叫做"归"？怎么叫做"不违"？"不违"时是怎样？"违"时是怎样？这显然是讲一种得人情之正的境界。居于此种境界，叫做"居仁"。后来孟子把他分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恻隐只是仁爱，合四者才是仁之广义。不然"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那里讲得通呢？老子所看不起的，也是王莽一流人之假仁假义，不是做人的道理。希腊文化之理想是"达才"，故称人生之理想为得达其才 (The exercise of one' s Powers in their lines of excellence)，中国文化之理论是达情。这达情的境界是难做到的。为什么难做到呢？……

柳夫人：我知道了。

柳：你知道什么？

柳夫人：一贯。

柳：好！人总是矛盾，破碎。谁能抱一，守一，就能一贯。

现代人就像一面破镜，原来一物，照到镜里影就乱，或是像一架破琴，发出的是沙沙的哑声。欲音声韵和，必先自身调和。由破碎达到完整，由矛盾达到调和，这就是仁的境界。道家归真返朴，也是一条路，儒家应世，救得人情之正，也是一条路，相差无几了。

柳夫人：好，你把儒道合一了。不过我心中还有一点缺憾。

柳：什么？

柳夫人：你把法家丢开了。

柳：毛厕法家，你也太强项了！

柳夫人：你要合儒道，我要合儒道法。儒道二家只能滋阴，法家才能补阳。以西人之法补东方之儒道，这样的世界做人可真就有意思了。

柳：和尚那里去了？

柳夫人：和尚是人类的赘瘤。在家人不生和尚，和尚早就灭种。若是生育得太多，让几个去做做和尚也无妨。就好比一人有十个指头，有一指残废，或麻木不仁，也不碍事，你说是不是？

柳先生爱她极了，俯首吻她而不答。……

等他们吻完了，柳夫人忽然抬头看朱先生，怕难为情。

柳夫人：老朱怎么不见了？

朱先生已悄悄地走到大门口了。

第二天得老朱来一短札如下：

"珠娘老柳：昨夜岁月走访，贤伉俪一会儿吵，一会儿好，发乎辩而止乎吻，岂所谓得人情之正者欤？徘徊月下思之，皆

因多长一张口耳。然两道两儒一法互吻，其势不能平，所以不辞而退者以此。弟将骑青牛去也。螺丝钉白。”

（《宇宙风》第6期，1935年12月1日）

写中西文之别

前办《论语》，不知是凭何一股傻气，不有此股傻气，至今尚不见得有其他文人敢冒此大不韪，提倡幽默。当日只想办一如西洋之幽默刊物而已，并未叫全国读幽默文，尤不望转移什么文风。即以今日而论，想请一位成名作家再办一幽默杂志，也未必有一下流如我者肯为之。结果是《论语》在风行一时之中，除了得当局之逾格宽贷以外，又常遭理学文人之品长道短。你袖太长啊，你领太短啊，你妖艳惑人啊，你不炊饭啊！我也无暇和这些女儿争一日之短长。摩登女性请原谅：不知是不是我“妒”字写惯女字旁，但我委实看见文人相轻，就像听女人评别的女人的鼻高唇厚，袖长领短——总而言之，毛病很多，甚不足取。然而不管虽然不管，却时时感觉中国义务检查员之多，及中西行文之不同。明明同一篇文章，用英文写就畅快，可以发挥淋漓，用中文写就拘束，战战兢兢。写了之后，英文读者都觉得入情入理，尚无大过；而在中国自以为并非“小市民”，但也不见得是真“普罗”的批评家，便觉得消闲落伍，风月无边，虽然老老实实，我一则不曾谈风月，二则不曾谈女臀。事实上义务检查员既多，我被发觉的毛病自也不少，个人笔调也错，小品文也错，幽默也错，谈古书也错，甚至谈人生也错，虽然个

人笔调，小品文，幽默，古书，大家都在跟我错里错。《论语》讽刺社会之黑暗，则曰，将军阀罪恶化为一笑了之；不讽刺，则又是消闲之幽默。并非不是小市民之假普罗说，你不应喜袁中郎。上海滩浪新文人说，你不应写小品文。我除了战战兢兢拜受明教以外，惟有点首称善。然而写中西文之不同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了。我文既无两样，影响确又不同，是诚咄咄怪事。求其现前，亦有说也。今日之世乱世也，其音哀以怨，人人在生气；武人既不敢骂，只好骂文人，练习练习革命姿势；炸弹既不敢掷，只好射暗箭，舒畅舒畅革命胸怀。于是不愿与狐群狗党一道同风者，遂受革命好手所光顾。这只能怪乱世，不能怪乱世之人。求其背景，亦有说也。西洋人家是不救国的，偶尔救国，也是实干，不重空谈；我们同胞救国特别热心，做文章若不"今夫天下"，便是无良心。原来因为西洋礼教社会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开始动摇，又被浮尔德讽刺一阵，被卢梭叱喝一声，早已风驰电掣，雾化烟消了。继来的是浪漫主义之爱伦尼（Romantic irony）及人道主义，加以科学机器之发明，心理学之深入，由是一个酸腐的，固封的，武断的文化变为宽容的，流动的，理解的文化。这个文化对于人情是比较理解的，对于女子，对于小孩，对于性的问题，对于结婚离婚，都是取同情理解而不取教训定罪的态度（此两种态度，也可以"赖婚"影片中之父子做代表）。回溯浪漫潮流行于欧洲百五十年矣，所以今日欧洲女子野游也无罪了，偶尔失贞也无罪了，穿露脐浴装也无罪了，草裙舞也无罪了，说笑话也无罪了，堂堂一个伦敦《泰晤士报》每日第四篇社论出以幽默笔调谈论人生琐碎也无罪了，英国星期日报必有半页大照片教人爱好自然风景之美也无罪了，

英国文人谈鸟声也无罪了，甚至寡妇再嫁也无罪了，而依 Lombroseo 的学说，连罪人犯法也是先天遗传，无罪了。这种怪状，在十八世纪眼光的人看来（如白璧德，Stuart · P. Sherman 之流）都足以亡国，然而英国偏偏不亡；至少可以危及英国人堕入消闲，足以弱国，而英国偏偏不弱。今吾以此观点，靠着一股傻气，为文行之国中，敢言幽默，敢谈人生琐碎、在理学余孽看来，其罪不綦重乎？然而我偏偏不想吃冷猪肉，看你奈何！

（《宇宙风》第 6 期，1935 年 12 月 1 日）

烟　屑（四）

吾好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中流书读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袭上，但皆偷的不好。

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宗教必如便药，方有人买。耶教之"呼我名者得救"、"哈唎噜哑"，佛家之"阿弥陀佛"、"唵嘛呢叭咪吽"皆与便药广告"三天包愈断根"相同。然文学家亦只须合十口念"嗜啰吙哩哑"喃喃有辞，便已得救。

口诵三民主义者，则有之矣，未见有为三民主义未能实行而寝食不安者。盖有之矣，吾未之见也。

三民主义行其一，则民兴；行其二，则国强；行其三，则长治久安。剥削民权，则民如散沙；禁言民族，则丧土辱国；忘记民生，则变乱无已时。

总理遗嘱尚有"唤醒民众"四字，大家忘之久矣。此四字是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致力革命之经验所换得来。且勿姑妄待之。

世上只有力的外交，无爱的外交。

先礼后兵，言时间，亦可言空间。前头揖让，后头重兵，谓之外交。

先礼后礼，必为奴隶。

有文王无武王，不能建周朝；有武王无文王，亦不能建周室。文王之德武王之力合，而后周祚奠定。

文王囚于羑里，武王不曾坐狱。

韩信能过妇人裤下，封淮阴侯，而卒不免于死。当时若肯打妇人两下嘴巴，未必结局如此。

有忍辱负重者，亦有忍辱而重负不起者。有委曲求全者，亦有委曲而全求不到者。

（《宇宙风》第6期，1935年12月1日）

烟　屑（五）

塾师以笔法谈作文，如匠人以规矩谈美术；书生以时文评古文，如木工以营造法尺量泰山。文学如水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塾师复取这些人的唾余去向孩童谈文学；至是教者学者皆不知欣赏文学为何事，而文学愈弄愈炫奇。

有文学，有文评，又有文评之文评。有木工说：你这房屋造得不合法式。又有木工曰：你用的是哪家的绳墨？又有木工曰：你不应该说“哪家”，你应该说“哪派”。又有木工曰：你这“派”字也不甚妥，还是“门”字妥贴。于是木匠互相揪打起来。至于房屋好看不好看，及能不能造得起来，已非木工之事了。

初学文学的人听这些匠师的辩论，目眩耳乱，莫测其高深，那知这些与文学皆无与。你读一本小说，觉得那一段人物描写得亲切，情节来得逼真自然，或者看一篇论文，觉得那一段意思特别巧妙多姿，丰韵特别柔媚动人，议论特别淋漓痛快，使你觉得好，尽管说他好。积许多这种读书欣赏的经验，清淡、醇

厚、宕拔、雄奇、辛辣、温柔、细腻……等等滋味都已尝过，便真正知道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

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去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若元气不足，素养学问思想不足以充实之，则味同嚼蜡。故鲜鱼腐鱼皆可红烧，而独鲜鱼可以清蒸，否则入口本味之甘恶立见。学力未足，元气未充，见解未到者，行文必不用本味，必多引古书，多袭僻典，多用艰语，如厨夫善用姜醋，无论是鲜鱼腐鱼，一把葱，一把蒜，一把辣椒，居然能端出一盘好菜出来。去其葱，去其蒜，则无一样嚼得。文字少平淡者之源在此。

王充分（1）儒生（能通一经），（2）“通人”（博览古今），（3）“文人”（能作上书奏记），（4）“鸿儒”（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一）与（二）相对，言读书；（三）与（四）相对，言著作。“鸿儒”即所谓思想家；“文人”只能作上书奏记，完全是文字上笔端上功夫而已。思想家必须深思熟虑，直接取材于人生，而以文字为表现其思想之工具而已。

所谓笔调，非外来的，亦非所可仿效他人的，只是一人思想情感人格个性自然之流露。除古文中专门摹仿他人以简练矜奇者外，凡稍稍自由之笔调，各人自然不同。独如书法学欧学苏，结局终是一人一体。梁启超自评“笔锋常带情感”，是其人本富情感，由笔锋自然流露出来，非有何笔法教他“带情感”也。他如某人文笔细腻，某人笔力奇拔，某篇神采奕奕，皆是其人观察本细腻，思想本奇拔，心中本有神采，写时天然著之纸上，非有何细腻奇拔之笔法也。

“学者”作文时善抄书。思想家只抄自家肚里文章。

初学为文者，必言分段，一以为此中有什么奥妙，二赞叹人家怎么有这样长篇大论。其实意思到哪里一段也便是一段，有话长一点，无话短一点，那有什么玄奥？前后照应，皆是常识。时文笔法之毒，至此未除。

美国人行文好分短段，英国人行文好分长段（尤其是在报纸文字）。看看上海《字林西报》（英）及《大美晚报》社论便知，其实长段味道来得醇厚些，气势也较足些。

娓语笔调，尽可拉拉扯扯，不分段纵笔直谈。谈得越有劲，段落越长。以前“废名”有一篇《关于派别》谈岂明的八千字一段长文，是属此类。我知此意，故亦不为分段。（见《人间世》廿六期）

英人态度从容，故主长段。美人只求时间经济，故报章文字每由编辑截成短段，以便读者。这种文字读下去，如吃肉丁，不能过瘾。肥肉仍是大块头好吃，许钦文已言之矣。

娓语笔调之难，难在作者肯把读者当知友，亲切自在谈去。娓语笔调之魔力，亦正在亲切二字。被作者当知友，这在读者是多么轻松愉快。

读好的娓语笔调文章，如聆名人高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要谈的有劲，须学力足，阅历富，见解透。

闲适笔调，便是娓语笔调，着重笔调之亲切自在。左派看定“闲适”二字定其消闲之罪，犹如四川军阀认《马氏文通》为马克思遗著。

（《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说耻恶衣恶食

东西文化之衡量，诚然不易，而耻恶衣恶食常居其一。前夕与某外人谈；外人曾往游南昌，在火车站上见有卖鸡蛋卖烧鸡之农民，或皓发红颜，或脸皮赪润，忠厚淳朴，天真可爱，争向车客兜卖手中物，外人爱之甚，拍一照。忽有洋装青年走上用一口漂亮英语对外人说："You are no friend of China. 你专拍中国污秽难堪的百姓的照片，去宣传国外，居心不良，不怀好意。"外人久居中国，颇知此班洋奴心理，乃转向带白狗领的青年说："You are no friend of China. 假如我拍你的照片去宣传国外，这才我自己承认对中国居心不良，不怀好意。至少这些农民自食其力，are trying to make an honest living，并不骗人。他们不耻以你为同胞，你反而耻以他们为同胞！"少年赧然而退。我说："答得好！答得好！"在中国读书洋奴诚然多，他们所谓文化是带狗领，拿洋棍，唱骨摩宁，谁不带狗领唱骨摩宁，便是野蛮，至于中国百姓之勤俭淳朴耐劳幽默诸美德，种种伟大之处，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所恨是不能制一条陀罗尼经大被把中国这个臭古棺一概掩盖起来，只留下他们带狗领喷香水的一流人代表中国。殊不知偏偏有看得出中国百姓之伟大，不耻恶衣恶食之外人，爱看中国老百姓，而偏不爱看读书洋奴。

中国文化最健全最优美处，乃在“淳朴”二字，教人认得简朴生活之美。而今日中国人被外国文化吓得魂不附体，已失却此赏好简朴生活之美的能力了。此话长，不多赘。那天晚上，回来在床上想那外人的答话，越想越有味道，越快活；想他替中国百姓出气，不禁连声在被中唱“答得好！”晨起，记数语于此。

（《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记翻印古书

近来出版界大转方向，一为大书局之大批翻印古书，二为小书局之出一折书，三为上海杂志公司及中央书店之大批翻印明书珍本——总括起来，仍是翻印古书大潮流中之各不同方向。此中有许多话可说，并且应该说。

第一，诸书共同之点，除了翻印旧籍以外，便是价钱便宜。因此其第二点便是，使古书普及流通。本来在印刷业大进步的现代，早应使书越出越便宜，乃是合理，无如书业陈陈相因，不合理事很多，乃使书越出越贵。幸而一折书出现，打开一条生路，其影响及于各大书局，使不廉价，便不足以与竞争。同时书一便宜，读者便增多，且不论版本好坏，提倡大家读书之习惯，其功就不小。此习惯养成，其间接影响于我国文化也非同小可。试想日本国民如何读书，日本出版业站在世界第三位，我们就应惭愧惶惑把“文章华国”一块假招牌自己拆下来了。

一、大书局之翻印古书

前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出《四部备要》，其功未尝不

伟，备要颇合用，丛刊则近于保存文献，合于藏书家之赏好，而非一般人之读物。就中单卖零本，每册四角，版精纸良，也不算贵，然大体上是不能说普及的。《万有文库》标准较低，因此也较合普通家庭之用。此是旧话不提。新近中华有《古今图书集成》，定价仍嫌太贵。最特别的是开明的九本《廿五史》，把古籍装洋装，缩小篇幅；此例一开，遂有商务之《十通》继之。古书洋装，化大为小，化零为整，亦是现代书业早晚须走上之一条路。至今日预约之特有价值有关文献者，一为开明《廿五史补编》，二为商务之《丛书集成》。《廿五史补编》，仍非普及范围，而此项搜罗汇刊，确为学界一大贡献。《丛书集成》，以二三百元买到以前每部数十元至百余元之丛书百部，嘉惠士林，其谁曰不然？

二、一折书

学者不知摆什么臭架子，看不起一折书。我却说翻印一折书者功德无量。书既一折，而且七扣，是诚便宜之至矣。吾尝六元钱选一大堆书，提不上公共汽车，只好雇汽车运回。尝想替现代读书人就各家所已出一折书目，拟出一张合值五元钱之国文自修丛书，到底无闲，未能做到。你想五分钱买一本《曼殊小说集》，五毛钱买一部《饮冰室全集》，七分钱买一本铜版《孟子集注》，三分钱买一本《随园诗话》，又三分钱买一本《陶庵梦忆》，又三分钱买一本《浮生六记》，一毛六买一本《曾文正公六种》，六分钱买一本《绝妙好词》，又六分钱买一本《白香词谱》，三分六买一本《郑板桥集》，一毛八买一本《龚定盦

集》，三分钱买一本《笃素堂文集》（内应有《聪训斋语》），一毛钱买一本《今古奇观》，一毛四买一本《儒林外史》，一毛六买一本《徐霞客游记》，八分钱买一本《虞初新志》（可代《古文观止》读），两毛钱买一部《明清十大名人尺牍》（姚惜抱、钱牧斋、归震川、顾亭林、侯朝宗、王阳明、吴谷人、王弢园、尤西堂、方望溪），又两毛钱买一部《近代十大名人尺牍》（曾涤生、樊樊山、康南海、林畏庐、俞曲园、吴挚甫、王益吾、章太炎、王壬秋、梁任公），七分钱买一本《苏黄尺牍》，三分钱买一本《李笠翁曲话》，七分钱买一本《桃花扇》，两毛半买一部《红楼梦》，四分钱买一本《莫泊桑小说集》，三分钱买一本《安徒生童话》，九分钱买一本《粉妆楼》，一毛钱买一本《孟鹿君》，两毛钱买一部《经史百家钞》，四毛半买一部《十八家诗钞》……学者还要嗤什么道学鼻，排什么方巾架，不理他呢？05．50．07．03．03．03．16．06．06．03．18．03．10．14．16．08．20．20．07．03．07．02．04．03．09．10．20．45．3 11．这样随便开一张书目，花了三元一毛一（内《饮冰室》及《十八家诗》占去一元）就够你雇一辆黄包车巍然跨两脚于一大包书之上回家了，也就够你自修国文两年了。（以上据新文化书局包纸纸上书目，约略打一折九扣。）若花五元钱，岂不是明明有一颇称完备的国文自修丛书吗？可见得买书怎样贵这句话现在也不大好说出口了。若说纸张不好，本不足介意；若说标点校对不好，也不见得，横竖新书店（如以前的新月书店）所出的书校对不比一折书强。而且所谓自修书，多半是看，小半是读，不是做考证用，错字有的看得出来，有的如旧小说随便阅览，有什么关系？况且版口一律，携带便利，马

路上车上厕上尽管看，丢了几分钱一本也无妨，配补容易。我颇想向出我的书的各书局商量，收回版权，合上《论语》、《人间世》各篇，出一文集，卖一毛钱，不知办得到否？不知学者所读何书，所为何事，所放何屁，还要骂他们。还是尽我们的力量贡献意见，劝他们将好书收入要紧（如李笠翁《闲情偶寄》应全部赶紧添入）。

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及国学珍本丛书

前者为上海杂志公司，后者为中央书店所出版，二者皆属翻印明末清初珍本，于中国文献上，有特别贡献，于《人间世》所提倡明朝小品，给以阐扬的实证，兼以专搜禁书珍本，又非普通无宗旨之翻印古书所可比。二丛书定价都极低廉，中国文学珍本五十种，仅售预约十五元，国学珍本廿三（?）种，仅售六元。国学珍本用楷书铅字排印，字迹清楚醒目，文学珍本中用明体者固然好，而字数多者，如《袁小修日记》，《拍案惊奇》，《尺牍新钞》等用新五号，笔画过细，终觉伤目力，吾甚不赞成。上海杂志公司的文学珍本出书在先，中央书店之国学珍本出书在后，既要避重复，自然内容不及前者，但亦有不少好东西。所以如尺牍一端而论，自然杂志公司之《赖古堂尺牍新钞》高明，中央书店所选《写心集》不及之，然而也不失为自修佳本。实则《尺牍新钞》之二集三集（《结邻集》，《藏弃集》）何不列入？又汪僧漪所选《分类尺牍新语》文字简洁，语出性灵，尤有足多。上海杂志公司既拟出《媚幽阁文娱》及《古文品外录》，则中央书店未尝不可出《兰雪斋文致》。此类文

选，言“娱”言“致”，主开畅性灵，文章逸致，皆比较读得进去，学者事半而功倍。中央书店所出卫泳编《冰雪携》（一种明末文选）有极好东西。记得中央书店此丛书目中也有张潮《幽梦影》，实千古佳作。

总之，明末清初之文学，从这两部丛书可略窥一斑了。其闲散笔调（或‘闲’字敬讳，可改用‘萧散笔调’风韵天然，正非未读其书者所可漫骂抹杀。明末人懂得尺牍之佳境（时人尺牍保存不少），又懂得笔调之清趣，又能评小说传奇，又能搜山歌淫词，民间文学，虽然从前被正统文学所淹没，到今日总应该又走红运了。毛声山之《评琵琶记》与金圣叹之《评水浒》，笔调见识，可谓一脉相传。

就中冯梦龙今年特别走红运。传经堂买到一部冯梦龙《山歌》以百元卖出，又钞四本，又各卖得四十元，后得顾颉刚标点，周作人诸人作序乃由传经堂以连史纸仿宋字翻印（定价一元二，实价九角）。同时中央书店之丛书中也出冯的《黄山谜》（还有冯编的《广笑府》），其中传经堂本《山歌》所有的私情四句，咏物四句，私情杂体，私情长歌，桐城时兴歌，都相同，只可惜有约略十分之一最淫而最好的私情歌删去；此外又加上黄莺儿，谜语，挂枝儿，夹竹桃，为传经堂山歌所无者，居全书之半。在看厌了不生不死无病呻吟的文人诗的人，这种山歌是好的，文字是大胆的，想象是奇异的，况同一闷室里，忽然来一阵野外清风，沁入肺腑，顿觉凉爽。我想这一类淫词小调，有此二本，加以开明之《白雪遗音》，北新的《遗音续选》，中央书店又再添入《霓裳续谱》，也就蔚为大观了。《山歌》是苏州语，《霓裳》是北平语。

四、国学名著·《浮生六记》全本

又不是专刊禁书珍本，又不如一折书良莠杂陈而实受一折书的影响大批廉价翻印有用古籍的，便是世界书局之《诸子集成》，及《国学名著》前后各集。名著第三集已出版，新近买来，全套十六种洋装十四册，装璜美观，仅售特价五元，非有一折书之例在前，决不如此。十四种中，除《十八家诗抄》、《古文辞类纂》、《史通通释》、《文史通义》、王临川、王阳明、郑板桥集、《袁中郎文集》、《花间集》、《绝妙好词笺》、《玉台新咏》、《八贤手札》外，值得特别提起的两种是：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及艺林名著丛刊各一册。艺林名著所收《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自是书法正宗，而《画禅室随笔》、《桐阴论画》、《画筌》、《画诀》等亦画论之精华。我以为余绍宋编之《画法要录》，精而不繁，理而不杂，大可想法列入。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所收，颇有味道，兼有编者朱剑芒为各篇作考。总而言之，皆属哀艳小品。内中《陶庵梦忆》，《影梅庵忆语》，早有市上流传便宜本。叶绍袁（天寥）《窈闻》，系《午梦堂文集》中述扶乩语之一部，类似《西青散记》，但亦有佳文（《续窈闻》中第二〇——二一页僧女问答一段不错）。其哭女之情虽然可哀，但有天下至情，便有天下至文，如沈君烈《祭震女文》，袁子才《祭妹文》是也，固不必托扶乩神仙以出之。《秋镫琐忆》、《扬州梦》皆是上乘文字，与《浮生六记》同一脉。总而言之，编者眼光实在不错，但如世界自称为稀世珍本，则又未必，因《浮生六记》全本是伪托，《扬州梦》早列入说库，而《秋镫琐忆》于民国二十二年已

由大东书局出单行本（《香畹楼忆语》亦有大东本）。《香畹楼》吾意不如《秋镫琐忆》；后者述夫妇闺房之乐，诗文共赏，月夜追踪，衣食不足，风韵有余，极似《浮生六记》，只文较短而事不详而已。《扬州梦》内有绝好文章，梦中人第一篇毕生妇及玉林芋珍二条是也；全书笔调闲散，描写琐屑，极其逼真，又极似《浮生六记》。梦中事之事甚趣，梦中人之人甚活，梦中情之情甚奇。

这本书的缺憾就是所称希世珍本之全本《浮生六记》是伪造的。朱剑芒跋中对此稿之真伪也稍疑惑，但不否定。稿本是苏州文人王文濡（均卿）所"发现"交世界出版的，不幸王先生于本夏归道山，无从起王先生于地下而质之。然王素尝造假书，本来令人可疑。朱跋已指出其游台湾琉球在嘉庆四年与前四记所记当年情形大相径庭（参考俞平伯所编沈氏夫妇年谱）。然这犹可说是笔误，我所以断定此二记是伪造的理由：（1）笔调全然不像；（2）后二记作者胸中全无独见，决非"凡事喜独出已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见《浪游记快》首段）的沈三白所肯著于笔墨；（3）诗词恶劣平凡，懒洋洋无气骨，无神彩；（4）于前四记夫妇间事实，全无补充；（5）竟胡闹用梁任公笔法，用梁任公新名词。《中山记历》第五，文笔尚无可议，所记风土文物甚详，当有所据，非向壁所可虚构。《养生记道》第六，便只是抄书，繁征博引前人语句，却道来无半句胸中独见的话。倘使三白记之，必以自身经历琐屑证其独悟心得，决不肯如此大批抄书也。按此记所抄前人语，前后蝉绵相贯而下者，有苏子瞻语，范文正语，陆放翁语，林鉴堂语，邵尧夫语，朱晦庵语，王华子语

(连抄四五条)，杨廉夫语，应璩语，白乐天语，程明道语……令人作恶不作恶？

别的不提，单说他用“饮冰室”新名词也就够了。第八五页有论太极拳一段：

> 太极二字已完全包括此种拳术之意义。太极乃一圆圈，太极拳即由无数圆圈联贯而成之一种拳术。无论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离此圆圈，离此圆圈，便违太极拳之原理……只须屏绝思虑，务使万缘俱静，以缓慢为原则，以毫不使力为要义……

再抄一段，真伪自辨（九〇页）。其中“精神”“认清”诸字已甚可笑，而虚字之用法，如“吾人”“和”，简直可定此伪记之死罪，使之百喙莫辩了。

> 有天然之声籁，抑扬顿挫，荡漾余之耳边，群鸟嘤鸣林间时所发之断断续续声，微风振动树叶时所发之沙沙籁籁声，和（注意和字）清溪细流流出时所发之潺潺淙淙声。余泰然仰卧于青葱可爱之草地上，眼望蔚蓝澄澈之穹苍，真一幅绝妙画图也。……吾人（注意梁任公之吾人）须于不快乐之中，寻一快乐方法，先须认清（注意二字）快乐与不快乐之造成，固由于处境之如何，但其主要根苗，还从己发长耳。同是一人，同处一样之境（任公笔调），甲却能战胜劣境，乙反为劣境所征服，能战胜劣境之人，视劣境所征服之

人，较为快乐，所以不必歆羡他人之福，怨恨自己之命，是何异雪上加霜，愈以毁灭人生之一切也。无论如何处境之中，可以不必郁郁，须从郁郁之中，生出希望和（又和字）快乐之精神……

均卿老先生实在太冒渎三白而儿戏我们了。所以虽还有他处可以指摘，恕我不浪费笔墨了。

十一月廿四日记。

（《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

报载须磨访唐有壬，对北平学生运动提出抗议。夫须磨何须访唐有壬，打电话可矣，而竟访之，其重视北平学生运动可知矣。再思，何应钦北上，须磨不抗议，北平学生运动，须磨独郑之重之抗而议之，是须磨眼光中畏学生运动甚于畏中国军界，亦可知矣。高明乎须磨，孰谓三岛无人哉！夫日本所欲者，一全国镇静之中国也，无民众运动，无游行示威之中国也。何以言之？丧辱国权祸在眉睫之《塘沽协定》，以不闻不问镇静之国民间接造成之，独全世界列强视线所集之《凡尔赛和约》，不镇静无武力之“五四运动”中国民众偏足以破坏之，故知民众力量如火燎原，比中国军界尤足畏也。再思“五卅运动”，足使英人屈服，国民党青年运动足以推倒北方政府，即今日党国北伐光荣之历史亦直接建树于民众运动学生运动之上，由真正民众势力与革命军人势力组合始得造成。此理先哲孙中山先生知之，日本政治家亦深知之。吾国先哲知之，故留下“唤醒民众”四字于遗嘱中，为将来兴国宝诀；邻国政治家亦知之，故对此学生运动极加注意。吾尝为须磨思之：倘使此反对华北独立运动继“五四运动”之章法，浩浩荡荡而来，结果如何，真不可设想；倘使北平教育界游行拥护政府，拥护中国领土之完

整，北平军警果敢开枪制止之乎？必不敢也。不敢便如何？必用军警包围诸大学，用软禁方法，不使出游；倘使如“五四运动”，北大学生愿在第三院受软禁，而如“五四运动”，引起北平各大学罢课；又如“五四运动”，引起全国罢学响应；又如“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商会响应；倘使如此，事情岂不麻烦哉？一个奄奄待毙的国魂岂不复活起来哉？此时恐中国政府即使欲诚意力行睦邻政策，亦须顾及民意。吾虽抗议，而中国政府答曰，吾非不制止，而实无法制止，民意如此，学界商界公意如此，要求土地完整，行政完整。此时连吾亦不能怪中国当局矣。华北运动，虽然是中国国内问题，吾日本不便干涉，然如此一来，局面一翻，吾岂复有在居仁堂与三数官吏不声不响夺得华北利益之方便哉！此由邻国眼光看之。若由国内看之，日本要求中国制止民众运动，是要求国民党取消总理遗嘱中“唤醒民众”四字。党国先进，不乏贤明，当已见及。北平学生运动，只能算叶楚伧、于右任诸党国先进所提倡之一点“民吁”“民呼”而已。二三十年前中国国土丧却几许？今日中国国土丧却几许，尔时可“吁”，此时何独不可“吁”？国土将丧，国民总可以“吁”一“吁”，“呼”一“呼”。若于华北断送之时，国民“吁”一声“呼”一声亦不会，是中国之元气已经丧尽，不但华北可灭，全中华灭亡亦且不远。夫犬之死，一之死，后脚尚须踢两踢，而况人类乎？今吾斩一犬之足，此犬喘亦不喘，踢亦不踢，则此犬早已寿终正寝，吾斩其足亦死，不斩亦死，何故美其名曰“镇静”耶？如此中国之亡，非日本斩之之罪，日本不斩，他人亦必斩之。而使吾为日本，将鄙恶中国，唾弃中国，宁斩活鸡，不斩死犬也。夫民众运动，如病家之脉息也。医家

言，病症无论如何，要看病家脉息；脉息好，症虽利害不足虑；脉息不好，症虽轻亦可致命。吾看北平教育领袖及学生脉息不错，中国其尚有望乎？

十二月十二日

（《宇宙风》第8期，1936年1月1日）

告 学 生 书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电：中大全体教授一百六十六人劝告学生上课，内有警句曰："如以罢课为爱国表示耶，则前此各地游行，霆举飚驰，影响已著，不必多此一举，转为蛇足。"尤精警句曰："自今以往，虽强邻凌迫，至于最后一课，犹必尽职指授。"按：此文字句不通，不知是谁起草。盖强邻凌迫"至于最后一课"，当然是指亡国前夜之"最后一课"，而所以"尽职指授"者，将直"指"入亡国里去也；而且大有"即使教到亡国成为'最后'亦所不恤"之意。其坚决盖如此，此恐非中大教授一百六十六人之意愿，亟应改正，以免留为千古笑谈。吾故曰：学生固然感情太冲动，大学教授亦未免理智太丰富。

（《宇宙风》第9期，1933年1月16日）

论躺在床上

《宇宙风》是为成年读者编的；若为小学生阅看，这种题目，不外“早起早睡，使身体康健”两语足以了之，躺在床上也就没有什么议论可发了。事实上，躺在床上偏偏是人生之一部，而且人生七十岁，躺床三十五，也就不得不谈，而且甚有可谈，不得以“早起早睡”四字了之，一若在床上经过时间，不足一谈也。我们总是喜欢蒙骗小孩，以“昼寝”为罪恶。实际上与我谈过的医生，银行家，校长多半认为每日下午昼寝半小时，甚为有裨卫生，且睡起作事精神饱满，较不昼寝者工作成绩加倍。但若以此话向青年言之，仍认为不合，是故中国部长院长校长人人实行昼寝，而人人戴上不昼寝之假面具，即使密友闲谈可以承认，而著之文章断断不许。于是文章与人生永远隔开，而失其改造人生使思想与人生调和之效用了。

躺在床上于世界文化之功大矣，世人不察耳。据我私见，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科学发明莫非得之于卧床上被窝中；惊动世界划分时代的哲学思想也莫非于三更半夜，身卧床上，手执一根香烟时，由哲学家之头脑胚胎出来。由是观之，躺在床上之艺术尚矣哉。

所谓躺在床上者何？不外两种意义，一为身体上的，一为

精神上的。由身体上言之，躺在床上是我们摒弃外物，退居房中，而取最合于思省的一种姿势。若要思省得好，这姿势不可不讲求的。孔子就是很懂得“人生的艺术”的人，就是人生的艺术家——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以防脚冷，此皆后世儒家所不屑谈的了，虽然在孔子，这已成为“必有”的条件。所以如此，也不过求其舒服而已。孔子的姿势是好的，对的，因为他是侧身而卧。所谓“寝不尸”，是不要强使本来曲折的脊梁拉成直线，以致筋肉长持紧张的态度，这是合乎近代科学的发明的。在我想，人生真正享福之事无多，而跷起足弯卧在床上居其一。全身躺直就无味了。手臂的位置，也须讲究。少读孔子所称“曲肱而枕”之乐，觉得难解，现在才知曲肱之趣。假如垫以大软枕头，我认为最好的姿势是弯着一腿或两腿，一手或两手放在头后，垫以枕头，使身体与床铺成三十角度之势。在这种姿势之下，诗人自然得了佳句，科学家自然发明新理，而哲学家也自然可以想出惊天动地的思想了。

世人平常都是无事忙，一天不知所忙何事，晨起夜睡，糊涂过去，少作曾子所谓三省，及君子慎思的工作。所谓卧床的艺术，不是单指身体上的休息而言。自然，躺在床上，身体得着休息，日间规劝你的哥哥姐姐，电话上无礼的陌生人，好意来探访你及一切使你身疲力乏的人，现在都也钻在被窝中，而你得自由解放了。但这些以外，还有精神上的意义。假定躺得好，这床上的时间，就是你深自检点，思前虑后继往开来的宝贵时间。许多商业中人，每以事业繁忙自豪，案上三架电话机拨个不停，才叫做成功。殊不知他们若肯每天晚点起来，多躺一个钟头，反可以想到远者大者，牟利可以加倍。就使躺到八

点九点起来，有何妨？在未起床之前，他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卧在被窝中，床旁一盒香烟，颈上无狗领，腰上无皮带，足上无皮鞋，足趾仍然自由开放，他可以盘算一下，追思前日作事之成绩及错误，及拣定今日工作之要点，去其繁琐，取其精要——这样才徐徐起来漱口，十点上办公室，胸有成竹，比起那些无事忙先生，危危岌岌九点或八点三刻就到公事房呼喝下辈，监督职员，岂不高一筹吗？商家常骂文人“幻想幻想”，其实眼光远大的商人，才需要幻想。要学习幻想，就得床上多躺一会儿。

至于文人，发明家，思想家，躺在床上之重要更不必提了。文人清晨静卧床上一小时得来奇思妙想，比之早晚硬着屁股，坐冷板凳，推敲字句，苦索枯肠，其功奚啻数十倍？当他在床上心血来潮，静卧思摩玩昧人生之一切时，他的幻想力既极强健，而他所观察的人世，也似脱去一层皮毛，现出真相。如中国画家所言，于物之形似之外，探其义理，再加以作家胸中之意，自然画出的山水人物，异乎日间所见的自然而更神似自然了。

所以如此者，是因为当我们躺在床上之时，一切肌肉在休息状态，血脉呼吸也归平稳了，五官神经也静止了，由了这身体上的静寂，使心灵更能聚精会神，不为外物所扰，所以无论是思想，是官觉，都比日间格外灵敏。即以耳官而论，也是此时最聪敏的。凡好的音乐，都应取躺卧的姿势，闭着眼去细细领略。李笠翁早已在论“柳”一篇说过，闻鸟宜于清晨静卧之时。假如我们能利用清晨，细听天中的音乐，福分真不小啊！

上海近郊的鸟声，很少听见人谈起，也许就很少人去领略。今天早晨，我五点半就醒，躺在床上听见最可喜的空中音乐。起

初是听见各工厂的汽笛而醒，笛声高低大小长短不一。(在此应补一句“我马上想到厂工之苦及资本主义之压迫”为得体时文应有之义。）过一会儿，是远处传来愚园路上的马蹄声，大约是外国骑兵早操经过。在晨光熹微的静寂中，听马蹄滴笃，比听什么音乐合奏还有味道。再过一会，便有三五声的鸟唱。可惜我对于鸟声向来不曾研究，不辨其为何鸟，但仍不失闻鸟之乐。今年春天，我最享乐的，就是听见一种鸟声，与我幼时在南方山中所听相似，土名为 Kachui，大概就是鸠鸟。它的唱调有四音——do，mi，re—ti，头二音合一拍，第三音长二拍半，而在半拍之中转入一简短的低阶的 ti(第四音)——第四音简短停顿的最妙。这样连环四音续唱，就成一极美的音调，又是宿在高树上，在空中传一绝响，尤为动人。最妙声，是近地一鸠鸟叫三五声，百步外树梢就传来另一鸠鸟的应声，这自然是雌雄的唱和，为一切诗歌的原始。这样唱和了一会，那边不和了，这边心里就着急，调就变了。拍节加快，而将尾音省去，只成 do，mi，re 三音，到了最后无聊，才归静止，过一会再来。

这鸠鸟的清唱，在各种鸟声中最美而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此外倒有不少，如鹊鸟，如黄鹂，如啄木，声皆近于剥啄粗野，独邻家鸽子的呜呜特别温柔，代表闺房之乐，属于《周南》一派。雀声来得较迟，就是因为醒得较迟，其理由不外如笠翁所指出。别的鸟最怕人，我们这最可恶的人类一醒，不是枪弹，就是扔石，一天不得清静，所以连唱都不能从容了之，尽其能事了。故日间吟唱，其唱不佳。为此只好早点起来清唱。唯有雀，即不怕人，也就无妨从容多眠一会儿。

自然鸟声以外，还有别种声音。五点半就有邻家西崽叩后

门声，大概是一夜眠花宿柳回来。隔弄有清道夫竹帚扫弄沙沙的声音。忽然间，两声“工——当”飞雁的声音由空中传过。六时二十五分，远地有沪杭甬火车到西站的机器隆隆的声音，加上一两声的鸣笛，隔壁小孩房中也有声响了。这时各家由梦乡相继回来，夜的静寂慢慢消逝，日间外头各种人类动作的混合声慢慢增高，慢慢宏亮起来。楼下佣人也起来了。有开窗声，钩钩声，一声咳嗽声，轻微脚步声，端放杯盘声。忽然间，隔房小孩叫“妈妈!”这是我清晨所听的音乐。

（《宇宙风》第9期，1936年1月16日）

外人之旁观者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字林西报》通信栏，有署名Chas. W. Rankins者，对工部局巡警阻止学生游行之行动发表意见，兹译于下：

《字林西报》记者足下：顷得可靠消息，有中国学生今日在上海游行，大约是抗议他们的政府在中国之一大部领域成立自治政府。在他们经过苏州路与乍浦路之时，有五六位外国巡警棍打学生，抢夺他们的旗帜，把他撕毁而践踏于足下。

"有一位外国妇人看如此下流举动，非常愤慨，以唯一表示抗议的方法，正视那几个巡警，大声高唱：'Hurrah for the Students!'

"我们通常总是敬重尊崇捍卫自己的国家的人。

"同这理由，英国及全世界今日敬重阿比西尼亚。

"我脱帽致敬于反抗今日华北事件的学生。

"因我深信这是一切君子对捍卫国家者的态度，我深望永不再见有人凌辱或干涉爱国男妇老幼在他们自己的城中街上守法的走路。

"巡警木棍之用还是棍打土匪与盗贼！爱国者可听其自由吧！

真茹，十二月廿四日

Chas. W. Rankin”

又《大陆报》北平记者 Gilman 详叙北平学生运动，内有一段描写他与受伤的燕大学生谈话。燕大学生说：

“那砍我的大刀是我出钱捐助买来的。当廿九军在喜峰口作战时，我们燕大学生捐钱叫他们买大刀，现在用来砍我们了。”

又北平军警用大刀军剑砍打学生，有外国记者给他拍照，倒地学生几十人横陈街上。某外人告诉我，此照片到上海时，上海某英文报不敢登，但现在已在太平洋路上，将在外国报上发表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宇宙风》第 9 期，1936 年 1 月 16 日）

考试分数不可靠

我向来反对分数，认为不足以代表学生真正的学力，虽然同时认为此非注重个人教育之学制，分数是不能避免的。惟我认为真正学力的考试可凭论文，由论文可以看出一学生文字、学问及思想之进步。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人的学问是花树式的，逐渐滋长的，不是积木式，偶然堆放而成的。一人的思想学问，是由动了灵机，继续发育其本性，对事对物渐渐得一种见解，故是一贯的，整个的。故凭其论文，便可知他思想教育的程度。各人有各人之本性，趣味，故各人有各人发育之过程，或偏此偏彼，不能勉强。在现今完全忽略学生个性整个发展的教育，教育家认为各人读同页数的书，答同样的问，将一科一科知识灌注学生脑中便可成为学人，故只须分科考试其强记的知识，便足看出一人的学问。谁也知道，这种考试出来的学问是强记而不生根的。既然不生根，当然无用。

考试之分数，也不一定是标准的。西洋教育家早已知道，一级中两班学生受两位教员定分数，结果每每不同。也有人反对百分制，认为这是无意义。这百分制作一绝对的假定，以学生所答与问题之正确答语相比。真正的学分应该是比较的，只能将一班的考卷就学生与学生相比。一百人中总有五十人是“中

材”，他们的平均答案，才可为标准，其余的廿人比平均好为“上等”，廿人比平均坏为“下等”，又约有五人为“上上”五人为“下下”。假如某次考试全班多半得四十分，便是四十分及格。所以说这些话，不过叫大家知道百分制不是“天经地义”。

假如我做教员，只有两条路可走。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十个考题，订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因为如果“及格”是说某生十个答案答得好，可以；若说某生某门学问真懂了，我没有这样傻。第二条路，假如我与诸生有朝夕接近的机会，常常谈谈学问、书本，到了学期终，我的订分没有什么八十七，七十八，大概某生“不错”，某生“过得去”，某生“肯用功”，某生“杂书看得不少”，某生“不行”，某生“的确好”，某生“文字好，思想差一点”，某生有“奇气”。这些考语是有意义的，至少比“某生历史八十七·五”有意义。但是要叫我把这些考语，改为“甲，乙，丙”我改不来，通共有几种，我也莫名其妙，大概随时看人而定。所谓“看人而定”是说人有个性，不能变为一个甲等生，乙等生，或是九十分生，八十分生。至于这考语写在那里，我想没有关系，有古雅信笺时写在古雅信笺；无古雅信笺时就写在草纸、信封背上……。

今天看见外报一段新闻，使我欢喜，证明我的意见不错。英国新出一本小册，名为《考试之考试》(An Examination of Examinations)，这是一个教育委员会实验考试制度的报告。委员是有名的大学教授及教育家如 Graham Wallas 等。考试的是利用英国公学同一套的真正考卷，先后分与各不同的专家去订分，

看他们订出及格不及格的成绩比较如何。最可惊异的是历史毕业考试的试卷。试验的结果是：把十五张考卷给十四位经验丰富的教员订分，结果有四十种不同的分等。再使这几位阅卷人隔十二月至十九月之后，重新订同一考卷的分数，他们自己先后不同，其二百零十张考卷中“及格”、“不及格”及“优等”的分配，有九十二张前后不同。不及格的变为及格，及格的变为不及格。所以这报告的结论是：“很明显的，这种的考试不能叫人放心。”又说：“依据现此制度，颁给许多人所赖为终身职业的毕业证书时，取与不取之决定中，含有极大的‘侥幸’成分。……有许多人应该取得毕业证书而误为落第，有人不应取得证书反偶然取了。”

其实以前科举何尝不这样，所以“房师”的恩德实在不小。这报告也认为在现此制度之下，考试不能避免。不过能打破分数的迷信，不要奉为圭臬，就是学问上见解上的一种进步。

（《宇宙风》第10期，1936年2月1日）

艺术的帝国主义

这次故宫宝物在伦敦展览，因而中国艺术品在欧洲大出风头，亦为一九三五年国人最痛心疾首之一事件。最近该展览已有移往纽约借观三月之议，如此则中国美术亦将在美国大出风头。此次展览物品，不独由中国方面供给，欧美各国亦皆出其所藏汇齐陈列，诚亘古以来中国书画古物之集大观而中国人眼福所不易看到者也。其影响之深，由英国各报评论及所载新闻可以想到。若 Bmyon 直称中国美术传统之富在希腊之上，其表面上之成功，如《字林西报》伦敦通信所称，至去年年夜止，在开会未到一月之期间，参观者已超过十万以上。由于报纸之评论及专家之品鉴，此展览会之影响，将使中国文物、器具、瓶供、图案复流行一时，与十八世纪中国文物在欧西成一时髦相同。试想英国战舰前既运输西洋耶教及帝国主义而东，今又运输中国艺术的帝国主义而西，诚可谓千古奇谈。

此次展览之效果有二，一为普通的，一为艺术的。普通的，如盆景、金鱼、木器、磁漆等，似属于时髦，无关大体，然藉机联络中外感情亦非浅鲜。盆景去年已经风行美国，金鱼，雕漆，茶几，橱柜，亦必相继而来。当十八世纪之所谓 Rokoko 时代，欧洲男人梳辫子，女子执扇子，公卿穿绸缎，士人藏磁器，

宫庭妃嫔乘轿出进，皆是崇拜中国之一种时髦。最近西洋摩登木器，以线条屈曲单纯为主，亦是受中国木器影响。Leigh Ashton 言近代户内装饰之倾向，多半系于大战以后，随着赏识中国古代艺品而来。Sir William Licwellyn 遽言今日英国社会上下所知者仅“明”一字。

“我碰见的无论谁家都有一件中国磁器。即使只是一个新的糖姜罐，也自认为是明器，赶紧把它收置于庋架上。”

在艺术方面，此次展览使西人较普遍的较真实的领略中国美术之精神，而使中西人士精神上多获一种接触。此种艺术上之欣赏，到底与前之欢迎麻雀牌、京戏不同。因为中国书画，尤其是此次所陈列的书画，实在能代表中国文化之顶点，寄托中国美术之精华。中国文化向来拙于理智，而富于情感，弱于分析，而强于综合，故中国之科学析理，格物致知，卑之无甚高论，而独于美术则擅长创造，登峰造极。以中国人游乎物内，或游乎物外，皆独得神趣，虽至微至贱，亦足供吾人之赏乐，故无论评花赏月，品茗供瓜，皆自具风格，为西洋人所不可及。及其化为图画，托为诗词，又于人为之中，保存山林之气，取法自然，而因取法自然，故变态万千，神乎其技，故中国文化各方面得西人之赏识者以美术为最，乃意中事。

实在文化接触，贵在互相吸收。宾娘氏 Lawrence Binyon（前伦敦博物院美术专家）近在伦敦演讲，谈及此次展览及中国美术之精神，语颇中肯。宾娘氏之言曰：“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有一重大的异点，西方艺人初见中国画展之时，必以为题材琐屑平庸，因为看来看去都是些花，鸟，山水，烟霞，而极少肖像及人生动作之写景。这是起于一种心理态度之不同，即对宇

宙万物之态度。我们（西人）以人为一切之中心，英国艺术家常对我说："为什么中国艺术没有裸体画?"……所以然者，因为中国艺术不以人物为最重要。他们所画的花卉，不是我们所谓自然研究。依我的意见，中国美术之可贵是他由生活——由平民的生活直接开放出来。""中国人的心灵悠游于自然万类之中；无论我们持什么美术学说，都不能不承认，美术之在中国成为普通人养性怡情之具，甚于在任何其他民族。这美术是寓于人生之内，而非附于人生之外的。"

（《宇宙风》第11期，1936年2月16日）

论 性 灵

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不知说什么性灵？我曰，精神是什么你知之否？朋友无辞以对。今人曰，今天精神不佳，或曰今天精神甚好。然何物为精神，无人晓得，亦无科学可以说明也。科学不能说明不妨精神之明明存在。书法家精神欠佳，则笔不随心，古文大家精神不足，则文思枯竭。闭眼静坐半小时，精神复来，而字字珠玑若泻玉盘而下矣，怪不怪？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起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此是袁伯修所谓"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暇晷引用古人词句"之时之一般光景也。是时也，客至不惊，电话不厌，人骂不怒，遇难不畏，不但心地太平，抑且天下太平，任何困难，皆有办法，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势。一夜失眠则失此光景，消化欠佳则失此光景，大便不通则失此光景，伤风流涕则失此光景，怪不怪？是时也，客至则惊，电话则厌，稍触则怒，稍挫则馁，而一切成为悲观世界矣。故哲学家之乐观悲观，常是消化之良否而已，消化积滞者不能使之乐观，犹大便通畅者不能使之悲观。大抵所谓精神，便是此物。

西方无精神二字，高兴言 High spirits，抑郁言 low spirits，而精神单用则甚难翻译，大概 Nervous energy 最近。作事作文有无精神，有无 Nervous energy，皆看得出来。实则以近代生理学言之，精神只是神经康健有力作事境地，译以 Nervous energy 颇确。文章后段气懈，便是精神不到，画家某笔脆弱，亦是精力不到。

由精神可进而言神感(烟士波利钝)，由神感可进而言性灵。精神到时，不但意到笔随，抑且笔意先，欲罢不能，一若佳句之来，胸中作不得主宰，得之无意之中，腕下有鬼自驱驰之，胸中作不得主宰，得之无意之中，故托为"神感"之说，实则仍是精神饱满时之精神作用而已，并无两样。西人称神感为 Divine afflatus，亦指神力之来到，Afflatus 盖指"潮流"，亦犹中文言"心血来潮"。以科学言之，吾人只是一只动物，任何神感，皆由血液中之变化，而其主要来源皆出腺分泌，分泌刺激血液，使人惊，使人恐，使人起色欲。尝闻此地探险家言，有雄犬一年不见雌犬，后遇雌犬于某宅墙内，不得近，环行墙外，三日不食而死。此亦是腺分泌作用，胸中作不得主，犬而有知，托言神感烟士波里钝可也。尝见书上言（不记得是否《何典》），人身血中有虫，叫人奸淫，叫人偷盗，叫人想做皇帝，叫人想做诗文。此虫咬人，叫你不做不休，无可奈何，便是烟士波里钝，便是血液中之腺分泌作用。武人想做皇帝，文人创作小说，奸夫贪人妻妾，皆是血中之虫咬之迫之，不可获已。文人心血来潮时，脑中文思之多多于虱，蠕蠕而动，而天才者，血中之虫较人多量较人活泼而已。

神感问题既解决，性灵问题亦自迎刃而解。神感乃一时之

境地，而性灵赖素时之培养。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 Personality 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若谓性灵玄奥，则心理学之所谓“个性”，本来玄奥。而个性之确有，固不容疑惑也。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大概得之先天者半，得之后天者半。先天定其派别，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义，或优柔寡断，或多病多愁，虽父母师傅之教训，不能易其骨子丝毫。又由后天之经历学问，所见所闻，的确感动其灵知者，集于一身，化而为种种成见怪癖态度信仰。其经历来源不一，故意见好恶亦自相矛盾：或怕猫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猫，或因世代官绅，非钻营一个司长科长做做便不痛快，或生性孤介，名利皆看不上眼。故个性之心理学成为最复杂之心理学，今日瑞士心理学家容格氏 Jung 一派，稍稍发其端倪而已。亦犹腺分泌作用，今日仅仅发端而已。但一人有一人之个性，固不待心理学证明。在文学上主张发挥个性，向来称之为性灵，性灵即个性也。大抵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惟断断不肯出卖灵魂，顺口接屁，依傍他人，抄袭补凑，有话便说，无话便停。性灵派所喜文字，于全篇取其最个别之段，于全段取其最个别之句，于全句取其最个别之辞，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是故言性灵必先打倒格套。是故若性灵派之袁中郎袁子才，皆以文体及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着，第一

主张打破桎梏，唾弃格律，痛诋抄袭。李笠翁不言性灵，而所为又实性灵大家，故其《闲性偶奇》一戒剽窃陈言，一戒网罗旧集，一戒支离补凑，皆性灵文人所应奉为金科玉律。其言曰："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二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林黛玉谓作诗若有佳句，即使平仄欠调亦不要紧，亦是性灵派也。又因倾重实见，每每看不起辞藻虚饰，故其作文主清淡自然，主畅所欲言，不复计较字句之文野，即崇奉孟子辞达而已为正宗。其流弊，在文字上易流于俚俗（袁中郎），在思想上易流于怪妄（金圣叹），讥讽先哲（李卓吾），而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思想之进步终赖性灵文人有此气魄，抒发胸襟，为之别开生面也。否则陈陈相因，千篇一律，而一国思想陷于抄袭模仿停滞，而终至于死亡。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惟在真正性灵派文人，固不肯以议论之偏颇怪妄惊人。苟胸中确见如此，虽孔孟与我雷同，亦不故为趋避；苟胸中不以为然，千金不可易之，圣贤不可改之。盖宇宙之生灭甚奇，人情之变幻甚奇，文句之出没甚奇，诚能取之，自成奇文，无所用于怪妄吊诡也。实则奇文一点不奇，特世上顺口接屁者太多，稍稍不肯人云亦云自抒己见者，乃不免被庸人惊诧而已。

（《宇宙风》第11期，1936年2月16日）

茵治论考试

自从教育委员会《考试之考试》报告小册出版以后，英国老文豪及思想家圣保罗大礼堂主教茵治 Dean W. R. Inge 即为文于《伦敦晚报》Evening Standard 发表意见。他说看了那个题目，初以为是“考试官之考试”，那才有趣哩。大意节译如下：

旧式的考题，如试述你所知关于 Chedorlaomer, Chusharisathaim Mahershalahashbuz, Huz, Buz, Luz，一类专考僻名僻典的问题，我希望永属于过去，不会再有了……牛津与剑桥的定分方法不同，在剑桥分数是依照各问题的分数一问一问加起来，加上总数以定及格不及格。牛津的阅卷官是印象主义派的；他把一张考卷阅下去，心中自然而然得了一个甲乙丙丁的印象。

在英国文学一门，我的意见似乎觉得考试制度弊多利少。书评之书评之书评！笺注之训解之义疏！这是预备文学考试的读书法，但万万不是欣赏英国文学而得实益的方法。牛津英文学科创设之时，几乎被一班训诂家弄得夭折而死。他们要学生读古哀司兰文，古日耳曼文，古斯拉夫文。原因是这种题目最便于考试！自然现在这一科的教法已较合理了，因为读的人很多。

教育与考试之间必有难免的冲突，因为两者的目的是不同

的。教育的目的不是帮一个青年找饭吃。教育的目的，布来司爵士 Lord Bryce 说，是刺激他的求知之欲，而教他服膺珍爱所当服膺珍爱者。教育之所注意目标，不在记诵事实，而在辨别是非贵贱。

今日中学教育及大学教育的真正失败，是不能叫受过这教程的人对于学问发生永久的兴趣。很多人同 Samuel Butler 一样说："我不一定说我离大学就赶紧要拂去大学里带来的靴上尘，但是吹入眼珠里的灰屑总要揩试一部分出来。"可是与 Butler 不同，他们一脚跨出校门，书本便都丢在脑后了。一人可以领一匹马到河畔，但是二十个人也不能强那匹马饮河水。

茵治之言如是，而茵治不但大学出身，并且当过多年的考官。

（《宇宙风》第 12 期，1936 年 3 月 1 日）

两部英文字典

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增订本》

张世鎏　平海澜　厉志云　陆学焕编辑

商务·廿四年　　定价二元五角

《双解实用英汉字典》

李登辉　郭秉文　李培恩编辑

商务廿四年　定价二元五角

去年商务出了两本袖珍英文字典，其中《模范字典》系增订本，其原本于民国十八年出版。模范以求解作文两用为主旨，多列成语，引证用法，得社会欢迎，独步一时，乃理所当然。字典有定义而不举例，犹如画像有轮廓而无眉目，空空洞洞，令人疑神疑鬼，某字在某句果此义也，果彼义也，捉摸莫定。一有例句，则前之所谓轮廓者，骨肉丰盈眉目毕现矣。此《简明牛津字典》序文所谓"define and your reader gets a silhouette illustrate, and he has it 'in the round'"之谓也。若真如《简明牛津字典》编来，直可谓"血足荣肤，肤足饰肉，肉足冒骨"，可以令人颠倒，岂但得帘中模糊倩影而已！《牛津字典》魔

力实全在此。模范本此义编辑，遂亦收用法明了之效。此书字义不用英汉双解，而以余出地位，作举例之用，然后解之，亦是一办法。此次增订本，添加单字，例句，页数，总额较原本为十七与十四之比，又于原有种种附录之外，增补"注音人名地名表"(约七十页)，及"略语表"，自然益臻美备。吾前曾劝学生以此字典作自修英文成语之用，每字咀嚼其用法，不彻底不放松，实为增进英文之最好良法，因用法既已了然，又句句已经译出，便利无比也。市上有所谓《英文成语辞典》，乃专讲冷僻字句，切不可读，因冷僻成语最难应用，程度尚低者运用不来，反成笑话。故反以此字典为最好研究通用成语之书。

《双解实用字典》与前书之不同，一在定义英汉双解，二在多收商业名词及专科名词，盖看重"实用"二字。此在其书后附录"商用名词表"更可看出。新名词及科学名词如 nudism, technocracy, introvert, hormone 他书所未收者，此书却已收入。新名词如第一字 nudism 实非列入不可，因上年清华英文考试题中有此字，而考卷中此字之错解到廿余种之多，有人将此材料寄交《论语》，未经刊登，而实一大笑话也。又此书之长处，能于每义之后，即加以例句，使定义得例句而益彰，胜于不分义举例者一筹。

关于新名词之收入，两书亦有未备者，如草裙舞之为 hula dance，同性恋之为 homosexuality，二书皆未收。模范有新名词如 cheka（苏俄侦缉反动派之秘密队）及 movietone（有声电影），自然可喜，而 hunger-strike 已收，hunger-march 未收，不无遗憾。将来两书增订时，《简明牛津字典》一九三四年之"新增附录"应酌量添入，盖此表多收美国俚语，近由电影势力传

入英人语言文字中者。例如 go-getter，get my goat，shimmy，tabloid newspaper 等字今日皆极常用，学者每感有检查之必要（tabloid newspaper 即‘小报’之类，‘实用’举 tabloid news 而注为‘简闻’，嫌未详）。同表中又有 cumquat（金橘）cumshaw（即酒资，源出中文‘感谢’或曰‘金沙’，未知孰是），皆与中文有关，尤应收入。

（《宇宙风》第 13 期，1936 年 3 月 16 日）

节育问题常识

山额夫人又来了（民国二十五年），当然又有人要来鼓吹，也有人要来反对。鼓吹与反对，用研究态度平心讨论是好的；但漠视和排斥是不好的。

这关于种族前途问题漠然视之，也不鼓吹，也不反对，非开通公民应有的态度。

然而高压手段，或类似高压之不自由的非理性的指使宣传，也非适宜。何以故？以简字问题为喻，今日在朝者赞成简字，明日在朝者也许反对简字，当其在朝发令，何尝非为国家造福设想？然而在朝在野均是“人”耳，并非圣贤，亦非神仙，难免为俗见所囿，偏见所蔽，况且在朝者未必是对于中国文字问题、普及教育问题有深切认识者。若只逞一己之私见，不事公开自由之讨论，今日之所提倡，也许就是明日之所禁止，阁臣换而成命马上收回，朝三暮四，太不成体统了。

节育问题亦然，而一般对此问题之成见特别多，特别牢不可破。惟有公开的、自由的、理智的讨论，才可寻出为国家种族幸福之真正答案，不得以当权党派之私人意见为转移。当局也许赞成，也许反对，而其反对与赞成莫不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试想，假使某主席某局长反对节育，其所言之“理”所

持之“故”，由那里得来呢？也许是纯出偶然的偏见，也许向来就不曾对此种族问题加以透彻的研究，但也许所言之理所持之故，皆由平日报章杂志某篇文章得来。然则报章杂志没有公正的自由的讨论，局长所言所持，理也不成理，故也不成故了。

于是我要说几句话。在今日反对“禽兽能言”，赞成“制礼作乐”，提倡“旌表节妇”之文武官员当权之日，尤要说几句话。

节育问题，根本不是生育多生育少的问题，乃是我们愿意做生育主人或生育奴隶的问题。生育由我做得主，谓之生育主人；不由我作得主，谓之生育奴隶。父母能节制——非绝对制止——生育，使与母亲伊朗、家庭经济、儿童养育相调和，便是做生育的主人；父母生也没办法，不生也没办法，听天由命，使妇女成一部生育机器，便是生育之奴隶。

节制生育之意义，是节制使多寡得中，迟早适宜。节育问题之赞成与反对两方面，根本非生育多生育少的问题，是对生育之多寡迟早，距离之远近疏密，愿意有办法及愿意无办法之两方面。新婚夫妇一时情势不许有儿女负担而非生育不可，就是无办法；母亲一儿未断奶一儿又怀妊，十年生八个，甚至讨厌儿女，而仍不得不生，也就是无办法。

或以逆天为言，然制天非逆天。洪水亦是天，灾旱亦是天，然开浚河道，多种树林，以制旱灾，未必便是逆天。霍乱亦是天，鼠疫亦是天，不饮冷水防霍乱，种牛痘防天花，未必便是逆天。人类文明之进化，在于以人制天。以人类之聪明征服自然，是西洋文明的精神；“天实为之，奈之何哉！”是东方文明之精神。

凡人类知识所未及所不懂者，皆托之于天。旱灾缺乏雨水，

无知识者称之天，有知识者认为是斧斤不以时入山林之人为结果。鼠疫无知识者认为“天”，或降诏罪己，或禁屠禳灾，有知识者知为虱子作祟。天乎天乎，天实难做。

中国社会未得科学洗礼，对于生育也是不懂，认为神秘，而凡不懂，凡神秘者皆是天。所以以人的知识节制生育便是逆天。

天生萝卜而人酱之，天生猪肉而人熏之，天生甘蔗而人榨之煮之炼之。必欲顺天，酱萝卜，熏火腿，精炼白糖，皆逆天也。必不吃萝卜、火腿、白糖而后可。火腿白糖失其神秘，食之便不逆天，生育失其神秘，节育也便不逆天。必欲顺天生育，必使人类生育与苍蝇猪狗生育一听天命而后可。

节育于西方是事实；非理想。五十年前西方五男八女之大家庭今日已不见，可以证明节育已成普通的事实。

谈生育问题者须诚实，勿自己实行节育，做文章劝人勿节育。谈生育问题者须脚踏实地，须设身处地，为月薪十五元，年三十岁已有五儿及再生五儿之希望者设想。勿高谈阔论也。

谈生育问题者须为穷人设想，须知上海工部局报告去年慈善团体收埋路旁弃尸达三万余，平均一日有一百左右。也许节育不人道，而生下小儿未能养育使之夭折，也不见得如何人道。使小儿不夭折而挨饿受寒，向垃圾桶觅黄菜尾，也不见得如何人道。

富人不配谈节育，年未及三十不知父母养育儿女苦况者亦不配谈节育。

富人不必节育。何以故？一则无必要，二则富家无子弟无少爷无荡子，则无人破坏其家产，变卖其古董，无兄弟互打官司，所取于民者不易还之于民。故富家子弟愈多，官司打的愈

热闹，家产拆的愈神速，灭亡愈容易，国家之幸也。

中等人家及穷民须节育。中等人家自称知识阶级，自称优秀分子。每侈言，知识阶级若不生育而使穷民繁育，非社会之福，何其不要脸耶？优秀分子皆出于农村，非出于城市知识阶级家庭也。种族之强皆赖农村子弟时时入了城市，以健全血统代替城市衰败种子。城市种子第二代尚可，第三代便不大行。

穷民也须节育，使节制有度。穷民能生而不能养，亦非国家之福。然一提倡设立宣传节育知识于穷民之机关，马上又有知识阶级出来反对。

夫中国城市社会之昏者、聩者、痴者、聋者、懦者、弱者、痨病者、神经者、性狂者、阳萎者、依赖者多矣！何若多繁殖此种子孙而称之为国家之福乎？

二千年前柏拉图在《共和国》里做一篇优生学辩，谓我辈养人不如养马，今人思想犹在二千年前柏拉图之后也。社会主义也好，非社会主义也好，对生育问题，总不应以其神秘托之于天了之。

（《宇宙风》第 13 期，1936 年 3 月 16 日）

吃草与吃肉

近来在编纂一本中文字典，觉得心情平静得多，省了多少是非。因此感觉做学问工作如吃草，做文人时论如吃肉。

编报纸，做时论，评时事，正人心，息邪说，比较含有人与人之接触，必有仇敌。做学问，做考证，考经史，编字典，自然而然少是非，而且自有其乐，寻发真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两种工作都重要，但须各凭其性情而行，不能勉强。

这个意思，可扩而充之。世上只有两种动物，一为吃草动物，包括牛羊及思想家；一为吃肉动物，包括虎狼及事业家。吃草动物只管自己的事，故心气温和良善如牛羊；吃肉动物专管人家的事，故多奸险狡黠，长于应付、笼络、算计、挟持、指挥……

前者，如学人，发明家等，只对学理事物有趣味，而在社交上却常要羞答答；做委员，喝听差都不大行。后者如刘邦朱元璋一类英雄豪杰，用兵用将，料事如神，而对于子曰诗云，一听便头疼，糊里糊涂。

也许有健全的天才，治学与治事都好，如曾国藩。然而曾国藩于治学方面，除了做做古文，学点腔调，哪里有什么发明与贡献，可与戴东原、王念孙相比？

食肉者搏击食草者，食草者也常藐视食肉者。思想家一方羡慕事业家，一方又看不起事业家。雀鸟在树上啾叫，一方是自鸣得意，一方也是笑鹰鹯搏击觅食之苦。他觉得拾得菜子吃吃，饱腹时吟吟唱唱，也自有其乐；追逐搏击都未免无谓。

世间食肉之徒，偶尔读两本书，就在书中觅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禄，哪里是真正懂得素食之味？学问兴趣他们是不懂的。偶尔出洋，偶尔留学，第一目的就是看准学位头衔。这于他是有意义的。他所读的不是电气化学工程，是政治法律及大学管理法，读政治法律回来可以当议员委员，高官厚禄，养父母，给妻子，并不是在研究政治学说学问上做工夫。

袁中郎描写此种人心理极好。"吏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无才，但觉官有无穷滋味，愈劳俞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尽，不穷其味不止。若夺其官便如夺婴孩手中鸡子，啼哭随之矣。"（《与张幼于书》）此语便含食草者对食肉者的讥笑。观袁中郎与吴七札，便可知他觉得食肉之苦。

所谓食草者对食肉者之羡慕，是如此的，他始终不懂这样闹忙有何意义。做个委员科长局长，在大会上自鸣得意的报告，本年度统计过多少别人所做的事业，填过多少别人修桥造路的表格，通过几项令他人去执行的议案，阻止过多少别人的活动，摧残过多少别人的事业，破坏过多少对方的计划，扣了多少他人的钮扣——报告完毕，扬眉得意下台……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想这类专管别人家事的工作，专报告他人的活动，通过叫他人施行的议案，其意义还在一个木匠做一个木盒之下。但是食肉者不让他管别人家事，心里就不高兴。

食肉者也轻鄙食草者。"议论空疏"、"阔论高谈"、"咄咄书

空”是文人之罪恶。而文人常也有令人轻鄙之处。

食肉者对文人表示轻鄙，非搏击文人时，而是豢养文人时。此种豢养文人，我想仍不是真正读书种子，是借食草之名求食肉之便，还应该归入食肉类去。他们一旦得意，仍善于互相倾轧，弄权舞弊，作威作福，恃势凌人。

“文学无用”之说也是对的。革命是干的，不是谈的。打虎就得上山，站在高楼绮窗前高唱“打啊！打啊！”我总觉得滑稽。声势愈凶猛愈形其滑稽。他为什么不上山去？我老是问。所以高谈革命者，我根本就把他归入食肉之类，他是以食草之名求食肉之便。

站在绣阁绮窗前喊打虎之人笑别的站在绮窗前而不喊打之人，那叫做滑稽。站在绮窗前而不喊打者笑别的专在绮窗前喊打虎者，那叫做同情的幽默。他好像说：你只能喊打，而我充其量也只能喊打，你我都只能喊，然而喊是无用的。打而不喊者上上；打而且喊者次之；不打亦不喊者居中，有自知之明；喊而不打者中下；自己喊而以骂别人不喊为能事者，斯为下矣。

据湖南人说：山有大虫，攘臂挽弓而上山，湖南人也。关起门来，登楼高呼，湖北人也。在玻璃窗内，算算这张虎皮值几两银者，山西人也。在高楼绣窗前对老虎喊着“来嘘！”姑苏人也。在绣窗前骂他太太为什么不去打虎，在他太太头上消耗其所有的豪勇气力者，××也，我说。

（《宇宙风》第14期，1936年4月1日）

《游山日记》读法

我读舒白香日记，喜其文笔闲散，甚得日记体裁，因劝亢德把他翻印。本想略加批注，以明私人好恶，而时间不容如此做法，只好改写一篇读法。然而绝对非摹仿谁何，闲人不必瞎猜。惟吾既称此书足为日记模范，亦应说说其为模范道理，一则可以指出要着，二则可以防入迷途，并非叫人囫囵吞枣把此书整个奉为理想杰作也。

日记所以为贵，在私之一字。论文是写给大家读的，尺牍是写给一人读的，日记是写给自己读的。论文材料是天子王侯部长科长之事，尺牍材料是朋友借贷感兴抒怀之事，日记材料是朝夕会谈中夜问心之事。故论文公，尺牍私，而日记私之又私。

然就范围言之，日记广于尺牍，尺牍又广于论文。论文谈大不谈小，尺牍日记大小皆可谈。小之又小者，日记可以列入。在尺牍，非至亲至友便不相宜。举例以明之，随意臧否人物，叙述曲直苦衷，可以入尺牍日记，而不可入论文。天池寺牝犬求交，雄鸡守节，今日吃豆，明日吃藕，系小之又小者，可以入日记，而非至亲至友便不宜入尺牍。

故论文只谈要紧事，尺牍可谈要紧及不要紧事，日记并可

谈最不要紧事。惟有好的尺牍写来必似日记。谈不要紧事，方是佳翰；写无事忙信，才算知交。牝犬求交、雄鸡守节材料皆可收入尺牍，便是尺牍圣手。至牝犬求交、雄鸡守节竟能运用入论文，斯为文章大家。孟子鱼与熊掌之喻，小之又小，便是如此随手拈来。

论文能大不能小，日记尺牍能大能小，故日记尺牍范围比论文广。故能写好论文者，未必能写好尺牍，能写好尺牍者，必能写好论文。是故教小学生作文，只须教写日记；日记做得好，能小能大，能叙事，能描写，能发议论，论文可不学而能。

此书有小有大，有记蚊记汗，亦有论佛论道。有叙事，有回忆，有会话，有自省，有骂和尚语，有敬樵夫语，有嘻笑怒骂，有巧譬罕喻，有透彻议论，有幽默风格，所以称为模范。而所最贵在幽默风格，于正经中杂以诙谐，闲散自然，涉笔成趣。

姑就其小而又小者言之（卷六页一）：

> 茂林阻雨，留三日始还。尚余藕粉少许，纸数幅，贻之；尔后并纸亦竭。去年贫无泞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吾行箧惟纸颇富，今可谓锥也无矣。

此不是怎样了不得文字，然正是学生作文应学文字。末句似重叠，然正是其自然处。

雄鸡守节、牝犬求交事，初见卷二页三：

> 诸寺多畜一雄鸡，雏而入山，当不知有牝鸡之晨。天池独畜一牝犬，老矣，亦不知有牡，是境可修心之

验也。

到了卷六页六：

天池雄鸡忽无疾而毙，老僧为诵《往生咒》，荼毗而瘗之后山。予戏作挽词云："伏维鸡公……"

隔日丙寅所记是：

山农有欲以伏雌饷我者。素性不喜为口腹杀牲，比曾笑言如不可却，则留作公鸡雏妾，不谓鸡公立时死。西辅疑其命犯孤鸾。予即以为此殆如柳翠前身，虑红莲毁戒体耳。

到了卷八页四，作者自毁"境可修心"之论：

丙子……竟有一牡犬求偶于寺，时时喧争。命逐去而阖其扉，扉又以与台憧憧，不能久阖，物固以类聚者哉。吾初谓天池牝犬不知有牡，乃竟不然，殊自悔誉过其实。今始悟乐道人善，乃谓之益耳。

全书以议论言，当以卷八丁丑条，页五至七《庸人颂》为第一。此盖古往今来骂道学第一篇杰作，与袁子才《答杨笠湖书》媲美，真可谓尽嘻笑怒骂之能事了。文长，兹不录。

以罕譬言，当以卷六页九丁卯条以寒热喻国脉盛衰为第一，

以卷六页一壬戊条以四时喻贤圣第二。第一条略如：

秦始皇好吃热药，以助火纵欲。其始也亦殊快意，浸假而遂生陈涉之痰，动项羽之火，痰火炽而中风亡矣。唐太宗好吃阴药，故体貌润泽，未尝有疾，浸假而酿成高宗之痿，明皇之泻，赖有徐狄之参蓍，挽回元气……

此真所谓妙语解颐矣。第二条略如：

至若孔子之德……则所谓秋分之际……有似卉木落实，为年来种子，正秋分事也。颜子一间未达，秋分之朝。曾子闻道稍迟，亦秋分之暮……孟子则丹枫黄菊之秋也，风景殊佳，气节则过中矣。原宪清寒，居然十月坤卦也……递降而至于秦皇，汉武，晋祖，唐宗，以及李斯，王莽，刘曜，朱温之徒，苟非酷暑，即是严寒，未尝不生物成物。而炉篝皇皇，宇宙间无宁日矣……

这是罕譬而喻，文字活泼，是吾所谓好文章。

在议论方面，以上几条以外，能发挥独见者，有《不知子都之美无目辩》(卷九页四)，《妓功甚钜论》及《老人不应犹好妓乐辩》(卷九页二)，而后者尤能议论风生，当与袁子才《与朱石公书》《与杨笠湖书》及龚定庵《论私》并读之。

但是以日记论，以小品论，以个人笔调论，全书吾却推

“想吃肉”（卷五页七）“喜夜谈”（卷五页八），及“睡状元冤解”（卷九页四）为第一。议论文属阳性，抒怀文属阴性，在日记中，我仍喜欢小品抒怀自由自在之文，故全书推“喜夜谈”文为第一。以其小品风调最纯熟也。因为特别欲表彰此类笔调，故虽略长，亦抄于此。

予比晓钟动即不复寐，辗转待日出始起，亦不为晏，然生平有坚卧不醒之名，竟有薄暮过我，犹问曾否朝餐者，予亦唯唯不敢辩。尝戏语白厂：“吾属当不睡则醉，不醉则睡；睡与醉，虽有罪不加刑焉。”白厂翻盏大笑，叹为典切。其实白厂未尝醉，予未尝睡也。拙性喜昼夜不寐而长谈，惜世人多忙，谁肯过我？或问“曾见某人？”辄云“彼长睡何由得见”，其不相识者，恶得不信？今试举一二长谈之人以证。吾往初入都，因吴茗香兰雪而识乐莲裳。三子者，或同来，或一二人来，谈辄达旦。往往一人病，二人引以为戒，不复来，然予必往问其疾，则又谈达旦。病者或因谈而愈，辄又悔其相戒也。莲裳比戏语兰雪，与舒白香谈，可以令人死，兰雪则谓予犹未尝读白香小词，乃真令人死耳。三子皆奇才宿慧，声入心通，虽欲不谈，亦忍俊不禁。即此可信，予不睡非难，不谈难，谈亦非难，能使我敢于妄谈者，难其人也。……大空敏绝有鉴裁，以冲度掩其机锋，鲜有知其善谈者。每觞佳客，辄相约一谈。否则虽适在坐，必私语曰，“某某客且至，君可去矣”，其风趣如此。至亲中曾连榻长谈而不厌，

自少至老，未尝笑我渴睡者，则别有西桥姊丈，果泉廉使，及朴园外甥，家从子长德、建侯诸人可证。然则相识朋旧之不屑过我，不肯过我，不暇过我长谈者，相遇虽疏，其过亦不专在我（语案：日记文字至此为上乘）。顾疑我无时不睡，以致传闻异辞，一若区区在世犹未下床也者（所谓闲适笔调，娓语笔调，便是指此种语句）。此睡名之所以重乎？抑果众人皆醒而我独梦乎？冤之久者不易白，故历举同乡诸公之曾久处而长谈者，以证吾梦而常醒，盖谈非梦中事也。脱诸子都复不承，谓予妄证。则予且自疑是梦，正好酣眠，亦不暇哓哓辩矣。

上乘小品，上乘幽默，皆见于本段，而末句"脱诸子都复不承"一转，乃行云流水之笔，不可强求，非才子莫能也。试以此文笔调与周作人笔调合读，便知娓语笔调平淡文章之趣。学者果能夺破古文笔法重围而出，学学亦当不甚难，即使学不像，亦较画"今夫天下"好也。呜呼，吾提倡闲适笔调，有何辜哉！白香之幽默，来得自然轻松，以幽默化其讽刺，斯不流于尖酸。姑举二例。卷一页九：

妙华欲重诣都下，住西山戒坛之太阳洞。谓此洞一虎守门中……心偶妄动，则虎有怒色，若严师之督弟子者……此虎数十年守洞，未尝食僧。戊午春，一道士谓能伏虎，乞居此洞。僧亦惮是役之险，乐让道士。居才五日，戒坛巡山僧过之，不见虎守洞，以为

道力所驱也。入洞相访，则道衣与一足存焉。予笑曰："此虎既善护法，仍旧茹荤，殆亦若萧居士（白香化名）乎？"……猎者：矢不虚发，近诸山皆有获，独黄龙虎不入彀，足见其高纵远虑，不婴外患，惜予留连信宿，闻声相慕而已……（白香曾谓闻虎吼，大慰岑寂故云。）

又举一例。白香高雅，自然觉得俗人可笑，但亦平平温温，不涉酸刻。卷九页三壬午条有煮鹤之喻：

亭午，数游人相过，知客僧延款甚殷。一猬髯蛙腹者叹曰："真好庐山，南北行半日不尽，若种菽麦，何难致富。敝乡之山甚宜树艺，惜宽广逊之。故古人独夸此山。"予闻之甚乐。昔人有酷好鹤而蕃其种者，一贵人见而乞焉，不得已笼献其一，甚有德色。翌日造请，贵人者殊不称谢。其人不能耐，遂自夸鹤美。贵人颦蹙摇首曰："昨已尝试，味反出雁鹅之下，奚足贵耶？"

此段作者以"予闻之甚乐"了之，若在不善用幽默者，便多事矣。不能幽默者始需要辱骂。此种杀风景事书中甚多，而尤以俗僧势利者尤多。卷三页八，甲午条知客僧与行者在清净禅林互骂便是。又卷四页七，己酉条"知客僧忽请化斋，意在化缘"一节。最好是卷八页五丁丑条，描写一些护吏"说官话，唾官痰，著官衣……。亦不屑赏鉴天池，但仰面望铁瓦问曰

'生铁乎？熟铁乎？'……”一段。卷七页三悔不失节条亦幽默。余数例已见黎厂跋。

大概此书不必人人读，问生铁熟铁之徒更不可读，以其读了“全然无事”也。然则谁可读，谁不可读，何为凭准？曰，先读卷八页五丁丑条《庸人论》看看。读此条而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非把全书读完不可。读了得一二句喜者，便可将卷八卷九（尤其是卷九前五页）读完，余随意翻读。卷一亦须一读。至读《庸人论》而觉全然无事者，决不可买此书，免花冤枉钱也。

卷二平常。卷三叙家世亡姊亡兄亡弟事，不觉得有何可取。卷三末，页九，丁酉条，初叙佣仆宗慧甚好，后发议论便觉乌烟瘴气。白香好由小见大，而大处便道学气。真奇怪，中国文人究能须臾不谈忠孝节义否？中国人看了此类文章，习以为常。我以西洋眼光读来，觉甚奇怪。卷四页十《理明则心开》一类文章太平常而太多，大可不读。

卷五页二《天池一雄鸡》条，可见幽默与道学之高下。夫鸡只美矣，称其“五德”便是中国人之道学，最令人作呕。“六德”“七德”（“吃得”与“笑东家吃不得”）便是幽默可喜，到了“八德九德”又是道学。倘非有第六德第七德，便全条索然无味，惟其中插入第六德第七德，便觉得幽默之润饰，化板重为轻松矣。使正经与诙谐相调和，是提倡幽默之意义，及将来中国散文解放后必走之路。

卷五页三至四《文人之事》条，记作者对文章之见解，甚重要。“文人之事，所以差胜于百工技艺，岂有他哉？以其有我真性情，称心而谈，绝无矫饰，后世才子可以想见陈死人生前

面目，如聆謦欬，如握手膝，燕笑一堂，不能不爱，则称之，称则传，传斯不朽。”寥寥数语将一切文章神秘道破，胜过读一部《文章百法》万万。其比模仿者为勒石人亦妙。

卷五页五记见纪晓岚事，称之为“纪丈”。又记其少在乌鲁木齐，他处亦记其少在“塞外”“西塞”归来。书中言其在“恭亲王”“怡邸”事多节。记乐莲裳亦有几条。

卷七页六辛未条第一节，用个人笔调。页七《危峰冷月》条便是所为“遐想”。

卷九页七八，骂僧不骂佛，可见其对二氏之思想。惟学问未到者可不读。大概此老思想观点与袁枚相近，而又确实能谈。莲裳谓“与舒白香谈，可以令人死”。白香自谓人家“不屑过我，不肯过我，不暇过我长谈……其过亦不在我”。今白香长睡地下矣，然得黎厂、海戈把他校点，知堂先生给他作序，我给他作读法，亢德给他印行，而倘使世人仍旧多忙，大家不屑读他，不肯读他，不暇读他，而聆白香夜谈，其罪当亦不在黎厂、海戈、知堂、亢德及区区也。但勿以“竖臣不醒”之罪加白香，则幸甚矣。

（《宇宙风》第15期，1936年4月16日）

《字林西报》评走私

华北走私问题已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未有的新式侵略，其方法之离奇，与态度之腼腆，已越出一切古今中外邻国的正常轨道，更不必说什么两国正在大谈“亲善”、“睦邻”、“缔结邦交”的时期了。呜呼奇矣！想不到“邦交”如此缔结法子！一句话说，就是以一国的武力取犯法的手段去破坏邻国的法律，《字林西报》早已讥为非大国应有的风度。又说一句老话，大亚细亚主义，若要建造在浪人行径的基础上，终必失败的。日本近来天怒人怨，失了全世界的同情，就在这等地方。日本过去的伟大，已受了这种的污点，彼邦人士，当有言之痛心者。他人我且不去管他，单看我们自己；我正在注意国中大报对此事的反应，犹如医师注意病家的脉息。在这一点，无论新闻编辑，或是社论气魄，都教我失望，脉息果然不好了。遇到这种国家命脉关头，还是托词保全邦交金口不言的时候么？果真说说，指正邻国的得失，难道报馆就封闭不成？上海外报大吹大擂，登刊照片，而中文报纸，不但没有有力的评论，没有特约通信，就是人家有了通信，也是过两三天，才翻译出来，藏在第几第几张地位，连中央通信海关当局报告这样重要文件也不加编辑，照例转载，列入“本埠新闻”，直至事情闹到国外去，才有列入第

一版或评前地位的资格。难道民智日开，舆论日益颓丧，是合理的现状么？我读三月十二日《字林西报》社论，见其能持公论，特为译出于左，一则可见外论之一斑，二则也可以做中国报界一个榜样：

多田中将离华时评论中国时事，强项干脆，正如其人。在一方面，正可以助我们了解报称冯玉祥对伦敦逐日驿报记者的谈话。多田氏称冀东并无所谓走私，因为输入货品已经纳税与冀东当局。也不必看看冀东“独立政府”所订的税则如何（这税则由多田的谈话可知是有利日本的），我们即可指出，冀东当局之独断独行，藐视国法，已得日本军人代表的批准。在日本羽翼之下，托词力谋远东的稳固，中国领土又给侵蚀一块去了。本报向来排斥武力抵抗日本的论调，因为这种政策只能增加此国百姓的苦痛。然而假如冯玉祥急得没法，想要抵抗，终是情有可原。南京政府迭次要求日本明说日方对于中日合作的条件，所得答复只有极含糊可以随意伸缩的“三点”。同时华北在关东军队武力的怂恿之下，篡夺治权之事，日甚一日。动辄援引《塘沽协定》，未经说明何条何项，以破坏中国海关行政的统一行使职权，而为所谓“独立”运动之发展大开方便之门。

本报社论早已指出，华北中国当局所处地位，正如一只禽鸟受毒蛇的催眠（实则这也不单限于华北）。那只鸟不动，青蛇只在那里弄舌装势；只要鸟一动，或

是相逃，或是反啄，那条蛇便把他一口吞下。当其时也，小鸟若敢抵抗，自然是罪大恶极，不待细说。冯玉祥一口不小心，稍微表示抵抗之可能，马上就加以“排日”之罪名。由局外人看来，贻害日本，辱没该国外交地位，令人难于取信日本外交官的甘言软语者，莫如这种的行径。市井无赖这样挺胸凸肚欺负小民，使人忍无可忍，然后拍拍胸膛得意而去，总要惹路人的侧目。所谓豪杰不是这么一回事罢！一时也许可以幸免，将来定得天诛。

多田现在又说南京政府只消减低税则，走私问题自可解决，这也正合于“何不食肉糜”(lucus a non lucen do)的原则。说来倒也巧妙，且与彼辈向来的行事方法相符。先是禁止海关行使其合法职权制止走私，继则无耻的滥用治外法权，在日本枪刀押护之下，大批私货络绎而来，人家还得代他受过；此刻又得依走私商人的蛮见，重修人家的税则。要是还依据中国海关独立的原则来辩这些废话，未免太不值得。美国国务卿赫罗新近声明关税提高是一种弊害，话固然对，但是且问，假如有一国默许利用武力以阻碍美国政府在加利福尼亚省的行使职权，然后在大批私货由散凡西斯哥进口，运入美洲大陆，陷全国国际贸易于全盘停滞状况之后，提出条件，教华盛顿答允减低入口税则，不知赫氏之感想当为何如？Borah，Pittmann，连 Upton Sinclair 的口辩天才，恐怕也不足以形容这种的局面。

多田来华不久，兴味浓郁，又回国去了。他带回东京的夹袋里定有一番新奇的国际伦理论，可想而知。

（《宇宙风》第18期，1936年6月1日）

古书有毒辩

现代青年的保姆太多了，保姆多就难免养成良医之子多死于病的症象。现代青年的良医也太多了，谁都要训告他，禁他读这个，劝他读那个，甚至青年自己也好做良医，未满三十的时候就欢喜做文章，自居堂上，排八字脚，做老大哥，禁止其他青年子弟读这个，劝告其他青年读那个。普天之下，莫非保姆、良医、训育主任、检查委员。我也不懂他们一班遗老劝告的是什么，遗少禁止的是什么，只觉得大家好干涉他人的事罢了。正如十三妹所说：“我的少爷，你酸死我了。”富家子弟爬上树，就有慈母嚷道：“你快下来，别跌伤了！”走到水滨，马上有保姆一把给扭回来说：“仔细，你别跌进水里去！”结果弄成一个身不出门庭，目不睹市井，树既爬不上，沟又跳不过，太阳晒不得，野风吹不得的文弱白面书生。太阳一晒，马上昏眩，野风一吹，玉山立倒。呜呼青年！

我倒不这样想。古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西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以前罗斯福（非现任美国总统）教他三个儿子，就是大热天带他们出去走崎岖的山路，攀山越岭，跳涧升木。大战以前德国海军，必待烟雾蔽海风浪接天之时，才开出去大洋操练。个人也曾在北平西山看见一对德国夫妇教一个四五岁小

孩由石上跳下，下山时，一直在后赶他跑，跑了跌，跌了又跑。在教育上，我想道理相同，攻乎异端，斯利也已，怀疑怀疑，一直怀疑。皮肉筋骨是可以训练的，跌儿回伤也不碍。文明人牙齿都蛀，就是因为吃的奶油白面做的点心，入口酥溶，牙齿无用其技，所以任你如何刷牙，还是要蛀。现代父母多叫儿子啃骨头面包头，就是这个道理。

古书有毒，也不过一二革命领袖一时过激的话吧。不想这久乎受保姆娇养看管的青年，头脑简单，便信以为真，视为一种天经地义，毒在那里，毒到那里，也不批评，也不思考，囫囵吞进去。我就不信青年这样容易受人欺负，这也是保姆太多之所致，少爷症象已造成了！古书诚不能无毒，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么？中国用得着这种读书人么？这样读书，不是洋书也有毒么？所以毒不毒，在人善利用他是非鉴别的聪明，不是把古书束之高阁，便可自谓清白身体。古书有毒，则胡适之早已中蛊，梁任公早已疯痫，周作人、周树人早已七孔流血，郑振铎、傅东华虽未能撰著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抄抄唐宋传奇，毒虽未刻，亦当呻吟床褥矣！若谓青年学力未定，何以知周作人、周树人十几岁读古书时有什么学力，又何以知今日青年皆不如周作人、周树人，必不如周作人、周树人乎？

且使古书有毒，西洋古书除苏俄革命以来之文学未必就无毒。矛盾还多着啊！人家也有布尔乔亚呢！然则有毒无毒何以

辩？何以西洋旧小说 Le Cid 可以翻译，中国旧小说《七侠五义》便不可翻印？何以 Don Quixote 可以放心阅览，《儒林外史》便不许寓目？何以柏拉图可以赏识，孟子便不许涉猎？苏格拉底可以奉为典要，孔子便不许说些人情天理？何以 Clarissa Harlowe 可以讽诵，《红楼梦》独不许经目？夫柏拉图与孟子之雄辩一也，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正名一也，Clarissa Harlowe 与《红楼梦》之缠绵伤感一也，Don Quixote 与《儒林外史》之滑稽讽刺一也。呜呼！孔、孟、吴、曹何不幸而生为中国人，柏、苏、利查逊、索蕃提何幸而生为洋大人！孔、孟、吴、曹又何不幸而生为现代中国人之祖宗！

以毒而论，义侠小说之毒一，在提倡忠孝节义（未知是否，代为持此说者揣摩而已）；言情小说之毒二，在读者学宝玉好吃女人胭脂；诗文小品之毒三，在吟风弄月。然吾谓三毒皆不足为患，何以故？现代忠臣孝子本来无多，绿林豪杰今日学生生下来就少有这副骨架，其不足为患一。世上本来没有许多女人肯让你吃她口上的胭脂，偶而有之，也不致妨碍读书功课，其不足为患二。现代人风也不大会吟，月也不大会弄，风吟不来，月弄不得，何足为患？虽然风不因你之不吟而不吹、月不因你之不弄而不照，即使果然被你吟成弄到，也早已变成“可爱的春天”了。即使“可爱的春天”是前进的，“吟风弄月”是落伍，风自为风，月自为月，你自为你，我自为我，本无中西洋风中西洋月之别，偶然吟吟弄弄，也不见得就伤你的盛德。你有姐姐妹妹，也可以放她们到后花园跑跑，到大公园走走。不一定大家关在深闺里，你们兄妹才保得住你们的清白啊！

（《宇宙风》第 18 期，1936 年 6 月 1 日）

中国杂志的缺点

——《西风》发刊词

《西风》与世人相见在《宇宙风》之后，而发端在《宇宙风》之前。我每读西洋杂志文章，而感其取材之丰富，文体之活泼，与范围之广大，皆足为吾国杂志模范。又回读我国杂志，而叹其取材之单调，文体之刻板，及范围之拘束，因愤而有起办《西风》之志。所愤者何？一、愤吾国文人与书本太接近，与人生太疏远，几乎书本之外，不知有所谓学问。敷陈事理多，而观察现实少，发挥空谈多，而叙述经验少，时或标榜主义，以为争名角胜之场，虽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于社会人生无与也。至于宇宙一大学堂，社会一大典籍，全然不看。尝闻有经济学博士，学成归国，或询以西洋经济现状，曰，吾念书太忙，未暇研究；又询以中国经济问题，曰，吾初回国，尚未留心。文人如此，杂志何能脱离抄书窠臼？故中国杂志长于理论而拙于写实，其弊在于空浮，而杂志反映人生这功遂失。二、愤文人之架子十足，学者之气味冲天，搞翰濡墨之际，摇头摇腿，吟哦自得。加以文字传统之束缚，道学传统之压迫，使行文者全失自然之神趣。好高骛远，不着边际，少有由衷之言，心得之见。据

笔直书者，文字既然呆直，思想更加因袭，少有突破重围，发为独特清新之论者。故中国杂志格调高而神趣失，其弊在于板重。三、愤文字成为读书阶级之专技，非文人决不投稿杂志，事业家不为也。于是撰述乃成书办吏役之专长。西洋书报撰著者银行家有之，陆军大将有之，探险家有之，狱吏狱犯亦有之。藉是西洋杂志范围亦随之而广大。在中国既以一切撰述委之文人，而撰述亦遂成一艺无成之文人之逃荒地。无怪乎社会初则以撰述委之文人，继则以此而鄙视文人之撰述。吾编《人间世》时，提倡“特写”，提倡“西洋杂志文”，即本此意。然非另办杂志，专译西洋杂志文字，不足以见中西杂志文字与内容相差之巨，而为将来中国杂志辟一蹊径。其未办《西风》者，非虑西洋杂志缺乏精彩文字供吾翻译，特以精力有限，筹备未熟耳。兹得黄嘉德、黄嘉音昆仲，赞成斯旨，乃从旁怂恿出而主编，此今日《西风》之所以出世也。西风东渐，不自今日始。翻译西洋报章，林则徐、魏默深早已提倡在先。特今日所见翻译西报文字，又皆犯格调太高之病，不曰介绍西洋文学名著，便讲西洋政治经济，而对于西洋人生社会家庭风俗，不屑谈亦不能谈也。长此下去，文学何能通俗，杂志何能普及，终成文人之玩意，你读我的我读你的而已。吾辈同人，向不知西洋文学为何物，独于西洋人生之甘苦，风俗之变迁，家庭之生活，社会之黑幕，谈之不厌，且谓从此可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较之高谈阔论“巴尔干形势之鸟瞰”而不识巴尔干地图之流，其志趣之高下为何如也。

（《宇宙风》第 24 期，1936 年 9 月 1 日）

临别赠言

朋友送别，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寄回发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不过题目太大了。为今日中国之民，离今日中国之境，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不过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千绪万端，何从讲起？言简意赅，亦难完作。只是题目虽大，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札中语）。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国决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处于今日廿纪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总是不适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廿世纪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愿。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忧忧乎其难矣。事至今日，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谁能负起救亡大策，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谁便须滚蛋。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与其政府独负，不如与民共负，后来国家荣盛，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

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当尊重些。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

（一）文学——提倡幽默，本不必大惊小怪，然偏有惊之怪之者。不过平心而论，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与悲壮，激昂等同为世界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没有不承认的。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但根本上反对幽默，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由道统遗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而易以较诚恳，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女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摹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末的新，想后仍是那末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的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

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的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重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

（二）思想——中国今日举国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夸大狂，或忧郁狂，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可虑的，是失了自信力。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也都因国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旧交汇，青黄不接所致。总而言之，乱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个而论，思想之健全，总不至如此乱嚷乱喊，稍有自信，也不至如此。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能达斯能勇。对付非常时期，诚然非坚

毅不可，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唱唱两声“坚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来。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乐观。号为“革命”，“前进”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说他落伍，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否认中国祖宗，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一味复古，也只是黠者之丑态。在这种各走极端，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无论维新与复古，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宽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因此令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说“政简刑轻”，使人人得安居乐业，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大国风度是如此的。中国要大家活下去，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硁硁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无论那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当留此宽大二字，否则一时炙手可热，日久必无成就。

关于思想，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就是统制思想。不要以为德国俄国实行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们便应该赶时髦也来统制思想。统制思想之祸莫甚于八股，而依我的定义，凡统制思想都可名之为八股。八股驱天下士人而置之笼中，流毒千余年（包括一切科举），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于千余年之后，闻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后，复欲以新八股自茧茧人，真可谓见道不明信道不笃了。统制思想政策行后，其效果亦必同于旧八股，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

沉寂而死亡。在这普遍的死的沉寂中，自有读书干禄之徒，为讨政治饭碗，受你笼络，亦自有一二宁舍富贵不肯干禄之书生终笼络不来也。

廿五年八月十四序于横滨舟次

（《宇宙风》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抵美印象

水中鱼族，说不定与人间一样，也有争权称霸那类蠢事，妄自尊大，满想教化人家。说不定水中与水面上一样，也有种种破坏，也有大鱼吃小鱼之强暴行为，也有彼此讥笑蔑视与侵略野心，也有人间一切争斗纷扰，而海底外交家与日内瓦诸君子一样，都睁目瞪眼，不能得一结局。二者之间，即有不同，我想亦只鱼族贫穷饥饿较少而已。

我此刻作文，乃在本薛凡尼亚州的友人家中。此间地形起伏，风景殊佳，且亦新奇。诸物均呈绿色，美丽，与和平之象。此间有榆树槭树以及其他绿叶成荫之树，而且还有，你能置信么，咏，还有袅袅的柳枝。然这些都如此美丽新奇，而不本位化，我直不能于这些上面起任何联想。此刻我极思看见些能使我忆及故国与幼年之事的事物；而亦是此刻我才悟出英国人为何随时总手提阳伞。比方我此刻身居此间，不能随时可见大块石头了。我看风景无石作点缀，直不能算风景。此间虽有大块石头，却全给树林蔽住；树林大石，往往不能兼得，至少此间情形，确是如此。那 Delaware 河给我以一种亲切之感；只是当你经过浩浩乎的汽车路，而你一眼瞥见一二柳树，如弃妇那样颇不自然地站在那里，那时你心总得突然一跳。他们只是长在

那儿，孤苦伶仃，没人理睬，可是还兀自摆动纤腰，随风招展飞舞。所飞之舞自是温静和穆之舞，而不是jazz，这个我想便是美国柳树不受人欢迎之所以。

真的，我今身在美国了。在苏俄人士看来，美国是罪恶之渊薮，亦是快乐之福地——资本主义使它成地狱，机械文明又使它成天堂。

美国丰衣足食，诸事安全；美国真有和平；我已说了，美国又有绿色美丽之原野，有产乳之母牛，有富于诗意之蓄鸡农场，有榆树槭树，甚之亦有柳树。总之美国物质方面，足使人们快乐一生。不错，美国有失业，有生产过剩，只是失业与生产过剩，其本身并无罪过。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去过剩生产，而又大家多少都有点闲工夫。你不致于去阻止机械之进步罢，而机械之进步便使生产愈加过剩，人类生活愈加悠闲，同时人之工作时间减少，而玩耍时间增多。事实上，机械总必使人人成为有闲阶级，能于上午工作，而于下午玩耍。如今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机械之数量总都日渐在增多；工作与闲暇之分配二点，总将同为一种主义所注意之焦点。而“闲暇”必成为各种文明的中心问题。可见机械文明并无多大错处，而美国就站在这个文明的最前头。

我前说美国的物质基础足人们快活过一世。她有丰衣足食，她给人民以安全，一切升平气象遍全国，此外她还有可爱的槭树与榆树。只是我想你我得同时问一声：“然而此外还有什么呢？”美国人安乐么？何物使他安乐的？他又是何等样人？因为左右人生的，毕竟不是一人的财富，而是他的为人如何。

实则以安乐与否来作一国文化高低之标准，是不妥的。天

下没有一种文化能吃得消这个标准。如果文化高低必以安乐与否来衡量，则 Balinese 文化将比中国文化或是美国文化来得高了。然而事实上何尝是如此呢。我们总须近人情。我们总是需要科学的。我们总得须有升降机，自动梯，硬木地板，真空拭尘机，良好的艺术陈列所，博物院，以及星象院；然为建造这些良好的艺术陈列所博物院星象院而慷慨解囊的，除那些鄙俗却还慈善的大富家以外还有谁呢？美国这许多研究所古物陈列所，只是精神与物质，科学与财富间妥协的结果。此间科学家之还能活着工作，乃是由资本家喂养着的；科学家如果一旦发迹，大受社会人士崇拜时，便可娶个富翁的寡妇做老婆了。总之，我们总得在这个惨苦世间中挣扎下去。我看呢，美国未必是罪恶的渊薮，亦不准是机械文明的福地，却只是个尚可过得去的，而将来也许能使人们更可安乐的文明而已。在此间普通一般人，只要知道如何去享乐，他总可享到比从前比别处来得美满的物质享受。如果你要称我做粗鲁的唯物论者，由你罢；只是我决不会像印度圣人那样，头上顶着牛粪那么一个东西，大挥拳头，想要打倒机械。无论如何，我总喜爱吃一杯果子汁，而不愿吃由道边潭中取来用一只木碗盛着的污水。

其实你也不能真的称我做浅陋的唯物论者；我只希望我能快活过日，同时看看美国人如何快活过日而已。我尝说最能叫你享福的文化，便是最美好的文化。只是你别误会你到 Empire State Building 去，升降机直送你上云端，就是享福了；或是到 Radio City 去，你直降到地底深处，你是享福了。这些并不是我所确指的享福。这种开心玩意儿是只能给小孩子，一般普通的美国人，庸碌的无线电听众，影戏院顾客，有航空热者，以及

一般速率竞赛家去玩玩的。速率竞赛家于一小时驶行八十英里中所得的开心程度正复近乎小孩行径。一般普通的美国人亦与小孩一样，总得要有新花样玩玩才得劲——Radio City 也好，马将也好——过了不久却又玩厌了。一般普通的美国人非要有开心可寻不可，只是这些"开心"离"欢乐"已远，离"安福"更远了。我看一般普通的美国人多不知道怎么去享福。如果把他的汽车拿去，把他关在家里，又把无线电机关掉，他便要和笼中的猴子一样不快活了。

美国文明真是不全惬意的；只是世间有哪个文明是全惬意的呢？美国人士，殊欠沉静；即不然，他们在人前总不敢显示沉静。这亦是事势使然，无法可免。种种纷扰奔波之动态，凡事作开路先锋之传统性，每年由中欧迁入之移民，这种种情形使他们生活不能沉静。迁入之移民，风俗习惯均与美国人民不同，美国真是如何能去融化他们，使彼此不致隔膜呢？美国恰如民种大炉中的八卦丹；也许百年之后，这八卦丹练得澄澈透明。凡事总需充分的时间。我们信口评议文化，一如小食店随意小酌，要吃什么，什么便来也者。其实在文化方面，这个是做不到的。你们不想中国文化成为更合理更舒服更能贴切人生有更多自由的文化便罢。不然，你们得承认美国在日常生活方面，在日常所作之事方面，在社会观念方面，在对待儿童与动物的态度方面，在为人屹然自立方面，在待人接物的礼貌方面，等等都比我们强。这诚然是自灭威风，只是美国一般普通的售票员，升降机侍者，途上过客，与警士店员，都比我们都市中的摩登人士来得有礼貌。上海电车上售票员的举止态度，即孔夫子见了也是要心中大怒饷以老拳的。

此外便要说到美国的德模克拉西精神。这个我是指自尊心与个人自由二端而言。比方就以出版自由来说，The New York Herald-Tribnue 杂志，和从前 Nation 周刊讥评胡佛一样，尽可恣意抨击罗斯福。有出戏甚之讽刺政府机关，呼它为“中央浪费委员会”(此戏讥讽政府之浪费：“中央浪费委员会”计划造桥，惜河太窄，桥太短，而所费太少。有委员曰欲长不难。或诘之，答曰：勿架桥渡河，沿岸造去便是)。我以为这个真是好的。我相信同时亦希望美国自由之传统既如此之深，她将来必不致于变为共产主义者或是法西斯蒂。如果美国人民并不失去嗜爱自由之天性，这自然是不致于的；美国人士总须自己谨慎才好。只是我素深信德模克拉西精神乃属美国人之天性，而我又信改造世事亦必有赖于天性。不错，出版自由殊给统治者以麻烦，只是法西斯蒂与信仰德模克拉西者间之分别，就在法西斯蒂视出版自由为麻烦，因此加以禁压，而信仰德模克拉西者亦视出版自由为麻烦，却只谢天谢地，他们竟有这种足以耀人的麻烦。出版界，国会，其实即是其他一切民主机关，均在为统治者找麻烦。我在他处曾说，统治者与被治间，其情形犹如骑师与马。德模克拉西视被骑之马得有权与骑师讲话，有时亦可加以责问。法西斯领袖却是个蛮横的骑师，兀自根据自己的痴想去逞能，满以为所骑之马理应为所鞭挞，俾自己称雄于世。只是他必得蛮横，不然他不叫做法西斯蒂了。法西斯主义简直看不起民众。我深喜美国的马不爱为所鞭挞。

其实美国的民主政体我倒并没过分尊敬。由一般平民来执政，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发噱。美国的总统选举，直令举国若狂，而又四年一次，适如疟疾。所谓总选，便是民主党与共和

党间，谁最能向人民说谎而已；谁说得高明，便由谁来做总统。此处我只指政党机关全体而言，非指总统候选人个人，因为总统候选人只是个老实君子，奔走全国，为党服务，如此而已。

这些都是人情之常，此外我们还能冀求什么？其实我所说的德模克拉西，是指罗吉斯（Will Rogers）的那一种。我看罗吉斯倒是最标准的美国人，他痛诋衣服装饰，他厌恶白色领结以及一切势利行径，他终日快活，任情幽默。罗吉斯的那种德模克拉西，确是值得有的。即烦劳百把个 Andrew Mellons（美国历任财政部长，一个金钱主义者）去产生一个罗吉斯，亦不能算是浪费。

我看此间人士对于中国事物，愈来愈感兴趣。中国虽则始终不许西洋人士去了解她，甚之还不许游历家观光中国，然而还是无效。中国不善宣传，不喜爱坦白公开。另一方面，日本却每年在美国以千万金钱，用作宣传，甚之听说她还将用五十万金之资，要使美国人相信她是个文明国家，并使人知道他们也知怎样品茗。虽则如此，只是一般美国知识阶级还是同情中国，而厌恶日本。这样，日本人自必非常着急，跳起来说："嗨！真是何故呢？这是何故呢？"这种日本人倒也天真，我还喜欢。此处我愿解释给他们听。比方兄弟二个吵嘴，年幼的那个跑到妈妈那里去，说哥哥侮弄他，并说他先动手打人，而那位哥哥却愣在那里，不作一声，贤明的妈妈自然疑心那小的是坏蛋，因而叱骂他了。而那小坏蛋便目瞪口呆，却还一边走一边咆哮说："嗨！这是何故呢？这是何故呢？"如果我是日本人，我必劝日本外交家不要再玩那套修辞与强辩，而去学点幽默。比方今日《纽约时报》载："日本发言人声称，他们将有九艘兵舰驶往中

国，去肃清反日情绪。”那位发言人真是在把自己当阿木林，亦把全部日本海军当阿木林。派遣九艘兵舰去肃清一种情绪，尤其是反日情绪，未免太呆。以兵舰去肃清火灾蝗虫叛变或是去扑灭一只苍蝇，那也罢了；只是派兵舰去肃清一种情绪，未免使人忍俊不禁。日本的驻美大使如果看到此文，我愿他注意此点，并希望他叫发言人下次不要再说此类发噱的话。此辈满自以为如果九艘不够，四十九艘总可肃清中国人民心中的反日情绪了。“求婚乞爱”，竟然以此出之，是诚奇妙哉！我求老天给日本人一点幽默。

（《宇宙风》第 30 期，1936 年 12 月 1 日）

课 儿 小 记

亢德兄：我是要写海外通信的，因为体裁自由些。伯讦由比国来信，谓已飞书叫琏儿去陪他，云旅中情绪甚好，已劝他写旅中杂感，寄投《宇宙风》。来美以来，奔忙一月，至此始得一点闲情，写此第一封长信。初住笨斯文尼亚省乡下一月，饱享异国村居的风味，饥来园中摘苹果，兴发涧上捉鱼虾，又时来纽约赴会，如此忙了一个多月，才搬入纽约新居……曾在好莱坞勾留四天，容后信细谈……

我现居纽约中央公园西沿七楼上，这是理想的失败。本想居普林斯顿大学附近，因原来我准备本年乡居，同小孩赤足遨游山林，练练身体——多美的理想呵！凡梦都是美的。然而第一没有中国饭店，第二纽约戏剧，美术，音乐看不到听不到，一来往返就费半天——结果又住城市。这与我十年居上海相同。现在打算回国定不住上海——但恐结果又住上海。

诸儿本季不入学，入学也学不到中文，由是课儿问题发生了。内子自己烧饭，诸儿分洗碗碟，这倒是在中国不易做到的。长女如斯到来美才第一次学炒鸡子，你说笑话不笑话？我们一个佣人也没有，只有一个中年妇每星期来两次洒扫房屋及洗衣服（按小时给钱）。但在美国管家极其方便，购物电话就送到，

寄信楼上投入邮筒便了，打电报也拨拨电话机告诉电报局完事（月底算账同电话账送来）……因此诸儿颇得真正教育。无双七点起来就到门外拿牛奶，拿报纸，拾掇房屋，揩拭椅桌，三女相如管倒烟灰，如斯管做咖啡，烤面包，我大约八点起来，吃早饭，看看报上中国消息（颇灵通，每日有AP及UP通信社，及各报特派驻华通信员来电），大约九时半开始和诸儿读书。

和诸儿读书是对的，教字不如和字好。所读者何不要紧，要在如何读法。要教如何读法，只好和他们读。如何吸收字句，如何细揣字义，如何随便删略不读，字义不识，字音不敢断定，如何检阅字典……因为我不对诸儿说《康熙字典》的字我都认识，或是说新字典各字的音读，及京音中入声字的分配，我是全知的上帝。连成吉斯汗何时入主中原，拿破仑死于何年，我都说不知道，并且告诉她们学校教员也不记得。她们不等我说，她们也知道教员是教到那课，看书才记得的，阅卷时有时还要翻书对一对——总而言之，我不是一部百科全书。但是既然大家不知道，只好大家去找。那里去找？这学问就来了。她们知道有《历代名人生卒年表》，有《世界大事表》，有《辞源》，更浅的有《学生词典》。更要紧的是叫她们养成音义弄精确，纲领弄清楚的习惯。拿破仑死于一八一二或一八一五都不要紧，大概他十八世纪末叶及十九世纪初叶大闹欧洲，这要弄清楚。宋而元而明这个顺序是要弄清楚的。平仄四声也是近来才教的，她们在上海念了五六年书，还没人教她们平上去入。最要紧，还在指出书中的趣味，尝尝读书的快乐。

教什么呢？笑话的很，一点没有定规。今天英文，明天中文，今天唐诗，明天《聊斋》——《今古奇观》，《宇宙风》，

《冰娱自传》,《从文自传》,当天报纸!忽讲历史,忽讲美国大选总统,忽讲书法,都没一定。她们各人带来学校规定课本。几种给我束之高阁。一本薄薄的地理,叫她们地图看清楚,余者我担保,回国临时要考时,念两天可及格;此刻念,那时也必忘掉,省出多少时间来念有用的书。而且看电影上各地风景就是念地理。……我的意思是每天一小时和她们讲学问,瞎讲,乱讲,元曲也念一点,《琵琶行》也已念过,李白的诗是按天抄写几首。她们喜欢就选读,不喜欢就拉倒——但是如果喜欢,就是心中真正的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好学"之"好",就是将来一切学问的泉源。下半天是自由读书,随她们去看小说,《宇宙风》,《西风》。

我是落伍的。教她们选读《五种遗规》。内中如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白居易《燕诗示刘叟》,陆放翁《过林黄中食柑子有感》,朱子《治家格言》,吕新吾《好人歌》都亲切有味,文字易明。做人道理也在里头,把做人与读书混为一谈。连《教女遗规》也教的,她们才知古代对女子的态度是如何。好,坏,都可尽量批评。古文,我最喜欢《虞初新志》及《文致》二书所选,因得其"致"便知其味,不至开卷昏昏。

我是下流的。《庄子》与《西厢》同等看待。韩文与《宇宙风》同等看待,而且在我看来,宁可少读韩文,不可少读现代通行文章。教小儿读书,不应离其思想见解知识太远。读通行杂志文进步易,读古文进步难。临名帖得益迟,临朋友来往书札得益速。你们几位朋友来信,不知儿通已让小儿抄写了。凡物取其近则易明易晓。此理常人少知之者,而教育之失败常在此。而且书札到底是真迹,名帖怎样好也已失真,失真则神气

不足，反不如平常张君李君一通手札来得活现。

英文也是下流的。不教名家作品，只同她们念晚报上罗斯福总统夫人每日纪录（My Day，by Eleanor Roosevelt，in N. Y. World-Telegram）——下流的很，平凡的很。所谈无非早晨会什么客，下午到那儿赴会，家常琐屑，天气晴雨，一点也没有高论，一点也没有妙语。例如今日叫她们背诵之句是“车站人站的那么多，火车将开时，罗斯福只得请大家退几步，恐怕车开时，有人碰伤”，及“小孩都在窗外探头”。这有什么文学价值？一点也没有。但是如此英文基础会念好的。我叫她们把这整句的意思，试用英文讲出来，讲不出来再看书，看后再试讲，讲到全句顺口为限。一点也没有分数，没有甲乙丙丁。余者出门，走路，看戏，也乱看乱学，文学乎？不文学也。她们所学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所取材之人生。不把读书时间与不读书时间分开，也是我的目的。宇宙就是一本大书，让她们去念。

作文题目也是下流的。没有救国论，“资本制裁”（此语曾见于商务所编小学公民读本），“自强不息”（上海某小学作文题目）。她们只写日记，一日一篇，范围绝对自由——叙事，游记，议论，私见，回忆，抒情，描写会话，刻绘人物，都可包入，都无限制。奇怪！成绩比学校所教的好。何以故？“真”字而已。今日小学作文写出来何以都是假小儿语？“然而天天玩耍，不顾学业，那么空费光阴，岂不可惜么？”这种千篇一律的陈腐假小儿语由何而来？由教科书来。教科书是大人写假小儿语来给真小孩读的，所以真小孩只好学大人的假小儿语，整个抄入文章里去。上段所引，即见于世界书局学生新尺牍。其给我的印象

颇似厦门真正中国教士祷告时学讲西洋教士的假厦门话，而自命风流。

读者大约以为我发痴了。否则以为林某好发怪论。一国之中，不少教育专家，教育官长，专门委员，积多年之经验，与专科之知识，始定出今日学制来。子何人也？而独持异议！不是教育专家发疯，便是林某发疯。林某疯不疯，无从断定。世上疯人疯事是那么多，智愚贤不肖，也无大差别。林某前日见纽约报载恩斯坦之教育意见与己见相同，而乐与恩斯坦同跻疯人之列。恩斯坦十月十五日在纽约省大学高等教育纪念十周之演说词曰：

"人生及学校工作之最要动机在于工作之快乐，及知道这工作在社会之价值。依我看来，学校最要的工作，在于启发巩固青年这种的灵机。

"这种学校对于教师期望他是此业中的一位艺术家。这种教师应当享有教材选择及教授方法的尽量自由。因为教师也是一样的，受外来的拘束压力就失了他工作的快乐。

"我要反对一种观念，说学校须直接教学生将来应世有用的知识及各种艺能。应世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由学校的专科训练学得来的。(林按：试将社会某成功者加以研究，而分析其成功之要素，有几样是专科训练所训练出来的？)

"此外，我认为将一个个人作一架死机械看待，是应加以反对的。

"学堂的宗旨，应当是期望青年离校时成个调和的人格 harmoniors personality，而不是个'专家'。在某种方面，我想就是预备专门职业的学校也应如此。

“所最要的目标，不是学得专科知识，而是明辨是非及独立思想的普通能力。——

“如果青年由步行体操训练他的肌肉与耐力，他便能做以后任何劳力 的工作。心灵技巧的训练也是如此。

“所以某滑稽家的名言是不错的。‘教育者，学校所习尽数送还先生以后之余剩也。”“Education is that which remains after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he learned in school.”

——见十月十六日纽约《泰晤士报》

十月廿日于纽约

（《宇宙风》第31期，1936年12月16日）

悼鲁迅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 Herald-Tribune 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惟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仅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世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

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彼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水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于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硁硁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

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馋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濛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宇宙风》第32期，1937年1月1日）

自由并没死

因为著作忙，想一气把书写成，两三月未能写通信，心里常常抱歉。常自谓一人聚精会神作一事业，惟贞惟一，颇近一女不事二夫之义，眼中心中，再无容许他郎之余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景此情，吾独知之。所以近日朋友通信，也几乎全然断绝，强为解嘲，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之义也。

来美将近半年，留心事物，也颇不少，如美国文坛，杂志，妇女地位，物质文明，西人对中国态度，美国学堂等。每样题目，能稍得工夫，都可写成专篇，而为环境所限，只好借通信的自由体裁，拉杂谈谈。通信正如谈话，本可成为艺术，然须具有风格，娓娓谈来，始臻妙景，写为艺术，却也真不容易。在中国文字，我于京话仅见之。若假我以余闲，每星期日能写一篇，谈述异地风光，见闻所感，何尝不是佳事。然自知未易享此人间清福也。

昨夜到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赴教授年会，使我深有感慨。（此新学院，近吾理想，事为自由讲学之地，无文凭，无分数。）半夜回来，得一佳句，想奉告国人，曰"自由没有死也！"该会特为表示致敬德国文人托马斯·曼（Thomas Mann）《山城》作者）而设。盖自德国国社党在位

以来，剥削人民自由，统制人民思想，箝制舆论，御用宣传，并艺术与宣传为一谈，混文学与政治为一物，所谓国家主义之国家成一上帝，法西斯蒂领袖誉为救主（德国国社宣传部主任曾播音宣传，称希特勒为下凡救主“God' s Revelation to the German peole” and “their Redeemer”，并命国中善男信女感谢上帝赐他们希特勒），大有不仿明末故事大造生祠不已之势。甚而自由研究精神，科学神圣世界亦为一班在朝小人所侵犯，弄出笑话，为人齿冷（容后补述），真不亚于明末阉党认魏档为爸爸客氏为娘娘之义子义孙。西欧思想，斯文扫地，自由之花，蹂躏无余，真有花落鸟啼红一番景象。

在此情形之下，稍具思想之人，多效儒家故事，收声敛迹，不谈国事，自保头颅。或属犹太种族之名士教授科学家，尽被削夺退职，陷于穷困，不能自拔。稍有本事声望者，亡命外国，如恩斯坦今在美国普林斯敦，Emil Ludwig 现居瑞士是也。也有本非犹太族人，目击黑暗状况，为良心所使，自行流放，散奔英美瑞士各国。近日此类德国教授愈来愈多，所余一班忍辱含垢之徒，为饭碗计，留在大学大讲其亚尔兰种族之天文地理，恭颂希特勒圣德而已。故去年德国某大学纪念，英国大学本有派遣代表参加典礼之习惯，此次一律加以“杯葛”。今年 Goettingen 大学几百周纪念，亦一样抵制。德国科学本为西欧泉源，名冠世界，至今日其盛誉乃一扫无余。若 Goettingen 之数学，本为世界第一，今则 Weyl 流于美，Heisenberg 流于英，使素爱德国之文化科学者，太息流涕，不堪回首。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乃借此机会，设一“放逐大学”（The Univesity in Exile），收集放逐教授，使得继续讲学。故此次年会含有一番悲凉的背景，深

动人心。

托马斯·曼乃属自行放逐之一类，出国后，国社党乃下命“放”之。数年前卜居瑞士。(Emil Ludwig——《华士梦》作者，有商务中文译本——也居瑞士。日前来美，曾与约谈一小时。)此次来美，特赴此会。会的赞助人，几乎美国各著名大学校长都列名其中。昨夜一番盛景，一方由于这样的背景，大家表示向不屈不挠的文豪致敬，一方也由于到场人士崇拜托马斯·曼的著作。托氏的著作我未读，据朋友说是有歌德式的同格，清淡自然，这在德国散文，是很不容易的。他演说时，听众一齐起立，演完时，又是一同起立，鼓掌之声不绝。年龄据说是六十二，但看来也不过四十。英文虽稍带德国腔调，但发音清晰。所谈虽含有对国社党不满的微词，而落落大方，对于人类自由精神三致意焉。两三月前，纽约一家周报 (Nation) 曾载有该氏所著自白心迹之文，题目虽为《斥希特勒之治政》(I Accuse the Hitler Regime)，读来都是满心爱国之至诚，诉述他何以初静默不言，又何以最后不得不言，及其心灵之苦痛。这文是答鲍恩(Bonn)大学教授会议褫夺他学位的信，文前冠以鲍恩大学褫夺他学位的短函，寥寥数行，但读来也真足令人喷饭。这不过如中国以前褫夺杜工部官职禁绝其诗文的一段故事罢了。一个托马斯·曼，赐之学位有何乐？夺之又何亏？然世上小人，一朝权在手，每好弄出此种把戏，此其所以为小人也。

所谓“自由没有死也”一语，盖吾国青年，眼光太狭且好趋新逐奇，右有法西，左有普罗，震于其名，遂谓德谟克拉西已成过去赘瘤，自由已化僵尸，再无一谈之价值。想来也是留美留英学生太不努力之过，也是吾国青年好学而不深思之过。举

梭利尼叱德谟克拉西为一“臭尸”,吾国自亦有崇梭利尼之子孙,同声附和，恨不得自由早被蹂躏，思想早受统制，化人类为机器，变享自由清福之人民为听人指挥之走卒，而后甘心，此正所谓“求为奴隶而不得”之心理也。何不思其与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相背驰乎？今日苏俄回转方向，声声口口恢复德谟克拉西代议制度。人事变迁，起伏在咫尺间，或五年一变，或十年一变，终不离“道”之一字。所谓“道”，亦是寻常人情而已。顺天则存，逆天则亡，是讲拂逆人情者必归灭亡。心头把定，眼光放开，始不团团转若狗逐尾巴也。吾到国外，留心此点，视察大局变迁起伏之机，始知德谟克拉西健在，非如国中读物所与一般印象也。且静待三五年，看世界潮流之起伏反复，再看德谟克拉西死也未，未为迟也。此话不能长谈，拉杂书一点愚见。将来有工夫，再补充可也。

廿六年四月十六日于纽约

再嚣俄遭拿破仑第三放逐，居英法海峡间荒岛十五年，著成 Toilers of the Sea，Les Miserables 巨著。然先死者非嚣俄，乃拿破仑第三也。嚣俄生还法国，托马斯·曼亦必有生还德国之一日。

（《宇宙风》第 43 期，1937 年 6 月 16 日）

给郁达夫的信

——关於《瞬息京华》

达夫兄：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诚以论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说。今日西文宣传，外国记者撰述至多，以书而论，不下十余种，而其足使读者惊魂动魄，影响深入者绝鲜。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效用，明者所易察。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故卷一叙庚子至辛亥，卷二叙辛亥至新潮，专述姚家二姊妹，曾家三妯娌，外亲内戚，家庭之琐碎，及时代之变迁。卷三乃借牛曾二家结怨，写成走私汉奸及缉私锄奸之斗争，重心转入政治，而归结于大战。由是旧派节妇孙曼娘反成抗日精神之中心，牛家叛逆徐黛云出而为锄奸杀兄之领袖。至陈三环见黛云之入游击队，阿通肖夫之从戎，阿梅之受辱，素云之悔过不甘为汉奸，为日人所杀，曼娘

之惨死乡下，木兰之逃难，遂入开战初半年范围。廿七年元旦，木兰陪夫挈女，在四十万难民之旋律中，载满一小车孤儿向天台山进发。适遇开赴前方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亦心动神移。此时由朱门闺秀转入山居贤妇之木兰，又一转而置身大众入无我相境界矣。天台山和尚送木兰至外门，远眺木兰全家入难民队中，渐行渐远，至不可复辨，不知所终而止。故其争以坐禅得无我，木兰乃于人群接触中得之，此书中女主人翁姚木兰精神态度转变之经过也。弟既无暇自译，所以必求兄亲译者以此。非敢以无聊因缘，污吾兄笔砚。大约以书中人物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荡漾为纬。举凡风尚之变易，潮流之起伏，老袁之阴谋，张勋之复辟，安福之造孽，张宗昌之粗犷，五四、五卅之学生运动，三·一八之惨案，语丝、现代之笔战，至国民党之崛起，青年之左倾，华北之走私，大战之来临，皆借书中人物事迹以安插之。其中若宋庆龄，傅增湘，林琴南，齐白石，辜鸿铭，王克敏，及文学革命领袖出入穿插，或藏或显，待人推敲，至故事自身以姚木兰、姚莫愁二姊妹为主人翁。木兰嫁入曾家，曾家三媳妇，曼娘古，木兰新，素云迷醉租界繁华，适成今日中国社会之断片。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妹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娘，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孙曼娘为特出人物，不可比拟。至曾文伯（儒），姚思安（道），钱太太

(耶)，及新派人物孔立夫（科学家），陈三（革命），黛云（女革命），素云（“白面女王”），莺莺（天津红妓女），巴固（留英新诗人），则远出红楼人物范围，无从譬方。以私意观之，木兰，莫愁，曼娘，立夫，姚思安（木兰父，百万富翁，药店茶号主人），阿妈，华大嫂为第一流人物。孙亚，红玉，阿非，暗香，宝芬，桂姐，珊瑚，曾夫人，锦罗，雪蕊，紫薇，银屏次之。他若素云之势利，环玉贪污，雅琴之懦弱，莺莺之无耻，马祖婆（牛太太）之专横，姚太太（木兰母）之顽固，不足论矣。以全书结构而言，木兰，莫愁，立夫，姚思安，为主中之主。孙亚，襟亚，曼娘，暗香，红玉，阿非，迪人，银屏为主中之宝。牛黛云，牛素云，曾夫人，钱桂姐，董宝芬，为宝中之主。珊瑚，莺莺，锦罗，以逃难起，以逃难终。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引《齐物论》“梦饮酒者，日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为格言。

Those who dream of the banquet wake to lamentation and sorrow. Those who dream of lamentation and sorrow wake to join the hunt……This is a paradox, Tomorrow a sage may arise to explain it; but that tomorrow will not be until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 have gone by. Yet you may meet him any day just around the corner.

书长三十六万言，凡四十五回，分上中下三卷。书名 Moment in Peking，似可译为“瞬息京华”，唯吾兄裁之。

九月四日弟语堂于纽约

（《宇宙风》第 49 期，1937 年 10 月 16 日）

关于《吾国与吾民》

亢德兄来函叫我写一篇《我怎样写〈吾国与吾民〉》。但是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二部书《生活的艺术》，赶本月底完稿，每日三千字一段，自九时半至十二时半坐在书斋工作，像机器一样，不容少许停顿或出岔。此刻书记在忙着抄改，只好偷闲写一点点。我想拉杂报告一点关于这两本书的消息。

《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廿三年春夏秋三季，所以一部是在庐山避暑山居时写的。通共约十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胡涂。忙者未必有功於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通货膨涨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至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其

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靴鞋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反革命，皆可勿论。

这样讲离题似远而实近。我不能按图索骥分甲乙丙丁讲下去，因为半小时内就得再起稿写书。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自在，用野老谈天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横竖还有十五分钟，何妨瞎谈一下。《吾国与吾民》已将出第十一版，此十一版系修订而加插图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错误都已改正。插图用照相，共十六页，德文法文挪威文译本早已出版，还有几种尚未出版。中文译本已请友人在翻译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现在写的是讲《生活之艺术》，名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秋镫锁忆》，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专书，加点张山来的《幽梦影》格言，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见《申报》说我译《浮生六记》“全本”上王均卿之当，实则此全本出版我首在《人间世》为文辨伪。）然书局老板意见，作《生活之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士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若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

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西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末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因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

三月初动手，写了二百六十页，忽然于五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将前稿尽行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论辩，至使手稿文调全非。自五月三日起乃重新写起，至七月底全书七百页，所以在这三月里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开。然而并不叫苦，反如受军事训练，一切纪律化，整齐化，严肃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书记打上，倒也是一种快乐。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来。《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的，而这书是口述而由人笔记的。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人好，便可为文。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五册

《廿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纪》、《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未去查过。居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国咏命遣怀一类诗四十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 Khayyam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拭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知人"之句，与Omar何别？觉隐时"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菴《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ny，又名为A Chinese Fantasia…话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

七月十三早于纽约

（《宇宙风》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日本必败论

一、总　论

1. 民国廿七年冬日本经济必然崩溃，由经济崩溃与民心之厌战，内阁改组，变式求和，使第三国出面调停，而英美等国因洞悉日本已经破产，必以经济与外交压力，使日本屈服，最后（约廿八年春夏间）不得不罢兵休战，按期退兵，空无所得，结局与日俄战争之末美总统罗斯福迫成和局使日本放弃满洲相同。

攻下汉口时，必先一度使人调停，但必不成功，而廿七年正月所定“永不与蒋介石谈判”之决议必于夏间即已推翻。

2. 中日战争，日本优势为军事上，而其弱点为经济与时间上，日本之致命伤为其经济组织，原料及销售以至一切财政全靠国际贸易维持。国际贸易及购买力一中断，即不可救药。

3. Peffer 有言曰，日本之敌人有三：中国，笔算与时间岁月。日本有意攻中国，无意攻笔算与岁月，然因攻中国不克，遂与加减乘除及时间岁月决斗，是谓之贪天之功，必败。

战短期，则日本胜。战长期，则中国胜。因日本必破产故也。故谓之日本与笔算岁月决斗。日本初料开战二月，至民国

廿六年十月，即可结束；十月间料年底即可结束；本年初料夏间可以结束；本六月六日东京电，日本陆军总长板垣且谓十年始可结束。此语半年前必不出于日本军人之口，可见日本军人早已抛弃轻敌之心。日本早知北平之战事发展将至如此局面，必不轻易言战。今则欲罢不能，进退维谷。但因战事范围既已扩大，年底破产之势已成。

4. 此次战争，惟一确定结果为两败俱伤。中国胜，日本固败；中国不胜，日本亦败。

因经济之消耗，战后日本必一蹶而成为次等弱国。西人有言曰，“战者无不败”“Every one loses in war”；又曰，“战争无好经济”“War is bad econemics”。此二格言，日本亦自不能例外。二二如四，笔算也，日本不能独为二二如三。日本军人不懂经济，而日本经济专家谓战事已至此，谈也无用，非不知其危机隐伏也。国人须知，日本今日之表面倔强，全系偷鸡，实则已成外强中干之局。中国半途屈服，则偷鸡计成；不屈服，则偷鸡计败而脱裤还债，始可了局。

5. 中国之优势为天时地利人和此次全备。

天时，雨水也。地利，土地广大也。战事发展，自成诱敌深入之势。只要中国国土未尽，日本实力先完，便是胜利。且敌愈深入。用兵愈多，军费愈大，实力消灭亦愈速，中国之利也。故中国目的，在步步缓冲，迁延岁月，便是成功。人和在民气及领袖二点，决无问题。个人以为中国战事迁延至明春，则必可操胜券。

6. 日本之攻有三种原因：军事上，政治上，与财政上，而主因为财政。兹分述如左，略军事政治，而详财政，然后因外

交大势而推测其和议结果。

二、军　事

7. 中日战事，廿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起至十二月十二日南京陷为第一期。自南京失守至今年秋间汉口决战为第二期。汉口若失守，则战事蔓延至无前线局面为第三期。第一期为据守战，第二第三期为争夺战及游击战，而第三期游击范围愈广，中国军队一面保全实力，扼守险要，一面四出掠夺敌军守据，截断交通，劫获粮草，为长期困斗。

是时日军深入长江，应守交通线主要有七，干线里数如下：

(一) 上海至汉口之长江线	五九五英里
(二) 津浦宁沪、沪杭线	九八七英里
(三) 平汉线	七五二英里
(四) 平绥线	五〇六英里
(五) 陇海线	四四九英里
(六) 胶济线	二四四英里
(七) 正太线、同蒲线	约六〇〇英里
合计	三・五三八英里

故日本防线在三千五百英里（即中国万余里）以上。此三千五百英里防线，皆中国游击队出没劫攻之地，用以消耗敌人兵力与财力。

8. 日本军队在中国长城以内者已超过三十三师，总数在八九十万以上。日本常备军廿八万，现驻中国本部作战三分之二为后备军，即由百姓间抽调者，其中农民约占什七，其影响本

国农作及工商已甚可观。全国可拉调之后备军，虽号称二百五十万，而实际超过一百五十万时，则国中工商农业发生巨大影响。受调军人之家庭经济影响更巨。

9. 中国官方报告，自廿六年七月至廿七年四月底之十月间，日本军队死伤四十一万，平均每月消耗军力四万人；以后战事更扩大，每月平均至少亦在四万以上。合计至廿七年底，日本死伤当在七十三万人以上。

本战事中最可注意者，即中国战事报告注重诚实，大体上可靠。该报告中所举开战以来至本年四月，十个月中敌人损失如下：

总动员（在日本及中国）一·六七五·〇〇〇人

死伤　　四一〇·九〇七人

内：
- 陆军　　三七五·七六一人
- 海军　　二七·九四八人
- 空军　　一·一八六人

军费　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即五十三万万圆）。

日本司令部报告伤亡数目，以多报少，已成世界笑柄。依余研究，日方报告中国伤亡每加十倍，报告自己伤亡每少十倍。例如，二月廿日伦敦报载自二月十二至十七日六日间津浦路血战结果，中国死伤三万人，日方死伤仅五十六人。依余方式例算，得中国三千名，日本五百六十名，较近情理。（但此方式不合空军报告。）

10. 日本军器精良，飞机大炮坦克皆优于我，所以一年来攻城掠地，经过相当迟误，每达目的。然因中国民心一致抵抗，

民众具有组织，结果所谓日军占领之地，号令不出城门，治权不及乡村，朝朝逞其狐威，暮暮退而蛰伏，白昼所辖，夜去其半，哨兵人人自危，交通时时截断，所据仅有铁道要邑。而此沿路要邑，不但无利于日本，反为日本防守之增加负担。以山西河北为例，可知即使日本攻下中国之半部，亦只增加防守线之里数，仍须驻兵百万左右于中国。此驻兵仍日受袭击而消耗，战事既无结束，军费仍然浩大，破产仍然可必。且因地盘愈大，消费愈巨，而溃灭亦愈速。此种战争，名之为消耗战“War of attritin”，最合中国地势，而今消耗战之势已成。

11．关于消耗战，所期消耗敌方兵力与财力，以中国士兵死伤数与日本消耗直接军费相比，则中国士兵每死伤一名，耗日本国币一万元，未尝不可谓值得。

初十月间，日本直接军费五十三万万元，中国死伤兵约五十万人，是五十与五十三万之比，故每名死兵伤兵约耗日本一万元。即使死伤不只五十万，平均亦近一万。此实不足为奇，因现代军费如此。西人统计欧洲大战中联盟军每杀德兵一名，花费美金五万元。

12．今日中国军火接济已无问题。空军及陆军器械皆反胜于开战时。开战后所得接济军火及新式武器超过战前二年间所购数目。机械化新师将已练成，此后有加无已，逆料年底可达五十师，其战斗力胜于旧式一百师。

三、政　治

13．日本攻下徐州决计进窥武汉时，军事上败局已成；而

日本攻陷南京纵杀淫掠之时，其政治上败势亦已决。倘使日本军事与政治全盘依照计划进行，兵力所到，秋毫无犯，秩序井然，则日本诚然可怕。然今日日兵横暴，各地一律，而其天性，又非一朝一夕所能改，故日兵之太乏纪律，将成为日本统治中国计划之致命伤。日本攻中国尚可说，治中国则决不能。因此，日本军事上之胜利，全成空虚。

日兵劫掠南京，美国 Ken 报称为"近代史上第一大屠杀"(转载本七月 Readers'Digest，此报有二百万读者)。此次屠杀之惨酷，与日兵之残暴，已逐渐传播，遍于欧美人士之耳。H·J Timperley 新书《日本在华之残暴》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Victor gollancz，London)，专述日兵在南京及他处之暴行，附以详细证据（南京国际中立区职员与日本司令部往返函件等），将引起世界极大对日恶感，且将日本陆军之荣誉一扫无余。"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较之亦显逊色。此事关于美国舆论之改变至重大，按欧洲大战，英国在美花宣传费八百万元，宣传德兵残暴，历时二年，始得美国加入。

14. 此外日本飞机轰炸平民，在国外失却友邦同情，在中国促成人民抗日到底之决心。日本惟恐中国人民一部分不识字，不知强邻在侧，不知日人何以可恨，故派飞机轰炸，使之耳闻目见，不复迟疑，故吾尝谓日本轰炸机乃蒋介石先生最忠心最努力之宣传部队。

此次连日轰炸广州，引起美国极大反日心理。例如，六月九日纽约《泰晤士报》评论开头曰，"此次日本十二日连续轰炸广州之忍心残暴，恐非现代人有生以来所曾耳闻目观者。他处固有轰炸平民之事，但现代征战史上决无若此一味到底之残酷，

结果亦决无若此之惨烈。”结尾曰，“至于连篇累牍抗议于东京无效之诸国，**每一颗炸弹掷下广州**，**减去一分此诸国尚未全灭对日本当局之同情**。”

15. 中国焦土政策，更使日本统治占领区之梦化归乌有。焦土政策与直接恫吓汉奸政策，皆可消灭日本以华制华之迷梦，而实属整个抗战计划之一部。

16. 第八路军民众组织之严密整齐，尤为日本不能坐收军事胜利实行统治占领区之大原因。所幸第八路军民众组织极有经验，使将来所有日本占领区悉如今日之山西河北，则日本之败可必。此种组织为中国乡村之保障。日本若不能与土豪劣绅地主勾结，则日本已无立足地。

17. 日本在江苏省有计划的毁坏中国实业，焚毁工厂，自绝于中国银行界实业界，割断其利用中国银行界之路，是又日本一大错着。从此无复有与日本合作之势力，中国商绅仕宦贩夫走卒，莫不知先有国始有家，一致立于抗战麾下，团结成为上下一心知有国家之民族。

18. 少数汉奸，国内国外，皆不足重轻，以华制华，决不成功。《纽约论坛》曾评北平南京傀儡政府之朽腐人物曰：“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尸腐体暴露于世，恐此辈亦未必感激涕零。”Nathaniel Peffer 在 Harper’s 称此辈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淘出之渣滓”。日人所设傀儡政府乃全盘抄袭英法诸国十九世纪帝国侵略故事，故图欺他人尚可，图欺西欧帝国，未免犯班门弄斧之识。

19. 综观以上数端，日本不能征服中国民众，不能收胜者之利，已昭然若揭。日军所到，中国百姓挈老携幼逃奔，是此

事实之明证。日兵对游击之报复为焚毁乡村，而焚毁乡村之结果，适足增长游击民众劳力。长此下去，日军败势不可收拾。

四、经　　济

20. 此次战争性质，根本为中国抵抗持久力与日本金融财力之消耗战。力先完者输，余可不问。

21. 在消耗战上，实业国不及农业国。日本实业发达，适为日本之弱点；中国实业不发达，反为中国之强处。

实业发达之国，组织严密，故易于中伤。农业之国，组织涣散，故便于生存。中国经济向无重心，有之，实上海商埠而已，上海实业重心已失，而抵抗力如旧，则无复有重心可攻。中国经济组织幼稚，内地各省，可以独立生存，而日本则不然。例之以动物界，有脊动物，断其一要部则死，无脊动物，斩去首而尾仍蠕蠕而动也。

22. 实业发达之国，便于急攻，不宜于困战；农业之国，不宜于急攻，而便于困战。攻守之势不同。

23. 且若美国实业发达原料充足之国，固亦不难困战。日本有实业国家之弱点，无实业国家之长处。实业国家之弱点，在整个经济组织社会生活，专赖国外贸易维持。实业国家之长处，在战争及商业原料，皆已充分开发，各种机器，能自制造。日本有其短而无其长。

24. 以作战能力而论，日本为最弱之国。无论商用军用品原料，悉数仰给他人。一日原料不接济或财政不足以购原料，则经济与军事同时瓦解。

商用原料如棉花，木材（制人造丝所用）。军用原料如铁，煤，汽油，铜，马口铁，锌 Zinc，铝 Auminum，镁 Magnesium，镍 Nickel，钨 Tungsten 等。此数种金类，皆制造枪炮必有之原料，天祸日本，无一不缺，天祐中华，无一不全。

25. 日本因商用军用原料俱乏，故作战原料又依赖国际贸易之赢余力量采购，而战事延长，国际贸易即受大影响。购商用原料，同时购置军用原料，即刻引起金融恐慌。不购商用原料，又无法制造商品，运输出国，以维持国际信用，而供购买军火之需。

本年正月，日政府严禁商用原料入口，得以减少入超，然至三月底计划全然失败，重复输入大宗货品，因不然则无法制造，工厂停业，出口亦随而减少。然因此四月间又须运美金三千七百万元出口，捉襟见肘势已成。

26. 且日本制造工业亦未充分发达。

主要如炼钢，化学品，及制造机器之机器等，皆未能充分自造，须仰给美国。原因现代制造，极其专门复杂，钢之种类极多，机器皆有专式，非可率尔仿造。日本由美国采购，汽油与烂铁之外，炼钢，化学品及制造机器之工具为大宗。且此种机器，一经采用美国式，非继续采用不可。大规模生产机器，或仅美国有之。

27. 日本军需供给全靠美国，又有二明证：一，美国所见论文十几篇，一致谓美国若不接济军需，日本数月即须休兵罢战。二，日本宣战，得封锁中国海面，断绝华南军火输入，外交上亦有许多便利：不宣战则名不正言不顺，而日本终犹豫不敢宣战。主要理由为一宣战，美国即不得不适用中立法，禁止

军火出口。仅此一端，足使日本至今不宣战，其重视美国军火可知。

28. 日本经济必然破产之原因有数种：一，开战时国内经济已达危机；二，政府公债已超危点；三，准备金极少；四，国际贸易已呈弱势；五，开战后国内生产遂受影响，国际贸易急转直下；六，军费浩繁，每日开销约一千八百万元，万难维持。日本在此情形之下，万无能力维持长战。华北启衅，乃料不必如此长战故也。然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开战时日本经济危岌之势，平常读者不大明了，但欲知日人苦况及厌战之心，极须注意。因数年来东三省之开发投资，开战时公债已超过危点（一百万万元）而达一百一十万元之惊人数目；实则日本实业家，对满洲之发展，早已不肯继续投资。实际上日本军人"满洲国乐土"之梦，早已打破，而结果使公债加倍，得不偿失。日本国际贸易入超已超七万万元；故廿六年初七月须现金值三万万二千八百万元出国。日币之准备金在廿五年即由百分之卅六降至百分之卅二。廿五六年预算中，税收仅达百分之五四；廿六年军费特项预算中之二十万万元，增加税收不及廿分之一，即不及一万万元。盖日本人民纳税重负已难再加。故预算常项，余部及特项军费全靠公债，然公债款额早已超过银行销售力量；廿五年正月，日本政府银行卖不出之公债即达五万万九千一百万；至七月又增至八万万五千四百万。且此项公债销售，多系人民储蓄来存银行者。日本又决无借得外债之可能。廿七年初，日本已发生劳资纠纷变剧之势，而工人实得工资及购买力已经降低。

29. 廿六年之日本绝非大战前之德国及廿五年之意大利所

可比。后者皆有十余年和平生聚积蓄，而日本开战正在浪费开发满洲，财政日绌，迷梦初醒之时。

意大利之征服阿比西尼亚数月，中日之战数年，不可同日而语。说者谓若使意阿之战延长，则虽国际之经济抵制未能一律，亦足使意大利屈服。

30. 开战时及开战后，日本国际贸易，早已由数年前最盛时期转入疲势。原因：一，各国订立保护税则以抗制日货之侵入。二，意大利起而夺非洲商场，印度起而自卫，其余如加拿大澳洲皆有抵制日货之条例。三，各国人民自由抵制日货倾向，有加无已。四，日本原料购买，生产及轮船运输，皆受军事影响限制。五，最后金融膨胀，因而物价飞腾，因而工资增加，因而出产货品加价，加以外国税则之抵制，必使日本国际贸易日减，万无日加之理，故恃国际贸易以维持战费，绝对不可能。

31. 日本廿六廿七年预算明明系一张破产账，必然之势为通货膨胀。若此惊人预算，所赖惟有税收增加。公债销售及国际贸易增加三条活路，收税及国际贸易增加之不可能既如上述，公债发卖成为惟一活路，而公债发行所需数目，决非日本财政界所能摊销，只记在账上好看，图欺一时而已。必然之势，为通货膨胀。日本识者，早已引为隐忧。

廿六廿七年预算中，指定发行公债总数几达七十万万元(六九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而通常日本一年销售八万万元公债即已困难，力量与需要相差十倍。廿六年底，已发应销之公债仅销四分之一（已发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中本年二月间尚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未能销售)。此项公债巨款，仅记在日本政府银行账上，其办法由政府银行以此

公债为抵押签发支票及印行钞票。说者谓实业界（间接）认销公债，而政府向实业界（军火商）购买军火。只是一笔转賬，并无须现金。然实业界以实工实料制造军火卖与政府，换得政府对公债为抵押之大堆钞票支票，仍逃不出公债信用问题也。实业界所供给军火日多，即换得纸票亦日多，实业界受政府挟制，不起质问，自无问题，纸票过剩，自然心中不能不起疑问。且有二问题，无法解决。政府以钞票给与实业界厂主，厂主以钞票散发工资，钞票数目增加仍然是增加，通货膨胀仍然是膨胀也。二，对外购买原料，仍然须以出货及现金维持平准，实业界不能永远以实货实金运出国外，换政府空头支票也。故此种财政办法结果为日币大跌，通货膨胀，乃有目共观绝不可掩之事实。故前财政总长贺屋亦谓："余谓此法不足防止可怕之通货膨胀，但相信不无少补。"政友社员在议会亦声言："公债在政府与财政界手中往还转账，只引起金融膨胀，昭然若揭。"

32. 公债办法，既未能解决困难，日本又为专靠外国供给原料销售出货之国家。其根本财政所系，仅有二项：一，有多少准备现金，足以长期运出国外，以为入超之抵补；二，国际贸易实力能否增加，故又归还原题。此二者之绝无办法，为日本必至破产之原因。

33. 日本政府准备金，至本年年底，必尽数用完。

日本政府准备金，绝对未尝准备今日之长期大战，盖数年来入超过剩，剥削殆尽。廿六年准备金仅五万万美金之可笑数目。此项准备金于廿六年间运出一半（二万万五千万美金）。至廿七年四月共运出五分之三（二万万八千七百万美金），仅剩五分之二（约余二万万美金）。以此用度速率推之，年底定然完尽。

廿六年日本准备金全数	一·六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六年日本运去美国现金	八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六年年底日本准备金余数	八〇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四月又运出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廿七年四月剩余	六七〇·六〇〇·〇〇〇元
即剩余美金	一九四·八〇九·〇〇〇元

美国经济专家 J. C. Forrest 在四月廿四日纽约《泰晤士报》曰："论者一致意见似乎以为使日本再战一年，其野心谋略必归失败。……日本现受困陷于出口日少入口日多之上下两块磨石。日本工厂改造非生产品之军需，使其入超日增无已"。远东评论大家 Nathaniel Peffer 最近在美国《新共和周刊》曰："依廿六年之入超情形，日本于一年内，必至仅能以出口货换购其大半入口货品。日本出口货价一增加，复受现行他国海关高税之限制，即伤及日本之国际贸易，而正击中日本国防之最弱点……以前备战所积之多量军火既日消耗，而不得不补充，则此后入口购额将愈巨。日本之成功与失败，维持与破产，专视国际贸易而定。只有恢复日本数年前国际贸易战之进攻盛势，始可使日本度此难关。但一切情形指明其国际贸易必反减少。"

34. 日本国会通过廿六、七年预算，连同历次之补充预算，共达五·五一七·四九一·〇〇〇元（即五十五万万余元）。

廿六年经常预算	二·八七二·二二七·〇〇〇元
第七十一届国会补充	二九·七四三·〇〇〇元
第七十二届国会补充	四二·六四七·〇〇〇元
第七十三届国会补充	三七·〇〇四·〇〇〇元
合计廿六年经常费	二·九八一·六九一·〇〇〇元

廿六年特别费（非常军费）

第七十一届（七月廿三日）　九六·八〇〇·〇〇〇元

第七十一届（八月五日）　四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第七十二届（九月三日）二·〇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合计廿六年特别军费　二·五三五·八〇〇·〇〇〇元

（注）通常历年预算，由本年三月初至次年三月初为一“财政年”。

35. 日本廿七、八年预算，连同历次补充预算，共八·三六四·五二一·〇〇〇元（即八十三万万余元）。或作七·七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者，盖未将三次补充之六四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加入也。

廿七年经常预算　二·八六七·七四九·〇〇〇元

第一次补充　三八六·四九二·〇〇〇元

第二次补充　一七一·〇〇六·〇〇〇元

第三次补充　八九·二二六·〇〇〇元

合计廿七年经常费　三·五一四·五二一·〇〇〇

廿七年特别军费　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36. 两年预算总数达惊人之数目一百三十万万余元。

一三·八八二·〇一二·〇〇〇元

其中公债六十九万万余元 六·九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税收增加仅　三九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37. 两年军费预算合共超过一百万万元

（一〇·六三三·九〇六·〇〇〇元）

两年特别军费预算合共　七·三八五·八〇〇·〇〇〇元

两年经常费中之半仍属海陆空军费

三・二四八・一〇六・〇〇〇元

38. 战争期间日本国家费用每日平均二千三百万元。

以百万元为单位计算，廿七年预算八・三六四，以三百六十五日除之，正得廿三。

39. 日本军费每日平均一千八百万元，约美金五百万元。

以百万元为单位计算，廿七年军费四・八五〇。加经常费之半属海陆空军费者一・七五七，共得六・六〇七，以三百六十五日除之，得十八。

或依第卅八六节二年军费总数，以五七五日（十九个月）除之，亦得一八・五。

美报所见计算，每日平均五百万美金（见《亚细亚》七月号），与此计算相符。

日本战争时期中经费消耗简表

以日金百万元为单位计算	每日金一元值美金二角九分
廿六年度预算总数	五・五一七（约五十一万万）
廿七年度预算总数	八・三六四（约八十三万万）
两年总数合共	一三・八八二（约一百三十万万）
两年军费总数约	一〇・六三三（一百万万）
每日国家费用总数平均	二三（约二千三百万）
每日军费平均	一八（约一千八百万）
杀或伤一名中国士兵	〇〇・〇一（约一万）
开战时日本现金准备	一・六四七（约十六万万）
初十月耗去五分之三	九七六（九万万余）
本四月余剩现金	六七一（六万万余）

准备金本年年底用尽

(满洲出产金矿每年仅一百万，私人储蓄外金约十六万万，但武力充公，必引反响。)

开战时政府公债	一一·〇〇〇（一百又十万万）
开战后拟发公债	六·九一四（六十九万万）
每年日本销售公债力量	八〇〇（八万万）
廿六年入超须以现金补约	七〇〇（七万万）

结论：廿七年年底日本破产，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购力断绝，借债无方，受英美威迫下台。

40. 本年四月日本之生产已减少百分之廿二。二月物价与去年二月物价相比，已增百分之十一，与去年七月相比，已增百分之六，是为国际贸易困难之先兆。

41. 日本在精疲力竭之时，又通过此项巨大费用，非发痴也，特以战事初发，本料中国决不实际统一，必因内部分裂而不能坚抗到底，数月间即可结束。及南京陷而战事未休，则亦无可如何，希望捷速胜利，作中国求和之梦想而已。中国若不屈服不求和，抱定将日本拖倒主义，则亦只好作战到底。且南京陷后，而战事结束犹遥遥无期，日本国内反战之心已萌，既已知国币从此耗尽，经济从此破产，反战之心自然日渐月长。且战场上节节胜利，虚荣心亦已满足，决非受攻者之坚持到底心理。在中国却地位不同，上下一致觉悟，此时言和，中国即亡，非坚持到底不可。在此一点，日本愈打愈疲败，中国愈打愈奋兴，又见两国强弱之势悬殊。

42. 或谓法西斯蒂政府以政府武力操纵资本，对国内资本调剂，非无办法。日本战争愈久，愈趋向于法西斯蒂之经济统

制，自可断言，国内资本调剂，自有多少延迟破产力量。但有二层须注意。一，统制经济政策，对国内效力大，对国外效力微，故在经济独立之国家效力大，在经济不独立之国家效力微。统制资本政策之对外效用，本仅统制汇兑及出入口货而已，倘统制之后，原料仍须外入，入超仍然入超，现金仍然匮乏，每日仍然浪费二千三百万元，结果破产依然。日本正处此等情形。二，统制政策，基于武力，非出于民心，在民心厌战之时，愈增加反战之势，反足为反战运动之推动力。及武力不足以制裁社会反战心理，其反动斯为社会革命。

五、外　　交

43. 外交无定势，因世界各国政府举动，向来一鉴国内民意二鉴国外形势以为推移。民意常反复，各国时局，波澜交错，又至复杂，故甚难绝对预料。所可言者，各国之存心，与利害之冲突而已。总括言之，日本侵华即侵各国远东利益，各国对日即无好存心，兹举其大要如下。

44. 远东利害最切而与日本正面冲突者为苏俄。故战事发展，中俄关系自然愈密，而苏俄之援助（除直接武力干涉加入战争以外）最为可靠而最有效。有可断言者，苏俄决不能坐视中国战败，亦决不坐视中国失败。苏俄不愿加入战争，但或因中国战败而不能不加入，可引起欧洲大战。或至日本兵疲马乏人穷财尽将蹶未蹶之时，日本一面不得不驻兵百万于华土，一面战舰军机大炮军火消耗极巨未能补充之时，苏俄有加入战团一拳打倒日本而算旅顺旧账之可能。但苏俄不出兵则已，出兵

则作东西前线同时发动之准备。苏俄知其势必如此，故早已作此准备。其空军为世界第一，原料器械皆能独立维持，此十年来预备之结果也。

45. 其次为事实主义之英国。英国因有香港新加坡澳洲印度之大防线关系，及华中华南百余年商业历史，远东利益至大，根基至固，不能遽尔放弃远东。日本进占华中已愤不可耐，窥伺华南更难旁观，日本野心愈明，则英国实业界醒悟愈速。所以隐而未发者，其实际主义而已，盖一时之势使然。英人冷眼热中，其所取政策，依余观察，为暗祝中国长期奋斗，冀日本实力消灭以为快耳。在重实际之英人，日本势胜，则与日本妥洽，以为后日余地，日本势败，则必出而以势力使日本屈服。

英人实际妥洽主义，一可见于与武汉政府妥洽，二可见于其与意大利妥洽，三可见其在西班牙两方观望，绝不为主义而战。

46. 其次为感情主义之美国。所谓感情主义，一，美国人感情易动，今日之和平家孤立派，皆感情作用之一种表现。因此理智极其缺乏，而其长处在有相当理想主义。实业家惟利是图，而普通平民却易抱不平，易为某种名词主义所冲动。抵制日货乃此种理想的人道主义之表现。二，美人心理之变至速，且时时变动。一九一六年威尔逊以防止美国加入欧战（"He Kept us out of war"）为口号，得连选二任总统，不数月间得国会同意加入欧战，是一好例。此外，美国特征，在于政府政策随时受国会及舆论牵制，确须先得民意，始能实行一种政策。故美国舆论最为重要。今日情形，美国总统国务卿皆有远见，知日本征服中国，可成为太平洋劲敌，且与卅年来中国开放门户主

义相背驰，第为舆论所制，未能积极行动，暂待舆论改变。但一般常人，却见不到此，一面感情痛恨日本，一面又无理智的怕招与日本战祸，孤立主义正与人道主义相消长，相持不决。最近轰炸广州，为美国舆论改变一大转机。战事发展，恨日之心愈重，孤立派之势愈弱，至英国毅然出为领袖，干涉远东，美国始得随和其后。

合上节视之，英美干涉须待日本兵穷财尽，及侵略华南野心昭著，始能实现，且此时必定实现。美以英为指归，而英以日本实势为定，造成此实势者专在中国。日本之势愈穷，则英美对日之态度愈硬，此可断言。中国能长期抵抗至日本半颠不倒财政匮乏，英美始能积极行动，故曰，求之在我。

47. 其次为法国。法国之于远东，向无多大利益，故对中日战事漠然视之。但一，日本胜利，即德国联盟邦之胜利。日本羁占东亚，可危及法国联盟之苏俄，以为有力的牵制。二，日本侵略华南之意渐显，危及安南之势渐著，而法国军部为防守安南起见，对日态度日益积极，盖如英国之在华南，与中国利害相同也。

48. 德国与日本，其政府虽属携手，而非官方意见日渐与中国同情。且德国与中国贸易利益甚大，亦只表示中立不肯十分确定助日攻华。最要者，日本兵穷财尽之时，则其牵制苏俄之力甚有限，被德国视为不足重轻。如何结局，极难预卜。

49. 意国正在与日本进行合作，希图满洲华北之利。然日本所最缺乏者财力，而与最亲之意德二国，自身财力且不足，不能救日本经济之危机。

50. 无论战事之胜败如何，一年后之日本必穷困不堪。至

日本将近破产之时，英美二国合其财政外交力量，足使日本屈服，而迫成日本空无所得之和局。

六、和议条件

至此局面成时，中国得提出条件，今日本限期撤兵，以下为和议最低三大原则。

第一原则：日本须脱离法西斯蒂集团，并由中国与日本合作剿灭日本之法西斯蒂。

第二原则：日本须取消军人超出宪法之地位，使受政党制裁。日本军人不得干涉政治。惩办主战军人。

第三原则：日本须声明放弃仇华政策，并尊重中国土地之完整及政治权之统一。

三原则与“广田三原则”尖锋相对，且可促成日本国内政党反对军人之势力。至若启衅责任问题，赔偿问题，撤兵裁兵收回领土等问题，须看临时情势而论。

廿七年七月一日抗战周年前六日草于巴黎

日本必败论撮要

日本军力万不足以征服中国，财力万不足以长期作战，政治手段又不足以收服人心。芦沟桥事起，日本非有实力足作长战，特以为中国内部分裂，不久即必求和而已。今则进退两难，而成外强中干局面。至本年年底经济破产，明年入春即生国内

反战运动，卒因英美外交力量屈服退兵。原因：

军事上：

1. 日本深入长江后，其防线计长一万华里，处处为游击队掠夺，结果反攻为守，军力财力消耗甚大，而征服中国尚遥遥无期。
2. 日兵名义上，占领多省，实际上仅据铁道之沿路要邑，而此占领路线不但无利，且反为日本之负担，其全属空虚。

政治上：

1. 日兵各地淫掠兽行，为日本不能统治中国之大原因。
2. 轰炸平民，惨无人道，适加强人民仇日之心，使上下一致抗日。
3. 第八路军组织，使汉奸政府治权不及乡村，日兵无法勾结土豪劣绅，遂无立足之地。
4. 焦土政策及恫吓汉奸政策为抗战计划中之一要部。
5. 日兵在沪宁一带焚毁工厂，使中国实业界亦绝无妥洽之可能。
6. 日兵以焚毁乡村报复游击，结果适增长游击势力。

经济上

1. 日本军用及商用原料皆仰给外国，是其致命伤：一日国外不供给原料，或购力不足，即不能自存。
2. 日本开战时，入超过剩，贸易转疲，现金准备空虚，绝对不能维持长战。
3. 开战后，入超愈大，贸易愈小，而现金准备及出口货品皆不足抵补入超，现金所剩不及二万万美金，年底定然破产。
4. 日军费浩大，政府明知无法，又不敢加税，故大半以发行公债为无办法之办法。然公债发行至七十万万元，远超日本财政界销售实力，故纯系纸上好看，无法实销，结果必致通货膨胀，引起经济恐慌，且对外购买原料仍须现金现货，非公债所能抵补。
5. 在经济破产之时若不停战，必引起国中社会革命。

外交上

1. 日本进占华中华南之野心渐著，而英法美对日态度愈积极。
2. 日本疲败至将蹶未蹶之时，则诸国态度愈硬，最后知日本业已破产，必以经济外交力量出而干涉，故战争愈久，日本外交形势愈转恶。

心理上

1. 我国被攻，日本攻入，形势不同。日兵所求捷速胜利，我国非坚持到底则国破家亡。
2. 故彼愈战愈疲倦，我愈战愈兴奋。

（《宇宙风》第73期，1938年7月1日）

在美编《论语》及其他

亢德兄：

弟迁居巴黎已十余天。因蒙东究竟乡僻，消息不通，山水佳有何用？弟每晨夕坐卧之际，凝思此时此刻，我军我民众非在台庄临沂与敌人撕杀，便是在五台山左右拦截粮草，死者几何，伤者又几何，所拼者老命，所牺牲者血肉，又非平常喊抗日抗日所可比。思之令书生愧死。每思此枝笔到底有何用处？若谓海外宣传，分工合作，人尽其才，亦仅足解嘲而已。书生所谈决不能影响前途于万一，将来胜败，全仗老百姓前线作战后方组织之精神耳。兄劝我多作几篇文章，亦不过观察中外大势，时作分析报告，使国人一知败胜之权全操己手，二知抵抗到底必获胜利而已。前信所谈 Peffer 氏之时文正可译译。又如最近出 Willard Price 之新书 Where Are You Going, Japan?及 Williaw Henry Chawberlain 去年之书"Japan Over Asia"其所分析日本优点弱点，便中亦可述其梗概。

外报载中国消息，伦敦《泰晤士报》终不及纽约《泰晤士报》，每日短短半栏数百字而已，其详不可得而知也。故又续订纽约报，再参阅上海《密勒氏周刊》，本国情形大概可知一二。又杨光泩先生所办日内瓦机关每晚可收中国内地所发无线电

讯。英报除《泰晤士报》外，则有 Manchester Cuardian 虽新闻不多，而极同情中国。在弟方面，仍系摭拾本国材料，组成篇章，寄登纽约《泰晤士报》，带点皮里阳秋之宣传耳。美国杂志，近已一律变成高等报章。论文以叙事为主，谁有特别材料，谁登出去。若今夫也者，理论空谈，绝难获选。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此国人多未知之道理也。

今晚且说一点私事。说弟在美"编《论语》"怎样个编法。前承 Modern Library 主人之邀，编《孔子哲言》The wisdom of Confucivs 一书(本月出版)，原因乃该书局曾有世界哲学丛书廿册。中有一册孔子哲学 (Dawaon 所编，系统不错，颇可读得)，原亦充数而已，谁知书店报告一来，孔老夫子之书畅销，压倒康德，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等西洋十九家，此亦西人居此乱世旁皇莫定摸索出路之一证据，而孔老地下有知亦当狂笑一声"时哉时哉"三嗅而作也。书局因思 Modern Lidrary 不可无孔氏书，乃邀弟。弟既允编，又定于二月初离美，乃于去年十二月预备材料，将孔门之书重读一遍，以定去取，正月间拼命将书译完。

大略分述如下。第一问题为选材。《论语》一书读法，必用掩卷功夫，学思并重，两三句话，读了掩卷思之，体会出来，体会不得再读，读后再思，正如《朱子语类》所示门径，此孔门读《论语》之正法也。无奈今人（中西相同）不肯下学思并重工夫，读者手不释卷，心在霄汉，一直读下去，如上堂听演讲，让讲者一直讲下去，我做闲人，方觉舒服。如此将《论语》一句一句译出，尽管是堆金砌玉，必不足引起现代读者兴趣。试思伯拉图《苏格拉底语录》任禄芬 (Xenophon)，"苏格拉底长

谈”每篇洋洋数千言或数万言，文章如何清丽，思想如何细密，便知两两相较，万无孔长苏绌之理。非孔氏哲理之不深纯博大，乃文体不同耳。然《论语》之外，孔经中固有成篇成段文字，较合近世读者习惯者，《大学》、《中庸》是已。《中庸》一书且深含立学哲理，尤合西人脾胃，若“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是也，且真能当得“其味无穷”四字“考语”，故以中庸为发端。然《大学》、《中庸》固出《礼记》，而《礼记》又有不少篇章，内有孔氏成篇长谈者。如《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礼运》皆是。古不用引号，故若《礼运》孔子的话说到何处而止，无从断定，然大意相连续也。其中最精彩而最合近世思想者，莫若《学记》、《乐记》二篇。又以成篇孔子行传无过《史记·孔子世家》，从未有人译过，乃译出以冠其前。而孔道流传，独《孟子》得其精纯，复译《告子上》全章计以附其后。结果内容如下：

第一章　叙论　Introduction

第二章　《孔子世家》　Life of Confucius

第三章　《中庸》　Central Harmony

第四章　《大学》　Ethics and Politics

第五章　《论语》

Aphorisms of Confucius（约选译五分之一）

第六章　《经解》　Education through the Six Classics

第七章　《哀公问》　Interview with Duke Ai

第八章　《礼运》　The Vision of Social Order”仿任禄芬例也。且三篇皆论“礼”，故言“Social Order”）

六·七·八三章合名"Three Confucian Discourses on the Social Order"

第九章　《学记》　On Ejucation

第十章　《乐记》　On Music

第十一章　《告子上》　Mencius

如此所译，除《孔子世家》外，《论语》节译一章，《孟子》选译一章，余《大学》，《中庸》及《礼记》新选入五篇，与四书组织大同小异也。或疑《学记》《乐记》出于荀子之学，不足据为孔子之言（实则言礼三章亦可说是荀学），然事情固不如此简单。一、《论语》未必尽是孔子之言，是明羼入有曾子、子张、子夏之言，然固不妨其为孔门圣经。二、《大学》、《中庸》何尝是孔子亲口所说；《中庸》世认为出于子思，而若"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又见《孟子》（《孟子》作"思诚者人之道"），此层公案，何时得了？三、《中庸》、《大学》既不得摒之门外，其他孔氏遗书总合杂货铺之所谓《礼记》者，又何独歧视之？而况《檀弓》、《表记》、《缁衣》诸章体裁内容原与《论语》无异乎？

要之，孔子当日之言，未曾得一位美国女书记速写下来，所求书上所傅不背要旨。大凡孔氏遗语，只好作如是观耳。《论语》所录每将孔氏当日全段议论截去上下文，摘出精粹要语，此可由《礼记》所称引证明出来。因此读《论语》孔子话，不知原来上头说什么，下头说什么，何时说，何地说，向何人说，天上飞来一句巧语，所以全不得要领，常使解者茫然，望文生义。若"未见好德如好色"一语，原来是孔子陪南子坐马车，招摇

过市，人家单看南子美人，不理老学者，所以发此感叹，那里是什么悬空哲理！幸亏有《史记》记个来历，不然何以知此语之有所为而发也。他如“犁牛之子骍且角”，亦如袁子才所说，是孔子与仲弓正坐窗下，看见窗外有人牵只好小牛过去而发感叹，岂可拿定是嘉奖仲弓可以南面的话？又如《论语》“有耻且格”，“格”字不当作“至善”解，当作“敬”解。看《缁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等语自明。闲话少说，孔子原说什么话，用什么字说，今日无从追究。今日所存经书中者，乃孔子哲理思想经过门人门孙手笔记录或发挥出来者而已，不得斤斤较量也。例之以耶教《圣经》，马太语长，多成段议论，马可语短，多零句，约翰全然改头换面，加入耶稣死后以弗所学派之立学，然以一代通人考据精审如 Renan 者，仍认四“福音传”不失为耶稣遗训之最要根据。例之以柏拉图所记苏格拉底语录，更不得因柏拉图之发挥乃师遗训，而遂疑其语录为不足信。总之，若谓孔丘定说那一句话，孔丘又不曾画押，不但《礼记》不足信，《论语》亦无一句可信。反之，若谓诸经所传足以代表孔门思想，以孔子为总源，以荀孟为支流，追流溯源，合而观之，相去当不远矣。今日大人先生与记者谈话，今日所言，明日尚可否认“我没这样说”，而况数千年下必欲追究孔丘某日曾说某句话不曾说某句话，弟期期以为不可也。

于此又须附带声明者。弟之治经，亦如治史，不为子贡列孔子门墙，只作孔文子蘧伯玉辈，时过孔氏之门相与交谈而已。交谈有得，则欣然而返。崔东壁专为圣人辩诬，谓之有成心，必还孔子圣人面目。弟无成心，只还孔子原来面目。许孔子以仁，

则弟赞同，许孔子以圣，则弟不知何所谓也。夫圣者空洞称颂之辞，主观也，非客观也，以表示吾人私衷之景仰则可，以作史家研究则了无用处。试问圣与仁有以别乎？无以别乎？有以别，则仁之外，何如而可谓之圣？说者茫然也。无以别，则莫如直言仁，观念较清楚也。古之所谓圣人，卜筮而已矣，教民稼穑取火之发明家而已，在神权时代，凡智力过人者能知未来者莫不奉之为神为圣，与今日之张天师无异。借圣字以语孔子，乃致敬之辞，只是六书之假借，致敬之外，毫无意义了。犹如称君为圣亦是谀词，非谓皇上果圣人也。神谓之圣，人谓之仁。超乎人情之外谓之圣，得乎人情中道谓之仁。孔子得天独厚，然亦得中道而行之不厌诲人不倦而已，弟深信孔子不曾超乎人情之外。故鄙孺悲则不见，不见已甚，且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令人难堪。孔子仁人也，惟仁者 能好人能恶人，此孔子之深恶孺悲，圣人必不若是也。孔子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辞仁是自谦，辞圣乃真真岂敢也。崔氏每于此等处欲为圣人辩诬，以为圣人必不如是，故孔子必不如是，故说孔子如是诬也。此种论证，今日已不行。弟谓正可不必，且必毫无成心，将《论语》读下去，始可得孔子真面目。故忽焉骂人不得其死然，忽焉骂官府为斗筲饭桶，忽焉举杖叩人家的胫，忽焉食言适卫，日蒲可伐，忽焉仰天长叹黄河之上，忽焉旁皇陈蔡之间，而在任何境遇，弦歌不衰，居上不骄，居下不悖，处穷不滥，求官不急，随遇而安，此孔子之所谓仁乎？弟固知圣人之与我同类也，因其同类，而后其悲欢离合之际啼笑歌哭之情与我共，与我共而后觉其蔼然可亲矣。故第五章选译《论语》，显出一个活跃纸上的人来。弟将孔子喜怒悲笑等处汇集一节，而题曰 The Johnsonian

Touch，盖谓孔子讨厌人时，亦会不留情面当面指斥如约翰生也。去此等处则孔子已失悲欢离合啼笑怒骂之情，亦不歌，亦不怒，亦不笑，亦不举杖叩人家之胫，亦不识浴乎沂风乎舞雩之乐，此等孔子与我了不相关也。

第二问题为翻译。四书五经于百年前由英人雷格 James Legge 译成英文。雷氏精研中学，以毕生精力译五经，其功不可谓不伟。且慎重从事，参考注疏，加以得学者王韬（著有《弢园文集》，《弢园尺牍》等）随时问难指教，总算走得门径。但弟尝与梵多伦（Carvan Doren）谈之，译笔实欠流畅。所译《诗经》，梵多伦认为不成佳作，而特推许 Helen Waddell 所选译。此由信而不能雅之译者通病也。且亦有令人不满意之处，如"惟酒无量，不及乱"，乱字译作 Confused，不是拘泥太甚，便是真正不知所云。总之，雷格之功不可如此一笔抹杀，但叫弟采用雷译则尚不惬意。《论语》更有他人所译数种，如 Soothill 译本入牛津大学书局之 World Classics，弟皆认为不满意，故全书自己下手，诚以古文译英，可商量出入及参酌个人心得之处正多，非自己译来总不痛快。他日英文高手读林译，亦必有不惬意处而又自己下手，此自然之道也。弟所佩服惟辜鸿铭所译《中庸》一书，（名为 The Conduct of Life，Lurray，London），此真挖心血之作，非俗手所可与同日而语。辜氏发愿译《大学》，而终未果，或由过于慎重，未敢发表，或直因懒而废耳。故此书除第二章《中庸》出辜译而略加删改外，余为个人所译。为功为罪，断难立定，以待后之知我者。

夫译事难，译中国古文为今日英文则尤难。就文字言，一字之间求英文恰当名词能尽表其意者，固已大费踌躇。且一人

译为此，他人必译为彼，就中皆成见主观，是非莫定也。信达雅非不可必兼，兼则怡然快于胸中，此译书之乐。若“克己复礼”之“复礼”如何译法，万世讲不清，若言复天下之体，即是 restore the (ideal) social order 然此处明指个人行之一日者，又非复天下之体可知。盖孔子明言三世而王，复天下之体决非一日之事。此礼盖言个人存心正敬，所译 personal discipline 是也。至若孟子之言仁义，义者事之宜，通行译为 righteousness，此处译“仁义”为 love and justice，仁内义外正通，又于西洋哲理名词极顺。凡此皆所以明取字之难，此其一。古文简，今文繁。“子绝四”三字，在英文中决非多多添字以合文法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同。故译古文为英文，结果等于古文译白话，虽欲不添枝叶不可得也。既添枝叶，所添又须合今日西文习惯，则其中可斟酌之处更多。若“辞达而已矣”讲为“文辞主旨在于达意”可，讲为“达意为文辞之要则”亦可，所谓“要则”也“主旨”也皆枝叶也。若不妨中加一字“达意为文辞之惟一原则”（Expressiveness is the only principle of language），则已将孔子文学批评归入克罗齐新派矣。孔子有无此项主张，抑系偶然之谈，今日不得而知。译者由自己体会而时加酌察而已，此外别无他术，此其二。译英既如译成中文白话，则所谓译，直是 Paraphrase，即增加词字而为完满有意义之解说。弟谓在此项工作，翻译与 Paraphrase（略同白话译）决分不开。既须增加词字以为完备有意义之解说，则译者之责任愈重，而其对于原文词义之理解体悟愈重要。辜译即系近于 Paraphrase，而弟所佩服，在于其理解体悟原文词义之真切，能信而达而雅，在英文读来，可深得个中滋味，毫不间隔。弟凡译一

句，必揣摩得其实义而后下笔。例如“骥不称其力，称其德”，“德”指马之脾气，应译为temper，问马夫便懂，否则空洞了无意义，又如“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今人读来全然不关痛痒。何以奢则不孙，何以俭则固，又何以不孙宁固？不孙即不逊，然奢与不逊关系未明，故原注解孙为顺，真不知而作，且仍了无意义，不成一句话。揣之人情事理，奢逸则其人势利，俭啬则俗陋寒伧，孔子益宁取俗人而不敢势利人也(I prefer the vulgar people to the snobs 或 I prefer vulgarity to snobbery)。孔子作此语，真可人也。或谓不孙决非势利，我谓不孙决指势利，是非莫以明，要在人之自己体悟该句原旨，而终须说个真实道理来也。不然何贵乎孔子之有此句遗言？

第三问题为校订。《大学》、《中庸》，旧本颇有错简，今本也未尽是。原来竹简一条写无几行，系以韦革，次第本来易乱，及至抄入缣帛，自然难保无讹。今日《中庸》，卅二章，长短不一，有的一章便是一条竹简，如“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自为一“章”是也。今人读去，谁也觉得杂乱无章，盖朱子所谓“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弟正谓意虽相承，文实不属也。

先说《大学》。朱子考订错简，因程子所定，别为序次，文理大明。试以朱子章句与《十三经注疏》中之郑玄本相较，便知其改编之迹。但朱子知其误而不知其致误之由，而结果编出。“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自为一章，认为经文亡失，只留末尾两句，给朱子一个机会，顺便补入一段致知穷理的宋朝理学(自“所谓致知在格物”至“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弟谓经文未尝亡失，而二句不应另立一章。

(郑本，未经朱改)第一章末“未之有也”直接“此谓知本，

此谓知之至也”，以下直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该章下接“诗云瞻彼淇澳”云云，而后回头释明德“康诰曰克明德”（今第二章）云云。

（朱本）将第一章末二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也”割去，别为毋佚章之末而自补经文，成第五章。又将“瞻彼淇澳”移入第三章，解“至善”。结果（1）第一章末无“此谓知本”字样，（2）诚意列第六章（甚好），（3）“瞻彼淇澳”补入第三章，（4）补第五章经文，（5）第四第五章变成如此：“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此谓知本，（接第五章）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若不添补经文，便成两个“此谓知本”连续。（英译本）第一章（大学之道）末“此谓知本”。

第四章（子曰听讼）末“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第五章删。

第谓朱子所复诚意章次第自无问题，而原文并无第五章。只是第一章末原来有一句“此谓知本”，第四章末原来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后来两章结尾换错而已。且第四章所谓听讼至使无情者不得尽其辞而大畏民志（百姓怕老爷聪明，欺不过），正是知之至之注解，原不关致知穷理，穷理系宋朝理学之所平空添入也。孔子所谓知之至，只是知人情，如见肺肝，使“人焉叟哉”，因而“大畏”之知，并非格亭子竹之知。郑本错误原因在原文第一第四章末各有“此谓知本”相同字句（第四章又加“此谓知之至也”一句），因致两章结尾误换，变成“此谓知之至也”误入第一段，又因“此谓知之至也”本来连续“所谓诚其意者”（今第六章），所以此简一并牵连误移前部，直接第一章。此种因字句相同而引出之错误，最易明瞭，校对上

常发现。即以背诵而论，背者由“此谓知本”而误接“此谓之至也所谓诚其意者”亦极自然。以讹传讹遂成郑本局面。故英文本（1）删朱补经文第五章，而（2）将郑本第一第四章之末语对换过来，第一章末“此谓知本”，第四章末“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3）余次序依朱子。

《中庸》文理不相连续。冯友兰说，此书原为二书合并，最有卓见。第一章及二十章自“在下位不获乎上”起至全篇末为一部，第二章至二十章“在下位”之上止为一部。二部文体不同，一多引孔子言，如《论语》一类，一作者发挥哲理极推至诚。其实二十章“在下位不获乎上”至章末，一半同《孟子》，或为后人所添入，亦未可知。但二部意思连贯，由《中庸》而言至诚，即使系后人拼合，而接榫处接得不错，姑从其旧。

但各章次第，全无道理，如第六、第十六是。弟谓：

（1）第一章抉全篇旨。

（2）第二，三，四，五（只一句！），七，八，九，十一各章合起，亦不过成一短章，言《中庸》之难能。其中第六言舜大知，文体似第十七，应取出与第十七言舜大孝合。第九文义亦殊不连续，仅“中立不倚”四字略有关系。

（3）第十二“君子之道费而稳”言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六“鬼神之为德”合此较宜。

（4）第十三，十四，十五皆言行远自迩之道，中庸之道虽难，而造端甚易。但十四十五倒置较清楚。

（5）第六 十七，十八，十九皆引舜武王周公为大德受禄于天之例。

（6）第二十“哀公问政”，文又见《家语》，“博学审问”以

下《家语》无之。“在下位”云云本篇重见，又见《孟子》。

(7) 自此以下无问题，惟第二十八章应删去一半，并合一半于二十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本有可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明明是李斯变法之张本及思祸天下倾陷反对党之告白，与孔子斟酌损益三代礼乐之反古思想相背而驰。且第二十九章，“王天下有三重”，三重何所指，说的最不清楚。今假定二十八章上半为秦汉时人所窜入，下半原由下章割裂而来，而试将下半仍归入下章，则三重之所指甚明——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上章“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本见他处，疑后人加入，但或原加在此。)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

所谓三重要事件，一德，二位，三历史之征证，所以取信于民，即所谓 historical appeal 也。此子思述乃翁孔子政治家依附古制之聪明见识，亦孔子历史考据家之原来观点也。

(《宇宙风》第74期，1938年9月1日)

我的信仰

我素不爱好哲学上无聊的理论。哲学名词，如柏拉图的“意象”，斯宾诺沙的“本质”、“本体”、“属性”，康德的“无上命令”等等，总使我怀疑哲学的念头已经转到牛角尖里去了。一旦哲学理论的体系过分动听，逻辑方面过分引人入胜时，我就难免心头狐疑。自满自足，逻辑得有点呆气的哲学体系，如黑智儿的历史哲学，卡尔文的人性堕落说，仅引起我一笑而已。等而下之，政治上的主义，如流行的法西斯主义，那直是胡闹了。共产主义还较能引起我的尊重，因它在理想方面毕竟是以博爱平民为主旨；至于法西斯主义则根本上就瞧不起平民。二者都是西方唯智论的产物。

科学研讨分析生命上细微琐碎之事，我颇有耐心；只是对于剖析过细的哲学理论，则殊觉厌烦。虽然，不论科学，宗教，或哲学，若以简单的文字出之，却都能使我入迷。其实说得浅近点，科学无非是对于生命的好奇心，宗教是对于生命的崇敬心，文学是对于生命的叹赏，艺术是对于生命的欣赏；根据个人对于宇宙之了解所生的对于人生之态度，是谓哲学。我初入大学时，不知何者为文科，何者曰理科，然总得二者之中择其一，是诚憾事也。我虽选文科，然总觉此或是一种错误。我素

嗜科学，故同时留意科学的探究以补救我的缺失。如果科学为对于生命与宇宙之好奇感的话不谬，则我也可说是个科学家。同时，我秉心虔敬，故所谓“宗教”常使我内心大惑。我虽为牧师之子，然此殊不能完全解释我的态度也。

我以普通受过教育之人的资格，对于生命，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宇宙，及造物，尝想采取一个和谐而一贯的态度。我虽天性不信任哲学的理论体系，然此非谓对于人生——如金钱，结婚，成功，家庭，爱国，政治等——就不能有和谐而一贯的态度。我却以为知道毫无破绽的哲学体系之不足凭信，反而使采取较为近情，一贯而和谐的人生观较为简易。

我深知科学也有它的限度，然我崇拜科学，我老是认定科学家是小心地兢兢业业的工作着，我深信他是诚实可靠的。我让他去为我寻求发现物质的宇宙，那个我所切望知道的物质的宇宙，但一旦尽量取得科学家对于物质的宇宙的知识后，我记住人总比科学家伟大，科学家是不能告诉我们一切的，他并不能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物，他不能告诉我们使人快乐的事物。我还得依赖“良知”（born sense）那个似乎还值得复活的十八世纪的名词。叫它“良知”也好，叫它常识也好，叫它直觉或触机也好，其实它只是一种真诚的由衷的，半幽默半狂妄，带点理想色彩而又有些无聊然却有趣的思维。先让想象力略为放肆着，然后再加以冷嘲，正如风筝与其线那样。一部人类历史恰如放风筝：有时风太急了，就把绳收得短些；有时他被树枝绊住了，只是风筝青云直上，抵达愉快的太空——啊，恐不能这么尽如人意吧。

自有伽利略以来，科学之影响如此其广且深，吾人无有不

受其影响者。近代人类对于造物，宇宙对物质的基础性质及构造，关于人类的创造及其过去的历史，关于人的善与恶，关于灵魂不灭，关于罪恶、惩罚、上帝的赏罚，以及关于人类动物的关系等等的观念，自有伽利略以来，都经过莫大的变动了。大体上我可说：在我们的脑筋里上帝是愈来愈伟大，人是变得愈渺小，而人的躯壳即变得愈纯洁，灵魂不灭的观念却亦愈模糊了。因此与信仰宗教有关的重要概念，如上帝，人类，罪恶，及永生（或得救）均得重新加以检讨。

我情不自禁的寻求科学知识之进步怎样予宗教的繁文礼节以打击，并非我不虔敬，倒是因为我对于宗教非常感觉兴趣。虽则基督之山上垂训，与乎道德境界及高洁生活的优美仍然深入人心，然我们必须大胆承认宗教的工具——宗教所赖以活动的观念，如罪恶、地狱等——却已为科学摧残无余了。我想真正想象地狱的，在今日大学生中恐百不得一，或简直千不得一睘。这些基本的观念即已大大的变更了，则宗教本身，至少在教会，当然是难免要受影响的了。

方才我说上帝在我们脑中比前来得巨大而人却变得渺小。我意指物质方面而言。因为上帝既然充其量只能与宇宙同其广大，而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的物质的宇宙愈来愈广阔无际，我们自然心头起恍惚畏惧之感。宗教与夫以人类为中心的种种信念的最大敌人是二百英寸的望远镜。数星期前我读纽约报纸的记载，说是有一位天文学家新近发现一簇离地球有廿五万光年的星群，那时我顿觉往昔对于人类在天地间所处之地位的观念未免太可笑了。这些事物对于我们的信念，其影响不能谓为不大。许久以前我就觉得我在造物宇宙的心目中是何等渺小卑微，

而灭亡、惩罚、赎罪等办法何等乖谬狂妄了。上帝以人有缺点而加以惩治，正如人类制定法规，以惩治虫蛆蚂蚁，或使其悔改赎罪，同样荒谬无据。

善恶报应，以及代人赎罪之价值与必要等观念，皆因科学与近代知识之进步而变更了。理想化的至善与罪恶之对立观念已不足信了。知道人由下等动物进化而来而并承受动物之本能，则觉向来人性善恶之争颇属无谓。吾人之不能责人类有情欲，正如吾人不能责海狸有情欲一样。因此基督教基础的关于肉欲之罪恶的神秘思想显然失其意义了。所以那中古的、僧侣的，与夫宗教所特有的对于身躯及物质生活的态度，均归消灭了，取而代之是一种较为健全合理的对于人及尘世一切的看法。谓上帝因人类有缺点或因正在进化的半途中尚未达至善之境而恼怒，是诚无聊的话耳。

宗教最使我不满的一端便是它的着重罪恶。我并不自知罪孽深重，更不觉我有何为天所不容之处。多数人如能平心静气，亦必已与我抱同一之见解。我虽非圣贤，做人倒也相当规矩。在法律方面，我是完美无疵的；至在道德方面则不能十全十美。但妥我道德上之缺点，如间或有之的说说谎与撒撒烂污之类，给他算个总帐，叫我妈妈去审判，充其量，她也只能定我三年有期徒刑而已，决不会说是判我投入阎王那里的油锅的。这不是吹牛；我朋友中间该受五年有期徒刑的也委实很少。如果我能见妈妈于地下而无愧，则在上帝面前我有何惧哉。我母亲不能罚我入地狱里的油锅，这是我所深知的。我深信上帝也同样近情与明鉴。

基督教教义的另一端是至善的观念。所谓至善，便是伊甸

园里的人的境界；亦即是将来天国里的境界。于吗至善呢？我委实不懂。所谓至善，实也不是爱美的本能所产生的。至善之观念，乃为耶稣降生后数百年中小亚细亚的那种逻辑的产物，其意乃谓我们欲与上帝为伴，既想与上帝为伴而进天国，则非做到至善的地步不可。故只是想进天国至乐之境一念之产物，并无逻辑之根据，纯是一种神秘思想而已。我诚疑基督徒如不许以天国，不知还愿做一个至善的人否？在实际日常生活中，所谓至善是并无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亦不赞成“完人”那种理想。理想的人倒是一个相当规矩而能以自己之见解评判是非的人。在我看来，理想的人无非是一个近情的人，愿意认错愿意改过，如斯而已。

× × ×

以上所说的那种信仰未免太使真诚的基督教徒惶惑不安了。然而非大着胆不拘礼节地说老实话，我们是不配谈真理的。在这点上，我们该学科学家。在大体上，科学家的守住旧的物质定义不愿放弃，不肯接受新的学说，亦正有如我们的不愿放弃陈旧的信仰。科学家往往与新的学说争执，然而他们毕竟是开通的，故终于听命他们的良心拒绝或接受新的学说了。新的真理总是使人不安的，正如突如其来的亮光总使我们眼睛觉得不舒服一样。然而我们精神的眼睛或是物质的眼睛经过调节以后，就觉得新的境遇毕竟也并不怎样恶劣。

然则剩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旧的宗教的外形是变迁至模糊了，然宗教本身还在，即将来亦还是永远存在的，此处所谓宗教，是指激于情感的信仰，基本的对于生命之虔诚心，人对于正义纯洁的确信之总和，也许有人以为分析虹霓之彩色，

或是在公园喷泉上设置人为的虹霓，我们对于主宰的信心就要消失，而我们的世界将沦为无信仰的世界。然而不，虹霓之美，固犹昔也。虹霓或溪边微风并未因此而失去其美丽与神秘之一丝一毫。

我们还有一个信仰较为简单的世界。我爱此种信仰，因为它比较简单，颇为自然。我所说的得救的"工具"已没有了；其实对于我"得救"的目的也已没有了。那严父样的上帝，对于我们的琐事也要查问的上帝，也没有了。在理论上互有关连的人本善说，堕落，定罪，叫人代理受罚，善性的回复，这些也被击破了。地狱没有了，天堂跟着也消逝了。在这样的人生哲学中，天堂这东西是没有地位的。这样也许要使心目中向有天堂的人不知所措了。其实是不必的。我们还是拥有一个奇妙的天地，表现上是物质的，然其动作则几乎是有灵智的神力推动者然。

人的灵性亦并未受到影响。道德的境界乃非物理定律的势力所能及的。对虹霓的了解是物理学，然见虹霓而欣喜则属于道德的范围了。了解是不会，不应，并且也是不能毁灭心头的欣喜的。这便是信仰简单的世界，既不需用神学，亦不乞助于无据的赏罚，只要人的心尚能见美而喜，尚能为公道正义慈爱所感动，这样也就够了。规规矩矩的做人，做事以最高贵最纯洁的本性为准绳，原是应该的。其实这样也就是合乎教义了。我们既有秉自祖先的兽性——就是所谓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罪恶——则以常识论，我们有一个较高贵的我与一个较低级的我。我们有高尚的本能，同时有卑劣的本能。吾人虽不信我们的罪恶是由撒旦作祟，然此非谓我们行事须依顺兽性也。

孟子说得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敬畏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又说："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

× × ×

以论理言，唯物主义非必随旧的宗教观念之消灭与俱来，然在事实上唯物主义却接踵而至。因人本非逻辑的动物，人事本有奇特可笑处。在大体上，近代社会日趋唯物，而离宗教日远，宗教向为一组经神批准的一贯的信仰。它是不期然而然的情感冲动，并非理智的产物。冷酷的合理的信仰是不能替代宗教的。复次，宗教一事，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有传统的力量，这部传统的规范倘或失去，并非佳事，然事实上竟已失去。这个时代又非为产生新教教主的时代。我们太爱批评故也。而个人私信对于合理的行为的信念，其力量以之与伟大的宗教相较，直有大巫小巫之差。这种私人的信念，以语上也者之君子则有余，对于下也者之小人则不足应付也。我们已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之时代矣。

摩西与孔子对于行为的规范均与以宗教的意味，洵智慧的办法也。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既不能产生一个摩西或一个孔子，我们惟有走广义的神秘主义的一途，例如老子所倡导的那种。以广义言之，神秘主义乃为尊重天地之间自然的秩序，一切听其自然，而个人融化于这大自然的秩序中是也。

道教中的"道"即是此意。它含义之广足以包括近代与将来最前进的宇宙论。它既神秘而且切合实际。道家对于唯物论采宽纵的态度。以道家的说法看来，唯物主义并不邪恶，只是有点呆气而已。而对于仇恨与妒忌则以狂笑冲散之；对于恣意

豪华之辈道教教之以简朴；对于都市生活者则导之以大自然的优美。对于竞争与奋斗则倡虚无之说以救济之；对于长生不老之妄想，则以物质不灭宇宙长存之理以开导之；对于过甚者则儆之以无为宁静；对于创造事业则以生活的艺术调和之；对于刚则以柔克之。对于近代的武力崇拜，如近代的法西斯国家，道教则谓汝并非世间惟一聪明的家伙，汝往前直冲必一无所得，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物极则必反，拗违此原则者终必得恶果。至于道教努力和平乃自培养和气着手。

在其他方面宗教的改革，我想结果是不会十分圆满的。我对宗教下的定义，方才已说了，是对于生命的崇敬心。凡是信仰总是随时变迁的，信仰便是宗教的内容，故宗教的内容必随时而异。

宗教的信条亦是无时不变的。“遵守神圣的安息日”，此教条往昔视为重大非凡，不得或违，在今人看来则殊觉无关紧要。时处今日，来一条“遵守神圣的国际条约！”的信条，这倒于世有益不浅。“别垂涎邻居的东西”这条教条，本含义至广，然另立一条“别垂涎邻国的领土”而以宗教的热诚信奉之，则较妥善多多，并更为有力量矣。“勿得杀人”的下面再加“并不得杀邻国的人”这几个字，则更为进步了。这些信条，本该遵守，然事实上则并不。于现代世界中创造一个包含这些信条的宗教殊非易事。我们是生存在国际的社会中，然而没有一个国际的宗教。

我们乃是活在一个冷酷的时代中。今人对于自己及人类比一百五十年前法国的百科字典家还悲观无信念。与昔相较，我们愈不信奉自由、平等、博爱了。我们真愧对狄德罗及达·郎

贝耳诸人。国际道德从没如今这样坏过。“把这世界交给一九三〇——一九三九年的人们真是倒霉!”将来的历史家必是这么写的。只以人杀人一端而论，我们直是处于野蛮时代。野蛮道德加以机械化敢不是野蛮行为了么？处于这个冷酷的时代惟有道家超然的愤世嫉俗主义是不冷酷的。然而这个世界终有一天自然而然的会变好的。目光放远点，你就不伤心了。

（原刊 New York Nationa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大美晚报》涤介译）

（《宇宙风乙刊》第 10 期，1939 年 7 月 16 日）

希特勒与魏忠贤

——世界笔会大会演讲词

大会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在美国纽约举行，主席房龙，演讲者有汤姆斯·曼（Thomas Mann）及安得莱·莫洛阿（Andre Maurois）。

吾人今日乃处于一个恐怖世界中。世人常问：此次世界危机，祸首为谁？设若大会同人经过一番考虑后，大家以为吾人应尸其咎，则我知希特勒和莫索利尼必将大为高兴。至少我个人不愿独裁者这样称心如意。不多几天以前，希特勒柬邀诸君，请诸君负战争的责任；依他在德国国会中所说，战争的恐怖乃由民主报界的战争鼓吹家所造成。吾辈既为舆论公意的呐喊者，则无论记者与否，均在被邀之列。只是至少我个人却只好谢绝所请。实则亦只有二位作家是危局的罪人，其一是Cardinlsa' s Mistress 的作者（即莫索利尼），另一是Mein Kampf 的作者；只是这二位既已唾弃民主政体，自视并不属于民主报界的一分子，则希莫二氏显未请他们自己负此罪责。这二位之中，一位是写次等言情小说的，另一位是偷天换日歪曲事实的作家；他们二位既也从事著作，则我觉得我们笔会大会纵然指斥他们，不认

他们为我们的同行，亦无怎样不当。

所谓著作界也者，我意即一般天资聪颖的饶舌者，他们对国家的主要贡献，不是好处，便是讨人嫌怨。地无论中西，凡心口一致言所欲言的作家，政府总认为讨厌；愈敢言所欲言，贡献虽大，然亦愈能惹人厌恶。我愿汤姆斯·曼自知他在希特勒眼中看来是何等可厌。如世无汤姆斯·曼其人，在希特勒自较方便。只是吾人别忘如世无希特勒其人，则在汤姆斯·曼亦可较为方便。真是，希特勒方便不方便与吾辈何干？世界应该改善得使汤姆斯·曼那种人觉得安乐，不应弄得与希特勒之流以方便。文明与野蛮之别就在于此。

我素主张著作家应该统治国家，而不该遭人厌恶。一个理想的国家里著作家同时也该是统治者，这个理想曾一度实现过于古代的中国。如果著作界较能影响政治，世人对他们的意见较能尊重，我深信世界必较为安乐。如果我们把英法德间之纠纷交与 Priestlev, Andre Maurois, Thomas Mann，一般人之手，我敢说没有一个问题不能在三天之内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不幸这世界并不如此。世界应由我们来管理，然而事实上却并不然，则著作家只好居于反对党的地位了。著作界应该永久是个反对党。站在永久反对党的立场上，他们愈使执政者看来觉得不顺眼，则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贡献也便愈大。

只是以做政府的眼中钉为己任，不论从前与现在，总是件危险别致的职业。中国古时文人的处境，正复与今日之著作家相同。我敢说天下之事，古今如同一辙。看看目前欧洲的情形，我愈觉我们的处境与中国古代的文人无异。中国古时，国王措施失当，儒者有奏谏之责。古时中国且亦设员，专司检查，只

是此非报章的检查，因为那时我们尚没有报章。他们却是审查帝王的，他们的职司是当着皇上的面前指陈他或朝廷措施的不当。他无法律的保障，却仍得这么做，他们有伦理上的言论自由，而没有法律上的言论自由。如果御史名副其实，克尽厥职，他公开的非难往往能激起相当的政潮。只是皇上认他可恶之至，真觉不耐烦时，自得罚他的俸，割他的头，使他不再多嘴。这便是我们那时的情形。我有一时曾以为西方的著作家，因为有宪法上的保障，情形总比较好些，但现在晓得就在欧洲一个所谓文化之邦里，你们也并没有什么保障，因为你们有“异己犯监狱”。可见我们今日乃是同舟的人。

然则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德国诗人海涅曾说：“我死时，勿葬我以笔，但葬我以剑。”蒙丹的象牙之塔亦为诸君所熟知。吾人咸知一个作者不是战士，便是头脑冷静的观察家。这二者之间我们每人必得有所取舍。只是战士的作者与象牙之塔里的观察家的作者，其间欲加区别，亦非易事。当今人类文化危急存亡之秋；欲使文明进步，其工作正与新式炮队之运用无异；在新式的炮台，有人专司射击，另有人专司了望，于轰击之中，观察工作之重要，正不亚于炮手。视察哨得目光锐利，心不旁骛，须于枪林弹雨，炮声连天之中，保持镇静。我想这便是作家对于今日与未来世界唯一的职责。时处今日，思想艺术文学，处处遭受统制，作家莫大之重任便是守卫人思想信仰之自由。

换言之，作家对世界的职责也即是对自己的职责。职责云何？即处此爱国狂时代中看事较人清楚，论事比人近情，遇必要时反抗这变态的爱国狂潮，综而言之，保持自己之个性是已。在独裁国中，如个性为所淹没了，唯救自己，始能救世界。正

如中国道家所说，只要守真抱一，则祸患莫能侵。今日无论左派与右派，莫不受单轨思想之威胁，有失去独特个性之危险。无论左翼作家，或是右翼作家，若已丧失自己，更何能谋主义之胜利。

此处不妨引几句孔子的话。我们须知作家之要务，首在明了何者曰“义”。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对于“和”字的见解，亦颇可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话，往往似非而是，颇堪回味，看去似觉矛盾，实则含有至理。譬如他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这话说得再切当没有了。故愚意凡是君子，便当胸怀旷达，不染政治臭味，超然于党争之外。

今日之世界，正义扫地，国际情势漆黑。文化既遭摧残，吾人正如临悬崖，大祸迫在眉睫。我们的时代是个冷酷的时代。吾人对于个人尊严之重视，人道观念，思想自由之尊重，视十八世纪法兰西百科全书之编纂者，似有逊色。狄德楼与达·郎贝耳辈，即深以我们为其文化后裔为耻，亦不为过。欧陆沉沦至此，可称空前。嫉恨流血迫害不平之事，必至层出不穷。由此可见吾人之职责，端在诚实无畏，保持个性，以维护人类之自由，防卫个人思想信仰之权利，慎勿为所侵夺。

法西斯政府蔑视人类自由，剥夺人民权利。凡此种种，我相信决不能永久。何则？不近人情故也。有人曾问我独裁之不能久持，其故安在。我说我们只是猴子的后裔。那人问道这话怎讲，我便道：“牛与独裁者可以相处无事，只是猴子与独裁者这就两样了。人类既自猴子演化而来，而并非牛的后裔，则我

相信我们不会长此隐忍独裁政制的胡作胡为，不久总得与它决裂的。因为隐忍不是猴子的天性，亦非人类的天性。”

我们试看中国的历史，欧洲有暴君，但以视我们暴君则似尚有逊色。即以希特勒而论，以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魏忠贤相较，亦得退避三舍。魏为亚洲最著名的太监，实亦即是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太监。盖太监为东方的特产。不知怎么，太监往往亦即善于擅政独裁。在太监执政之上，文人儒者之被迫害，仗势者胡作非为，其恐惧黑暗，正复与今日之欧洲无异。在德国，纳粹诗人纳粹总长之流，以希氏喻耶稣；在中国，则有一位儒者曾倡仪将这位大太监与孔子同样尊敬。“德齐尧舜，大贤大智……”对魏氏的颂文便是这么一套。唯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使。而举国的官吏便全是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他的全给残杀了。于是兴造生祠，塑魏氏之像，以使人民士子之瞻仰崇拜。魏氏之义儿义孙甚多，呼魏氏为“干爸”，称他的恋人（客氏），即皇帝的乳母，曰“干妈”。皇上过时，例呼“万岁”；当魏氏过时，则官吏跪呼“九千岁”！而魏氏视若无睹，迳自昂昂然过去，绝不回礼。只是他虽声势显赫，毕竟仍免不了人民的腹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我们调侃魏氏的党羽，绰号他们为“五虎五豹十子四十孙”。这岂非是猴性的表演？因为人性毕竟爱好议论，故魏氏政权终究灭亡了。他后来迫得只好自杀，于是他便自杀了。自杀乃是独裁暴君最该做的事。中国看魏氏灭亡，而中国至今还是中国。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沮丧。

（《宇宙风乙刊》第 17 期，1939 年 11 月 16 日）

留别“左派”仁兄三首

其一

关山故国动离愁
达巷党人我心忧
读易原难闻吠犬
弹琴何必对犁牛
落花无意顾怜盼
流水有情空绸缪
莲社高贤酬应剧
我今去也攒眉头

其二

故国河山尚未还
无暇清理旧新冤
胸有成竹总宜让
手无寸铁可放宽

骂街何补家国事
饮醋合该肚皮酸
且看来日平寇后
何人出卖旧家园

其三

文人自古好相轻
井蛙蝌蚪互品评
缺垣断釉称割据
跳梁没水誉奇能
规规若失语东海
适适然惊闻北溟
有识悠然付一笑
蚊雷终究是虫声

（《宇宙风》第135、136合期，1943年12月）

《印度智慧》序

译者按：中印两国，同为历史数千年，名闻全球的古国，其与西洋各国之接触，亦为时不暂。而时至今日，西洋“先进诸国”一部分人士，对之仍为一“谜”，甚而误解百出。这不但无补于各国本身，简直有碍全人类的和平前途。语堂先生为使各国人士更明瞭中印两国对人类发展史上所贡献的智慧起见，乃费数年功夫，编译《中印智慧的宝库》(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一书。该书系于一九四二年由美国兰达姆屋出版社 (Random House, Inc) 出版。内容先介绍印度古今经典和印度教的《精神知识之歌》，佛教的经典等；继介绍中国经典，如老子的《道德经》，《庄子》，孔子的《中庸》，《孟子》，以及《诗经》等。总之，举凡影响东方民族数千年来的生活，而成为不朽的中印智慧，莫不搜罗编入。使读者（尤其西方友人）手此一册，对于东方的思想，以及东西思想的关连，能一目瞭然，茅塞顿开。本书对于中印思想之源流，发展以及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尤有特别的阐剖和说明！译文未经语堂先生校阅，错误之处由译者负责。

我不是梵文学者，但比这还要好一点，因我是爱好那些具

有不朽智慧的书籍的人。印度智慧和中国智慧合编的目的乃使读者愉快地欣赏该国文学之优美与智慧。在编纂本书时，倘若我到印度旅行一趟，那我就有更多的享受了。可不是吗？同诗人、森林、圣人，以及第一流贤人接触，窥探古印度心理所发现的第一次觉悟，时而天真烂漫，时而深沉直觉，但时时都是诚恳热情，致力于精神的真理和生存的意义——这种经验必能予任何人以高度的刺激。尤其是印度文化如此的异样，必会有更多的贡献。我们可以从印度的文学作品中看到印度的思想与道德，而其文学作品，三千年来已经不断地活跃，并教化了它的人民。在没有看到印度丰富的思想及其真实的精神之前，我们是不能明瞭它并希望分沾些民族的自由与平等。而这些就是我们从这道德与政治混乱的世界中，不断地企图以各种花样来创造的东西。

依照中国的礼仪，我仍将印度智慧的部分编列在前头，这是与书名的次序恰恰相反。我在书名上将中国放在前头的原因，是因为我极端怀疑一般读者不相信印度有丰富的文化，创造性的想象，机智与幽默，像中国所能贡献的一切。同时在宗教及想象文学上，印度是中国的老师，在三角学、二次方程式、文法、语音学、动物、寓言、棋学以及在哲学上鼓励过波加奇奥、哥德、赫德固、叔本华、埃默生，甚至也可能影响过老伊索。

一般西方人对印度的态度概而言之，可以用包括四点不确实的句子来说：“我所知道的印度，就是所有的印度人都是佛教徒。佛教哲学中的涅槃即消灭的意思，显然印度对于世界文明毫无贡献。”第一个不确实，就是印度人都是佛教徒，其实整个民族并不是。性质上说，印度人已经拒绝了佛教，正像犹太人

已经拒绝基督教一样。第二个不确实，就是涅槃的意义从未被正常确定和合理的人的知识所了解。第三个不确实，就是印度除佛教以外实际上产生了广大丰富的想象文学和哲学，而印度的文化具高度的创造性。第四个不确实，就是印度教及佛教思想排除了物质主义以及根据这些宗教而发动的非武力抵抗运动，他们都否认其对现世界的教训。佛教教人曰：最大罪恶为无知与无思，神圣生活乃始于此；而道德的虔诚，下问的精神和自我检讨乃建于此，这种对印度无思的罪过也应停止了。若将印度问题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当做一个不可接触的题目，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毫无利益的。我坚信这一代的老政治家们已经绝望了，我们必须开始教育新的一代使他们更正确地了解印度民族。

关于印度今日的国教——印度教——的教义及其领袖如甘地和尼赫鲁等的基本资料可以从印度敬神录方面的第一段找到。印度思想的特点是在于宗教和哲学不可分离。在印度方面，哲学和宗教之间没有“关节”的必要，而在现世界探寻这遗失了的“关节”的问题亦不存在。印度哲学和上帝的知识正像中国哲学和道德问题一样不可分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已临世纪末；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高度专家化和分工化的思想家究竟能否将科学、哲学和宗教重新综合起来的问题。但很显然地，印度产生了太多的宗教而中国则太少。印度宗教精神的小支流流入中国，而泛滥了整个东亚，印度的毛病的确太多了。举凡感到宗教精神缺乏的人，到印度比到他国为佳，这似乎较为合理和妥当的。现在只有在印度宗教还是个生动的情绪，而基督教那让人家打你的另一个嘴巴的教义，在印度却变成了国民运动，

由群众实行起来了。只有在印度实行，而不是在别的国家。印度的奇特现象即是全世界和平主义者的奇特现象。但和平只能从非暴力与不信武力获致。而非暴力只能从印度来，因为印度人似乎相信它。

（《宇宙风》第142期，1946年3月20日）

《中国智慧》序

我们谈到中国的文明时，连印度也认它为一种人性、合理与容易明白的文化。整个说来，中国文明的性质是人文主义，非宗教和非神秘主义的。这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真实性。我完全同意其人文主义，不同意其非神秘主义，因为凡有广大与深刻的精神基础的文化必为神秘感的。倘若“非神秘主义”被解释为现代的奴隶，浅薄的机械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崇拜，精确观察与表列，而他们则似以为可自满自足了。此乃现在最流行的思想方式，我必排斥这种对中国文明估量过低的思想。事实上，任何科学部门，不管为研究石头与矿物，或是研究宇宙线，研究至相当深度时，神秘主义必油然而生。卡雷尔博士（Dr. Aloxis Carrol）与埃丁顿博士（Dr. A. S. Edington）则为明证。十九世纪那些浅薄的合理主义者很天真相信“一片草为何物?”的问题，可以把“一片草”当为纯粹的机械现象而获答案。现代科学的态度则认为不可能。白华尔·惠特曼(Walt Whitman)用他的深刻神秘主义提出该问题以来，未有一人能回答它，今日也没有科学家将擅自回答此问题。

中国对哲学的特殊贡献乃在不信任系统哲学。我承认此点必能使大学二年级生感到苦恼，因为他们热望有一种毫无缺隙

的系统，可以据为堡垒而对抗任何可能的进攻。他们想要说出罪犯是先天而非后天，或说罪犯是后天而非先天，他们并要为之证明。但是中国人的答案却认为地球上没有这种气泄不通的系统，这种系统只有在迷惑与逻辑化的笨头笨脑中方有存在。

我们的国际世界很快就临到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的现代知识世界也是如此。思想的世界正在有规定地支离破碎了。因为我们的传统价值已经逝去了。这把我们带到东西洋哲学的第二个差别里来，即是估量（Approach）和价值的差别。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似乎是观察得很确切与表述得很小心的事实！我们的道德价值已经消失了，它们并且消失得太奇特，这一点我将加以说明，中西哲学在估量上有一定的差别，即对于价值的估量与事实的估量，这个差异乃由于接近东方与西方所产生的奇异现象。最令西方的旅行者惊异的，即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确感，尤其是对于事实与数字。据说若请两位中国人同意于两方邻近城市的距离里程或人口的数量，简直成为绝望。中国人同样不能明白为什么概而言之还不充足。另一方面，这亦使中国人同样惊奇一个西方的作家要投寄一篇杂志的文章并希望刊出时，为什么必须斤斤论究鸡蛋或牛油输入英国的百分比，或者是阿比西尼亚的棉花纤维的米突尺，或者是数百万工作时间的损失表呢？更混账不过的就是政治家们对开辟第二战线问题的普遍臆测，他们认为此问题可由握有“一切事实”的“军事”领袖们来解决，而对任何道德、心理与政治问题毫无判断之感。倘若中华民族曾经受过这种统计的迷惑，那他们早就不敢执武器来对抗日本军队了。在表示中国人忽略事实方面，举一位中国学者为例，他曾严肃写出人类的心脏是在胸部的右边；他的技

术真是不可名状——他简直连以自己的手都摸不出心脏的位置。另一方面，中国人可以反过来回答说："心脏在左或在右究竟有什么差别？倘若把胸部割开，你当然可以看到它，倘若不割开，你就没有办法见它。总而言之，甚至把它割开，你都不能奈何它哩。"西方将回答说："啊，是的，但我们要科学化和精确地找出心脏在那里！"中国人则将再回答说："不管你在何处找到心脏的位置都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心脏放在正确的地方。"此事乃约略表现事实的占量与价值的占量之别。

中国的人文主义（Humanism）或孔子主义都集中在某种的人情价值上面。我们若不认清估量的广大差别，则西方的读者将感到失望。孔子主义是排斥物理学及形而上学，而集中于人与人的关系价值上。我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并不能有多少发现，有亦微乎其微，但孔子主义说得好，知识有基本与表面之分：表面的知识是事实的世界，而基本的知识则为人与人的关系及行为的世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根据孔子的观点来说，少数也许很多，而多数也许太少。因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精义是在于从正确地估量人的价值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伦），以达到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即做人）。大意如此，但其意义则非常深远。孔子主义的观点认为政治必须补助道德，政府只是暂时的弥缝工具，法律是秩序的表面工具，警察是为道德上未成熟的个人而设的愚蠢发明物。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德成熟的人只从教育和文化及从启发礼乐而产生来的道德感才能培养出尊严和自尊的行为。完成社会与政治的秩序的方法

观念，是和西方经济学者与政治科学的学生的方法有天壤之别的。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种相反之观点遂与西方社会及政治哲学之机构大相径庭。孔子对任何文明的最后试验，则在于它究竟会不会产生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朋友和好个人。具有脆弱的敏感，而热烈地避免伤害他人的情感。这也许是文明的最后目的；也许不是，但我们怎能知道？也许在将来第二十五世纪的人民看来，今日我们个人或国家的社会行为似乎极端古僻。也许今日有些所谓世界的领袖，在第二十五世纪的人看来不过是具有部落思想的野蛮人，正像我们现在对汉尼拔(Hannibal)的观念一样。不过这种自欺的观念暂时必须继续的。

但是，倘若我们对自己说现在知识的蜕变与价值的崩溃，而号召着恢复某种人类价值时，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开始了。研究任何人类价值的估量，技术与哲学的基础并没有。只要机械的技术，与物质的方法继续支配着我们大学教授的思想时，则此种价值之不能被重新发现已是明显的事实了。所谓"唯物主义"我并不指物质的进步，因这是反对西方的普遍论据的。我是完全拥护物质的进步的。我所指的是作为方法，技术与观点的科学唯物主义，已经很绝望地麻痹了欧洲的人性，并把它抛入极端崩溃与混乱的状态中。

由于科学唯物主义侵入我们的文学与思想的直接结果，遂使世界陷入支离破碎的地步，这是可以证明的。人道主义的教授们乃被贬低到寻求机械主义的规律来支配人类活动的地位，"自然律"愈严格，与自由意志愈空想时，则教授们的知识的喜

悦就愈大了。唯物史观把历史当做决定论的鸟笼，而跌入鸟笼的两足动物的人则朝着供应食物的方向跳动着。我们这时代最令人钦佩的精神并不是意外，也不是最伟大的，而是顶流行的悲观论。我们国际的动乱是建立在我们的绝望哲学上面：像鲍德莱(Baudelaire)的绝望，休斯曼斯(Huysmang)的绝望，哈代(Hardy)的绝望、德雷萨(Dreiser)的绝望，伊里奥特(T. S. Eliot)的绝望，普劳斯特(Proust)的永久懊悔，萨姆巴特勒(Samuel Butler)，丁因格(Dean Inge)，赫斯黎(Aldous Huxley)的温和悲观主义，毕卡索(Picasso)立体派(Cubist)超现实主义者(Surrealist)，佛洛伊特主义者(Freudians)，精神病者(Psychopaths)与苛刻的审美学者(Hyperesthetes)等极端的绝望。只有像华尔，惠特曼那种健强的心理，没有受过科学精神之苦，他们是和生活本身，与伟大的人道主义保持密切接触，只有他们对平民保留着无量的爱和忠诚的。我很有趣地指出新英格兰文化之花是很接近中国的文化：惠特曼在他的神秘主义与他对这血与肉的人道主义的爱，托鲁(thoreau)在他的和平主义与他的乡村理想，以及埃默生(Emorson)在他那洞察与讽刺的智慧。那枝花不会再开花了，因为工业主义的精神已经摧残了它。

我们对于人性的观念已经被曲解被贬抑了。其基础已被打出宇宙以外了。这机构不能再支持了；其中有一部分必须打破。从这些零乱片断的现代知识中，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而东方与西方必须合作来建造它。

（《宇宙风》第143期，1946年6月30日）

论踢屁股

中国社会只有两种阶级：踢人家屁股者，及预备屁股给人家踢者。读书上学就是预备将来踢人家屁股的门路。(参阅《文学》卷一期五《达生篇》)

同是一副屁股，给外人踢比给国人踢荣幸。同一只脚，踢国人比踢外人有劲。

被外人踢屁股者常要向被国人踢屁股者夸耀。被国人踢屁股者常要向被外人踢屁股者表示钦慕曰："胡为我后?"

奴才最善献屁股，一旦得志，亦最善踢人家屁股。

儒家"定位"之说，是叫踢屁股者放心踢，叫被踢屁股者安分被踢。但安分之说总有点未足，故必益以道家为天下谿之说，其中有消极与积极之别。"安分"只是安分而已，坐待可以不必安分之时，并非满意；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则以居下为得势，以屁股被踢为乐。故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以踢人屁股为代天行教，失意时信老庄，以屁股被踢为得天。故中国人得遇时深觉庙堂之美，不遇时深觉山林之美。

弄堂中两个小孩子打架，拳头大的信儒教，拳头小的信佛教。

踢屁股有天才，献屁股亦有本性。天才应踢人家屁股而忽

遇屁股不愿被踢，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必骂其人如何如何。本性要献屁股求人踢而觅不到主人者，必饮酒赋诗，自叹时运不济。

踢人屁股者大都亦愿人踢其屁股，只要他认为对方有踢人家屁股的身分与福气。衙役、卑隶、司阍、马弁、政客、官僚等皆同时进行踢屁股及献屁股。

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家，天下有道，则皇帝踢皇后的屁股，皇后踢宦官的屁股，宦官踢大臣的屁股，大臣踢疆吏的屁股，疆吏踢太守的屁股，太守踢庶人的屁股。假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守己安分，循道不逾，一面被踢，一面踢人家，则分定位安身修家齐而国治天下平。天下无道，则宦官被皇帝踢屁股而哭诉于皇后之前，皇后反而踢天子屁股，于是上行下效，庶人踢太守屁股，太守踢疆吏屁股……是谓人心不古，天下大乱，百姓造反，而有革命党出现。

少年人好打倒人家，反踢踢之者之屁股。老成人则反是，有涵养。因为经验，阅历，世故告诉他，反踢者逆天，常要头破血流，至少亦须常坐冷板凳，甘受踢者顺天，顺天则宦囊饱满，升官进爵，命中有软垫沙发可坐。

文人政客失意时，每代屁股被踢之小百姓抱不平，主张屁股不应被踢，以合民治精神；得意时，又主张凡屁股皆有应踢之义，以符治安之旨。

读书人踢百姓之屁股，而武人又从而踢读书人之屁股。文人政客上台后，主张凡屁股非自我踢之不可，为公为私，皆不得不牺牲个人，为国效劳。不久，武人将他踢下来，亦恭颂曰："这一脚踢得好啊！"然而不久，又主张，凡踢屁股是违反民治

精神。

由被动的踢升为主动的踢，其中有一层工夫，叫做“摸”。然凡摸赵孟之屁股者，赵孟即有踢其屁股之权利。

同时好踢屁股，又以被踢时喊痛与不痛为分。被踢而不喊痛者谓之“有涵养”，好喊痛者谓之“不识抬举”。在中国屁股怕踢，或一踢便喊痛，还能算做屁股吗？

斯巴达儿童亦有打屁股不许喊痛之练习。但情形又与中国不同。斯巴达人是练习不喊痛，不是练习给敌人踢屁股，而且同时练习反踢。因为斯巴达人骁勇善战，亦善踢雅典人之屁股。

踢屁股哲学已深入吾国人心理，要把它革除，以一百年为限。

（《申报·自由谈》，1932年11月26日）

吴　宓

温源宁英文原著　　林语堂汉译

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常有人得介绍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还得介绍才认识，这种人面貌太平凡了，没有怪样没有个性，就是平平无奇一个面庞。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副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的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枝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

头既昂起，背又挺直，雨生看来是有庄严气象。他对于自己的学问是有相当的抱负，而他的好友也视他为一位天真淳朴的人物。他为人慷慨豁达，乐为善事，每为人所误会。待人接物，每偏于忠厚，而对于外间之臧否也不能漠然。因此雨生的心灵永是不安的，不是在怅惘咨嗟，便是在发愤著作。他虽极崇拜哥德，但他却未达到哥德所称羡的“不慌不辍”（Ohne Hart, Ohne Rast）的境地，这也如但丁吟“Io feigiubbettoa medellemie case”（我把我的厢房当做我的一架刑枷）一样的未

能达到这种境地。

世上有一种人，永远不知所谓年少气盛是怎么一回事，雨生就是其中一个。虽然已年满四十，他看起来总在三十与百岁之间。他待人以宽，待己却甚严，是信儒道，立儒行的一个人。容貌非常端肃，对事非常认真，守己非常严正。但是仍不能令人望之生畏。

雨生现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当教授。此外曾主编《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后者到最近才辞职。

雨生的教书，师道可谓无间然，只是在启迪后生的灵感有点缺憾。他照时上课，一秒不差；预备讲义，毫无敷衍。别人也许带了书本将要引用的一段文字念给学生听，雨生却无论那段文字怎么长，非先自背诵上口不可。他的阐扬发挥处是井井有条：甲、乙、丙、丁这样下去。有点干燥，是的，但总不会空疏。他不像另一种教员，说的天花乱坠，结果不知所云，他所云的都有个内容，或有错误但断不空疏。他总不依违两可，他的是非非常坚确；换言之，就是不怕有固定的意见。关于记问的事实，尤其是那一类在百科全书及各种类书可以检得的事实，他百无一误。只在见解上面，我们可以抓到他的毛病。在这种地方，雨生露出他的弱点，但是这个弱点，病不在论理不明或者立意不诚，病在他人文主义的立场——而且是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的立场。雨生不幸，坠入这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圈套。现在他一切的意见都染上这主义的色彩。伦理与艺术怎样也搅不清。你听他讲，常常莫名他是在演讲文学还是在演讲道德。

雨生办《学衡》，一切立论与胡适正正相反。《学衡》明明是大张旗鼓以与白话文学反抗，而保守旧有生活的。反抗是失

败了，但是其勇气毅力是可嘉的。他编《文学副刊》之勇气毅力也是一样的可嘉。他要叫中国读者注意西洋文学之史实，而不仅摭拾那文学的皮毛。史实、年月、数目，这是多么干燥乏味。现代人所要的是趋时喜新，随波逐流，摭拾这文学潮流上之泡沫草秽——Dowson，Baudelaire，Valery，Virginia Woolf，Aldous Huxley 等等。在现在时代，像雨生那样孜孜叫人研究Homer，Virgil，Dante，Miltonl 雅典文学，就要遭人不齿。

悲哉雨生，你是那样孤芳自赏，不屈不移。更可悲者，是雨生对自身也没有了解。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雨生为人坦白无伪，所以此点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见。人家知道他是崇拜拜伦的，并且曾仿摹 Childe Harold 写过一篇中文长诗。这种矛盾，让别人看了不自在，他却处之泰然。

每回我想起雨生，就想起他的苦笑的容貌及他清华大学里净朴的书斋和那被他的窗幔摈出的外边一片风华艳丽的野景。也许是我自己在痴想，但我常疑心着，如果他肯拉开窗幔，凭眺那野景或是勿再矜持，放心怡情的赏鉴那风华艳丽的一片野景，也许他的生活上不至那样不安，而面容上也不至那样苦笑了。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1947 年版《文人画像》）

胡 适 之

温源宁英文原著　　林语堂汉译

适之绰号“胡大哥”并非偶然。梁漱溟多骨，胡适之多肉，梁漱溟庄严，胡适之豪迈；梁漱溟应入儒林，胡适之应入文苑。学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适之是决不能做隐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难于分类，也大可不必分类。我想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约略可以尽之。也许加了三分学究气，减了三分才子气，适之的应酬可以少一点，学术著作可以丰富一点，但如此便少了一团蔼然可亲之气，而不成其为胡大哥了。这却何苦来！这一股才子气，又被他六分的学究气压下，所以若称之为“风流才子”也不甚适用，因为他的立身行世，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然而适之对女子，又不是像漱溟、雨生那样一副面孔。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克逊所谓“绅士”的范围。用这种体贴温柔于同辈及少辈，“胡大哥”之名便成了。

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

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

今年似是四十四吧？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瘦马相，只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灯下用功之遗迹。衣服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极敏，你说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声不是像岂明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适之所以不能成为诗人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呵呵笑的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在那眼光中，我们看出理智的光辉，那兀突不定的嘴唇，也老是闪过机智者会心的微笑。这样是不合做诗的。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顺明畅，像一泓秋水一般，晶澈可爱，却很少波澜曲折，阐理则有余，抒情则不足。人还是规矩人，所以文也老实。布风说过“文如其人”，正是此意。因此他的思想，也是近于厚重稳健，非近于犀利急进，他的观点是演化的（即所谓历史癖），非革命的（evolutionary，not revolutionary）。在此种地方，最可看出他盎格罗撒克逊的素养。丁在君、胡适之都是这一派思想的好代表，于是“高等华人”的徽号便落在他的身上。在普罗作家，甚至在一切急进派作家眼

光中，这种绅士气是极讨厌的。但是，适之的态度，是极诚恳极负责的。这从他的刊物名称《努力》可以看出来的。它这种态度，使他常傻头傻脑作文章，见要人，向一般急进派所认为根本无望的官僚军阀作劝告，不免太不脱化。然而在这好人极少的中国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不甘自弃的好人，而发生爱惜甚至景仰之意。

适之写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

（上海文艺书局1934年12月版《名家传记》）

说个人笔调

白话文学提倡以来，文体上之大变有二，一则语体欧化，二则使用个人笔调。语体欧化，在辞汇上多用新名词，在句法上多用子母句相系而成之长句。此种句法，半系随科学而来，谓之科学化亦无不可，因非如此结构缜密之句法，不足以曲达作者分辨入微之意。若曰“据说仁者人也”，“义者，似乎宜也”在古文中断断不许，然其精微表示思想，却系进一大步。又如曰“某派有溃灭，或腐化之倾向”，亦系欧化句法，古文中断断不能将原意如此这般表出，此种句法，开始于梁任公。章行严则恢复古文句法，而以西洋逻辑语调，断成四字句，归入新式古文，论理方面，较古文的确谨严得多，然少用双音语，总是求雅之累，读来颇似严几道《天演论》，未能餍足读惯西洋科学文者之望。白话文学改梁任公“之之乎也者”为“的吗呢了”，是承梁之遗绪，而在解放句体方面发展，因而有所谓语体欧化发现。其弊在鲁里鲁嗦。好的欧化语体未尝不可读，而普通译笔之诘屈聱牙，却非欧化之罪，乃译者原文不懂，中文不通之故而已。译者不甚了了原意，故亦不敢推敲原意译为中文合理的说法，致字字生吞活剥搬运过来，实不足言语体欧化。若有人译 Her husband's mo ther 不曰“她的婆婆”，而曰“她男人的母

亲”，译 He want from house to house to collect taxes 不曰“按户征收”，而曰“由一屋到别的屋子收税”，译 The butferfly flied from one flower to another 不曰“蝴蝶在花丛中翻飞”，而曰“由一朵花飞到别朵花”，真不足为法，但与语体欧化无涉也。兹有人投稿指我《卖花女》中译 Be kind to her 为“善待她”，认为错误，应作“对于她慈爱”，乃是英文不通，未知该语之实实为善待。凡善待人善待狗，皆言 Be kind to。此种人未悟此点，故将来作英文，“善待它”，亦必曰 Treat her well，而不曰 Be kind to her，故万世英文不通也。“对于她慈爱”看来似是“欧化”(因其决非中语)，实即只是原义未明，不得不如此生吞活剥耳。兹表过不提，且说个人笔调。语体欧化在科学文极为重要，而个人笔调在文学上尤有重要意义。大约有两种意义，即(1)遣辞清新，不用陈言，与(2)笔锋带情感也。以前《自由谈》讨论读《文选》问题，是非姑勿论，但有一举例甚好。在一小学作文课上，有题目曰《观飞机》在描写飞机航行，本有两路可走，一即拾袭古语，曰“袭人云际”、“翱翔云间”等，另一路是凭小学生所思感曰：“像一只蜻蜓在空中飞来飞去”。后者即个人笔调。此种笔调，在文学之解放上有重大意义，即使中国干枯之文字，变为丰富而得新生命。如此人人得尽依其思感，发为文字，属辞比事，变化万端，充量发挥，必成西洋现代散文之技巧。盖古文中能描写翱翔状态之句，既极有限，其中学生勤苦用工而能吸收记得者，又极有限中之有限，所记得中之古语适足以表示飞机之翱翔者又有限之有限之有限，宜乎行文每每不能达意，且使果然拾得两句什么“直冲霄汉”的陈言，读来还是陈言，毫无生气，其文学上之表现力远逊于以蜻

蜓作比之自然语调也。今叫学者丢开书本，只说现代物语中实有之感触，再培养其文学鉴赏力，使在现代物语中锻炼出来传情达意之说法，便可时有清新可喜之句及笔调出现。综视西洋散文与中国古文之别，实只西洋文清新，古文干枯一点而已。实因英文散文系继乔索个人笔调之遗绪，若黎利之英文四六骈俪，不十载已为英人所唾弃。中国文字萎靡时期，诗人不复由人生中求诗句，只在前人诗中求诗句，散文作者亦不复由人生中求辞句，只在古文中求辞句，结果徒叹三代之文不可及。夫三代之文有何不可及？亦今人作文方法之谬误而已。西洋最平常小说家固未尝读《左传》，而叙事能力不在《左传》之下。所谓古气磅礴之文，实只是与人生接触，由当代事物得生命之文而已。司马迁行文，辞汇极丰富，造句极自由，即文学未陷入因袭苦劫之自然景象。司马迁敢言"期期以为不可"，后人倘未见司马迁之句，则不敢将此句放入文中耳。古文生，今文死，只是这一点道理。

实则作清新可喜之句，亦须有胆量。白话固已推翻文言之烂调。而白话文人，我看仍极不自由，每每欲以文饰其陋，以致有"心弦的颤动"、"快乐的幸福"等新烂调出现。毛病不在意中着想，只在文中着想，长此下去，必又回到干枯状态。今代文人之最大任务，在如何将现代语锻炼起来，使表现力增加，而欲如此，非自个人笔调中求之不可。盖脱去陈言，只好求个人之言，陈言不说，个人之言又不说，则必亡一句话可说。且必须不怕人讥其俚浅，始可尽最发展此种笔调。若曰"似一只蜻蜓飞来飞去"，在中文或疑其俚浅，然在外国语中，并不觉得如此，乃文体已炼成，读者读惯所致。昔人不懂此种道理，作

文专求高雅，故如袁中郎已使古文获得新生命，而仍沉没下去。黄道周谓中郎“文藻卑庸”真不知如何说法，朱彝尊、纪晓岚辈亦如此，皆无眼光人也。纪晓岚非无文才，而其所做庙廊诗乃真正文学中屎橛，乃论文观点所误耳。实则只敢放进自然语调，即使是四六臭调，亦可得新生命。试举一例，陈其志重修《鹤林寺疏》有句曰：

“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竖起拂铁小一丸，放下锹金焦两点。要识西来祖意，暮潮边帆影高低；欲知首座禅心，烟树外钟无远近。”

又有句曰：

“谩夸缭绕绀园，越世久，踏成樵路客；遮莫崔嵬碧殿，数年来，址作野人居。”

又有句曰：

“白牸牛，骑来露地；赤斑蛇，窜出惊人。推倒回头，踢翻不托，只当逢场作戏；九峰拽耜，杨岐牵犁，不妨到处随缘。寻常贬剥诸方，箭锋机句中有眼；造次受敌八面，本家诗笔下无痕。”

读来即有生机，清新可喜，不如寻常四六谀词满纸之令人讨厌。

近人著作中，最擅个人笔调者，莫如周作人。此自公论，非余捧场。《苦茶庵小文》“七”（《人间世》第五期）有句：

“半农谓当系打拳卖药者流所张贴者，是或然欤，此则更令余觉得大有意思者也。”白话文或文言文作此种句法便有生命，否则不大那个了。又能造句曰（《人间世》第四期）：

“假如平伯早说一声，或多写几张六行书裱人亦无不可。今

须题册上，乃未免稍为难耳。不得已姑书数语，且以塞责，总当作题过了也。”

此纯是心中一句话，常人不肯如此说法。然不肯如此说法，提倡白话，有何意义？若讲此种语无“文”，无表现能力，恐只是眼光问题。不足言锻炼国语为文也。又有一句：

“唯题亦无甚话可说，只是有一件事想提出异议，废名题跋中推重太过，transparent意过誉亦失实耳。雨后新凉，偶记此语，乃并不待废名之催而写了矣。”

至于笔锋带情感，乃自然之事。见上数例，可见其真情自然流露也。情感或狂热，或豪放，或清静，不可勉强。而作文时，尤贵将此时心中一点意境表露出来。在小品文中，表出此种心境最为可贵，且凡有心境，皆可写成文章。本文已长，肚子微饿，想不写下去了。

（《新语林》创刊号，1934年7月5日）

说 潇 洒

人生永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其原因在于人之心灵总是一张一弛，若海之有潮汐，音之有节奏，天之有晴雨，时之有寒暑，月之有晦明。宇宙之生律无不基于此循环起伏之理，所以生活是富有曲线的。袁中郎说的好："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寿存齐张公七十序》）其在人，发而为狂与狷二派；其在教，发而为儒与道二门；其在文，发而为古典与浪漫二类。此二派人生态度，虽时有风尚之不同，而无论何时何地，却时时隐伏于我们的心灵中，未尝舍然泯灭，只是盛衰之气不同而已。那一派消灭都是一国的不幸，如在中国，可谓全国是无进取之狷者，所以有这种颓靡不振之现象。即如在中国文学，名为儒家经世派的天下，却暗地里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如山林思想，归田思想，归真返朴，保和持泰等。有时同在一人的生平，也有入世出世之两种矛盾观念角逐于胸中，远如诸葛亮、孔子、苏东坡、袁中郎，近如梁漱溟、鲁迅便是（鲁迅于文学革命之前是在槐树院里作一长期自杀者）。

在文学上，这重要区别，可以说是在"工"与"逸"二字。古典文学取工字，浪漫文学取逸字。我常想到中国现代文学，从

广义讲是在经过浪漫的时期。在此地，浪漫二字几乎就是等于解放的意义罢了。凡在经典主义过活的人及社会，其人态度必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然后可以达到现代西洋文化的阶段。以前读西洋文学史时，最可使我惊异的就是十七八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之根本相同，同是在注重用字修辞之"工"，同是标举格套（即中国之笔法章法，如戏剧之"三一律"，凡越雷池一步便遭人鄙笑），同是多用僻典，同是模仿古文，同是避用俗字（如鱼曰"鳞族"the scaly tribe 鸟曰"羽类"the feathery race 天曰"穹苍"the firmaments 月曰"美人"mistres of the sky，简直与中文一般无二），其结果，又同是桎梏性灵。蔑视天才，缩限题材，而文学之路愈走愈狭。所以如莎士比亚这样的妙文，竟被（新古典派）埋没了一百五十年，直至 Lessing 出，浪漫潮流开始，才能恢复其盛名，这真可谓咄咄奇事了，但在我们中国何尝不是如此。我从袁中郎《狂言》中看到明末李卓吾已看得起《西厢》，而评点《西厢》，并且推重其本色之美，是推重《西厢》文学价值，金圣叹只承李卓吾之遗绪而已。那时袁中郎赏识《金瓶梅》，冯梦龙赏识山歌童谣，及李卓吾之赏识《西厢》，都可说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浪漫文学都看重"才"字"逸"字。在西洋十八世纪末叶浪漫文学开始，最风行的就是这"才"字（genius），及"逸"字（romantic）及"幻想"（imagination）。这也没有什么神妙，只是工整的文学必有读厌之时，及其读厌，惟有求放逸而已。所以工与逸的转替，也是这寻常生律起伏之一端而已。

本篇并不是讲浪漫文学，而只借此讲讲人品及文笔之潇洒。因为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

讲才华。谨愿者以工，才高者以逸，在做人，在行文，在画画，同一道理。若苏东坡之冠代才华，自然独往独来，无窒无碍，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但是我所要讲的是，无论何人总可表示一点逸气，把真性灵吐露一点出来，不可昏昏冥冥战战兢兢板起面孔以终世，这样的人生就无味了，充满这种人的社会也成了无味的社会。但若只求多寿多福多子混过一世，也不要什么性灵，这也未始不可，至于艺术创作却以此一点性灵风骨为生命。性灵二字并不怎样玄奥，只是你最独特的思感脾气好恶喜怒所集合而成的个性。在洋文，这叫做 personality，用个性翻还不大好。我们可说某人做人或行文太没有 personality，但不能说某人太无个性了——除非我们开始这样用法。在中文似乎说这人太无韵致，太无风味，或太无骨气，是一种株守成法，依违两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有个性（风味）的人，你看见就喜欢，因为你看见一点真。在中国我想得有这种个性的人，如以前的徐树铮，他是一位敢作敢为敢承当的人，虽然他不是怎样的好人，但是比起奴颜婢膝的人总有人味吧。在文学上，在政治上，在艺术上，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这一点个性，这一点风味。先从女人说起，可以一直说到文学作风，一贯而下。我们同事有一位女博士，虽然其貌不扬，但她有一种才调，也不仅是所谓应酬手腕而已，虽然我也不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是她决不能说是庸俗。在电影上成名的，就男明星来讲，有二位最有个性风味的，一就是亚里期（演 Disraeli'Voltaire 之 George Arliss），一是里昂·巴里摩亚（Lionel Barrymore），他们的艺术就是潇洒的艺术，叫你觉得有种引人之魔力，平常讲似乎是说“那人很有趣”。电影艺术之高下，就是看你能不能把那不可无一不可

有二之潇洒风味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人家就喜欢。在女的，我不讲瑙玛·希拉（Norma Shoarer）诸人，而讲曼丽·特兰澈(Marie Dressler)，那位忽怒忽喜不拘泥守礼而有一副慈悲心肠的老婆是多么可爱啊！是的，她脸孔一点不漂亮，但是仍会十分可爱。明这个道理，就会明白所谓性灵文学，所谓潇洒笔调之魔力。这倒是行文一种秘诀。普天之下莫非食饭遗矢之辈，这里一篇很合圣道，那里一篇也很合主义，但是圣道主义或则有，作者面孔却看不到。这就是所谓达到“工整”文学看厌的时候。一人在写作中，能露出一副真面目，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又有他自己个别与众不同的所谓作风，自然能超越平庸而达到艺术的成功。多半人的作风思想就这样依样画葫芦的，你要打出这庸俗之范围，除非打破那无形的格套，脱离那无形的窠臼，才能保存你自己。不能保存你自己，又怎能有动人的力量？我想一人常常看亚里斯、特兰澈诸人之表演，而体会出其潇洒的骨气及风味，便可以懂得作文的所谓个人笔调，因为一切艺术的道理是相同的。

廿四年元旦试笔

（《文饭小品》创刊号，1935 年 2 月 5 日）

慈善启蒙

Beverley Nichols 此公甚妙，老是替小孩跟大人开玩笑，每每抓着我们心头痒处。他所著书，有 Crazy Pavements，Are They the Same at Home? 等十一种，而我所读过有“只给成年人看”(或作“禁止儿童阅览”For Adults Only，1932）及“妇儿在后”(Women and Chidren Last，1931）二种。第一种及第二种之后半部有所谓“启蒙”文章，如“电影启蒙”、“皇家书院启蒙”、“宣传启蒙”等（A Child's Guide to the Tallcies，etc)。内容一律取问答体裁，一母一女。女也不知几岁，总是跟一切活泼小孩一样，问东问西，而所问又都是极天真极有理的话，因此常常刺着大人的伤疤。借此大人之虚伪，可笑，无理，势利，愚蠢，顽腐都被小孩问出来了。尼哥罗斯是牛津大学著名辩论家，其方法并非用大刀阔斧，乃是用短小利剑，轻快犀利，伤痕不深，但善中要害，不久被伤者总是大笑而死。此小孩总是东拉西凑，层层迫人，而最妙是那母亲中伤之时，无可奈何，总是用严厉的教训作遁辞，大致是“你早晨手也不洗”，“你又把手指放在嘴里”，极有声有势地敷衍过去。而每次问答的结果，虽然小孩总是被人教训，而实际上读者公评都是小孩胜利的。我们想，世上如许欺诈、虚伪、陋俗、顽固之事，那

堪一聪明孩子本着天真纯朴的眼光去追究？因此他这体裁，几乎对社会上无一事业不可用来戳穿，讽刺。

现姑就“慈善启蒙”译出作一举例。中外常有假赈灾之名开跳舞或化妆大会，给与绅士闺媛作乐个一夜痛快，其实在灯红酒绿之下，有谁真想到那被赈的灾民？

开场时母亲立在镜前，正在顾影自怜。头上是金碧辉煌的珠饰，足穿希腊古式草鞋，而足趾上已染上金色。小孩越看越出神而越懵懂起来。由是问答开始：

女：妈，你怎么打扮的这样？

母：因为今晚我要去赴慈善化妆大会。

女：你是扮谁呢？

母（快活的叹一口气）：扮突洛伊的赫伦（Helen of Troy 古代第一美人）。

女：妈，突洛伊的赫伦很慈善吗？

母（心不在焉）：是的。

女：她染足趾就是因为慈善吗？

母：不是！

女：为什么不是？

母：因为这太荒谬了。你懂得什么？

女：我要等到几岁才可以染足趾……

母：不要吵！

女：赫伦几岁才染起她的足趾？

母：我不晓得。

女：是不是她发慈善心时才染的？

母：是的，是的。

女：她对谁慈善呢？

母：无论谁。

女：妈，你是不是对无论谁也都慈善？

母：总应当如此。

女：那末，求你让我染……

母（严厉的）：你嘴里的别针还不拿出来。吞下去，你得割了盲肠。

………………

女：今天慈善会为什么开的？

母（不甚清楚）：公益的事。

女：什么公益？

母：许多穷人。

女：什么穷人？

母：那个，那个……很穷的穷人。

女：那些穷人要来化妆大会里看你染金色的足趾吗？

母（怒气的）：说什么鬼话！

女：为什么不？他们不喜欢来吗？

母：咳……你听我说……是说……这都没有关系的事。

女：那么什么才叫有关系的事？

母：这化装会并不是为穷人而扮演的。

女：你刚刚说是为穷人。

母：穷人得了好处。但是他们不能来看。

女：为什么不？

母：咳，你专问这些没来由的话。他们来了要觉得不自在。

女：为什么要不自在？

母：就因为他们要不自在。连我们也不自在。

女：为什么？妈，你不爱穷人吗？

母：当然的，我爱穷人。

女：那末，为什么不让他们来看你的足趾？

母：（发急了）：你真是！别扯我的衣服！回头满是你的手印，像个什么样子？这衣料一码得五个金磅（八十元）。

女：这衣料真正一码五金磅吗？

母：真的。而且实在值得这么多钱。

女：穷人也这样想是值得的吗？

母（猜疑的）：你讲那一回？

女：我不过在这样猜想。

母：你不应该瞎猜想。你应当老实一点，随其自然，别要凡事寻根究底。

女：你的足趾也不随其自然。

母：你敢说到我的……真是……讨厌死了。你这样一搅，搅得我都没心情赴会了。

女：妈，你很想去吗？

母：而……

女：你想不想去，妈？

母（答时用字极费踌躇，因为小孩这样利害推敲字面，已被问慌了）：自然，很令人操心。我走在全队前头。而且……有很多小气的女客。还有许多人要给你照相。（略为得意忘形）但是自然也有两队极好的音乐队，而且餐后还有几种真好笑的杂耍。（忽然停止）你到底怎么一回事，向人这样呆呆的痴笑？

女：我只是心里想，穷人真有福气。

母：怎样有福气？

女：你想，你得这样受罪，才有钱给他们，那不是有福气吗？

母：不懂你的话，你总是讲疯疯颠颠的话。

女：假如你没有这会，没买这衣料，而只耽在家里，而把染足趾的钱施给他们……

母（严厉的）：我告诉你多少回，别把你的脏手摸我的衣服。难道老妈不会教你规矩吗？

…………

女：妈，他们为什么选你做赫伦呢？

母（微微作痴笑）：而……总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有些像她。

女：是不是因为你面貌很慈善？

母：慈善？这与慈善有什么关系？

女：妈，你说什么？

母（有点忙乱）：而……自然我们都时时刻刻想到这慈善关系，但是有时也……我说……别老弄那些别针……原是这样的，他们选人的时候，总得——而——看外貌。所以他们选我。

女：啊！我懂了。

母：你干吗这样恶狠狠的说“我懂了”？

女：我不过在猜想，你说“外貌”是什么意思？

母：我不懂你的话。

女：因为三姨说他们所以选你不过因为……

母：你说啊！

女：如果我告诉你三姨的话，你可肯给我染足趾吗？

母：不可以。

女：那末，我三姨的话也忘记了。

母：你怎么这样会说谎？

女：我可不可以染……

母：也许……要看是怎样。

女：三姨说他们所以选你，不过是因为没人会争闲气。

母：（轻微笑着）：三姨真可人！

女：三姨说，因为自然这是荒谬不堪的主意。

母：什么？

女：而且，自然你应该扮的是麦散……是麦散……我记不清那名字（按 Messa……系指 Messalina，罗马王 Claudius 之后，以淫欲无度恃宠欺君在外偷情著名）。

母（如丧考妣的）：三姨说这种话！我早就疑心她……你现在干吗？

女：脱袜子。

母：为什么？

女：因为我也要参加慈善的事。

母：你发疯了吗？闹什么鬼？

女（啼哭着）：妈啊，妈啊，我真想染……

母（这回真正有打耳光的声音）：你再不走开，我就得发疯了。即刻给我上床。（气得发抖）今晚还有什么心情去赴会？！

幕完。

但她终于去赴会了，而大家说她的足趾真是美不可言。

（《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5日）

说本色之美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浅。我想中国诗文的地位与西洋正相反。在中国，诗词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并不如中国之玄妙，而韵文之赏鉴反限于少数文人。这是以东西相比言之，若单论本国，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诗普遍，能文比能诗者多。然而就诗而论，中国不但取士用诗，楹联巧对也用诗，射覆酒令也用诗，罍盒刻字也用诗，画家题画也用诗，才女择婿也用诗，毛厕题字也用诗——这些种种是西方所无，所以说诗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况用中国文人全集一翻，总是五七律绝占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现象。诗之好坏且勿论，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两韵佳句，登临旅次，偶尔吟成一绝，总是怡养性情，是好不是坏。

至于文，便不然。以中国与西洋相比，中国文章已成为文人阶级之专有品。若非操笔墨生涯者，必不敢过问，也不肯过问。故中国银行家不撰文，悬壶行医者不撰文，实业大家不撰文，甚至连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说撰文，便是秘书文牍之事。盖一则银行实业政治各界一闻文章二字，则顾而却走，那敢动笔；二则文章实在太难，宣言有宣言文，书面有书面文，启事有启

事文，议论有议论文，其中有笔法，有体裁，有古董，有典故，有声韵，外人切切不敢问津。所以做一总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饭碗才保得住，圣眷才见日隆。这都是因为中国文言之难，及文学观念之误。此刻原因且不讲，但讲结果，结果是这样的：（一）外国实业大家也要著书，如福特便是，中国实业家就未尝梦想过著书。虽然福特著作未必是亲笔，然而也不见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书记笔录，再加修饰的。所以外国出版界，内容比我们丰富。（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兴大将，劳易·乔治，顾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将政治生活，记录下来，有叙事，有议论，对于一时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国政治家便不见有同类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视文学为畏途外，一方是因为懒，又一方因为中国社会尚面子，尚虚伪，大家没有恕道，怕得罪人，也实在容易得罪人。（三）杂志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经验或职业经验说话，救火队长叙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长叙述航空危险性，书店编辑叙述书店黑幕。在中国，如有杂志编辑请航空署长赐文，则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书代作无疑，而秘书所作又必是八股无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国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后而最坏的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人生，虚而不实。宣言等文既有专家代庖，专家必做得篇篇“得体”，既然“得体”，便是“应说尽说”，便非“心头所要说”，便是“你未说我先知你要说”，故无一句老实话。倘使有人于此倡言，文章不必得体，只须说老实话，务必使文学去浮言，重实质，而接近人生，幕僚师爷之饭碗也许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讲实话，少听放屁，举凡车行药贩经理皆敢为文，而一般文字范围得以放宽，内容可

以丰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现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险家（Trader Horn），或江湖豪杰（Revolt in The Desert）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顺而文章魔力极大者。我是最恶文人包办文学的。须知文人对于书本以外，全是外行，故做文非抄书不行，况且书本范围以内，书读通的人也实寥如晨星。只许这班人为文，则文风尤趋于萎弱、模仿、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学范围放宽，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实在纯文学立场看来，文学等到成为文人的专有品，都已不是好东西了。历朝文体，皆起于民间，一到文人手里，即失生气，失本色，而日趋迂腐萎靡。《国风》之诗，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辞，也越久越不像样，而沦为赋。赋被文人弄坏，于是有乐府，以后诗词戏曲的兴灭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冯梦龙、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谣山歌，以为在文人所作诗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愤而著者自遣，排弃一切古文章笔法，格调老套，隐名撰著，不当文学只当游戏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长、金圣叹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若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金圣叹谓诗者心头之一声而已；心头一声有文学价值（如“悠然见南山”、“举头见明月”、“衣沾不足惜”之类），念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头一声本无文学价值，任汝如何润饰，皆无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

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近译《浮生六记》，尤感觉此点。沈复何尝有意为文？何尝顾到什么笔法波澜？只是依实情实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下来，而结果其感人魔力，万非一般有意摹写者所能望其肩背。称之为化工，也未尝不可。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论语》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贡入，有何文法可言？挟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顺口瞎扯，何尝学什么人来？今人若没人写过"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骤然以之入文，便自觉鄙陋，把它删掉。这种人还配谈文吗？

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头话用最适当最达意方法表出。识破此理，一概《作文讲话》皆不必读。

要紧看你有话可讲否？有话可讲，何必饰他？无话可讲，何必说他？有话可讲，何必修他？无话可话，何不丢他？说而不饰，丢而不修，是为天籁。

（《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3日）

与又文先生论《逸经》

又文兄：

你办《逸经》我甚赞成。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单看目前《人间世》第四十二期出版一个月我应得的几本尚未送到，而北四川路至愚园路并不很远，——这就可以令人明白我何以主张办报非自己办不可。

《逸经》与《人间世》性质不同，而却有相同之点。中国人素来皆自认为前进，他人皆落后，自己是爱国，他人皆消闲，因此凡做一事，必有许多人起来任义务检查员，给你指出迷途，归入正路。大概态度以为这个国唯有他才可以救。政治家文学家皆是如此，何其不自量也！所以言幽默，便有人说这是《笑林广记》；言小品文，便有人说这是恢复古式的笔记；言“闲适”笔调，便有人说这是“消闲”；言明末文人反对摹仿文学，便有人说这是叫人摹仿明人。这一类高明的批评家，理论只能如此，你哪里去同他辩？现在你出来办《逸经》，高明的义务检查员看来自然又有话可说了，而可以批评《人间世》者批评《逸经》。“逸”字与“闲”字相近，而“闲”字与“消闲”相近，而“消闲”、“有闲阶级”又与“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相近，其弊类《文通》作者不应姓马，此其一。《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便是

笔记，而《逸经》载野史轶闻亦便是恢复笔记，此其二。所以我想在这小品文与笔记用法上面说说几句话。

高明的批评家，似乎不曾查到笔记体裁可以别开生面，小品文范围用途也可以发展扩充，犹如高明的批评家梦想不到幽默也可于茶余酒后之外别有启迪灵知润饰文章助长思想之用途，《人间世》提倡小品文笔调，以谈话腔调入文，而能为此笔调者尚少。愚见以为西文所谓谈话（娓语）笔调可以发展而未发展之前途甚为远大，并且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中国文体必比今日通行文较近谈话意味，以此笔调可以写传记，述轶事，撰社论，作自传，此则专在当代散文家有此眼光者之势力。此种笔调甚平易而实亦甚难，非"健谈"者写来便薄弱，无气力，而"健谈"岂易事哉？芥兰菜炒牛肉片人人会炒，而炒得老嫩相宜耐人咀嚼，岂是易事？

兹本此义，姑以愚见以为可发展之几点说说。

(1) 斯脱奇 Lytton Strachey 以小品闲散笔调作传记，在传记学中别开生面，似小说，似史实，于叙事之中加以幻想，于议论之中杂以轶闻，此有可采者一。中国人做传记太幼稚了：史论太道学，传记太枯燥，少能学太史公运用灵活之笔，百忙中带入轻笔，严重中出以空灵，所以中国传记技巧上极其幼稚。你想道学先生替人家做墓志铭，那里懂得什么空灵细腻？今日读不到一本好的《袁子才传》、《金圣叹传》、《苏东坡传》、《曾国藩袁世凯传》，——即是有也都是考证家戴玳瑁眼镜的玩意，那里会有一点文学意味？今日可作的传记很多，若李鸿章，若曾国藩，若张宗昌，若徐树铮，何一不可运用生花之笔做一本极

好传记?

(2)轶事等于西洋 Anecdotes,扩充起来便是 Episodes 而成为成段的描写。中国人记笔记的伎俩,我最反对,一事仅仅一段十几行二三百字便完,这都是文言之束缚所致。我的意思是:除了不分类,不整理,无议论,无描写的零乱随笔以外,也应用白话写出较可读较生动的成段文字。一段轶事至少可以写成一二千字在篇文章。我看此刻新闻记载,还不是"陈仓暗渡"、"珠胎暗结"的老套,那有什么生动的描写?中国这种散文非弄得他灵活一点不可。大家少写史论,与其于千百年后评古人某者"自知不明",某者"自信不笃",替古人做训育主任,还不如用心理学的知识与文学的技巧把他写成一段体贴入微的心理素描。以体会代武断,以心理代道学,譬如骂秦桧骂严嵩者多矣,但是谁曾写出秦桧的心理来?古人鄙夷小说为稗官小道,今人既然承认小说是文学,何妨运用小说解剖心理之技术入于笔记?

(3)时评及时事记载今日都不见得有人用闲谈笔调写出。我不是说记载必不可严谨板重,然而于严谨板重之外,不妨别开生面,化板重为轻松,变严谨为幽默。最好的例,便是纽约的《泰晤周刊》(Time Magazine 非《泰晤士日报》)。此刊数年前为大学毕业青年所创办,即以纯粹口语及闲谈笔调叙述国家大事及时闻。一用此笔调便有许多材料严重记载所以不能用者可以列入。同时持负责态度,求不失实,不似一般小报。《泰晤周报》风行一时,销路六十万,便是因为他的记载特别灵活,人家读得下去。细想今日一切文字所以如此板重枯燥,都因有鬼吓煞人也。写作方面,有学究鬼,有考证鬼;批评方面,有刻

薄鬼，有道学鬼。左派言古代幽灵复活，我言古代幽灵向来就不曾死去也。吾甚愿见文笔轻巧而内容负责不失实的时事记载各地通信，《逸经》可勉于斯否？

（《逸经》第1期，1936年3月5日）

论月亮与臭虫

鄙人前在某校讲演《中西文化之沟通及国人应立自信心理》，今日再就这题目阐发一下。今日吾国文化界所必须研究或注意者有二事：一、对自己固有文化的认识；二、对东西文化沟通之要领。前所讲为基本态度，今日所讲仍是基本态度。

有人说中国只有臭虫，没有月亮，中国古书有毒，固有文化整个要不得，整个是封建思想，是士大夫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一派人同时说外国只有月亮，没有臭虫，并且不许人家说外国有臭虫，说外国有臭虫便是反动，复古。这种根本对自己对他人的文化没有精深了解，根本剥夺国民的自信心，既不承认中国有固有文化可言，自然谈不到东西沟通。好像娶媳妇，本结秦晋之好，现在只把男儿"嫁"出去，根本没有男家姓氏，只可称为灭种亡国思想。心中既没有东字，何来东西沟通？只把东字抹杀学个不东不西的西洋文化，这不能称为思想，只是洋场恶少的思想，也是臭虫思想，也就是今日中国文化界臭虫之一，应该见一个扑一个。

也有人说中国只有月亮没有臭虫，这是庚子拳民满清遗老思想，这样有东无西，也就谈不到东西沟通，但是这可以不说，因为今日的中国思想已进步，已没有庚子拳民思想，可以置而

不论。

正当的研究态度，应当是说中国月亮固好，臭虫也颇肥大；外国虽有臭虫，也有月亮，且虽有月亮，也有臭虫。外国臭虫不一定比中国好，即使比中国臭虫体格大，色泽美，也不必学哥伦比亚博士，必欲捉外国肥美硕大的臭虫放在中国床上，而后心安，而后美其名曰摩登。

这等于讲中国文化固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文化，外国文化也并不是十美十全，各国文化有其利弊优劣，外国月亮，也要欣赏，外国臭虫也要防范；对本国外国文化都具有真切的认识，批评的眼光，东西的优劣，各以大公无私的学者眼光见识去批评，这才是叫做东西文化之沟通，而且才沟通得来。若单说外国全好，中国全坏，只许人吃瑞士牛奶、巧古力糖，不许人吃中秋月饼，并且骂吃中秋月饼为反动，学吃巧古力糖者为开通，这就未免太幼稚了。

大体上说，此时中国文化界思想，还在这幼稚阶段。大家还是做西洋美满世界的梦，禁止人家说外国有臭虫。所以我要发两个问题，叫大家用脑想一想。

（一）西方文明如果是完美无疵，何以二十五年间发生两次大战，何以欧洲社会大动摇？何以发生纳粹思想？何以人权摧灭，公理无存？何以强权思想牢不可破？

大战只是起于社会思想，人生人心之不安，若非精神界有混乱状态，战事不会发生。

（二）若说中国固有文化不行，何以这四千年来还能保存这有礼义廉耻的百姓？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有新认识，才能知道中国何以会有这样朴实勤俭淳厚可爱的老百姓？这样朴实淳厚忠

孝廉节是否孔孟遗教儒家思想所结晶?并且值得不值得保存?大家应用脑子，至少对中国礼教存疑，不便一味抹杀，或者因疑而悟，因慎思明辨而得一种新认识。

今日大家思想仿效西洋，自然比庚子拳民进步，但是还未能做到东西文化真正批评的地步。一面妄自菲薄，一面盲目崇拜西洋，这是了解东西文化的精神上的障碍。原来《新青年》时代大声疾呼唤起国人猛省，这是必要的一个阶段，不唤醒就不求振作，大家昏聩，无疾以终。那时北京政府就是昏聩的大本营，北大就是思想革命的中心，所以陈独秀骂贞节观念，骂吃人的礼教，都是好的，必要的。胡适之提倡西洋戏剧、短篇小说，也是好的，必要的，这是一种唤醒运动。但是那时已种下盲目崇拜西洋根苗。比方说曹雪芹不及陀斯托以夫斯基，这便是胡闹，说礼教只有吃人，别无精深伦理思想，也是胡闹！这派思想，总称为左派，根本不要青年读古书，以免染毒，于是语体欧化，什么都来了，青年文字，不求简洁，只学不清不白的冗长欧化句子，欣然自得，自号激进；以文字不通为欧化，以国文幼稚为摩登，一呼百应，成为风尚，今日白话文之落后，正吃这亏。

这思想，就是我所讲洋汤恶少的思想，其人品性格并随而改变，古道古风荡然无存。这一派根本认东方文化为士大夫阶级，小资产思想，要不得，所以对于东方思想根本不取研究态度，只取攻讦吐弃态度。一方面对西洋思想文化也无认识，因为左派中人大都留日，并非留英留美，对英美及普通欧西文化尚隔阂，说起西洋文化，未免如小儿听说外祖母家故事，惟有兴奋，未有了解，所以这一派对于欧西文化，便有像《穆天子

传》演说西王母的神话意味，到了西洋便是上西天极乐世界。所以这一派听人家说外祖母家也有臭虫，竟不是仙童玉女瑶池盛宴，便不大高兴起来。

要真正达到沟通东西文化境地，第一便须有自信心，立稳脚跟。要自信心，必要胆识，然后能方寸不乱，去批评各个的优劣。东方月亮也赏，西方月亮也赏，东方臭虫要扑灭，西方臭虫也要扑灭。若自信心不立，先自慌张，认为东方本无文化，方寸已乱，见了西洋文物，五体投地跪拜，怎么能够说得上批评。

但胆识最不容易，譬如西洋政治学，若只抱书本，还不能作东西政治的比较，西洋政治的比较。西洋政治学专讲政制机构、代议制度等，可以叫你读得昏天黑地，愈读愈糊涂！你问一问中国政治学如何？便发觉一大不同之点，就是礼乐刑政四者缺一不可，寓伦理与政治于一炉，先建伦理秩序为政治秩序的基础，所谓“政者正也”求事物之正，上下各得其所。要能这样看法，必先能把政治学之目标认清，目标认清自然政治学与中国之治道看为同一目标（即求事之治)。而发明方法上之不同，甚至发明中国儒家之言治，并不在西洋政治学之下，这样便沟通起来。

再如社会学也可以念得昏头昏脑，而缺于胆识不能融贯东西。西洋社会学，多半是搜集客观比较材料，但是一究其哲理，便又不能不发疑问，社会学是否研究社会与人的关系何以不讲伦理？这样又发明东西社会学根本立足不同，方法不同之处，而互见优劣。大凡天理一也，古今中外，学理尽处相同，只要有胆识有见解，自然有东西通之理。一味捧书本上西洋大学听讲，

不回头一究中国本有的学理，就不足以言沟通。

再如哲学，死读西洋哲学是无用的，有人以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值得研究，独《易经》比黑格尔更精通知远，世运盛衰的哲理不值得研究，便是根本不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何物。一般肤浅见识，有人以为西洋“相对论”可以研究，独吾国老庄思想天道循环及等差相对之说不许中国青年研究，也有一样盲人摸象鼻，不但对吾国哲理不能了解，就是对“相对论”的原理，也没有真知灼见。

总之，要讲东西文化的沟通，大家必须肯用脑筋，用思想并重工夫，然后能贯穿中外，由思而疑，由疑而悟，自然到达一种融合贯通之果。并由融合贯通而对吾国旧有文化起立信心，有自信心而后中国人敢说中国话，已往文化思想得以继续不堕。

（《文艺春秋》丛刊，1944 年 10 月 10 日）

“五十以学《易》”辩

拙文偶引《论语》“五十以学《易》”一句，本出于人人所读人人常引之监本四书，所谓正经正注，乃引起缠夹二先生凑热闹君子藉端称引清儒，卖弄鸿博。其文本不足辩，乃一般未读古书之青年，为所愚弄，将信将疑。个人足迹所至，记者每以此相问，一若真有可辩之价值，故客中抽闲，聊写数行，一解天下疑窦。

（一）读经旨在明义，义理不明，校勘异同，不足以言考据。鲁论齐论，未有定案，何晏所从，自有独见，要于义有可取然后取之，不得以“清儒”二字为护身符。夫子十五而志于学，岂有一“五十以学”待五十岁才想念书之理？且学何书，明何人生哲理，始可以“无大过”，亦费思悟。五十乃夫子知命之年，正合鲁论。凡校勘版本，必原文未通然后改之。若俞樾之校正墨子老子是也。原文既通，不应改窜。读经最怕无识，人云亦云，妄引清儒肚子全无分晓，无识故也。

（二）所谓称引“清儒”，全是外行话，欺骗未读古书之青年可耳。须知清儒今古文门户之见甚深，后来愈演愈甚。齐论古论已佚，凤毛麟角，考而存之，自是可贵。清儒致力于版本异同，人欲引鲁论齐诗毛诗韩诗之异同，乃最容易之事，没有

什么可炫耀。须知清儒不但考鲁毛齐论之异同，并且极深门户之见，必欲打倒古文而后已。故若陈乔纵弃毛诗，攻齐韩，岂今人以论诗为古文，并不许引毛诗之句乎？或若刘台拱（客中无书，忘记书名）欲斥《左传》，捧公、谷，箴膏肓，起废疾，岂今人亦须从“清儒”，并不许引《左传》之句乎？又如近人据甲骨文，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记祖父兄名曰“辛”之误，岂今日中央委员说“在新民”，并不许引汤盘铭乎？此其所谓少见多怪。

（三）今人闻清儒之名，便吓了一跳。须知清儒之考据合乎科学精神云者，乃言其能用客观比较方法（若段之发明古音十七部，王之释“夫佳兵不祥”），非清儒所据尽是也。即如所谓伪孔古文之“定案”，细读阎（若璩）惠（栋）丁（晏）魏（源）所考，或谓出王肃，或谓出梅赜，或谓西晋时古文尚书已失传，或谓西晋未失传，或谓孔安国时并无今古文之则，愈考愈自相矛盾。且对于诸篇之真伪，每有先人之见，臆测武断之语甚多，最不科学。真能合乎科学（西洋文字学批评）条理者，寥寥无几，有之还是顾炎武论“相”、“业”二字而已。即使所考，似有可采，仍须以辞洽义安为主。此集释集解之所以为贵也。故若王先谦作《庄子集解》，孙诒让作《墨子闲诂》，参集各说，各有取舍，非必尽据《诸子平义》《经义述闻》也。若说某句某条未据俞说，遂斥为未见俞书，此帐何时算得清乎？

（四）清儒长于考据，拙于义理；宋儒长于义理，拙于考据。此陈兰甫《东塾读书记》之所以折中汉宋也。较之《汉学师承记》之一味讲“家法”，未始非清儒之一大进步。弃“五十以学易”，采“五十以学”，正坐此不明义理之通弊，甚不足取也。康

成注经，兼取今古文，正有卓识深见。吾人今日不谈经学则已，欲谈经学，正不必株守门户。不然，弃《左传》之妙文，斥为伪书，并不许人引左氏之文，岂不为有识者所窃笑？近游桂黔道上，汽车颠波不堪，无法看书，只好口占一首，以嘲读经无识强作解人之辈：

十五圣人便志学
五十学个甚东西
年少过庭学诗日
老年知命研《易》时
未闻桃李门墙满
犹学青梅竹马儿
强作解人浑无识
穷年终是破鼓皮

“五十以学《易》”一语既辩，缠夹二先生曲解吾文之他点，恕不复赘。吾所言者，原文俱在，一字可以不改，是否提倡“青年读《易》”，抑系论欲言儒必通《易》，愿与国人治学者及想阐明儒家哲学者互相劝勉之意。不难就原文“考据”一下，无置辩之必要。

三十三年正月卅日于贵阳。

（《天下文章》第2卷，第4期 1944年11月）

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

——10月24日在中央大学演讲稿

语堂按：本文发表《大公报》后，颇有凑热闹之徒，断章取义，颠倒是非，尽缠夹之能事。余以当日所言，任人如何歪曲，原文俱在，不难对证。且原文阐意极明，非有意歪缠者，不致误会，故亦毋庸另文答辩。兹将原稿重载《宇宙风》，并将可注意者二点，特为指出。非难文字，一曰"劝青年读《易经》"，二曰"中国亦有臭虫"。关于第一点，原文谓"认识吾国文化，本非易事……必有好学深思之士……始贯通得来"，且谓"儒家的中心思想必须找到，始可以谈到中国固有的文化"，而"《易经》为儒家精深哲理所寄托，非懂《易》，不足以言儒"。意思是"与国人治学者愿互相劝勉"。此"劝青年读《易》"一语所由来也。关于第二点，原谓"一国之大，错综复杂，自有不如意事，而自信心因以动摇。须知不但本国如此，各国皆如此，外国也有黑市……凡视一国的发展，总要眼光放远些……目前有不如意小事，应当批评与纠正，但自信的心理，必须树立。他事可以消极，抗战与建国决不容消极"。此"外国也有臭虫"一语所由来也。原文既在，吾不复多赘。至原文谓自己行年将近

五十，不敢说已懂东西文化，已懂《易》，乃学然后知不足者之辞，非仅困谦之语，以此“与国人治学者互相劝励”，冀当代国人对儒家思想，得更进一步的了解。乃竟有人亦以此语做文章，谓我未读《易》，不懂《易》，甚且造谣谓我不识于民十一年在柏林早已见过了焦循易学等书。凡此下流蜚语，皆无置辩之必要。

——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于桂林

鄙人这次归国，一则参观国内情形，征求抗战事实，二则报告国人国际政治思想动向，国外对本国流言甚多，传闻失实，或见诸文字，或出之口传，或为有作用的宣传，或只是无意识的闲话。这种徜恍迷离的局面要打破，便须供给确切事实。且一国之大，内在之能力如何，思想之动向如何，决非西人记者所能彻底了解与鉴别，希望此次回来，再到国外，能正国外的视听，并使外邦人士对中国将来发展的动向，有更亲切的认识。中国官方宣传，虽有组织，而文字宣传，实在太少，比起英国在美宣传，真是微乎其微。最近美国人士对中国的好感友谊，十分诚挚，但是因此对中国之将来，也很关切。我们应该纠正种种的错解谬说，使对中国的政府及人民的正常发展，不要有一点的怀疑。

关于报告国外政治思想动向，鄙人已著《啼笑皆非》一书，正在翻译中，并不多赘。所谓《啼笑皆非》，就是叫人哭不得笑不得的一种局面。所收的是公开的材料，所表的是私人的见解，也可以做我数年来国外视察之总报告。希望国人读了，对国际政治将来之发展及战后的局面，有更亲切之认识。我也觉得，国

内的人因为读物缺乏，对国外政治的暗潮，未免太隔膜了。

今日讲的是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何以挑这题目？因为我觉得国人还是缺乏自信心，自信心不立，就是没有心理建设，没有心理建设，物质的建设，便感困难。一国之大，错综复杂，自有不如意事，而自信心因以动摇。须知不但本国如此，各国亦皆如此。外国也有黑市，也有人弄权舞弊，也有骈枝机关，人浮于事的混乱局面，（美国中央政府职员多至三百万人可惊之数）也有吏曹因循成法推诿责任，也有政策未立举棋不定的外交等等。我以为中国如一大海，只看沙滩上的飘泊秽草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小玩意儿，是不足以言观海的。有人恶意宣传，正像向大海投石。投一担石海水不加多。取出所投之石，海水也不减少。凡视一国家的发展，总要眼光放远些，信心要坚定些，营私舞弊，固然也有，而抗战可歌可泣之事也所在多有。目前有不如意小事也！应当批评与纠正，但自信的心理，必须树立。他事可以消极，抗战与建国决不容消极，这才是纯正的态度。孔子说：立国之道有三：足食、足兵、立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以可以无食，去兵，而不可无信。信就是心理建设，而兵食是物质建设。可见孔老夫子并非物质主义崇拜者，也是心理学家。他精神与物质两方面是都顾得到的。

但是要一般社会有自信心，必需国人对于吾国文化及西方文化有一番相当正确的认识。认识吾国文化，本非易事；认识西方文化，也非朝夕可致。必有好学深思之士，通达古今，兼有悟力识见，始贯通得来。但学问之事极难。我行年将近五十，中文也看，西文也看，时时视察，穷其条理，对于中西哲理人生社会思想习惯始稍稍窥一个眉目，略知其条理沿革。然而我

懂中国文化哲理吗？并不。譬如《易经》，还是未窥其涯略。然《易经》为儒家精深哲理所寄托，非懂易，不足以言儒。孔子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太过。盖阴阳消长之理所在，不得以一本卦书等闲视之。故曰，学然后知不足。凡此皆吾辈所应致力之处。欧洲心理家容氏（C. J. Jung）谓看《易经》始知东方逻辑及思想法与西洋因果的逻辑不同，而且较合科学新条理，因为今日科学的基本因果律已经动摇。事理变化极为复杂，决非如前因后果的科学讲得那么简单。谁不相信这话，试将第一次大战的原委分出那个是因，那个是果，便知这断片的前因后果说是不通而与事实不符的。因果是同时并行的，互相倚伏消长，成为循环律而近于相对论。我也可以套孔夫子的话，假我数年，五十以学中西文化，穷究其源流，也许可以稍窥其梗概。这是我与国人治学者愿劝勉的。

现在中国思想是混乱的状态。外国文化，且不必说，本国文化也难有真知灼见的认识。但没有真知灼见的认识，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就不能建立。举一例，以前鲁迅说中国书看得教人昏睡，外国书看了就抖擞精神。他说外国虽有颓唐派，但是有生命的颓唐派，中国虽有积极入世的士大夫，但只是没有生命的入世士大夫。这种愤激的话，不能叫做认识。说贾宝玉做和尚是无生命，而《罪与罚》的主人翁自杀是有生命，是不通的话。左派作家说中国书有毒，《三国》、《水浒》忠孝节义的话都有毒。现在从抗战看来，大后方的老百姓，所听的就是《三国》、《水浒》关羽武松的戏，全没受过上海租界消过毒的洋青年的洗礼，然而抗战的力量，反而靠这些老百姓。你说中国书本上忠孝节义的思想有毒，试想怎么四千年传到今还能产生并

保存这样的好百姓，可见左派理论与事实不符，一味抹杀固有文化的理论，为抗战的事实所驳倒。这个哑谜摆在眼前，大家赶紧搔首，用脑想吧。所以这种愤激之论，不能称为认识。只能称为迎合青年心理。何以言之？今日青年，或者未读古书，于心有疚。你告诉他，古书读不得，因为有毒，岂不是使青年对自己说，幸哉我未读古书，幸哉我未中毒。《论》、《孟》读也未！未也；于是恭喜。《史》、《汉》读也未？未也；于是恭喜。所以大家不但不内心有疚，还应额手称庆。所以这叫做迎合青年心理。或谓古书有毒，或谓古书是封建思想，或谓经书未经整理过以前读不得。总而言之，理由很多，正如我们不愿意到朋友约会，也必有许多理由。至于左派前辈作家，自己躲在床上偷看古书，似乎十分歉意，也必造出许多的理由，或者说我是整理古书，不是读，或谓我明知是毒药，但是我是医生，有经验，还无妨看看，至于你们后进青年后生小子是万万吃不得这毒药的。

反过来说，中国近年也屡见复古的思潮。盲目拜外，固然不是，一味复古，也无是处。在这一点，更需要对于儒道释有真知灼见的学识。儒家的中心思想，必须找到，始可以谈到中国固有的文化。尤其要与西方比较之下，权其轻重，知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得一哲学条理，然后可谓学者的批评态度，然后可合大国之风。我想《大学》修身齐家治平的话，显而易见，其理易寻，懂得的人，十有八九。但是《中庸》一书，真懂中庸至德，而能以科学原理说出来的，也许国中没有几人。怎么叫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及尽人性尽物性之关系，都有玄通的哲理在焉。再如庄子齐物之论，列子商丘开之喻，都可与现代科学相对证，使理益

彰而意益明。这也是治学的人应用一番苦心，发明新知，使古今中外互相印证，这样做法，然后可以融会贯通，自由自在，书为我用，我不为书用，收古今中外为我注脚。

这是言研究方面，还有中外交际方面。刚才我说大国之风，愿以此四字相勉。每思今人，思想复杂，流于片断零碎。对于我国文化，信心未立，见诸行事，便失大国之风。孟子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上海买办洋奴侍奉洋大人的心理，可谓亡国奴的心理。见了洋大人必恭必敬，不寒而慄，这且不必论。但据我观察，不平等条约心理依然存在。外侨“中国通”轻蔑华人的心理未改，中国人之侍奉洋大人的买办心理也依然未改：因其未改，侍奉愈殷勤，愈引起洋大人的轻蔑。西人最要人自尊，看得起自己，你愈妄自菲薄，愈招外侮。这于近年来中外接触的事件上，处处可以发现。吾尝谓东方之道，让然后得，西方之道，攘然后得。鞠躬雅事也，但是对西人万万行不得，你鞠躬时，他从你背后一拍，你怎么办呢？倨傲不逊与叩头谢恩，两事都行不得，都不是大国之风。妄自夸大与妄自菲薄，都不是大国的风度。最要是与外人接触时，有自尊心，不必悖慢无理，也不必足恭逢迎，不卑不亢，是为大国的风度。事有必争便须争，若十九世纪半殖民地心理未解除，怕得罪洋大人，便一切外交都无可办。

今天所谈不及中西文化的本体，只当一个发凡。但是对于中外交际，我有两句话奉告诸位。(一)人必以平等自居，然后人肯以平等待之。(二)国家之事，我们若不争平等，外人决无将平等置在托盘上自送给你之理。这是我们目前最急要的彻底觉悟。

（《天下文章》第2卷第4期，1944年11月）